

Common Sense



梁文道

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
多为常识而已。
若觉可怪，
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自序

上编 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爱”：撕裂社会的爱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多元：不同的中国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大国：温柔的必要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投票（一）：为什么有时候它是不道德的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

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哀悼：与亡者和解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第三空间：“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间的空白

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位特别好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诽谤：为什么政府控告传媒不是一个好主意

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

下编 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政治激进派的豪赌

温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进路线

激进政治的自我繁殖

战争不能取代建设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

右翼版本的美国人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敌人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奥尔良风灾

爱国怎么毁了传媒

奥巴马的修辞学

奥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

建立在一本书上的国家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国王与我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世界到底有多平

政治游戏的规则

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世界银行”

买军火好比买玩具

有钱不一定有权

富豪治国

贝卢斯科尼——富豪政客启示录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传媒帝国的阴影

超级财团垄断传媒的年代

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

鸣谢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 梁文道

自序：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的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琐细，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去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

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语）；

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得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

上编：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当代中国庞杂繁复，有说不完的故事，谈不尽的现象。这里的文章就像人体切片，断流截出其中关键的部分，虽然犹如管中窥豹，亦可检视全体经络的气脉动向。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中国在过去十年之间走过的道路还真是奇怪，尤其自媒体取得相对开放的空间以来，明明我们看到中国有诸多问题和困难，但才一回头，却猛然发现自己突然之间竟成了一个叫人艳羡甚至嫉恨的大国了。明明我们是一个受了百年欺凌的发展中国家，这两年在国际媒体上看见的却是一片中国热。明明几年前我们还是那个被人妖魔化的国度，现在却目瞪口呆地看着中文成为各国学生的热门科目。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的不只是怎样登台当好大国的角色，还要在剧烈的场景变换和剧情转折中检视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所谓的检视与调整，不是只看几部电视剧，学一下古代王朝的往绩看一看西欧列强的盛衰；也不是教育国民讲风度重礼貌，外游之时不喧哗不吐痰那么简单。

说到反省一个国家的心态，鲁迅数十年前写下的“阿 Q”直到今天依然是最有力的象征。阿 Q 的故事比《伊索寓言》中的酸葡萄更可怕的地方，在于那只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只不过是说那葡萄是酸的，但可没说甜是不好的酸才妙。然而阿 Q 却翻转了正常的价值，打不过人就转而夸赞自己是世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狐狸顶多是贬损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阿 Q 则干脆把自己的可怜可悲转换成神圣光荣。

阿 Q 的故事说的除了是鲁迅眼中的国人通病之外，还很符合当时国际形势下中国人的自处之道。清末以来，中国人被现代殖民帝国打得透不过气，传统文化系统被西潮摧折得瓦崩砖碎。这都是事实，也是很多人看得清楚讲得明白的。可是与此同时，却有另一些人反过来把自己的积弱说成是一种美德。最可笑的莫过于当年英国大哲学家罗素那套“中国人热爱和平”论的流行。要知道罗素固然是位严谨的逻辑学家，但他对中国的观察则来自皮毛的阅读与走马观花的旅行，根本不值一晒。偏偏很多知识分子引之为知音的肺腑之言，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是高尚，热爱和平，发明了火药也不搞火箭炸弹。这，难道不是阿 Q 吗？

20 世纪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ax Scheler 继尼采之后，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 Q 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复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

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将自己的低下处境说成是高等的。就像阿 Q 和人打了一架之后却以自己的卑贱无能为美，又像中国给列强欺凌之后表扬自己热爱和平。

舍勒认为怨恨不只存在于个人内心，它还可以是社会群体的共有情绪，只要符合了两个条件，它就会产生。这两个条件之一是自己这个群体可以和其他群体比较；之二是觉得被怨恨嫉妒的群体之地位是自己可以达到，甚至本来就应该属于自己的。放在中国的具体环境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真有一片培养怨恨心理的土壤。首先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受了百年国耻，“各国不肯平等待我”，奈何自己往日又无力反抗，只好一方面心中愤懑“不忘国耻”，日日慢慢咀嚼这挥之不去的恨意。同时我们又会回想汉唐盛世乃至清初三帝的威风武功，认为这个世界第一的宝座本来是自己的。在这个基础上若再加上长期以来的教育灌输，一般能够扭曲价值扭曲世界观的怨恨就会不断生长茁壮了。

怨恨的表达相当多样，除了颠倒地肯定自我（比如说把随地吐痰讲成是中国人自在随意的表现），它还可以是种稍经刺激就立刻动怒的敏感反应（例如把某些国家的旅游景点特意以中文书写的“禁止吐痰”警告牌单纯地解读为歧视中国人）。更可怕的，是一种自我贬损的冲动。这两年来网上时常流传一些极度侮辱中国人的事件传说，其中有不少后来被证实是国人自己捏造的。为什么要自己辛辛苦苦虚构一些辱华的夸张故事出来，再去刺激大家生气呢？这就是怨恨心理导致的自虐了，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的地位卑下。

这种变态心理的反面表现则是盲目的自我肯定，例如以制造世上最长的拉面或全世界“寿”字最多的一面墙等古灵精怪的世界纪录为乐。许多个人、团体以至于地方政府乐此不疲地去创造或打破这些纪录，为的就是在那部巨大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上多添一行用放大镜才看得清的“世界第一”。

又例如任何一个地方县城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填进“让××走向世界，让世界认识××”的大型标语牌中，仿佛不让“××”走向世界，不让世界认识“××”，那个可怜的“××”就不存在似的。全美国有多少小城镇？怎么他们就没有这种大志？就算在京都和维也纳这些世界名城，你也不会看到这种标语，因为人家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给人瞧不起。

我刚才描述的这些现象，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而它们背后的集体怨恨也从未清除远离。现下中国在短短两年之间被世界公认为新兴的大国甚至强权，社会却仍然弥漫着一股自卑自怜并且扭曲颠倒的怨恨心理，仍然除不去百年国耻阴影下成长的吐信毒蛇。我们要怎么当个大国呢？

原题为“大国背后的毒蛇”
刊于《快周刊》2005年08月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两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是2005年全球纪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战时死亡人数最多的俄罗斯在纳粹德国投降的六十周年，于莫斯科红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一队苏联红军接受俄罗斯人民的英雄式欢迎，光荣无比地经过克里姆林宫，一派战胜国的气势。反观死伤数字比得上俄罗斯、战时国体残败犹有过之的中国，对之却表现得相当低调。而且全国上下的官方机构、各级传媒也是多谈当年的苦难国耻，少谈胜战的荣耀喜悦。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方，中国却表达不出一一种胜利的感觉。二是近期各种国际媒体竞相吹嘘中国的强大崛起，《经济学人》甚至以“中国统治了世界经济”为题做了个专辑。而东南亚各地的传媒和民调也显示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日益增加，仿佛王朝时期的朝贡体系随时再临。但是中国人自己却不这么看，部分百姓则把美国日本当做凶险的国家。似乎八国联军围攻京师的日子还没过去，四处仍有强敌环伺，我们依然处在“最危险的时候”。

当然“中国威胁论”有夸大不实的地方，也有很多国人对当前中国的地位深感骄傲。但是巡视一遍中国各大网站的网民言论，我们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种浮躁不安的情绪。听说韩国要求中国人以后改称“汉城”为“首尔”，有人立时上升到民族尊严的层次，说些“我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你韩国人凭什么？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之类的话。少数更极端的言论甚至要合并蒙古、越南，好“振我汉唐天威”。另一方面则是无日无之地讨论美国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时时处在被威胁甚至灭国的危机之中。这两种表面矛盾的情绪其实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都是无法确切把握中国在国际上的位置、没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同一种民族主义的体现。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这一连串的创伤通常可以简单地归结成四个字：内忧外患。而内忧与外患不只互为因果，并且相互缠结在集体记忆的根干上，剪不清理还乱。在这一系列的外患里，由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战沦丧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国外患史上最大的创痛，其伤口至今淌血，其经历仍然历历在目。因此抗战似乎仍未结束，中国也没有一种战胜国的气度。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日本的责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壮大土壤，令其国民历史认识不够透彻的冷战体系，同样影响了中国的抗战记忆。二战结束之后，

随之而来的冷战固然使得许多日本战时政府的官员再度出山，占日美军当局也以保持社会稳定的理由没有彻底清算天皇体制。就算是蒋介石也要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不敢开出适当的赔偿条件，反而“以德报怨”，甚至还请日本战犯当军事顾问好对付共产党。另一方面，为了争取日本成为盟友，中共也曾不断向对方伸出橄榄枝。今天这个局面，难道只是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责任吗？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这尊著名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阴朝北，饶是如此，观众向它献花致敬也往往要经官方批准和组织。近两年来，曾有人民自发向其献花却被公安问话阻挡的事例，请注意这些人还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据知他们只是想悼念抗战英烈而已。何况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非专为抗战而设，它纪念的是“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典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现代民族国家用来纪念其创基人，然后凝聚民族认同的常见手段。其无名可以形成一种意义上的空洞，让民族国家的建立超乎个人行为，诉诸集体的牺牲与经历。简单地说，每一座无名的民族英雄纪念碑都在诉说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国家诞生的故事，一段现政权合法由来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它表达了一种从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故事。抗战在这1840年以来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片段。

那么八宝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纪念个别死者的方式保存记忆，但一不是专为抗日战争而设，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战英魂。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愿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

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璉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开始，民间史学界陆续挖掘国民党军队史迹。近年政局以“民族统一大义”为前提，以对抗“台独分裂分子”为要务，大陆媒体重新处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开了。甚至有官员公开说“蒋介石也没有投降啊，他也坚持了抗战”。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在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记不只仍有战争受害者活到今天，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还留在民间，许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地方传诵。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表現同样令人失望。港英时期的“重光纪念日”在回归之后改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只持续两年，到了1999年就干脆取消，为的只是维持《假期条例》里十七天公众假期的上限。政府总是想推动爱国教育，难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吗？

原题为“如何纪念抗战”

刊于《明报·笔阵》

2005年08月17日、2005年08月24日

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关于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见不是批评救灾工作，也不是“过早”出现的重建监督，更不是怀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总总的“分化言论”。比方说日本救援队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却救不出一个活人；又比如说某些艺人商人捐钱捐得够不够多。很多人都已正确地指出，天灾面前，我们不需要更多的对立、分化与偏见。可是在这些涉及人群的比较和分类的各种言论里面，有一种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几条事后终被证明无根据的谣传。例如姚明这回献出的款项是不是还不如他捐给美国新奥尔良风灾灾民的多呢？几乎在灾后的第三天，这个故事就开始在网上流传了，许多人一时气不过，纷纷大骂姚明不是中国人，向美国球迷献媚，浑然忘了祖国的苦难。直到有人认真核查过资料，发现这是没有凭据的“误传”之后，这个故事才止于智者，争论也渐渐平息下来。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兴未艾之际，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神奇的故事。话说某城某夜，一间酒吧里来了一位面貌甚斯文的男子，他主动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们攀谈。然后他挑起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比较日本人与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一直笑眯眯地提问，总想引导大家承认日本人比中国人优秀。大伙越谈越觉得不对劲，渐渐发现这个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青年原来根本是个日本人，而他的言论也极尽辱华之能事。故事一上网，自然激起公愤，很多人觉得这鬼子太过放肆，撒野撒到中国的土地上了。

虽然这个故事看起来很不真实，也有不少人怀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参与讨论的网民还是觉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声，是以成为反日的坚实证据。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它的流传过程和演变，有人说那个城市是武汉，也有人说是北京，还有人说是上海，总之在哪里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内容也越来越详细，那名日本青年一开始只是谈到两国人民行为生活的差别，后来则主张日本的统治有利于中国人的进步，最终甚至还说出了中国女孩应该会爱上日本男人的话……

假如这真是个虚构的民间传说，第一个创作它出来的人到底在想什么？后来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有什么动机呢？从效果上看，这个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对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是为了证明日本人有多坏，替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说，参与创作的这些人似乎觉得大家对日本的仇恨还不足够，应该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个传说一样，它不是先有一个确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满；而是先有不满，才回头为自己的情绪制造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

我们不只可以看见人对偏见的执著（我们讨厌日本人，讨厌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为此捏造事实好说服自己和别人，我们的讨论是合理的），还会发现这种情绪表达方式的怪异。它分明就是一种自虐，我们硬是想证明日本人对我们有多歧视，姚明又是怎么地离弃我们；似乎在这里能够找一种残酷怪异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经描述过幼童的一种奇行，他发现他们有时会把自已藏起来，好让大人找不着，这时他们会感到格外的紧张，深怕大人会自此忘却他们，甚至趁机抛弃他们。可是在这个躲藏的过程里，他们却又享受着刺激的快感，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然后，他们或者被发现，或者干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来，与父母相拥团圆。这就是有名的“去/来”（fort/da）游戏，后来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无数的诠释和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正如一人偏执地怀疑伴侣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为对方变心的蛛丝马迹，甚或幻想出丰富的情节。表面上他很痛苦，实际上他很享受。当伴侣九牛二虎地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之后，他那失而复得的满足才能达到最高程度。

问题是这个结局并不是真的结局，对爱侣忠诚奉献、对父母全心爱护，以至于对他人的认同，肯定是一个永无止尽的追寻。所以小孩会一遍又一遍地玩着这种游戏，情侣

会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与许诺，直至我们真正长大真正自立。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为。从中日两国的复杂历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于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又能不能说我们对叛国分外执著，总是怀疑他们一旦出国扬名在外就会断根叛逃，于是希望他们费尽心血地证明自己仍然是个百分百的中国人？

当我们缺乏自信，心存疑虑，因此形成对他人的偏见和要求时，这种情绪的表达是不会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因此震撼全国的灾难也就成了让我们尽情表露偏见、区分人我，从而自虐图乐的时机。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

刊于《am730》

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

“爱”：撕裂社会的爱

原来陈水扁还是个老师，意外地给所有中国人上了一堂启蒙课。

自从他汇款瑞士案曝光以来，天天都有新消息，日日都有新发展，情节比电影还要好看。他的死忠支持者要不是改弦易辙大呼上当，就是痛心疾首垂头丧气。最可圈可点的，是其前度亲信，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一席话：“原来过去传闻证实是真的，……大家太信赖阿扁的权威及权力，将一切都交给阿扁，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导致一个人的错误，造成民进党的危机。”

过去那么多年，陈水扁政府有过那么多弊案传闻，为什么蔡英文和民进党的支持者全都没起过半点疑心？难道就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太信任他吗？他们之所以“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与其说是陈水扁太有权威太具魅力，倒不如说是一连串更宽广的基础因素。这里头或许有同坐一条船的党性作用，或许有外人不可察的共犯关联；更重要的，可能是种思考方式的盲点。

正如台湾评论家南方朔先生所说的，在民进党执政的8年里，台湾社会已经被一道轴线切割为两半了，你要不是爱台湾，要不就是不爱台湾；支持陈水扁就是爱台湾的表现，而反对陈水扁自然就是不爱台湾的明证了。这条轴线的成立，不只是靠陈水扁个人的功劳，甚至也不单是其核心团队的责任，它还是一种建基在“本土主义”的民粹情绪。陈水扁团队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把民间恐共的情结、日益狭隘的本土化倾向，和各路媒体的商业操作，一一扣连整合起来罢了。

“爱台湾”不只是民进党政府的旗帜，还是台湾许多“地下电台”的招牌。听过那些电台节目的人，都晓得他们讨论问题的模式。任何对于政府的批评与质疑，哪怕是多么局部的问题，都会轻易地被人扣上帽子，觉得那是蓝营的偏见甚至阴谋，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则一定是蓝营的同路人；蓝营的人都不爱台湾，他们爱的是中共，他们根本是一群台奸；所以他们一切挑战和疑问背后的真正目的就是出卖台湾。在这样的舆论气候当中，所有问题都被移形换影地替置成“爱不爱台湾”，“是不是台奸”的伪议题。你觉得“三一九”枪击案还没查清楚？那么你一定是不爱台湾。你觉得扁嫂吴淑珍既然收到传讯，就该好好上庭受审？那么你一定就是巴不得台湾灭亡。有些商人甚至只是指出政府经济政策紊乱，都会被人怀疑他们是不是被中共收买了。于是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提问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诚；任何一个批评，都像打在棉花堆上的拳头。于是社会论述变得愈来愈空洞，宛如一片沙漠。论述没有寸进，社会又怎能不空转呢？

这些人为什么会“放弃了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其实他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只不过是把一切问题都思考成了一个问题，把所有判断都变成一种价值的判断。这才是大部分陈水扁支持者的病灶。

回过头看，近年大陆的民间舆情难道不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吗？一道切割社会的轴线正在隐约成形，你不是落在“左愤”（左派愤青）那边，就是落在“右愤”（右派愤青）那边。且不说特别敏感的政治话题，有时候就连“范美忠老师遇震先逃”这么单纯的社会现象，就连某条河道污染治理这么实际的环境问题，都能在网络上演化出爱不爱国的抽象争论。仿佛只要你有一点不同意见，你就是在用外国传媒的角度看事情，你就是洋奴，你就是不爱国了。反过来说，如果你赞成政府的某项政策，你就是被当局洗脑的愤青。在这种环境底下想要客观地探讨一些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果把所有问题都上升到很高层次的爱国之争，那么还有什么事情好谈呢？如果所有议题都被简化成一个议题，那么大家又能学到什么？又能怎样利用“自己思考、判断的能力”呢？

原题为“灾难时期的自虐”

刊于《明报·笔阵》

2008年08月21日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乔姆斯基是我最敬仰的知识分子之一。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揭发美帝国主义的真相，对抗美国历届政府和主流传媒的霸权，不只使得他的政论著作只能透过小型出版社独立出版，更令他长期遭到《纽约时报》等主流传媒的刻意漠视（至少在“九一一事件”以前）。所以当我知道他的著作陆续中译出版，而且粉丝众多之后，我真的是非常高兴。

可是渐渐地，我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原来乔姆斯基的许多中国追随者只看见了他狠批美国的那一面，却忘记了他也是个美国人这一点的启示……

同样不大对劲的感觉出在内地一些朋友对我的看法上。本来嘛，我从马克思追读到齐泽克，思想上一直自认是左翼分子，香港还有人批评我想复活共产主义呢。偏偏内地却有人见我老讲民主，于是将我归类为右派，甚至推测我一定是美帝走狗。查“左派”一词本来就源自法国“三级会议”上坐在国王左侧的激进民主派，左派不讲民主难道还要让右派讲吗？至于美帝走狗一说，那就更是天可怜见了，美军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时，我不只先后参与了两次反战游行，更是其中一些活动的策划人之一。到了香港主办世贸部长级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反对欧美主导的全球化的示威运动。假如这也是走狗所为，我就不大懂走狗的意思了。

近日不少西方主流传媒在报道拉萨事件的时候频频犯错造假，结果一群中国网民和海外留学生联合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我也觉得异常兴奋，因为大家终于认识到一向标榜客观中立的西方主流传媒其实也不乏坏种，而且还自发地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可是再细看下去，那股熟悉的不对劲的感觉慢慢又浮现了。

有些人似乎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很含糊的“西方反华势力”，以为西方主流媒体一定也是听命于政坛的反华派甚至政府本身。其实那些媒体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它表现出深植的偏见和意识形态机器的共识运作。首先，那些西方主流传媒实在不是政府可以直接管控的，就算是国营的“BBC”也有相对于英国政府的一定独立性。根据乔姆斯基等人的长期观察，西方主流传媒、大企业和政治势力等三者之间固然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和公关网络，但有时更要命的或许是媒体人那种未经反省却又自命正确的价值观。照他们的价值观形成的潜在共识，中国政府是个压迫人权的政府，中国传媒也是不可信的宣传机器，所以中国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省自觉（因此才会有人诬蔑 Antic nn 有官方在背后做手脚）。于是在西藏和人权等议题上，他们往往就失去了客观的坚持，不惜以截图等手段扭曲真相，好持续控诉中国，并且获得“政治正确”的自我满足感。

事实上，西方也有不少专门和主流媒体对着干的独立媒体，常常揭发前者系统化的偏见，尤其针对默多克这类强行把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利益取向灌入旗下媒体的大亨；当然，这些网上的独立媒体通常也是左翼的。关于西方主流媒体制造共识的复杂内情和独立媒体的概况，以后还可以再向大家介绍。我现在只想再次提醒大家，那些独立媒体的确很少批评中国的传媒，因为他们得先忙着监察自己国家的主流传媒，看它有没有自我审查甚至造假。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年04月10日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时间过得真快，再过几天就是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1999年5月7日）九周年的日子了。想当年，也曾有群热血青年上街示威，在美国驻华使馆外慷慨激昂。那批年轻人现在在哪里呢？那位剃光了头，在顶门上画了炸弹标靶，人群中格外显眼的学生如今到了哪里？回首那段日子，这群热血过的年轻人不知又有何感想？九年以来，中国的年轻人经历过两次反美浪潮，一趟反日大游行，以及最近抵制家乐福的反法运动。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些运动将会成为几代学子的集体记忆甚至身份界标，于是当大伙聚在一块初次见面的时候，不用自报年岁，只需说一句“我是反日那一拨的，你是反法的吧”，便知彼此长幼有序了。

也就是说，“反x”（“x”为某一个国家）成了九年间许多年轻人的共同背景。问题是，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同背景？所谓“反x”指的又是什么？这两天，中央政府递出了橄榄枝，愿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会面；法国总统又派出了政坛元老拉法兰当媒人，前来中国修好。这一切和缓紧张局势的迹象正好能让我们有点呼吸的空间，好好问一些基本的问题。

现代民族主义的一大特色就是它无限扩展国家范围的能力，不只往日发生在现今国土范围内的历史是国史，所有的人民是国民，即使是大自然中与世无争的景观和物种也能一一纳入国家的范围，和民族拉上了神秘的联系。例如朝鲜的金刚山，它不单是座雄伟的高山，还“象征”了朝鲜人民的民族精神。又如四川的大熊猫，大家都知道它是“国宝”。从一个个的人直到花草鱼虫，莫不共享了一种人人皆能感受得到却又不容易解释得清的“国族精神”。这股超越个体的“国族精神”不只贯穿了一切，反过来，那些被其涵摄的个体也能随时代表“国族精神”的整体。这抽象的“国族精神”与无数个体之间的关系，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与多的状态。

所以当法国有人试图抢夺奥运火炬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自动觉得这不是一部分人的意见，而是准许这些事件发生的法国有错。当巴黎的市政府打算把“荣誉市民”的衔头颁发给达赖喇嘛时，这也不只是一个市政府的错，而是全法国人民的责任。当法国媒体非议中国政府的个别政策，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是法国与中国的全面对决了。

依照这样的逻辑，反法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愤怒的网民们针对的不再是持某种政治主张的团体，也不再是一个城市的政府，更不再是几篇媒体的报道，而是整个法国和它所涵盖的一切。因为任何一个拥有法国国籍的人，任何一件来自法国的事物，都神秘地代表了法国。反对法国就是反对那些我们所不满的个体和单元，而反对那些个体与单元就是反对法国全体。

经过反美、反日、反法甚至是反韩的风潮洗礼，内地不少青年学到的就是这种一代

表多、多代表一的民族主义逻辑。当然这绝非中国的独有产物，而是一种普世的现象。美国人和韩国人也会反过来以为海外侨胞和留学生就代表了全中国，看见部分情绪激动的留学生痛扁了自己的记者一顿，就觉得这是全体中国人要入侵国土了。只不过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短短九年间就已经历了数次“反×”运动。这些运动就像一种集体的社会仪式，参与者在其中通过言词和行动的反复操演，可以从实践中习得这种极度简化的思考方式与想象力，把个别的东西和意见迅速地无限上纲成玄而又玄的“国家”或者“民族”的代表。而且这还是一种必将反向操作的实践，也就是说，越是以这种方式看待对立面，就越会以同样的态度为自己寻根，尽量寻求和肯定属于自己国家的东西。再简单点讲，就是反对对手的所有，同时肯定自己的全部。

到了这个地步，所谓爱国就是要爱自己国家的一切。所以柏杨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有人为“死了一个汉奸”而鼓掌，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柏杨写过《丑陋的中国人》，说自己国家有问题的人，又怎能不是汉奸呢？

原题为“一即一切的民族主义逻辑”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年05月03日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色，戒》走红，连汉奸也重新成了热门话题。有人说李安与张爱玲丰富了汉奸与爱国志士的形象，还他们人性的本来面目；也有人说这叫做美化汉奸，所以不只本来就很成疑问的张爱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变成新汉奸了。

我们中国人学历史就像小孩看戏，任何人物一出场，首先要问：“他是忠臣还是奸贼？”除此之外，再无第三条路。这种看待历史的方法对还是不对？只要把同样的眼光挪向我们此刻身处的现实测试一下就行了。你说马英九是忠的吗？他为什么也要赞成台湾“重返联合国”呢？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尾随美国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么判断他恢复英国经济活力的政绩呢？你能肯定地说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俗话说，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等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宽大地对待汉奸，而是要历史地对待历史。什么叫做“历史地对待历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历史的境况之中，看人的转变，事件的出现。谈论汉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汉奸”这个概念放回历史里头，审视它的生成与演变。

忠奸之辨远非全然相对、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不过我们也不能否认大部分的汉奸在他生前是不会轻易接受“汉奸”这种称号的；所谓“汉奸”，多半是后人的判断，而

后人的判断则往往依据了不同的标准甚至某些个人的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陆各国也纷纷掀起了肃清“通敌者”的风潮（“通敌者”一般英译为 Collaborator，他们似乎没有“德奸”、“日奸”和“荷兰奸”的概念）。那是个百废待举的废墟年代，广厦已毁，人才难求。于是在现实的需要下，许多货真价实的“通敌者”者——过关，重回舞台，重操故业，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可是这里头也有一些人为求自保，就大力检举昔时友伴，因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发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显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战前在事业上极不得意的人，比方说没什么天分的年轻指挥家，这时以爱国者的姿态出击，狠批几位造诣非凡的大师曾经出任纳粹伪职，主理过一批大牌乐团或者歌剧院。他们的言论很正义，但是他们的心态很阴暗：既然我在专业上爬不过你的头，我就要在爱国的问题上绊倒你，取而代之。

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关于“通敌者”的糊涂账，西方史学界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实况绝非历史剧里那般正邪分明。反观中国，几乎所有超越简化、二元对立模式的声音都成了异议，甚至也成了一种“汉奸”的雄辩。可是，另一方面，也还是有很多人觉得事实不是如此

简单，比如说汪精卫到底是不是汉奸呢？这就是一个令很多人感到困扰的问题。大家都很难想象，曾经追随孙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谋刺满清摄政王而入狱，且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好汉子，怎么就会成了一个与日本议和，成立南京伪政权的大汉奸呢？于是坊间就有许多传说了，其中一种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这样的：其实汪精卫是假装的，他早和蒋介石串通好了，俟时机一至，他就会起兵反日。

其实这种美妙的民间故事依然不脱传统忠奸二分的历史观，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象。大家不只希望能够准确地把汪精卫嵌在一个简单的范式里面，还很希望一个好人能够由头忠到尾；既然汪精卫一开始是条好汉，他就应该继续好下去，这才符合我们既有的世界观。

但是什么叫做好人呢？我们能够稳当地判定一个人是真正的爱国志士吗？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国史权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里面指出，孤岛时期的上海有不少业余特工，他们平常可能是文员，也可能经营家小店铺，收入不大好的时候就受雇去施袭暗杀。假如事败被捕，说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更常见的或许是李士群和丁默邨等有名的汉奸，你说他们亲日倒不如说他们是想谋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说的“职业革命家”，搞革命不是为了理想，而是为了谋生，革命于他们而言不外乎职业。为什么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游走于国、共和汪伪之间，最后又秘密地替重庆政府办事呢？这就是因为他们全是职业的特工，谁给活干就帮谁，处身乱世，但求苟存。加拿大著名的

中国史学家卜正民在他的近著《Collaboration》（且暂译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有些人曾经帮侵华日军指认出匿藏于平民中的败逃国军，结果害死了这

些抗日军人，看来这应该是最罪大恶极的汉奸了，但这种恶行却起到了保护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们免遭日军滥杀的厄运。那些汉奸的目的到底是为了无辜百姓，还是纯粹无耻的自私呢？我们很难判定，因为我们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为就定了他们的罪，没有兴趣去翻箱倒柜查档案深究他们的口供和心理。

或许是外国人的缘故，没有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还举了很多实例说明现实情况复杂。比方说历经屠城之后的南京就有一个典型汉奸，城里的洋人称之为“famous Jimmy”，这个王姓汉奸在日本人手下负责分配粮食给市民，同时提供一些妓女慰劳日军。卜正民认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难判断其行为的好坏。一方面他极力向日军争取最大限度的粮食配额，使许多百姓不挨饿；但另一方面这也曲线地强化了日军占领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来中国女子供侵略者享乐，同时这却也使得日方不再有借口任意欺凌妇女。

历史绝不只是一堆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从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的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的立场有关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抗战史至今仍是一块荆棘满布的森林，两岸曾经各有不同的诠释，连国民党共产党谁的功劳大都还是问题，不过两党都以领导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论证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如此，双方的官方史学就都必须以一套分外分明分外严格的标准辨识那混淆

灰暗的年代与人物，不容半点含糊。因为历史教育始终是国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责任生产一批符合标准的好国民。何谓好国民？典型在夙昔；何谓坏国民，汉奸簿上斑斑可数。

只不过这种符合国民教育目标的史学不一定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为道德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一堆抽象的原则，提供几个完美的人物典范，还要给出一些复杂的处境，让学生知道怎样在现实的环境(尤其是黑白难判异常艰困的处境)下明智地行动，把道德原则应用在实践的需要之中。多年以来，中国和海外的史学界对抗战的历史研究已经推进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没有进入大众的意识 and 教育的层面，特别是汉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换上更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他们，不是翻案，也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而是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别忘了，所谓的“是非不分”，并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为何物，而是他们虽有是非观念但不知怎样实践在具体的时空当中。汉奸的历史不就正好说明了这点吗？

原题为“焉能辨我是忠奸”

刊于《南方周末》

2007年11月14日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如果一种公共议题反复被人拿出来探讨辩论，那么理论上大家都应该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发展出更理性的自我了解，学习到更丰富的认知方式。可是一种议题的循环再现，有时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巩俐加入新加坡国籍这件事，网民迅速把它变成一场关于爱国与“汉奸”的辩论。为什么这个国家有那么多人想当“汉奸”？大家又为什么如此关切爱国这个课题？这种议论方式的重复乃至垄断，很容易就会阻碍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许会更有兴趣也更有建设性的角度，比方说人才的竞争。

没有一个国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来源则不外乎自己培育与对外引入两种。我不知道巩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国际人才市场的竞争上从来就处在一个主动出击的位置上。它固然也着力于培养自己的年轻人，但更擅长把握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去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内不可能制造得出来的生产力。与它本是同根生的马来西亚自从实施“新经济政策”开始，就在教育和就业创业的机会上排挤掉不少优秀的华人精英；而新加坡则近水楼台，很方便地就把这些无法在祖国大展拳脚的精英吸纳了过去，使他们成为这个弹丸之地的发展动力。近年中国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标锁定在中国身上，不只用奖学金吸引中国学子，还让他们不用费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资格，反过来变成前进中国拓展新市场的先锋部队。它的策略如此大胆激进，乃至本国老百姓开始心生不满，屡有怨言。

这也许是一个岛国的生存之道；对他们的政府来讲，问题不单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这个世上最优异的人也变成新加坡人。相对而言，中国人口庞大，人才的储备层次也远较新加坡丰富多样，似乎用不着学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猎头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天的美国人口数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属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要用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为什么它还要持续拉拢移民，甚至出到网上“绿卡彩券”（The Green Card Lottery）这种怪招？其实在对待国民身份这个问题上，美国的策略可说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有才华，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么地方，我都欢迎你。比起新加坡，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制度和土壤的开放；假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

虽然自从“九一一”事件之后，很多人都感到美国的大门正在日渐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

美国还是诺贝尔奖的大赢家，它生产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目乃世界之冠，这里头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人来说

吧，在得奖的时候他们几乎全都拥有美国国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后给予他们良好研究环境和资源的，却是这片大洋的彼岸。

为什么美国能让这些中国人摘取学界桂冠？何时我们才能见到一位在中国本土的学术机构做研究的中国学者得到这份殊荣呢？这是很多爱国心切的中国人都曾问过的老问题。在我看来，我们其实还可以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见到一位任教于中国大学的日本学者、英国学者，甚至一位美国学者赢得诺贝尔奖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也是中国的骄傲呢？

假如我们的学术体制和文化环境非常优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国名家来这里过上半退休的优渥生活，还能引来一群正处黄金岁月的青壮学者到此钻研学问，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孵育出顶尖的中国籍学者。只不过到了那时候，“代表”中国去领诺贝尔奖的人在种族上是不是中国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土壤丰美，社会开放，真真正正不负大国之名。

面对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现实，要思考的课题不只是他们爱不爱国，也不只是怎么留住他们，更是如何不让中国成为全球人才竞争的净出口国。同时，我们也许要调整一下心态，换掉那种常见的种族爱国主义；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个长得像“外国人”的人说着一口流利普通话，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台上，甚至当上了国务院的部长；我们是不是承受得了？

原题为“从巩俐想起李白”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12月03日

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

在北京奥运会举行之前，很多外国传媒认为，渐趋狂热的中国民族主义将要再上一层楼。如果中国在金牌数目的竞赛上真的一举超过了美国，那就更是火上加油势不可挡了。诚然，运动竞赛从来都是巩固国族认同的理想场合。自己国家的选手得胜，自然会深感骄傲；就算败了，也能在那难过的瞬间体会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不论输赢，只要是国际性的较量，都能凝固出国家的认同感。比如说我是 NBA 湖人队的球迷，但是当 Kobe 对上了姚明带领的中国队，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在心理上站到姚明这边，盼望 Kobe 失手。

可是，如果以为京奥就一定会催生出一一种失却理智的民族主义，把中国人全都变成一帮心理狭隘的群氓，那也未免太小看运动自身的逻辑了。尤其在体坛最神圣的奥运会上，运动本身的逻辑甚至会对那种预想的狂热起到意料之外的调节作用。

身为美国女排教练的郎平回国，恰巧同在机场的棋圣聂卫平发了顿牢骚，觉得她跑去教导外国人很不象话，简直不是中国人。结果棋圣反而引来不少批评，理由是在充份全球化的体育世界里，请外国人当教练根本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中国自己也有不少「外教」，难道他们都是自己国家的叛徒吗？

当年为中国取得奥运第一面剑击金牌的「扬眉剑客」栾菊杰，如今是代表加拿大参加京奥的选手。本来依照近年部份愤青的逻辑，实在没有比这更叛国的了。可是在她于赛后亮出「祖国好」的横幅之前，在偶现的讥刺声中，更多人却为她以五十高龄仍然奋战战场上而感动。

我们固然怀念她当年替中国赢回的光荣，同时也总是佩服那些永不言倦永不言退的选手，因为那是体育精神。

在一场团体赛事之后，有网友注意到拿银牌的日本队上领奖台时只和拿铜牌的加拿大人握手，却不理会中国冠军队。这位网友立刻被人讥笑。因为依照次序，金牌得主是最后登台的，难道你要日本队在上台前先绕到后头找中国队握手吗？有一位网友留言：「先多看几场比赛，摸清楚奥运的规矩，再来这里说话吧！你这个狭隘的小愤青」。

更妙的是当日本「蛙王」北岛康介得到第一面金牌之后，很多论坛上的留言不是外人想象中的不屑以及对日本的惯性批评，而是「亚洲的骄傲！祝贺北岛，希望中国也要加油」，简直友好得一塌糊涂。可见体坛从来是块英雄地，这块地方胜负分明，只要裁判公正没人耍诈，不管成绩如何人人都是要服气的。在大部分的赛事里面，就算事先很被看好的中国代表输了，观众也只能叹声可惜，然后照样会为胜者鼓掌甚至叫好。这也是体育精神。

反过来看，总是挑剔中国民族主义和国民性的人这时就会遇上滑铁卢。在国篮对阵美国与西班牙的时候，有些人批评中国球迷自我中心太没风度，老在对方射罚球时大喝倒采，嘘声满场。内行的球迷马上回击：「你懂甚么？这是篮球常规，不管是 NBA 还是国际赛，主场球迷一定会想办法干扰客队罚球。不懂篮球就少说两句！」。说得好，奥运确实让人更爱国，但也别把所有爱国的观众当成被洗脑的傻蛋；运动，到底是有自己规矩的。

原题为“奥运一定会让民族主义更狂热”

刊于《am730》

2008 年 08 月 15 日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一提到近日席卷中国各地的反日浪潮，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思想陷阱：要不义愤填膺地在旁呐喊打气，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边，抱着怀疑犬儒的态度冷嘲热讽。以上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并不足取。此外，当然还有很多论者会同情中国民众的情绪和立场，同时呼吁游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愤青”保持冷静理性；但又往往失之于缺乏思想的深度，点到即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看这场反日浪潮，又怎样确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后浮现的所谓“日本问题”呢？

让我们先来看看怀疑各处反日游行和行动的诸种论点有什么问题。有些论者（包括我的好友）认为发生在过去一周内的各处游行只是官方暗中发动的虚假“民间行动”，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许真正由人民自主发起的抗议集会。我觉得这种说法实在太过想当然耳，纯粹来自对于中国社会的刻板印象，脱离实际甚远。凡有机会采访过当年在北京抗议美军“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集会的记者，都知道那一次游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许，甚至还有学校加入组织，派校车接送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可是这一趟游行却大不相同，不只没有官方介入的迹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组织单位（如“爱国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两个网友以网上留言和手机短信动员起来的“聪明群众”（Smart Mob）行动。而且几条游行路线的设定也是临时“走”出来的，充满了随机应变的色彩及意外。

其实只要看多点内地新闻就知道，这一两年来由民间发起，但政府事先一无所知的群众运动不在少数。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我并不是要说中国政府已经大开游行自由之门，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国的确可能出现既非官方策动，亦非官方可预先阻止的民间群众集会。最近的反日游行就是这样一种集会，只是官方明显地没有干预介入。

也有些人强调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种默许。从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的潮流开始，一股势力愈来愈大的新民族主义就日渐成形，并且助长了所谓的“愤青”现象。在这个过程里面，官方的确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说是积极的倡导，而可以是左右透过传媒报道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的细致，就可以构成助力。不过如果过度重视官方的角色，可能就会忽略了民间自主及社会内在的种种因素，可能就会轻视了政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构成了当前民族主义的热潮。关于这点，我以后还会另文细谈，现在暂且不表。

当然，还有朋友提出历史反省的责任问题，认为中国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历史，认真道歉，同时却掩盖自己历史上的失误。我赞成这个说法，可是在同意之余也有必要指出，中国自己的历史忏悔意识不足，不等于日本也自动地不用忏悔。同样地，就算当前民间反日情绪是由中国官方鼓动，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广州的游行是由官方组织，也不等于批评日本修订教科书就是错误的。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官方默

许”和“官方引导”，就要否定中国民间的反日情绪和它所针对的问题。

还有一种看法在内地也相当流行，就是主张“抗日不如自强”。与其罢买日货，不如先搞好国货的质量和信誉；与其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散布仇日言论，上街焚烧日本国旗，不如集中精神检讨自己的社会体制，壮大国家实力。这种想法的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了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强化中国本身，于是可以漠视仍然在世的慰安妇继续得不到合理赔偿，而且还要受到日本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侮辱（按该书的说法，慰安妇其实是自愿的军妓）。第二个问题更是严重，因为它很容易就会导致一种“今天我且哑忍，瞧明天我强了之后谁狠”的复仇心态。什么叫做“自强”？我们“壮大国力”之后要干什么呢？这里脱不掉一种把中日历史问题看成两个彼此竞争总得分出敌我高下的简化国际观，不只解决不了眼前的历史罪恶如何分析如何解脱的问题，且徒添了威权式的国家主义。我们根本随时都要反省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目的是为了民众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胜过日本就可终止。

简单地说，所有怀疑反日情绪的看法就算全部正确，也无法遮盖明摆在这里的“日本问题”。但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反日情绪，所有那些包括抵制日货和伤害日本留学生的反日行为，就都是正确的呢？当然不！“反日”从一开始就反错了对象，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意图加入联合国安理会、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与美国军事联防和钓鱼台问题一股脑地混成一团，并且连接各种各样的“日本人论”，本质化成了对日本的整体否定。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可说非常精准。但如何区分反日与反罪？怎样分析反日情绪？“日本问题”又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問題呢？

上面我强调不能把当前席卷中国的反日游行活动看成是官方鼓动的结果，除了还民间自发行动的清白，正视国民情绪之外，同时也想提醒各种不同立场的论者，把这一连串的集会说成是由政府鼓动和操纵，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怀。因为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比如说在战争历史的事实争论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欢先从中国的学术界不够自主不够自由开始，进一步推论所有学术研究都脱不开政府影响，而结论就是中国学界所说的“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南京大屠杀”无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传。同理，他们也不愿意相信中国百姓会有不经政府组织的游行；就算有，他们也会认为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结果。

这种中国印象是冷战结构的产物之一，战后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其主流社会把日本与中国的区分，界定成自由民主开放的世界和封闭专权的铁幕世界之别。如今日本右翼与战时军国主义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于它把这种“民主”话语从传统左翼手中抢了过来，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种资源。透过这套话语资源，

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试图复兴天皇权威，但另一方面吊诡地以民主和开放的旗帜再次宣扬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优越性。所以当日本保守阵营指摘中国学者虚构史实、官方暗中发动示威的时候，不只是否认战争责任这么简单，而且是再制造日本的优秀先进和中国的专权保守这种特定印象。

令人气馁的，是所谓的反日糊里糊涂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团，情绪胜过理性，对于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种种过当行为，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坏”之外，就再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因此才会有抵制日货、袭击日本留学生乃至至于破坏日本餐馆等种种行为。照这种全面否定日本的逻辑来看，现代中文里所有来自日本的外来语，如“广告”、“现金”、“干部”和“建筑”，是否也全都应该扫地出门，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学者在谈起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政府右倾化背后的理路时，要比一般中国知识界来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当走红的小森阳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里面，指出了日本自卫队赴驻海外、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保守派试图修宪与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四项事端的因果逻辑。他认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盟军”后援，明显是要把自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同时也是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试探手段。而修改宪法使自卫队成为名正言顺的军队，则是想把日本变成“正常化国家”。这里所说的“正常化国家”，几乎完全是由军事力量的正名来界定的，可说是把军队当成了国家的资格证书。至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它的一个小秘密是为了预防有自卫队员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为如果真有这么不幸的事件，日本国民肯定会质疑他们的子弟何以要去为美国人的战争送死。可是只要根据传统，把死去自卫队员的灵位供奉在靖国神社，有天皇的威权笼罩，他们就成了为国捐躯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纯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就是想再度巩固靖国神社与天皇国家的关系，而且这也有助推动修宪。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日本的宪法要有第九条这么一条，全是来自它过去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是想让日本成为“正常化国家”，想让日本国民接受修宪（须经半数公民投票通过）；把靖国神社从一个供奉战犯的地方，转化成一个供奉所有为国捐躯者的正常军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征工作了。修改历史教科书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的，采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书的学校少之又少；但是相关组织的普及历史读物却是市场上的畅销书，而且抱持类似史观的出版物也愈来愈多。在小森阳一看来，这是日本右翼与政府里应外合的文宣行动，目的就是给大家洗脑，酝酿半数国民支持修宪的理想土壤。

可见日本政府和民间右翼的诸种举措并非毫无关联，不是一句“日本人玩嘢”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而所谓“历史问题”也不像某些倡导“对日新思维”的学者所言，是一种可以放在脑后、与现实利益无关系的包袱。缠绕着中日双方的历史问题不只仍然在世

的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双方后人的集体记忆与民族感情之中，而且还是一股可以影响现实政治的力量。否则日本右翼尽可提倡修宪尽可提倡建军，又何须汲汲于修改历史掩埋史实？如果历史真的可以轻易地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什么1980年代看《龙珠》长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树的那些内地年轻人，现在怎么会把怒气烧在日本头上？

“反日”必须弄清目标，一方面针对战争历史的罪恶，另一方面要把历史和现在的政治局势联结起来分析，才可以对准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盘计划。对于“反罪”的问题，碍于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论。

原题为“既不犬儒，亦不激愤 —— 分析日本问题”
《明报·笔阵》

2005年04月16日、2005年04月20日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二之一】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

蜂拥一时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压制底下，看来暂时是平息下来了。为了遏止人民的愤怒，许多机构采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报章干脆把“日本”二字列为禁忌，不要说不能发表反日言论，就算一篇介绍日本餐厅的文章也得暂时禁刊。但是在民间酝酿多年的仇日情绪是否就这么简单地烟消云散了呢？当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迟早还是要再拿上台面，所以许多民间人士倡议的“反罪”运动因此还是得继续推动，有关的论述也必须继续深化。

说到反罪，说到日本的战争责任，很多人会直觉地以德国在二战之后的表现来做比较，追问日本人为何不像德国人那般深切忏悔。得出的答案往往归结到日本文化的本质或者各式各样的“日本人论”，例如人类学家本尼迪特(Ruth Benedict)经典著作《菊花与刀》里的著名判断：日本的“耻感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这种化约的文化解释不只大而化之摆脱了历史细节，而且过度强调了日本的特殊性，反过来正好证明了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认错，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这类很知识分子的论述方式，竟然与大陆网站上激进的平民言论不谋而合。那些被认为很民粹很粗暴的愤青同样觉得日本是“死不认错”的，因为“日本人骨子里就是这么贱”，只不过知识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学术词汇罢了。

我们的确可以也的确应该把日本拿来与德国比较，只是我们不只要问“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那般痛切自悔”，而且还得自问身为战争受害者的自己：为什么我们不像纳粹

受害者那样去追究加害国的责任呢？纳粹德国在波兰、捷克、俄罗斯等多国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历史问题”、“德捷历史问题”与“德俄历史问题”，而是被视作一组跨越国境的“反人类罪恶问题”。当一个波兰犹太人在战后痛斥当年纳粹暴行的时候，他会很清楚这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历史仇恨，而且是发生在波兰的一件重大罪恶，这个罪恶也曾降临在其他国家之中。反过来说，有多少中国人意识到在抗日战争以外，曾经有过万菲律宾战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日本在整个中南半岛杀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国人有兴趣去了解日本帝国在韩国怎样推行皇民化运动？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吧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同样地，包括《经济学人》在内的许多西方知名媒体也倾向淡化日本的战争罪行，将其描述成“日本与亚洲多国的历史矛盾”，并且详列战后日本官方曾经作出的道歉次数，证明日本业已清除罪责。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意见认为他们道歉道得够多了，不懂中国干吗还老叫他们认错，觉得这是一种利用历史的勒索手段。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么样呢？恐怕不只各国传媒将严辞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过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悔意的谢罪；而在于尽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于公开声称侵略亚洲其实是解放亚洲，却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至于成为中国人抗日战争记忆坐标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历史学界的争论之一是死亡的确切人数。中国史学界大多坚称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超过 30 万；而日本方面则有史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可靠，因为当时南京城内根本没有 30 万人。历史事实的确要客观地发掘研究，但是无论当年死者的确切人数有多少，都不可能改变屠杀事件的邪恶性质。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难人数直至今日仍有争议，但它灭绝人性的恐怖本质却毋庸争论，更何根本地去否认它的存在呢？可是如今日本有些右翼学者要不干脆宣称“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要不就是把焦点放在罹难人数等“无关宏旨”的技术问题上。

为什么日本不像德国？这是因为中国人、日本人乃至于世界各地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当作是纳粹德国那般的反人类罪恶来看待。当然，有很多论者以为纳粹的罪恶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类型，而日本军队的暴行则只不过是所有战争都会出现的暴力加大码罢了。下次我将说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二之二】我们无罪我们只是小零件

“手下不留情的残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亲胎内的孩子。看到乳儿的话就抛到空中，在母亲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儿给母亲看。”这是二战时期曾在中国服役的日本军人服部弥

一的证言，他接说：“到战场之前连一只小虫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兽性的内部潜伏以杀人游戏为乐的不知深渊的魔鬼生命。”这段话最可怕的，在我看来并非那种残杀婴儿的手段，而是一个曾经连小虫也不敢踩死的人，怎么会成了以屠杀为乐的凶手。

另一位日本军人在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华中特遣军直属部队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由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支毒气作战部队。因为国际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种部队。这名军人参与过当年进攻南京的作战，在部队里很受尊敬，因为他的性格温厚，被认为是个“忠实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杀之后的3个月，他进驻定远，写下这么一封信：“.....现在眺望定远城外，风景异常清明秀丽。柳吐新云，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黄。平原千里，一望无垠，远处迷迷蒙蒙，但见白云嫋嫋.....明丽的春光任何汉字的形容词都可当之无愧。尤其是杨柳之绿、油菜花之黄，颜色鲜艳近似原色，极为悠然自在的构图.....”转战异国，犹能寄兴春光的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师、电影导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藤忠男曾经指出：“实际上小津只是不能够积极赞成军国主义，决不是消极地不赞同军国主义。”小津的为人“可以侃侃而谈个人道德问题，但一提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之类，就有些羞于开口。如果说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么这个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础就在于此。谈论个人道德个人能够负责，然而社会、政治问题即使谈论个人也难以负责”（佐藤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艺术》）。那么，参与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气，到底是个人的事，还是社会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会怎么想，因为在他那些贯注了人道精神与平民关怀的电影里，没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对比起粗野不文的美军，德国军官总是一派儒雅，喜欢诵读歌德甚至能够弹一首贝多芬的奏鸣曲。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参与如此骇人听闻的冷酷残杀呢？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学家汉娜·鄂伦(Hannah Arendt)去耶路撒冷旁听纳粹党徒艾克曼(Adolf Eichmann)受审时，心里带的疑问。她惊讶地发现“艾克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来自遵从命令，顶多就是特别热心军阶晋升罢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过是“一座机器里的螺丝钉”。

“平凡之恶” 错在放弃

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恶”(evil of banality)。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像难以言传的邪恶。“真正困扰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朋友的行为。持续一生的友谊可以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就因为害怕错失了加入历史的潮流。他们只是在纳粹的威势面前

失去了自己下判断的能力。”(Hannah Arendt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很多学者形容纳粹的罪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像力的边界。而汉娜·鄂伦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在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正是因为这个“平凡之恶”的观点，我们可以讨论在独裁专制的政权底下，个人的道德责任问题。去逼问当年的德国人何以不反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恶是如何由每一个人不经意的每一步逐渐积累而成。纳粹党卫军不都是痛下决心要做凶手的，他们可能平凡如你我，他们甚至可以是个熟读康德知书达礼的“好人”，他们只是渐渐地交出了判断的能力。

因此我们可以拿日本与德国相提并论，因为在二战期间，它们的社会都是极权主义盛行，“平凡之恶”浸淫了整个国度。服部弥一是个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个温情脉脉的谦谦君子，但是他们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能力。

所谓“日本军国主义”其实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种社会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为中心，由上而下一层层地构成了整个国家的秩序。在这个秩序里面，个人没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动完全是上级替他规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称之为“不负责任的体系”。可是得注意这套秩序并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什么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维新之后才透过各种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来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彻底接受战争责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话，使得大家重新认识到那部大机器里的小零件，到底是个有自省能力可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对于推说“我也是个被国家欺骗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须像对着错愕的艾克曼一样，指出他埋没理性终于与邪恶合作的历程。配合冷战日皇逃过战争罪责可是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国指挥部，却为了即将开展的冷战，选择保存日本“国体”和社会稳定，不去触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责，将首相东条英机列为A级战犯；另一方面则努力让日本国民感到自己也是无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传所骗。于是非常诡异地，曾经有一半人口驻在海外的日本，却从未大规模和系统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经历，彷彿它从来不曾是个殖民帝国。一切罪责，全在那极少数的战犯身上。而直至今日，发表过《人间宣言》的日本不只有动摇过天皇的无上地位，他的神圣价值甚至死灰复燃，再次成为右翼尊奉的对象。顺带一提，近日很多人谈论的《菊花与刀》，本来是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战时为美国官方写作的“敌情分析”。她认为天皇在日本是个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政治的神圣领袖，超出了价值批判的范围，受人尊重但不一定与战责相关。战后美国统治当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据之一就是这位人类学家的分析，尽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过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

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最近有人常说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担历史责任。其实要反省的，又何必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原题为“告别反日，深化反罪”

《明报·笔阵》

2005年05月04日、2005年05月11日

多元：不同的中国

说起民族文化，原来还有人相信粗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各个民族间的关系也一定是彼此竞争优胜劣汰。再加上斯大林式的民族消亡论的影响，于是就有人主张汉人的“中华文化”硬是了得，其他各族不得不服，早早汉化方为上策。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拜读人类学者蔡华教授《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时的震撼经验。虽然纳西摩梭人的故事早已名闻遐迩，“走婚”的传说也令许多人浮想联翩，但却是这部著作令我第一次发现摩梭人社会结构之独特，没想到就在中国，我们终于找到了可以改写整个人类学的无婚姻社会的存在证据，它让我发现，自己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原来没有我所想的那么自然那么标准。

假如我有一个孩子，我一定也要让他知道摩梭人的故事。让他晓得，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如果孩子稍微懂事了，开始和我一起听我心爱的爵士乐唱片，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当年第一次见识到新疆“木卡姆”的感受。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了，我还在读中学，“香港大会堂”有几场“十二木卡姆”的演出。音乐会结束之际，那几位乐手突然来了一大段即兴演出，在场的资深乐迷一下子全热起来了。孩子，你或许不知道，中国也有这么一种音乐，它的即兴火花完全不下于历史上第一流的爵士大师。

孩子或许会开始翻我的书，觉得几本禅宗漫画入门真有意思，里头的公案怎么会如此古怪。然后，我会告诉他一则伊斯兰苏非派的圣哲传说。

有一天，老师正在闭门静修，一个冒失的弟子跑去敲门。老师问：“是谁？”小徒弟想也不想便答：“是我呀，师父。”于是老师把他打发走了。隔了一阵子，徒弟略有所

悟，又去敲门。老师就问：“是谁？”这回小徒弟福至心灵地答道：“是你。”老师很高兴，然后告诉门外的弟子：“进来吧，因为这间房子容不下两个我。”

怎么样？孩子，想不到伊斯兰也有这么“禅”的东西吧？你知道苏非派曾经在新疆显赫一时吗？

如果孩子长大了，居然和我一样迷上了哲学，他或许也会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嫌中国哲学不够理论化，逻辑的成分不足。这时，我将向他介绍藏传佛教格鲁派开宗祖师宗喀巴的著作，让他了解藏传金刚乘的知识论是何等地复杂何等地严密，然后他将明白为什么西方学者会把宗喀巴称作“东方的康德”。

当然，身为汉人，我也会掌握机会教他一点儒家的道理，虽然我可不敢要他走我幼时走过的路，天天吃力地背诵四书。但是，我一定会尽力告诉他什么叫做“和而不同”。陆象山说得好，“千古圣贤若同堂合席，必无尽合之理”。而焦循解释“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时把“攻”训为治学的“治”，也就是要告诉我们面对异端的说法时不要执一，于是冲突之害自然就能避免了。

假如你问：“什么是中国？”孩子，这就是中国了。你我何其幸运，生在这样一个国度，同时拥有儒家、道家、伊斯兰和藏传佛教等深厚的传统可以学习，有几十个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可以继承，有大陆的本土左翼思想脉络，有香港的英式法治文化，有台湾的民主实验……这一切一切都是中国。想象一下，它们的交流冲撞，会爆发出何等巨大的能量呢？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地美丽。

原题为“生物尚求多样，况乎文化”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04月23日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虽然中国人曾经喜欢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我们对世界人民其实是不大感兴趣的。例如三年前在香港举行的世贸部长级会议，明明来了那么多世界各地的工人和农民，明明有那么多代表弱势来自草根的团体；但当我提议某大传媒机构的新闻主管去采访一下他们时，他却不置可否。直到一群韩国农民和香港警方发生了激烈冲突，这家传媒的记者才亢奋地跑到前线，把港岛街头当作战地，务求捕得最刺激的画面。

自从1999年“西雅图起义”开始，俗称的“反全球化运动”就从来没有退潮过。哪里有富裕大国召开高峰会，哪里有跨国财团举办大型论坛，挟着“我们到处都是（We are everywhere）”口号的示威者就会跟到哪里。无论是世界经济论坛、世贸组织会议，还是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这群反对派几乎无役不与，力图争取曝光机会，甚至直接举行

破坏会议的游行。他们的背景复杂，议题不同，但一般学者皆以为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左翼大结合，是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美国主导的新帝国的最新力量。

中国不只是世上最后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大国，而且有着丰富的反帝传统以及第三世界联结合作的经验；可是十年以来，这等国际级反帝盛会却从来不见中国人的身影（少数香港代表例外）。不只如此，我们甚至连人家到底是谁都搞不清楚。因为中国的主流传媒和受众都不是很有兴趣，我们大可在国内反精英反权贵，但只要一到了国际场合，我们却变得比谁都精英，只关心最传统的大国政治和最保守的外交战略。

例如刚刚在日本洞爷湖落幕的 2008 年度“八大工业国高峰会”，主流传媒最注意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加入其中，似乎都把这趟混水当成了国家地位提升的证明，丝毫没有想过这个会议的虚伪和霸道。至于那些示威者，我检索了一下中文网页，全是他们如何游行的花边，几乎没有人深入介绍他们的议题，分析他们反抗的理由。

在报道今年八大工业国高峰会时，最有内容的就是说一下会议的成果，批评一下他们怎样无心解决全球暖化，如何无力应付油价高涨。可是大部分传媒都忽略了“八国峰会”反对者的声音，如此一来，我们廉价的批评反而会蒙蔽了大家的眼睛，看不见“八国峰会”的很多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响应全球关切的危机，而在于它响应的方式。

比如说，一般传媒都会质疑美国等农业出口大国有没有增加对外粮食援助，好像只要它们援助的数额够大，就算尽到富国责任了；如果它们的援助力度不足，大家就批评它们没有良心。如此取态根本就被八国峰会集团设定的议程牵着鼻子走，毫无独立批判的能力。可是只要听听民间团体和示威者的声音，我们就会发现所谓“援助”其实是个陷阱。因为美国一向破坏公平贸易的原则，大量补贴本国农业，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养出了不少肥大的农产商团，打垮了第三世界的无数小农。

它现在的“援助”只不过是个掩眼法，先用钱买下本国农产品，再拿去转赠他国。于是美国的大农场主照样享受了国家给出的另类补贴，穷国的农业则始终无力自立，不能竞争。请问，这样的援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粮食生产不足的难题吗？也就是说，即使美国非常慷慨地大施援手，也不表示它真正“协助”第三世界的饥民。

自从“拉萨事件”以来，中国今年最流行的话题就是西方传媒的偏见和霸权，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凡是在“八国峰会”这样的场合里面，在这种和国家尊严无关但却实在影响到了全球弱势平民的议题上，中国主流传媒和热血网民却突然变得很不在意西方主流传媒的偏向，并且很愿意跟着人家设置的路子走呢！

话说回来，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有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都变得

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不见了”

发于“牛博网”

2008年7月29日

大国：温柔的必要

运动和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没有。然而，正因为大家都相信运动和政治没有关系，运动的政治效应才能发挥到最大程度。情况就和艺术一样。当纽约爱乐乐团破天荒往赴平壤演出时，它的指挥马捷尔也是如此回答记者的问题：“我不想谈美朝关系，我们是来演奏音乐的。”可是大家都晓得这次旅程不简单，效果一如昔年的乒乓外交，要是把音乐家和运动员换成了外交官，不只成效截然不同，甚至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些人人称道的美事。

中国再三强调奥运和政治无关，人家偏偏就越是要利用它来为难甚至羞辱中国，因为他们看见中国确是以举国之力来承办奥运，确实想藉着北京奥运展现国家新貌。英文的“torch”本来只是火炬的意思，在中文里则变成了“圣火”，于是有人就觉得抢夺“圣火”果然可以掉中国人的面子了。其实，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参加过出境外的奥运开幕式，但布什既然受邀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典礼，于是三位总统候选人就都要拿住这点做文章了，好像布什来不来真的很重要似的。

我的意思不是要中国人都带着点阿Q的心态，一起不把奥运当回事；我只是想指出一点很简单的现实，那就是你越紧张什么，别人就越会把它当成目标。

过去短短几年之间，中国崛起突然从科幻式的预言变作现实，不仅许多西方人一时接受不了，连不少国人好像也适应不及。没错，我们好久没做过“大国”了，所以还不大明白当大国的代价与心理准备。做一个大国，必备的心理条件之一就是要明白别人会怕你，会因为你的体积庞大而加倍注视你，会因为你的影响深广而格外提防你。十年之前，英美等地的报刊还只是偶尔报一报中国来的消息；到了今天，任何一份有点自尊的国际大报都不能忍受一天没有中国新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老是在电视上看见美国的一桩枪击案甚至微不足道的小花边呢？如果不是现在，至少也是不久的将来，中国境内的治安事件也将会得到这等级别的对待。同样地，美国大概是最被这个世界上最被人针对的国家了，从年头到年尾，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全球的反美示威加起来大概能够组成一条全年无休太阳不落的链条。终于，在最近的反北京奥运示威浪潮之中，我们总算也感到了身为世界第二强国的滋味。

所以，当大家不满西方的反华示威，愤恨于部分西方传媒的偏颇报道时，千万不要

以为我们还是那个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羸弱小国；恰恰相反，中国已经是个令人畏惧的世界强国了。又由于中国跃升的速度如此之快如此之猛，别人的疑惧就更是深重。了解到这一点，我们的心态方能恰当转换，方能更好地应对当前处境。

看近日的西方媒体，从独立的网站到主流大报，虽然批评中国人权问题与西藏政策的仍占多数，但另类的声音也开始渐渐出现了。例如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专栏作家西蒙·伯恩斯就指出，反北京奥运的浪潮其实隐含了种族主义的逻辑。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事实上，从关注西藏问题开始上升到针对整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氛围里面，我们的确可以发现一种非常简化的倾向。最初只是批判中国政府，后来则仇视一切在海外声援圣火传递的华人，以为他们全是受到洗脑的官方传声筒，最后更闹出了 CNN 主持人卡佛说中国人是“一群五十年不变的呆子和暴徒”的事件。伯恩斯反问他的英国读者：假如有外国人跑来揍你一顿，说你们英国人有份侵略伊拉克，你会有什么感受？由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变质为反华情绪，从批判中国政府的集权跳跃至仇视所有中国人的集权性格，这里头潜伏的正是对中国崛起的恐慌。以前有人害怕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会抢走大家的饭碗，现在则无法接受这座工厂背后的价值观和自己的不同。他们怕的不只是个一般的大国；还是一个陌生的、不一样的大国。

面对这种情绪，应该如何回应呢？我以为与其用强悍的防卫姿态去刺激出更大的反应，倒不如学学狮子的步伐，轻缓一点。不是说抗议不对，而是平心静气的柔性态度可能更合身份，更有效果。假如别人冤枉你是暴徒，你会用暴力恐吓他的方法去叫他认错吗（例如某些网站上声称要痛打外国驻华记者的帖子）？

北京奥运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用不着再夸耀，那是人尽皆知甚至因此忧虑的现实；现在要宣扬的该是中国的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和民情理性。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原题为“大国的温柔与世界的梦想”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年04月17日

口音：“港台腔” 错在哪里

听陈水扁用国语演讲，会发现在那挥之不去的闽南口音之中，偶尔有几个字他咬得特别用力，音发得特别标准，听来反而叫人更觉突兀不协调。这令我想起幼年在台湾上学的经验，很多本省籍同学在家里说惯了闽南话，在学校突然要讲标准国语，多半都说不好，这意味着他在国语课永远拿不到高分，更意味着他永远登不上台，代表学生发言致词。可是很奇怪，在不断的苦练之下，这些同学永远有几个字的发音特别准确，就像今天的陈水扁一样。这几个字是他们在当年的政治气候底下力争上游的结果跟痕迹。

最近有些广州本地网民发出了抗议，他们投诉本地报纸的标题和内文日见“北方化”，充满了广东人看不懂的北方俗语，结果惹起了语言与地区关系的文化争议。其实何止用语，地方口音的位置在更早时候就成了这几年来的热门话题。广电总局曾经多番下令，约束各省市电视台和电台的方言节目，而主持人则更应尽量避免说话带着“港台腔”。但怪的是，即便中央台节目本身也充斥了大量的“京腔”和其他北方俚语，难道北京口音就不算口音，只有台湾和广东的口音才叫口音吗？语言从来都是政治的。世界各国使用的标准语言多半不是自然演化的成果，而是人为的创造。现代标准“国语”的概念是经济和政治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产物，很多学者对这个过程都做过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从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去探视“标准国语”或“普通话”的兴起。根据这种路线的研究，标准语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部分，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内部沟通的无误，成为全国通行的正式语言，然后再确定它的语条、文法及发音。“标准语”和“方言”的差别因此在纯粹语言学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差别主要还是一种政治的区分。

当一个国家的标准语确立了，国境以内的其他语言当然也就成了方言。至于这个标准语内的字条发音，本来从人类声发的自然机制看来，就算是同一个字，也不可能有两个人的读法是一模一样的(因此治安情报机关才有可能用“声纹”去鉴别对象)；可是通过现代电子传播技术，官方还是可以尽量推广一种标准的发音方式腔调。这项任务通常交由各国公共电子传媒承担，例如中国中央电视台与英国BBC(英国广播公司)。

你很难从一个人相貌判别他的出身、籍贯和阶级背景，但是你却可以从他的口音听出这一切。由于说话口音最能表达一个人身份，所以许多关于出身背景的偏见及歧视就能围绕着口音发展起来了。比方说大量与地方方言口音有关的笑话，除了是发挥沟通误会这种经典喜剧课题之外，有时候也是在拿大家对某些地区的刻板印象来开玩笑。而在香港，粤语口音的准确与否也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土生土长香港人的准则，因此一直是歧视“外江佬”、“阿灿”、“表姐”和“新移民”的重要依据。

因为从大众传媒到教育系统，大家都在推广和维护一种标准语和它的发音方式，久而久之，乃至大家都忘了即便是最正确最标准的说话方法其实也是一种“口音”，进而

将其它一切偏离正轨的发音都判读为“口音”。所以我们才会说某些说话有“口音”，却从不抱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有种“中央口音”。这情况就和美国白人忘了白色也是一种颜色而把其他人种叫做“有色人种”一样。

正当中国还有许多关于口音和方言的争论甚至官方禁令之际，我想起英国 BBC 前年开始的一项重大变革，那就是正式招聘了一些带有“苏格兰腔”和“威尔士腔”等不同地方不同阶级口音的播音员。大家都知道 BBC 向来标榜字正腔圆的“女皇英语”，是英式英语的标准尺度，因此其他国家的人常常通过收听 BBC 节目来学英语。但是 BBC 发现它在维持标准之余却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是间接催生不少地域偏见和阶层歧视，不利于社会和谐，也跟不上英语全球化时代英语发音正在日渐纷繁多样的趋势。所以他们下了一个破天荒的决定，让各色各样的方言口音涌进这个重要的平台。其实只要是在一个可以听懂可以沟通的范围之内，不同的口音和不同的地方俚语不只可以促进宽容与理解，更能够激活和扩张标准语的生命与内容。BBC 这个极有远见的改革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一点启示吧。

原题为“方言与口音的政治学”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 年 01 月 18 日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中国该不该继续用龙来代表自己的形象呢？没想到这个问题竟然成了近期的热门话题。事件的缘起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吴友富，自称受到委托，要研究设计的是“dragon”，而“dragon”在西方人的文化里恰巧是种穷凶极恶的怪兽，基督教传统更以它作为魔鬼的象征。所以，中国要是想在这个世界里树起强大但不霸道、崛起但是友善的形象，就不能固守“龙的传人”这个身份了，至少得把这条龙修改一下。

消息传出之后，民间反应大极了。最可料见的，当然是种种民族主义的回响，大家纷纷痛骂这位吴教授数典忘祖，为了献媚洋人竟可牺牲民族尊严，置千年传统于不顾。另外还有人从学术角度入手，分析龙图腾的源流，指出此龙不同彼龙，咱中国龙不仅不恶，还吉祥得很。

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来得太急太快。它太急，急得根本还没弄明白吴友富研究的全盘真貌；也忘了问到底是谁授权他做这项研究，以及这个研究的结果又会如何应用。它太快，快得大家没有时间去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更根本的问题呢？那就是在讨论龙是否适合代表中国之前，我们要不要先搞清楚什么叫做一个国家的形象代表？它的作用是什么？产生这种形象代表的恰当程序

又是如何？跳过这一连串问题，我们关于龙的种种说法都只不过是闲谈温谈罢了。

自从商界开始关心品牌效应以来，企业的“身份标识”(CI)就越来越受重视了，大至企业的标志，小至一个信封，都成了商业设计师大展拳脚的地方。流风所及，连国家也变得可以当做一家企业来包装，大家希望为整个国家和它的不同政府部门设计出一套视觉语言，以准确传达它们的价值、文化和理念，以及它们想让人看到的那一面。

在这股新潮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丹麦的例子了。在二十多年前，丹麦人民常常上街示威，他们讨厌政府的官僚作风，讨厌政府那种高高在上与民对立的作风。于是丹麦政府开始在原有民主体制的基础上厉行改革，一方面想要加快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想要重新拉近人民与政府的距离。在这场改革运动里面，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形象再包装。所以丹麦政府找来了著名的设计师林内曼(Bo Linnemann)，为政府和国家重新打造一个时髦而亲民的形象。他和伙伴们如今遍见于丹麦的大街小巷，从政府大楼顶上的纹章到路边邮筒都是改造的对象。

在这项庞大的计划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丹麦那顶著名的皇冠了。皇冠一向是丹麦人最熟悉又最认同的象征，其地位与中国的龙差不多。但是皇冠又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带有太强的皇权威势，而且过于古老土气，所以林内曼从皇冠下手，为它设计出几种微调变形，把它放在不同的字款之中作出多样的配搭，又尝试着上各种颜色，结果就是丹麦官方各部门的新标志了。

林内曼的设计令人耳目一新，它们的线条充满简约的北欧风味，还给人时尚可亲的感觉。这次改造充分突显了丹麦想要强调的政府透明度和友善的施政作风，可以说是真正的形象工程，与中国某些地方争建堂皇大楼的区别不可以道里计。

从丹麦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身份标识”只是它的外观，想要创造崭新的形象，首先要有新的政治作风。企业管理学告诉我们，一家企业的形象是它企业文化的面孔，这个道理放在国家的层面上也是说得通的。没有根本文化的改变，一切外形的换装都只不过是皮相的伪装而已。

其次，国家的形象设计首先针对的一定是内部的国民，只有国民支持和认同，一个形象标识才能彻底地体现出国家的性格和品位。事实上，近年丹麦旅游产业和国民外交种种宣传工作，也是建立在这套原来针对国民的形象工程上的。国家的形象设计，不只是为了给外人好印象，更是为了要凝聚本国民心。

至于什么样的形象才是国民认同的形象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拥有众多的方法和工具去寻求答案了，其大要不外乎本着民主精神的研究和调查。国家形象不能只是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的结果，更不能任由官员发挥主观意志；它必须来自自由下而上的意见表达，经过公开的讨论再渐渐成型于专家之手。

最后，我们发现再古老的形象也可以焕发全新的气息，威权霸道如皇冠也能够变成可爱的象征。问题只在于有没有想像力，有没有敢于突破陈规的创造勇气，有没有真正

的高手去执行工作。

再回到中国龙的争论,我们的问题就很清楚了。新形象的念头来自何处?它有没有全新的施政风格去配合呢?这个形象是做给自己人看的呢,还是纯粹指向外人?国民认同这个新形象吗?又有什么程序去保证这点?谁有资格去负责这项重要的计划呢?就是吴友富教授吗?

原题为“不是龙的问题,而是形象的问题”

发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12月08日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我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走进北京故宫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一阵错愕。我以为这座世上最大的皇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建筑瑰宝,今天就算丧失了卢浮宫的奢华,少了东京御苑墙外的静穆,至少也是体面的。最起码,它得有世界级国宝博物馆的庄重。

然而,在穿过故宫大门之后,我看到的却是几块绘上了清宫人物画像的木板,脸部挖了孔洞,好让游客把脸凑进去扮演皇族拍照留念。这明明是三流仿古游乐场的恶俗玩意,怎能放在堂堂紫禁城内呢?再看两旁的商店,蒙尘窗口上贴了几张摇摇欲坠的红纸片,拼出“纪念品”和“商店”等字样。且不要拿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的专营商店来比了,这等门面恐怕连一般中等商场里常见的连锁成衣店都不如。当时我看见这等光景真是又难堪又心痛,但是我又安慰自己,国力不强,文化发展水平还不够高,一时达不到世界第一流水准也是正常的。假以时日,必有改善。

十几年过去了,再进故宫。那种胡闹的乐园式配套设计依然没有多大改善,只是多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

最近中央电视台主播芮成钢在博客里炮轰星巴克,说它把分店开进北京故宫是明目张胆的文化入侵。于是引来内地网民的热烈讨论,有人支持他,要求星巴克滚出去;也有人反对他,说这是不尊重合约精神,人家签好了约就有权留在此地。

其实在判断这是否文化入侵之前,大家的讨论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基础层次,那就是故宫管理部门的责任。星巴克在商言商,哪里有游客就哪里去,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问题是场地管理者为什么会放它进来呢?我说的还不单是文化入侵这类很容易引起情绪反应的“民族大义”问题,而是管理机构想为场地营造出何种整体形象的问题。

好比一家商场,主事者自会为它选择合适的商店,以配合整家商场的形象与格调。北京半岛酒店不会让永和豆浆进去开业,香港置地广场也容不下麦当劳,哪怕它们出得起再多的租金;而一间针对低消费阶层的百货公司则根本不会费心拉拢高端客户。同理,

一间有水平的博物馆也必须明白它营造出来的环境就是它留给游客的印象了，更不提故宫这种世界文明遗产。

主事者在设计整体形象的时候要先回答几个问题，首先是整个场地的定位：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神圣的地方，还是一个老少咸宜的教育中心呢？它是一个面向全球游客的国际化休闲场所，还是一座纯粹的民族文化圣殿呢？然后就要探讨里面该有的配套设施了，例如它可以像韩国故宫那样完全杜绝商业活动，也可以学习卢浮宫的顺应潮流。接下来他们要顾及细节，从导游手册的平面设计到厕所的环境安排，全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半点也不能马虎。

以故宫的现状看来，它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让美国连锁咖啡店轻易进场，甚至也不是我之前所说的没有品位；而是它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晓得要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与其争论高而大的文化入侵，大家不如一齐探讨故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题为“慎谈文化入侵，多谈故宫定位”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2月09日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虽然有许多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计划经济体系翻案，认为它并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么一无是处，甚至还起过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可是今天，仍然相信并且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到底是寥寥可数了。中国也曾是个奉行计划经济的大国，但是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难道不就是一个国家逐步退出经济生活，让市场机制代替政府计划的历程吗？除了仔细掌握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分寸，把握好政府在这个程中的角色和定位之外。我们现在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中国会不会也渐渐放弃“计划形象”的老路，不再硬性地经营政府和国家的形象，也不再为了所谓的“正面”效应而任意难塑舆论环境的生态呢？

什么叫做“计划形象”？什么是“正面”效应？我们看看北京奥运开幕式上的两桩“造假”事件就知道了。

首先是那场先声夺人的巨型足印烟火秀。原来北京奥组委深怕现场效果不如理想，所以预先以计算机动画技术录制了这个场面，然后把它加插在当晚的实况直播里头。虽然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在事后的访问中立刻承认此事，但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手段已经完全改变了大家对“实况直播”四个字的一贯认知。顾名思义，“实况直播”就是实时地把发生在某一地点的事件直接传送给观众。如果主办机构明明知道自己会在这次演出里插进如此一段加工画面，但又不立即以字幕等形式坦白声明，这晚的“实况直播”

难道还不是一个骗局吗？

其次则是赢尽全球观众欢心的林妙可被揭发只是那段《歌唱祖国》的幕前替身，真正在演唱的其实是背后的杨沛宜。按照中国媒体的习惯说法，这是不折不扣的“假唱”，不止有违职业操守，甚至还可能触犯了国家为打击“假唱”歪风而专门订立的政令。就算退一万步讲，你也总该还幕后代唱的杨沛宜一个名誉，让全球观众知道是谁在演唱吧。即便是电视电影这些娱乐产业，也总会把替身演员的名字全部列出。如今一场史上最多观众收看的电视大秀怎能公然做出这么不公平的劣行呢？

根据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的说法，这么做是为了“国家利益”。因为林妙可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歌声的音域却不够宽；而杨沛宜的演唱美则美矣，却又坏在正处换牙期，形象不佳。也就是说，无论是一个相貌可爱但歌唱得不好的小女孩，还是一个声比天籁但样子不够动人的小女孩，都不能恰当地满足“国家利益”。这番话传出之后，舆论哗然，大家都不能理解这等小事何以会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更有许多人为杨沛宜抱不平，觉得她清丽可人，丝毫不下于林妙可。

音乐圈的人都晓得贵为现代音乐大师梅湘(Olivier Messiaen)关门弟子的陈其钢，实乃当世华人作曲家中的佼佼者，艺术成就甚至要比他的同学谭盾还高。而且他一向爱惜羽毛，从不苟且，是个很有个性的艺术家。这回怎么会做出这等既违反艺术原则又不符国际常规的事呢？其实陈其钢也把答案说出来了，那是因为一名政治局委员表达过意见。后来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他更明言自己有责任道出真相，要还杨沛宜一个公道。

故事仍未结束。这个事件曝光之后，不只令外界对美轮美奂的京奥开幕式的印象打了折扣；也让当局非常尴尬。于是两日之后，这条消息就迅速地被内地各大网站删去，变成一则失踪的事故。

这个故事恰巧说明了中国政府“计划形象”工程的盲点。所谓“计划形象”，我指的是一种由官员主动构想出来的抽象的政府和国家形象，然后以各种刚性手段将它套在现实之上的工程。

首先我们要理解“抽象”的活动本来是现代国家能力的证明，一个政府愈是能够借着图表、统计和各种调查去简化复杂庞大的现实，它就愈能完好地治理国家。依据今年故世的社会学大家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说法，在这种现代化的国家里面，统治阶层总是难免要脱出他们身处的社会脉络和其它被统治的群体，依赖那些抽象的活动及其结果去预知社会的走向，发现潜在的隐患，从而制定出种种响应现实与导引发展的决策。问题是当这些抽象活动的依据不是各种可堪验证的科学工具，而抽象的领域也不限于可以量化的事物时，它很容易就会变成一小撮官员离开现实的空想了。政府和国家的形象正是一种最难量化管理的领域，要测知它们的工具也是最不齐备的；偏偏今天中国各级政府官员都以为自己知道辖地和国家该有什么形象，也都以为自己明白怎么样才能

实现心中所想的形象。

说穿了，这就是形象工程。许多地方政府不顾所在县市的实际情况，也不管社会的整体需要，又不屑于使用少数可堪利用的调查工具先去研究人民对自己的看法，就随意耗用公帑大兴土木，以为一两座巨大的政府建筑物就能在人民心目中制造出美好的形象，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同样地，京奥开幕式上这一连串事件其实也可看作是一种形象工程的败笔。

一直以来，不少中国官员都以为自己是艺术家，觉得自己官位大了，审美品味也就比别人高了。在经济领域上，他们或许会承认自己不是专家；但是说到政府形象和地标设计这些事，他们却自觉要比任何专家都还内行，总是意见多多指手划脚。有趣的是当你再问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时，他们却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通常只能报以“正面”二字。

为什么那段烟火足印要假装是实况直播？是为了“正面”。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假唱玩双簧？也是为了“正面”。为什么不准媒体再报道这段消息？还是为了“正面”（亦即俗称的“正面报道”）。

假如城市只是一面地图，政府当然可以大胆规划，任意在上面修大道开运河；假如社会只是一张白纸，政府也能够为所欲为，在上头画出自己理想中的“正面形象”。但是现实社会不是地图也不是白纸，尤其现在的社会，阶层分化，媒体发达，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渠道去发放和获得各种信息。就和计划经济总是难以掌握全部经济信息一样，计划形象也不可能获知和垄断所有和政府形象有关的信息与反馈。

为了所谓的“正面形象”，你可以安排杨沛宜为林妙可代唱，但是你不能控制陈其钢要说什么话（陈其钢可能拥有法国国籍），你也不能完全抹除一切传媒的报道，更加不能控制境外的传媒。于是当初的一心求好，反过来又成了外间批评“中国专门弄虚作假”的另一罪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然而计划形象的主事者就是不能预知一切后果，正如为自己盖“白宫”的地方官也不知道原来这么做会捱骂。与其苦心经营正面形象，然后弄出个破绽重重，实质与表象反差巨大的结局，何不以一个最正常的真实面目坦然示人？为了正面，牺牲正常，别人是看得出来的。

形象当然可以规划，也可以设计；但再怎么规划设计也不能脱离正常的现实。你能想象可口可乐的广告公司为它弄出一套恍如顶级法国葡萄酒般的形像包装吗？当然不能，因为可乐就是可乐，无论它的老板再怎么希望自己卖的其实是红酒，那个瓶子里装的还是可乐。更何况可乐又有什么不好呢？它可是全球最赚钱的饮料呀！同样地，难道一个拥有 13 亿人口的超级大国，正在崛起的经济强权，竟然容忍不了一个 7 岁女孩再正常不过的换牙吗？

原题为“也谈造假——计划形象的贫困”，发于“牛博网”2008年08月18日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虽然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世界四大电影奖项中，奥斯卡金像奖是最不国际化的一个，但凭着美国电影工业雄霸全球的实力，它还是最受瞩目的。所以李安得奖与否一致被华文媒体看作是华人在世界影坛的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近年大陆急躁的民族主义情绪背景下，李安得不得奖，更已是个牵涉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大问题了。

2006年的奥斯卡奖的确特别值得中国人关注，因为起码有三个人、三部电影与三种情绪在它和中国之间拉上了关系。第一个是李安和他导演的《断背山》，一开始就备受华人重视，而且果然不负众望，夺得华人导演的首座奥斯卡金像奖，被认为是华人扬威国际的壮举。第二个是获邀颁奖的章子怡与她主演的《艺伎回忆录》，章子怡向来是娱乐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而《艺伎回忆录》更被视为是“中国女人跑到日本当妓女”的媚外烂片，二者加起来堪称“国耻”。第三个是陈凯歌及其《无极》，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名，但制作单位一直声称要“冲奥”（冲击奥斯卡），并且得到官方的协助，可惜最后在一面倒的民间嘲讽声中成了笑话。

当三地一致地把李安描绘成“华人之光”的时候，其实是在传达一种“代表关系”，也就是说李安代表了全体华人，所以他的光荣也就是我们全体华人的光荣。同样地，当我们把饰演日本艺伎的章子怡说成是“华人之耻”的时候，也是把她当成了代表，她的耻辱就是大家的耻辱。但是我们却很少去追究这种代表关系是怎么形成的，正如我们从来不用质疑刘翔、杨利伟和李政道带给我们的荣誉感，仿佛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是不证自明的，他们用不着先问准我们，我们也不用投票去选举他们出来。

李安和章子怡之所以能够代表全球华人，最浅显的理由自然是他们确实具有华人身份。但是所有稍经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族群与民族的身份不是一种客观实存的条件，而是人为主观地参与构想的产物。也就是说，我必须经过一番联想才能把李安和我都放进“华人”这个范畴里面。所以不妨大胆点推论，不是李安和我们都是华人，才使得他代表了我们全体华人上台领奖；而是我们把李安推为代表这番言语这种行动本身，使我们共同分享了华人的认同。并非代表关系立基于已有的身份，而是代表关系塑造了身份。

因此，重点不在李安如何为华人争光，也不在他争了什么光，而在我们借着把他推许为华人之光这个行动能得到些什么？把一个人当成一整群人的代表，总是有透过那个被推许出来的人树立整群人身份与形象的作用。简单地讲，我们希望温文儒雅又才华横溢的李安就是全体华人的形象代言人。所以李安虽然是一个弹性十足的导演，拍《理智与感情》时有英国味，拍《冰风暴》与《断背山》时又十分地道地掌握了美式风貌人情，但我们还是愿意强调他的含蓄，因为这是大家心目中的中华格调。另一方面，陈水扁也

极乐意强调李安是台湾代表的身份。可见代表的意义，决定于被代表的人怎么塑造他的身份，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

于是我们就很能体会称呼李安那代表身份之四种方式的差别了。说他是“台湾人的光荣”、“中国人的光荣”、“华人的光荣”乃至“亚洲人的光荣”，其实是在表述四种不同的身份。至于说章子怡是“中国人之耻”的人（例如许多大陆网民），往往又爱补充一句“她不配当中国人”之类的气语。这表示虽然依据常识她是个中国人，但大家也不愿她成了中国人的代表，不想和她分享同样的认同。褫夺章子怡的代表身份，就是反面地界定了中国人的内涵与意义；排除一种代表形象，就是维护一份良好的自我感觉。

在大陆官方的眼中，最好的代表当是陈凯歌的《无极》。难得陈凯歌从当年“丑化中国社会”的《黄土地》作者，蜕变成一个能够集合中、日、韩三地影星炮制出“中国式国际大片”的导演。于是虽没有当年张艺谋《英雄》那种在人民大会堂首映，全国其他电影不准同期上映的特殊待遇，但还是得到了官方其他形式的支持。例如《无极》在四川全国首映，当地有关部门就下令媒体不得在那段期间刊登“负面宣传”，也就是不许说它不好。原因不难想象，这部耗资巨大，动用许多特技效果的电影很有大片格局，很能代表新时期的大国气象。一时之间，关于它能问鼎奥斯卡的传闻也在官方媒体上炒作得甚嚣尘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无极》连摸一摸奥斯卡边的机会都没有，反倒是因为涉及“宣扬同性恋”而被大陆禁止上映的《断背山》成了“华人的骄傲”。官方媒体很小心地把李安描述为“第一个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华人”，而非“第一个荣获奥斯卡的中国导演”。欢迎什么，拒绝什么；想用谁代表自己，不希望谁代表自己；认同何种形象，不认同何种形象——真是一目了然，却又何其尴尬。

这就像当年苦苦盼望的第一座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到了高行健手上，却要被迫称呼他为“法国作家”一样。不同的是，大陆百姓不一定都喜欢高行健，甚至可能不认识他，他的盗版书也不容易畅销。如今的中国观众却都自动过户地把李安封作自己的代表，虽然没法从正式渠道看到《断背山》，但每个网民讨论起来照样头头是道，这当然是托遍布大江南北的翻版碟之福。此等局面不仅暴露了文化和传媒管理策略的可笑，以官方力量强推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徒然；更突显了官方与民间对于谁能代表自己，又代表自己什么的理解差异。获官方护航的代表遭到百姓的耻笑，被官方打压的形象却被民间自己树立起来，这到底是谁跟不上谁？

原题为“华人的代表官方的无语”

刊于《明报·笔阵》

2006年03月08日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太湖污染，香港人最关心的大概就是今年大闸蟹的情况了。听来凉薄，却也是事实，而且这螃蟹问题不只影响了食家的口福，还有一连串蟹农、中介商、出口商、零售店与食肆的生意。最惨的是有些国际媒体也很关注太湖，很不巧，这正是全球都把焦点放在中国食品，乃至一切其他中国产品安全上的时候。前一阵子，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率团赴美经贸谈判，还真是件大苦差。因为这个谈判的对手不单是面上的美国政府，更是背后那日渐庞大的反华情绪；所以吴仪等人必须两面作战，一面和对方官员算账本，另一面则要软化从四面八方袭来的“中国威胁论”。平常谈到“中国威胁论”，我们想到的总是中国军力的扩张、中国正在抢夺美国工人的工作和中国倾销货物等种种不理性的指责。然而，这次中美经贸谈判却隐隐出现了一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而且还是中方最难招架的一种，那就是美国农业部长约翰斯在会谈首日提出的食品安全问题了。

其实，早在“毒牙膏”和“有毒宠物食品”事件之前，美国学界就已开始担心中国会不会向全球输出问题产品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校区教授彼德·纳瓦楼(Peter Navarro)那本耸人听闻的新著《来临中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他假想了许多诸如中国假冒疫苗如何害死全球人民之类的可怕情况，更断言中国的污染也将“温柔地杀死”全世界，可说是这类新版“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作。

为什么说这种“中国威胁论”不好招架呢？原因之一就是人家说的并不是全错。过去几年来，有关假酒、假药甚至假鸡的新闻可说无日无止，这是全中国都知道的事实。中国既然是世界工厂，我们凭什么说那些有毛病的产品都只供内销，而好东西却都出口了呢？

更大的难题在于产品安全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长串的问题组合。略过出口产品检验这第一关不谈，中国产品其中一个最让人诟病的地方就是它的质量不稳定，第一批货过关不保证以后每批货都合格，所以许多老外现在就有大把理由要在中国产品身上施加更长期更严苛的质检程序。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说起来简直就像现代中国企业管理文化大分析，可以十分长篇，简单地讲就是生产和管理水平的不足，和它们背后的营商原理。

好吧，就算中国商人全都童叟无欺，不卖假冒伪劣产品，并且极力维持生产标准；而工厂管理阶层和原料供货商也都成了尧舜，绝不偷工减料掉包冒充；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个非常棘手的难关，那就是环境问题。大家都知道，环境污染可以直接影响依赖环境的原材料生产，尤以食品为最。之前炒得很热的“宠物食品事件”，问题不就是出在原料上吗？现在的太湖污染事件也应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湖水水质恶化，包括大闸蟹在内的水产自然也就难逃一劫。然而，这湖水的问题真的就只是官方所说的“天气炎热，水位下降”那么简单吗？

每逢自然环境出现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总是本能地把它解释成人力不可阻挡的天灾；可是每回大家事后细究下来，就常常看见人为的痕迹。或许我们仍然没有直接证据指出太湖的蓝藻暴增与湖边工业发展的关系，可是，湖畔居民都晓得原有的竹林几乎殆尽，他们都目睹了十几二十年来无锡工业化的猛进，也同时感受到了本来歌曲里“又香又甜”的太湖水怎样渐渐变得又臭又浊。

为什么明摆在眼前的环境恶化，大家却像久入鲍鱼之肆，慢慢习惯以至于麻木了呢？这自然又是为求经济增长而不顾环境代价的粗放式发展的结果。可是难道官方和民间就没有一个人是清醒的吗？倒也不是。曾经被中央电视台列为2005年“感动中国”候选人之一的吴立红就曾奔走多年，为太湖的污染多番投书鼓呼，还赢得了“太湖卫士”的称号。可惜他后来被告“敲诈勒索”，近日即将出庭受审。

这一路说下来，我们就明白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的深远了，以太湖大闸蟹的个案为例，它背后牵扯到了无数人的生计、环境的恶化、发展策略的失衡、政府权责的行使、民间监督的有无等多重环节。这就是产品不安全这个新版中国威胁论难以应付的原因了，它不只是外交层面的课题，也不是光靠经贸谈判就能处理掉的项目，它涉及了太多中国内部的困难。

国际社会一旦形成了中国食品和产品都很危险的印象，不只拆解起来很棘手，各种保护主义和主张对华贸易壁垒的声音也会变得更加雄壮。这个局面的出现，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难以预料的，但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内政和外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年代。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
刊于《南方周末》
2007年07月25日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中国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工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 C.Thurow)在他近著《当中国成为第一》(台湾《商业周刊》1024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

外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吞噬那么大量那么多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程序。今天的中国以一国之力吸纳了

二三十年前由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瓜分的市场，它又怎能不成为众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标呢？你以为中国只能生产低端消费品吗？2007年初，当英国名牌服饰商 Burberry 关掉它本土最后一家工厂，宣布将全部生产线移往中国之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潜能远在意料之外了。

对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受薪阶级来讲，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严酷的竞争。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原来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条件恶劣的宿舍里、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国人，他能不直觉地生起一种解释不清的不公平的感觉吗？如果他减薪了，甚至失业了，你觉得他会相信“中国正在倾销产品”还是“经济正在转型”？哪种说法更直接、更简单、更明确呢？

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国威胁论的基础。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和“中国式殖民主义”根本就是小儿科。建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就算有再多的经济学家力陈利害否定简化，但还是有很多政客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见，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国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谐口号，从和谐社会一直和谐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种最切身的的不公感，它就总会改头换面找到第二个出口。果然，这个新口子出现了。

最近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上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更以此做了个封面专题，把读者的视线从中国出口的商品拉向中国内部的市场，似乎是要告诉大家“毒牙膏”和“毒宠物食品”还不算什么，中国老百姓自己过的日子才叫苦呢，从食水到空气无一不毒；中国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危机四伏，你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完全信得过的。

在这片“中国产品威胁论”的浪潮中，最高兴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国消灭的全球中产阶级”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国价格”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厂商，他们终于找到喘口气的机会了。过去这些厂商和工会利用的是“人民币汇率被操控”和“中国政府透过出口补贴搞倾销”这些理论，向政府和政客施压，要他们出头干点事。但是这等说法一来会招惹“保护主义”之讥；二来又明显和消费者的钱包有矛盾，因为中国货确实是便宜，你凭什么要大家为了你的饭碗多花几块钱呢？

现在可不同了，这批厂商和他们雇员的饭碗问题首度和消费者那碗饭本身结合起来；中国货不只威胁工人饭碗，还威胁到所有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说政客的利器，要他们对中国产品施加更严格的检验程序(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这么提倡了)；更厉害的是它直接诉诸消费者的个人利害，能够渐渐形成中国产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换句话说，它的对象不再是政府高层，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对付这套新版威胁论要比对付老式的威胁论难多了，它不只是谈判和游说的技巧问

题，而是深远广阔的信心问题。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会借此推波助澜，把它变成促销自己产品的商机。早在中国渐成世界工厂之初，就有个别欧美厂商打出“本地制造，质量更好”的旗号了，这也呼应了许多企管专家的建议：对付中国价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若要坚持制造业，就得迈向更高端的市场。如今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于为他们卖了一场免费广告，使他们省下不少工夫，自动造成一个市场区隔，换了是我们自己，能不利用到底吗？

国家质检总局在中国“毒牙膏”传闻初起之时，立场站得十分坚定，不只屡次出面澄清，还要香港特区政府放行那几个被禁进口的牙膏品牌，差点引起有关一国两制的权限争论。这种反应是典型的防御性反应，人家批评我们了，首先就得自卫。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自卫理由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没有超出国家标准，对人体无害。但问题是，就算它们符合你的标准，却不合人家外国的标准呀。这种解释不只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变相地公告全球，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和你们老外不一样，而且是低一点的标准。果然过不了多久，质检总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中国的产品要想出口的话，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按自己的规矩办事，还要看看那些进口国的标准。在这风雨飘摇的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

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他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 1970 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地区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
刊于《南方周末》2007 年 07 月 25 日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这就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坦白说，温家宝在这趟外访行程中展现的技巧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俳句，后来又跑去打一场棒球，立意要借着日本文化的骄傲与日本人最喜欢的运动，拉近日本国民与他的距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精心设计的公关手法。可是在内地媒体的一片赞赏声中，我们却极难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虽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温总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不愿点到“公关”二字，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显其诚。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结

果得到她的赞赏：“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都说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

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4月19日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格魅力”成为国内媒体一个形容政坛人物的常用词。怪的是尽管大小媒体成天到晚“人格魅力”来“人格魅力”去，但从来没有人说得清到底什么是“人格魅力”。顾名思义，“人格魅力”指的应该是某种人格产生的魅力，但什么样的人格才会产生魅力呢？还是不同类型的人格都有发放魅力的可能？更堪琢磨的，是我们平民百姓有多少亲炙这些据说十分有魅力的大人物，知道他们的为人如何？以先后在一年间去世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为例，他们就是媒体口中“人格魅力”的典范，但是我们却极少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他们的魅力。我不敢也没有任何凭据去怀疑他们的人格和魅力，我怀疑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媒体受众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关于这两位先生的描

述，以至于他们成了传说，以至于“汪辜会谈”成了传奇。我们迫不及待地相信这些传说，是否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投射呢？

从头细阅多年来的记录，每当谈到“汪辜会谈”，除了必然盛赞二老的身份地位、学识风度，另一项摆不开的要素就是“中国传统”。这种“中国传统”的味道不仅被说成是他们自然散发的雍容气度、儒者风范，而且还是交往过程中刻意营造的机巧。例如晚宴菜单的名堂与排序，双方引用的诗句，以及辜振甫唱戏的曲目，莫不带有传统中国色彩。更要紧的是这种借着菜名和诗词迂回地传情达意的做法，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在外交场合、谈判桌上最优而为之的技巧。所谓“汪辜会谈”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重点不是那些共识和原则，而是这场会谈的方式和过程本身就很有格调，本身就体现了国人久违的中国风味，堪称“佳话”。

分隔数十年，两岸首回接触最宜采用这种古典中国的交际手腕，把复杂的局势用一种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戏码呈现演出。要演好这台戏，汪辜二老自是不二人选，但身为观众的我更是愿意搬出我们的历史蕴藏去丰富他们的关系。举个例子，几乎所有对他们二人的回忆都很强调汪辜是知己知交，即使在后来相当不妙的情势之中，仍旧忧心为国；在关山大海的阻隔底下，依然体谅对方。但只要冷静一想，就会发现他俩实际上只见过两回，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当然不可否定他们一见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看来，二老最好是知交，因为这才符合我们的心愿，符合历史上经典故事的模式。

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暗地里的期盼是把两岸关系当成兄弟般的关系，政治的纷扰化成自家人的误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么是谈不拢的呢？“汪辜会谈”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它的个人色彩掩盖了政治本质，少了明刀明枪的硬朗，多了曲折朦胧的蕴藉。这正是中国式的政治协商谈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转化成私人的，将两个阵营的事压缩成两个朋友的轻酌浅唱。在这个意义上，“汪辜会谈”不只是一出当年两岸合演的好戏，还是投射了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两岸关系之具体而微的象征。

俱往矣，所有人都知道，“汪辜会谈”已成绝唱，这更增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传奇性，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二老“人格魅力”的感知。听说汪道涵先生曾托人送了一个筷子筒给辜振甫先生，辜振甫先生微微一笑，知道这是汪老的心愿：两岸“快统”。流言传闻自是不能尽信，但重点是关于二老的这类传说实在太多，而且它们也只能发生在这两位老先生身上。想想看，这是一个何等“中国”的故事：凭物寄意，取字谐音，真是风雅妙绝，换了别人换了其它场合，我们就未必愿意轻信了。

“汪辜会谈”之不可再，不仅是再也找不到这等分量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环境使然。从1992年至今，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去中国化”的工程下，越来越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如果今日能够重开谈判之门，如果台湾仍是民进党执政，他们还会用这

种形式本身就很中国的手法来与大陆谈吗？

我们最该问的问题，不是二老的接班人何在，而是以后要用哪种方式谈下去。假如世上仍有汪辜这般人物，自然不坏；但正式正常的机制对处理国家大事民族前途更是必不可少的。

原题为“汪辜会谈何以会成绝唱”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1月07日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看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份大报的社论，他们对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并没有给出什么特别的评价。相反地，香港传媒则注意到了重点，那就是胡锦涛在新一届常委亮相时特别介绍了“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确是中国政坛的下一代，两人都不过五十多岁的年纪，大家在这年纪的问题上看到的更是中国政界新老交替的常规化，未来的中国高层政治将会变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规可循，而且更注重权力来自职位而非个人威望的正常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惯用怀疑眼光看中国的外国传媒仍然不为当前的局面所动？仍然奢于给点掌声呢？

说到年纪的问题，这可真是当今世界政坛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认同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觉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罗斯总统普京固然年轻到了退任之后还要再当国会议员的地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过早退休”之后更是展开了政治生涯的第二春。这些领袖级人物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越年轻就越有活力越有创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欢心的说法。难怪法国和英国现任内阁班子里也不少四十出头甚至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而下届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大卫·卡麦隆更是刚到四十岁的“娃娃脸”。

在这平均寿命拉长、人口渐渐老化的时代，世界政坛却出现了年轻化的异象，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呼吁延迟退休年龄，再看一下这些国家的政治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的动力可能是年轻选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逐年下降的投票率。所以许多政党为了得到青年的认同，争取他们的选票，就纷纷推出了年龄和他们相去不远的新星，好把他们拉回票站。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的能耐与他的年纪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日本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的短命任期就是个反面示范。年轻确实是卖点，但它不一定是优点。综观这些产生了不少青年领袖的国家，它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对从政者的年龄往往不设

上限，反而只有下限。例如美国，你起码要到了三十五岁才有资格竞选总统，因为一国大任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到乳臭未干的小子肩上吧？可是你若有办法赢得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觉得你老当益壮，你甚至可以像传奇性的参议员特尔曼(Strom Thurmond)那样一千干到一百岁。换句话说，年纪在今天的选战里可能是耀目的招牌，争论的话题，但是在制度上，只有选票是老大。

中国政治的接班问题渐渐制度化了，但那些外国传媒却看不到。

原题为“政治人的年纪”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10月30日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我本来以为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辞职只是香港这小茶杯里的风波而已，没想到原来有不少内地媒体也很关注这事，不只报道，并且评论。它们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体的自由与发达，香港社会民意力量的强大，以及香港人对官员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

的确，同样的事件要是发生在内地，首先就不会有媒体擅自发布甚至拍摄一名高官与性工作者把臂同游的照片。其次，所谓的“民意”也可能发作不起来，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不以为意的话。最后，官员更是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级有压力。因此，朱培庆的丑闻反倒见证了香港体制的优点。

可是再细想下来，香港社会对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难道就绝无可议之处吗？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要求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它该高到哪个程度？我们又有什么方法确保公职人员不会失德呢？回顾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可以发现，其实有不少人赞同朱培庆的解释，觉得他在公余时间自己花钱冶游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与“公务”无关，所以他没有理由向公众交待详情，在这事上真正该问责的其实是他的太太。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又觉得他主动请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的形象已经受损，而“社会对于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是应该比一般人要高的”。

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有道德呢？这其实是一个沿袭传统但未经推敲的共识，好像从政者都该是圣人，不只比一般人聪明能干，刻苦耐劳，还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诱惑，在道德操守上堪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静下来想一想，都会觉得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考虑，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不只从政成绩优秀，还恰巧是个大善人，那么他的声誉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但万一他只是个普通人，齐备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欲，而且不时有逾矩的行为，那么他是否就此丧失了从政的资格呢？我们该记住即使是孔子，也曾盛赞私德不够检点的管仲，说他有功于天

下。难道我们竟然要比孔子还讲究道德吗？

但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职人员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齐就行了，因为他们占据了特殊的职位，享有非常的权能，与社会大众有特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简单地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他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就以朱培庆这件事为例，他犯的错误大概有三条：一是光顾声色场所；二是被记者拍照时惊惶失措；三是事后透过属下香港电台的公关发表声明，说当晚他身边那名女子只不过是朋友的女伴。第一条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私生活的事，既与公众无关，也与其权能职位无关。如果我们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费活动的话，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犯错。第二条错误就更只是公关反应的技巧问题了，我们可以说他处理得不够机智不够成熟，破坏了他一贯的稳重形象，但这实在和道德扯不上边。

直至目前，香港传媒与大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两条了。朱培庆被记者拍到的丑态固然是市民讪笑的题材，当晚他和那名女子到底干了什么事更是越挖越细，大白于天下。可是，那第三条错误却被大家轻易放过了，恍如过眼云烟。若按照前面所说的从政专业伦理来看，这第三条错误才是最严重的。首先，这是一个谎言，那名女子根本不是朱培庆口中的“朋友的女友”，而是他花钱请来的性工作者。政治人物公然说谎，当然会令人联想到他是否也会在关涉公共利益的事务上欺瞒大家了。其次，就算我们采取最宽容的态度，觉得这个谎言与公众无关，但它是一个很重大的错失，因为这个谎言是透过政府部门——香港电台的公关发出的。换句话说，朱培庆冶游也好，失仪也好，都和他的职位权能无关，反而他事后回应的方法才是真正违反了公职人员专业伦理，因为他利用职位和政府机器去撒了一个谎，与滥权无异。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谎言看做焦点，却都跑去关心他那私人生活的作风问题呢？除了朱培庆担任公职三十年来建树颇多，尽忠持重，大家不忍多加追究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且以美国战后两次著名的弹劾总统案为例，第一次是尼克松，第二次是克林顿。在尼克松案里，弹劾的理由分别是他隐瞒水门事件的窃听内情，以及动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国家机器去针对政敌；在克林顿案里，弹劾的理由则是他在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上公然撒谎。任何人都能明显看出，尼克松所犯的罪行要比克林顿严重多了，他滥用职权破坏了美国的国家体制，而克林顿犯的却是一个严格来讲与公众无关的“私德”错误。为何在短短 20 多年间，美国议会弹劾的理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首先，从美国开始，最近三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社会气氛都有道德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道德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香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与性有关的议题近来动

不动就成了社会分歧的引爆点。更准确地说，这还不是道德的保守，而是道德的偏向。因为我们虽然很关心包括政客在内的公众人物有没有嫖妓，有没有婚外情，但却从不理会他们有没有同情心，是否仁善公正。对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团体来讲，一个政治家是同性恋的罪恶甚至比他毫不关怀弱势群体的麻木不仁还要重。一个议员可以言而无信，实际投票结果与他事前所言截然两样，但他却绝对不能有婚外性行为，仿佛他的性生活和公众更有关系似的。莫非只有性才是道德领域的议题吗？

其次，媒体的琐碎化与相应的“政治化术”（Spin）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报刊固然越来越喜欢政治人物的小故事，说说他们放假去何处旅行，孩子又在什么地方上学工作。同时政治人物也越来越不介意公开一点自己的私生活，好营造一个立体的人格形象，让百姓觉得他很亲民。加起来的效果就是把公众视线从更严重的政治议题转到政客的个人身上，如果今天的政客比从前少了私隐，狗仔队像追明星一样跟随他们，这也实在是大势所趋，咎由自取。

说回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请他当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就难以操作。例如我们都不想再看见官员为了一己私欲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筑豪华办公楼，为地方铺张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可叫他们放弃浮夸作风就管用了吗？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品德的问题，而是预算如何编订如何管控的权力监督问题；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分权制衡的精神。

比起内地，香港或许胜在传媒上，但说到官员道德水平的准则，大家在观念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空泛，这条路就有多远。

原题为“对政治人物应有怎样的道德期待”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7月21日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7月25日，有一条对中国人来讲不大显眼的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卢拉炒掉了他的国防部长皮尔斯。直接原因是7月17日，有一架民航客机撞向圣保罗机场的一幢建筑，死了将近200人；而航空交通正是国防部的管辖范围。有些巴西博客批评皮尔斯不相称，他早该在空难的第二天就自动辞职，根本不应该等到总统出手炒他鱿鱼，显得他很眷恋权位似的。

对中国读者来讲，这种说法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随着国际新闻的开放与增加，那种下头出事导致部级官员辞职的消息我们都听得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国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为“高考”(A - Level)评分出了问题而挂冠求去。陌生的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里头的道理，难道设置考试评分标准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吗？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倒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ter System，源于英国的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西敏寺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任何问题，他都不能说自己不知道；遇上任何挑战，他也不能推到属下的头上。理由是他乃民选的政治任命官员，有责任为全民监督那庞大的行政机器。

这是种常规，理论上你可以置之不理，可是你要是真的什么都不管，好官我自为之，那么接下来可能的政治危机就要拖累整个政府，结果就算不是立刻垮台，也会让执政党在下一轮大选中遭到选民的投票处罚了。由于有这么巨大的负担，内阁各部就得加紧监督下属，保证不出乱子，不让对手有任何可乘之机。

既然如此，何以实行总统制的巴西也要学这套英式的“部长问责”呢？这是因为这套“二官分途”的原则已经成了民主国家共有的金科玉律了，那位不幸的巴西国防部长虽然不是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他到底也是民选总统自己任命的。更不用说美国偶尔会发生州里出事、州长辞职的情况了，因为那些州长根本就是州民直选的。

最近有些网上的舆论还在谈论山西黑砖窑事件的查处情况，觉得涉及官员只到县级好像还不够高，并且还动辄引用上述那种外国事例作比较。在我看来，这种比较实在是太不符合国情了。别的不说，就拿文官制度来讲吧，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务员制度，理论上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是有政治任务的，所有层次的官员也都有政治责任，因此用不着像西方那种“二官分途”、“部长问责”，动不动就“刑上大夫”(SARS时期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去职只是特例而非常态)。所以，有县级官员为黑砖窑事件负责也就很够了，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道歉实在是超额完成了他的本分。

原题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7年08月06日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最近网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江苏省邳州市的李连玉书记开完十七大返乡，全市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的盛况了。光是看照片，就知道百姓们真是高兴得不行了，不只铺上了平常明星专用的红地毯，挂上了写着“热烈欢迎李书记载誉归来”的标语条幅，更有腰鼓秧歌阵加上舞狮舞龙。至于公安交警的立正敬礼，医院护士的掌声花朵，那就更不用谈了。

网友们再追查下去，才发现除了这烟花处处飞的“欢迎仪式”，原来在李书记进京开会之前，当地也倾全市之力搞了一个极庄严极热闹的“欢送仪式”。于是一时之间，“土皇帝”和“劳民伤财”这些字眼就纷纷往这位照片里总是笑眯眯的书记身上招呼去了。

要批评这位地方官的“政治文明意识不强”很容易，说他肆无忌惮地过足领导瘾就更简单了。但我以为这个个案其实还折射出了一个更普遍的现象，而要认识这个现象，就得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听起来或许不是那么“政治正确”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会是件“喜事”？

的确，十七大召开之前，社会上的负面新闻和意外事件都少了很多，颇有天与人归的吉祥气象。看代表们投票的场面，也循例有欢乐的音乐当背景，与一般国家的国会要不喧哗闹腾，要不鸦雀无声的情况大异其趣。可是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十七大作为中国执政党最重要的决策会议应该是件正事，而不是结婚生小孩一类的喜事。

十七大是影响中国未来路向的重大会议，大家尽可以为新登场的一代拍手道喜，但这个会议本身却是庄重严肃的，用“喜事”二字形容反而只会贬低了它的真正意义。像李连玉书记这样的代表去参加会议，本是他分内的责任，再正常不过，又有什么值得热烈欢送兴奋欢迎的呢？一个学生上学，一个工人上班，皆是应有之义，他们的家人用得着天天在门口点鞭炮恭贺上学成功上班胜利吗？

这位李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主人因为仆从做对了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

原文为“政治责任的国情差别”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08日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海外观察家在谈论中国的时候有一组固定的词汇，这组词汇表达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说“开放”与“保守”，他们很喜欢把这两个价值意蕴饱满的形容词加诸中国政府的领导层身上，辨识出谁是开明派谁又是保守派；而开明自然是好的，保守当然很坏。这套二分法依据的是一系列标准，例如开放舆论是开明，管束私人企业则是保守。同样的形容词、同样的判准和同样的观察框架还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与事件之上。就以刚刚落幕的“两会”来说，有人就说中国更开放了，但也有人反过来说中国变得保守了。

说中国开放，主要是因为《物权法》的通过，英国的《经济学人》甚至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在许多人心目中，社会主义国家居然要保护私有产权，这难道还不是开放吗？说中国保守的，则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与医疗投入的同时，还会加强约束这两个领域的“自主”。更何况增加政府资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着政府规模的扩张。一个规模更大权力更强的政府难道还不是保守吗？

这些判断的前提来自于对中国数十年的历史观察。回顾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变化，我们可以总结为“集权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府是“全能主义”的，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经济和社会尽在政府的掌控之中；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与社会空间是和政治领域高度重合的。自从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政府就逐步撤出各个领域、还市场自行运转的空间，还社会自主管理的可能，还文化自由表达的机会。所以在海外观察家的眼中，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一段由保守迈向开放的进程。政府越后退，人民越自主，国家就越开放；相反地，政府介入得越深，社会就变得越不独立，国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这种判断的根本问题就是太过简化，把个人与政府对立起来，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仿佛只要一头重了另一头必然就轻，中国不是更开放就是走回头路。正好碰上近年关于改革开放何去何从的大讨论，本届两会变得格外令人瞩目，大家都急于从会议的决策看出中国未来的轨道。看见《物权法》通过了，就说这是官退民进，开放了；看见政府重新介入教育、医疗甚至房地产市场，就说这是官进民退，保守了。

其实今天中国政府真正面对的不是开放或保守的是非选择，而是另一个政治学上的根本难题，那就是应该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改革开放前的全能主义政府是一个极端，那么一个彻底退缩的“最小国家”就是另一个极端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光谱是很宽阔的，要把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个点则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选择。

很多人说过去近三十年来中国追求的经济发展是种不计环境成本与社会代价的“粗放型发展”，其实过去近三十年来的开放又何尝不是一种粗放型的政府撤退呢？教育、医疗、住房和一连串的社会需要都不能没有政府的位置；新自由主义梦寐以求的最小国家也未曾真正出现过。今天我们看到的许多问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

都不是太过“保守”的结果，而是政府退得太远太快。

所以一方面订立了《物权法》，另一方面强化自己在教育与医疗上的功能的中国政府既非更“开放”，亦非更“保守”，它只是更敏感地在摸索自己的新角色。

原题为“摸索新角色的中国政府”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3月29日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中国就像以往的“东亚四小龙”，国家机器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形式保证的民众授权之上(如选举)，而是在于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基本保障。至于大家认识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其实只是一道黏合剂，让百姓感到自己生活的富足安定是国家的赐予，民族的自豪。假如民生凋敝，社会不安，再多的爱国宣传也挽救不了统治的危机。

难怪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这正是官方共产主义破产之后仍然力保政权不坠的不二法门。其中的等式是这样的：经济发展等于百姓生活无忧，百姓生活无忧就等于政府长治久安。明乎此，便能了解近日“毒奶事件”的严重了。纵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们看见的不只是商人的贪婪无良，还是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的集体缺席。

早在今年二月，就有消费者向工商局投诉“三鹿”奶粉的质量有问题。但当局的回应竟然是要该名消费者先给两万块钱人民币，才能替他检测相关产品！作风就和救命得先缴订金的无良医院一样。如果政府连它该尽的本份也要收钱才做，谁还需要政府呢？何不干脆让民间自行开办产品检测实验室？说不定取价还能便宜点呢。

能够预先测知并且处理牛奶问题的部门有一大串，但它们全到哪里去了呢？至于地方政府，从石家庄市到河北省都曾接过投诉，他们的响应是什么？就算出动到了新西兰政府，他们依然默不作声。我很难想象新西兰总理打电话给温家宝，对他说“你们那里的牛奶出事了，他们没告诉你吗？”的情景。我只感到政府好像不见了。这是不是个体制问题？当然是！但它甚至已经和民主不民主无关了。就算是在“东亚四小龙”式的威权体制之下，这种无政府状态也很难发生。不要搞错，就算是邓小平式的强人统治，也不大可能出现这种整体管治失效的情况。

政府已经不能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它还能够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吗？由次按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必将打击中国来年的出口贸易，我们的内需再怎么扩大也补不上那巨大的缺口吧？

如此一来，这个国家的合法性能不遇到空前的危机吗？到底有没有人在管治这个国

家呢？肯定有，最起码还要有政府部门勒令媒体不得擅自报道毒奶事件，更不能发布类似这篇文章的评论。这是我最能感到政府存在的环节。

原题为“有人在管制这个国家吗”

发于“牛博网”

2008年09月23日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很久以前，有人递了一根烟给我，他神秘兮兮地叫我赶紧尝尝：“这是特别做给‘上头’抽的，外面没得卖”；这就是我的第一根“中华牌”了。后来，“中华牌”变得一点也不稀奇，满街都是，而我们这些“港灿”此时也早已发现，真正做给“上头”的其实是一种叫做“熊猫”的烟。孰料去年开始，连香港机场免税店也在卖“熊猫”了，而且还是那种传说中的黄色包装。起初大伙儿还不相信，怎么“上头”抽的烟就能这样拿到街上卖呢？果然，又有一个朋友（同样很神秘地）提醒我：“别傻了，真正的‘特供’哪能这么容易让你见着。”

“特供”，特别制造以供应上峰的产品简称。多么奇怪的东西呀，我小时候还一直以为英国才有这种事呢，因为英国是个有皇室的国家。想当年，香港不少商品都喜欢标榜自己是“皇室御用”，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小老百姓也能随便买到女皇她老人家的专用货呢？后来我才知道皇室“御”用原来不是皇室“专”用，一字之差，其异远矣。

其实，许多君主立宪国都还保有“皇室御用”的货品，英文叫做 Royal Warrant，字面的意思是“皇家认证”，和“特供”不可同日而语。且以英国为例，它最早起源于1155年的亨利二世，是一种颁给商人和某些专门服务业者的荣誉。按照“皇家商人认证委员会”的规定，商家若是想得到这个头衔，它必须连续服务皇室成员至少五年，方可具备入围的基本资格。女王、王夫和太子看得上的，当然是好东西，所以拥有这项荣誉的商人莫不以之为质量的保证，品牌的广告。

因此“皇家认证”绝对不是“特供”，它不是专门做给皇家专用的物品，因为这玩意的宣传效力正正在于让你知道你买回去的一块肥皂和女皇御用的完全相同。例如“皇室认证石油产品供货商”林顿能源公司，难道它会为了皇室特制一批街上买不到的石油吗？又如“皇室认证报刊供货商”琼斯·雅留公司，本来就是英国最有名的报刊零售递送行；我想他们发给女皇的《泰晤士报》该不会和我看到的不同吧。而且这琳琅满目的商品服务全部都要付费，就算天王老子也一样要掏出真金白银。

前阵子网上流传“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的消息，许多网民都很愤慨，

凭什么有些人喝的牛奶就是和我们不一样呢。后来官方还特地出来否认有这个机构。其实我就知道这是个谣传，好歹我们是共和国，怎么可能会有比丹麦、英国和日本这些君主立宪国还不如的“特供”呢？

可那些“没有包装的熊猫”与“瓶底印了面小国旗的茅台”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它们全是子虚乌有的民间传说？万一它们是真的，难道我所理解的“共和国”概念竟然是西方霸权的产物，和我浩浩中华的语境颇有不同？又假如这都是谣言，假如我那些说话特别小声的朋友原来全在撒谎，为什么我们又一直愿意去相信“特供”的存在呢？也许这说明了大家的国民意识有问题，分明活在人人平等的共和国，心里却总还残留着君高民卑的封建思想。

原题为“英国才有特供”

发于“牛博网”

2008年10月07日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马英九赢得了选举，几乎所有人都说这是场“民主的胜利”，原因之一是台湾人民在这次选战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智。从前盛行的买票与“奥步”渐渐退隐，选后曾经会因愤怒而聚众闹事的群众也都静静归家。经过一轮政党轮替，过往长期执政又熬过了八年在野岁月的国民党，如今应该变得更谦卑，更懂得行使权力应有的戒慎之心；曾经由异见分子一跃成为掌政团伙的民进党，现在也总算尝过了手握大权的滋味和权力带来的诱惑，应该可以在未来的岁月里检讨己过重新出发。

然而，很多人赞赏这次台湾选举的理由却是：绿营等急独分子终于下台了。换句话说，是这趟选举的结果令人满意。且让我们问一个假设的问题：假如赢的是谢长廷，那是否就代表台湾民主没有胜利呢？假如台湾人选出了绿色的民进党执政，那是否就表示民主始终是一个不大好的制度呢？

没错，台湾过去八年来的种种乱象的确叫许多人看傻了眼，不少心仪民主选举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大家盼了那么久的民主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台湾著名评论家杨照曾经在《10年后的台湾》中说过一段令人感伤的话：“……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事件与军法大审震慑，领受到那股历史性的悲剧感。国民党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我从来不曾自认是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前面，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台湾的民主就是这么来的，是由一代又一代像杨照这般的知识青年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的。可是，

最后他却发现：“我们万万也没料到，民主制度建立之后，我们当年持守以信仰民主的价值，人的价值，文化的价值，所有崇高的、伟大的、深邃的、美丽的，竟然都被民主给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了……多么大的讽刺！”

如果连杨照这种曾经打算身殉民主的人都对民主感到心灰，我等隔岸观火的看客岂不更该深思民主何价？于是又有些抱持政治实用主义的论者，乘机指出民不民主为其次，只要政府确保国泰民安，领导层清廉有为，任何制度都是可以的。若说集权导致腐败，难道民选的陈水扁就很廉洁吗？可见民主实在保证不了什么。

正当大家都在关注台湾选举的时候，不丹这个小佛国的第一次大选却好像被我们忽略了。要说“和谐社会”，世界上恐怕没有比标榜“国民快乐指数”的不丹更和谐的了，虽然也有驱逐少数民族和限制资讯自由的事，但它大体上还是个人民生活安稳的地方。曾经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国王凯撒尔年轻英俊，深受国民爱戴，他一力推行民主选举，要把百年帝制终于己手。不丹国民不只不欢迎，还感到非常疑惑，“我们的国王那么好，为什么要民主呢？”铁了心的凯撒尔硬生生地把下属大臣训练成两个彼此竞争的政党，甚至命人“演出”一场“街头示威”，好叫百姓习惯民主生活(事后，有些淳朴的不丹国民居然受惊报警)。对于国民的不解，他的答案很简单：“你们今天或许拥有一位好国王，但是谁能保证以后的国王也会这么好呢？”诚哉斯言，就算现在的政府再好，谁能保证以后的政府也会这么好呢？陈水扁确实很糟糕，但民进党毕竟还是给人唾弃了，不是吗？这不就是民主选举的自我修正吗？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算民进党再次赢得大选，民主的自我修正机制失灵，我们就能否定民主选举的价值了吗？过去八年以来，不断有人拿台湾当作民主的坏榜样，从高层的腐坏到底层的盲目，从媒体的恶俗到“立法院”武斗，一切问题都可以算到民主的头上。如果这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粗暴推理，那么我们还有另一种比较精致的诡论，那就是说中国文化并不适合民主选举。近年流行一种近乎清谈的“文化分析”，总是玄而又玄地高谈“文化特质”和“民族性”，总是动不动就从个别的现象迅速上升至“文化层面”，貌似很有深度，实则反映了基本社会科学知识的匮乏。我们真能如此简单地把民主失效归因于文化吗？

依据最一般的历史见识，我们知道现代民主其实是种很年轻的政体，而且远远未臻完善。美国的民主不是突然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早在独立以前，北美十三州已有过百年的地方自治经验。英国的民主更是从大宪章以来，匍匐前行地实验了几世纪，才有今天的格局。饶是如此，英美的进步人士仍觉得现行的体制缺陷重重，提出了种种对治的方法。例如针对当前公关手段横行，选民不熟悉各候选人政纲实质差异的情况，于是有了“审议式民主”的理论和投票前政策讨论日的建议。由于财团势力高涨，政圈权贵勾结商界精英的问题日渐肿大，所以才有左翼学者勾勒出种种代议政制之外的“激进民主”构想。可见即便是国人心目中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也还大有改善的空间，我们又怎

能奢求台湾地区在十几年间变得毫无瑕疵呢？

民主或者不民主，从来不只是有无之间的是非题；我们不能以为从威权体制到民主政体就是个从无到有的简单一跃，或者开电灯般地一按按钮就有了光。相反地，民主没有终点，它是一条漫长的演进过程。不只如此，民主也是一种十分脆弱的机制，一个业已民主化的国家不仅要面对种种问题，甚至还会往后倒退。因此，政治学界除了研究民主化的进程之外，近年也越来越关注“去民主化”这种昔日不受重视的现象了。

其实，单是从各路记者在台湾大选期间得到的透明化招待，与各派政治人物的开放态度，我们就该为台湾短短十多年间的变化感到讶异了。可别忘了，不过二十多年前，参加示威游行还是一件令许多如杨照这般反对派要打从心底发慌的大事。

台湾在过去十多年间产生的各类困难，多是民主转型的问题，多于民主体制本身的毛病。民进党和绿营分子喜用“转型正义” (transitional justice) 去包装诸如“中正纪念馆”更名等刺激民粹的行动，固然是滥用和误解了此一概念。不过话说回头，“转型正义”本身确实是很值得重视的课题，由威权体制蜕变为民主政治，一定会有许多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隐疾需要省思清理，绝对不是一两场选举解决得了的。例如民进党政府最爱用来“消费”国民党的党产问题、白色恐怖与“二二八事件”，这全是两蒋在位时埋下的政治包袱，民进党借之炒作固然不对。但要是国民政府当年早早自行了断党国不分的恶习，早早清理自己犯过的错误，连战和马英九等后人又何须一而再再而三地为此受辱呢？台湾的民主实验充分显示出了转型的艰难。如果迟早要踏上这条不归路，那么一个具有威权性格的政府就该及早准备，明智并且负责地为未来铺下更顺畅的路基。

说到基础，很多人会说民主很讲究人民素质，以台湾当年的平均教育水准和财富积累，一路走来尚且跌跌撞撞，更不用说其它地方了。这也没错，实行民主是很考究人民的“公民能力” (civic literacy)；但我们又不能等到大家都把书念好了，考试也及格了，才开始试行民主。因为“公民能力”的培养，除了教育之外，更要依靠实践。例如“公民能力”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理性沟通与妥协的能力，它不是从书上学来的，而是来自言论开放的环境中的日夜浸染，来自参与决策过程的经验积累。就像游泳，没有人是在陆地上学会游水的，你不大胆下水摸索，你就一辈子也别想成为游泳健将。

如果这回台湾选举的胜利者是八年来劣迹斑斑的民进党，顶多也只能说是台湾人民民主学步的临时顿挫，前路漫漫其修远兮。从这种历史的宽度来看，台湾人现在表现出来的成熟反而是奇迹了，社会变化的过程竟然可以快到这个地步。我想起了人人称羡的香港廉政，其实它也只不过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罢了，在我成长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还是个警察四处索贿的地方，你能够相信吗？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变化，固然要放在足够长远的尺度下衡量；可一经启动，它有时又会迅速得出人意表。

原题为“假如民进党赢了，民主就是个坏东西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4日

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据说中国的政治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注重民意了。证据之一是有些地方官员开始公布自己和下属的电话，欢迎人民随时致电。证据之二是两会期间，各大网站论坛都开了专页让网民提意见给领导人，因为领导人会上网收集民情。

可是在我看来，在国家两大民意代表机构正在召开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大会时，这些好消息简直就是最好的讽刺。假如政协和人大真能如实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民意的话，假如他们全都有机会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收集到的意见带到最高层级的话，假如整个政府的决策真的来自于对这些意见的尊重和分析的话，我们还用得着让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员忙着接电话，还用得着领导人在网上“微服出访”吗？

没错，即便是号称最民主的国家，也会有民情不能上达，政府行动不完全依循民意的时候，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讲，这叫做“政治沟通失效”。无奈的是，只要有一个规模不算小的行政部门，只要走的是代议民主政治，这种政治沟通的失效就必然存在，问题是程度上的大小。那么，中国的政治沟通失效是严重还是轻微呢？

理论上讲，中国的民意传达机制应该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根据对两种政治力量主轴的分析，分别建立了涵盖面极广，层级相当精细的两大套体制，也就是人大和政协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会不时听见有些地方的百姓要高呼“请温总理过来看看”？为什么我们还会看见有那么多的网民在论坛上声称自己要反映底层最真实的情况呢？

也没错，任何政府都要在既存的议会和民意机构之外另开蹊径，或者经常委托专业机构做民意调查，或者仰赖专门的智囊组织时刻跟踪舆论以归纳民意的走向。然而，这一切要不是为了比反对党更快更准地掌握民心，就是要弥补既有机制的种种不足。而原来那些正式的民意代表始终是政治沟通的骨干，再不济也不能变成纯粹的装饰。

每次看见那些穿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人大代表在镜头前端坐听讲或者埋头笔记，我都会生起奇异的感觉。这些代表平常也会这么穿戴吗？我想不会。我知道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如此着装其实是个很重要的表态，他们要在这一一年一度的盛会里昭告天下：我是代表。

每次看见美国媒体煞有介事地在报刊的小花边上报道总统如何亲笔回复一个七八岁的小孩的来信，甚或打电话去和他聊天，美国的读者大概也会莞尔。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白宫几成习惯的表演老招，明明有现成的民意机构在运作着，总统他老人家偏要来这招表现自己的亲民，表现自己率领的政府是何等地重视民意。

其他人当做花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竟然有点“玩真”的意思。如果官员非得要回复电邮和接听电话才叫做开放问责，我们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呢？

原题为“听电话的政治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03月09日

投票（一）：为什么有时候它是不道德的

想像这样一个情景：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地方的居民突然全部迷上了生命意义的问题。他们不只躲在家里沉思，而且还在街道、商店和公园这些公开场合里热烈讨论做人有什么意义。日复一日，如此下来，这个社区的上空仿佛蒙上了一层阴影，大家都活得非常沉重，甚至生无可恋。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的那一天，这个社区的主管部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方案，与其继续沉溺在无边而磨人的争论之中，不如以实际行动解决大家的痛苦。什么实际行动呢？那就是以公投的方式去决定全体居民日后的生命走向，要不就是忘掉这个问题然后行尸走肉般地生活下去，要不就是集体自杀一了百了。

这叫不叫民主呢？假如我们宽泛地把民主界定为一种集体决策的方式，那么全民公投当然是民主的。这又算不算是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办法呢？那就要看它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了。如果这个社区的公投结果出来了，五成多的居民都选择了自杀，剩下那四成多的居民是否也该遵照民主原则跟着去死呢？当然不能，因为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再怎么讲究民主，也不能让其他人替我决定做人活着到底还有没有意义。这个例子当然很极端也很荒谬，现实里不可能有机会出现。可是我想用它说明的道理却适用于最近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上，那就是北京酒仙桥“危改拆迁”的全民公投事件。

居民迁拆是近年中国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许多矛盾和冲突都来自政府和发展商的权力过大，而最受到影响的居民则根本没有说话表态的机会。其实整部人类城市空间发展史就是一个权力分配与斗争的历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笼罩下，哪些建筑应该拆掉建新楼，哪些人可以住进城中心，几乎全是国家机器由上而下的“神目式”（God's view）规划观与资本的逻辑来决定的。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居民参与的规划方式开始在西方兴起。许多城市都有过成功的经历，既能民主地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也能在维护老区和城市更新之间找到平衡之道。今天的中国，最宜大规模地引进这套已经发展了数十年的规划方式。

然而在酒仙桥这个北京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改拆迁”工程里，发展商和当地政府部门却破天荒地想到了“全民公投”这一招，让居民决定要不要接受当局提出的方案，是该搬还是不搬。很多人都说这只是“表面民主”甚至“假民主”，把原以为会博得一片掌声的当局骂得十分不堪。

在我看来，这还不是民主真假的问题，而是投票这种决策手段适用范围的问题，例如个人房产的归属到底可不可以让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集体来决定呢？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我们会看到一个更深层也更根本的概念，那就是权利了。现代权利观其实包括了一揽子的基本人权，其中最核心的自然是一个人对自身生命和身体的自主权，由之派生的最重要权利则是财产权了。但在现代民主运动史上，财产权起到的作用反而更大。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构思的契约论，就是假设人民为了维护自己身家性命和产业的安全，才愿

意把部分权力让渡给君主与国家。而在实践上，现代民主强调的人人平等则是来自罗马法有关财产的规定，中古封建时代延续了这套规定，保证有田土的领主也拥有相应的司法地位和政治权利，使得后来迫使英国国王签署《大宪章》的贵族们有理有据。总而言之，财产权是一种核心人权，不能被人用“民主”的方式剥夺，因为它正是民主的基础之一。

因此，用公投决定一个区的居民接不接受拆迁，其荒谬程度仅次于用公投来决定大家要不要自杀。酒仙桥“危改拆迁”事件是一个上好的教科书案例，可让大家上一堂人权课。

原题为“西方传媒持有什么偏见”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年06月21日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

平均一个星期就会接到一次这样的电话录音：“你好，我们是××报业的调研中心，现正进行一次电话民意调查……”每一次我都立刻挂机。如果是真人打来的，我也总是有现成的理由拒绝：“对不起，我在媒体工作，按照问卷调查的常规，是不能接受访问的。”

活在香港，有哪一个人没碰到过这类调查？香港人每天都在发表意见，而且是对每一项事物都有意见。民意调查已经变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这周日就是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投票日。据调查显示，这一届的投票率有可能会比上一次低。一位茶餐厅的茶客告诉我：“那是因为民意调查做得太多。既然我们的意见早就被反映过了，干嘛还要去投票呢？”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教书时，一个学生的疑问：“如果民意调查做得够科学，那种针对单项议题的公投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其实，各国大选的票站出口调查早就准确得渐渐逼近真实的选举结果，会不会真有这么一天，民调成为民主制度的主要工具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先绕个大弯，谈谈所谓的“网络民意”。

近年来，内地许多政府部门纷纷在网络上公开征求人民的意见。各地各级官员领导，也不时上网会会网民，回答几条网友提问。我真心相信，他们平常有空是会上网的，浏览各大论坛，看看热议话题，观察网友的思绪和倾向。这是不是件好事呢？当然是好事。只不过，所谓的“网友热议”其实也可能是个迷思。网络论坛里往往是看的人多，留言的少；而且是极少。且以知名博客和菜头为例，他说：“以我的 Blog 为例，日均访问量是一万个独立 IP，这意味着每天有一万个人来访问。在这一万人里，回帖发表意见

的人有多少？平均每天不超过100帖，也就是说只有1%不到的人会参与讨论。”如果仔细查看所有网络论坛上最受追捧最受争议的帖子，我们将不难发现部分网民其实都是沉默的潜水艇。他们来了，他们看见，但是他们不说话。潜水艇为什么不浮出水面呢？有可能是觉得想说的话都已经被别人说完了，也有可能只是没兴趣，或者懒得打字。至于那些留了言的，不管他是片言只语还是长篇大论，则一定都是比较有情绪有意愿也比较有闲的人。真能把后者的话当成前者的心声，以部分网民的留言为全体网民的民意吗？然而，我们还是很笼统地说“网民认为x x x x”。也许有一天我们真能找出一套工具去精准地分析网民留言，从里头萃取出全民的意志。也许有一天，民意调查的方法已经进步到了误差极少极少的地步，不用投票，我们就知道选举的结果。

即便如此，选举还是必要的。因为投票和民调的分别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本质的。人的意见浮动不居，今天喜欢吃苹果，说不定明天就爱吃橘子了。对于一项公共议题，刚开始，我可能有一个粗糙的感觉，所以我的反应也是初步的。等到后来消息更多，所知更全，我的立场可能就不同了。而民意调查总是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至于投票，则是这个过程的决断时刻。面临一次投票，我必须很自觉地主动搜集资讯主动思考辨析，因为我知道它不是简单的意见表达，而是一次决定性的抉择。餐馆点菜，餐牌刚到手，你大可以左挑右选自言自语，但是当侍者记下菜名转身而去时，一顿饭的好坏就这么定下来了。菜不好吃可以退回去，但选出来的人不理想，就只能等下回了。

马英九现在的民意再低，台湾人也不能叫他随便下台；当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不顾高达七成的反对民意，悍然出兵伊拉克，英国人能奈他何？除非发动罢免，而那是另一次的决断了。为什么选票常被认为是“神圣”的？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你必须承担后果的决定，它不是你兴之所至的一句感叹一则留言。“尊重民意”和“人民决定”的政治之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人民其实不必负责，后者的人民却要背上千斤重担。

尊重民意的施政当然很民主，但它和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恐怕还是不同的。所以我对那位声称不必投票的茶客说：你这周日还是要去投票的，除非你觉得不用负责的人生真是幸福真是轻松，只想当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客；又或者你认为代议政制还不够民主，那么就该站出来大声要求更激进的民主实践。

原题为“投票不只是为了表达民意”

刊于《南方周末》

2007年11月14日

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中国国家主席最近提出了包括“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等八项教条在内的“八荣八耻”，目的是要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八荣八耻”这个最新的“中央精神”。

提出这样的道德信条，学习这样的“中央精神”，背景当然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得可以；为官的欺上瞒下，贪污不过百万不成新闻；经商的不信不实，伪劣仿冒几如必然常态；至于所谓的“重大”工业意外、刑事案件和非法征地，更是无日无之。“旧社会”的四维八德和各种传统宗教给摔了个稀巴烂，“新中国”倡导的马列主义价值观则沦为口号，中国社会陷入价值真空的局面老早就不是新闻了。

美籍华裔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曾在其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至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传统中国社会基层有自己的文化网络，调节了各方的权力，维持了民间村社的自行运转。但是进入20世纪之后，国家权力深入拓展到各个地方，却出现了“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就是国家政权愈是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地方的社会愈是破败，政府愈是腐化。原因之一就是原有的文化网络失效，政府的威权取代了传统士绅族长赖以维持权力的一系列象征符号，比如说关帝。崇拜关帝不只是民间的“迷信”，也是传统帝国认可的行为；对种地的农民来说，关帝可保风调雨顺；对皇权来讲，关帝是忠君价值的终极体现。政府不只不破坏民间的祭祀结社，反而积极介入出一把力，于是一个关帝，政府民间各取所需，互相得益。

历史人物关羽演变为神的历程，是中国历史发挥宗教作用的经典示范。一般不识字的百姓或许看不懂《三国志》，但是尊崇汉蜀的小说《三国演义》却能透过戏曲等各种民俗文艺，把一套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人物角色与是非判断灌注到帝国全境。帝王不需要提倡任何“荣辱观”，他只需要认可早在民间流传的人物典型和正统的历史观。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惹起了中国知识界和网民的激烈争论。这部电视剧把叛明降清的施琅美化成民族英雄，因为他率军攻克郑成功后人治下的台湾，“维护了民族的统一，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样的主调当然会引来非议。首先，除了在福建沿海的少数地区之外，施琅一直都被人称作“汉奸”。因为他曾两度背叛南明王室，先随郑成功抗击清军，最后又倒向满清收拾了明朝的最后据点台湾。其次，郑成功是两岸共尊的“民族英雄”，如今若连施琅也是民族英雄，那么该置郑成功于何地呢？第三，郑成功现在也被台独抬作建国先祖，施琅则是他们贬损的“小人”。中央台这套剧集针锋相对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此剧最早的倡导者陈明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他直言不讳是“想唤起国人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其次是想振作决策层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意志力和决心”。

关于施琅的历史定位，可以牵扯到中国历史“正统”观的理解，和民族主义形成的问题，十分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在这里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件事来侧击中国社会价值真空的原因，那就是传统史学作用的沦丧，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缺席。

我们先要了解，满清对于向自己投诚的明室旧臣并不客气，乾隆 41 年甚至编纂了《贰臣传》甲乙两篇，列出了 157 个“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大节有亏”的人物，其中包括了洪承畴这些大清洪业的功臣。反过来，倒是郑成功逝世之后，康熙亲书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其间褒贬对比，一目了然。这种做法摆脱了一时的功利计较，肯定了中国历史中永恒的忠奸观念，其政治智慧之高，比起今天某些人仍不愿全面认同抗日国军功绩的态度，相差岂止道里？

满清入关，面对一些儒生基于种族立场的华夷之辨，不得不追求文化上的正统。例如雍正就在《大义觉迷录》里说：“天下一家，万物一体，自古迄今，万世不易之常经，非寻常之类群聚，分乡曲疆域之私衷浅见所可妄为同异者也。……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有时候还得加倍努力，要比前朝做得还多。比方说康熙就每日找儒臣入禁中为自己讲经，他亲诣曲阜孔庙的时候更是“步行升殿，跪读祝文，行三献礼。对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实为历代帝王所不曾有”。

饶宗教授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尝言：“正统理论之精髓，在于阐释如何始可以承统，又如何方可谓之『正』之真理。持此论者，皆凛然有不可侵犯之态度。”清初诸帝明显是要把自己接上正统，让自己的统治得到毫无疑义的合法性。但是要有这个正统，其前提是独立于王权和现实政治利害的史学，及维持这个史学道统的知识分子。所以饶公又说：“……对君主行为可作严厉而正义之道德评判，其由来甚远，实为中国史家之优良传统……历史上之裁判，既为史家应有之责任。所谓 moral judgement 者，西方或决于神断，稽之往史，古埃及倚神力为裁断，凡人之终，必受秤之衡量以定其功罪。吾谓神断之秤，不如历史之秤。”

自孔子作《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这种想法骤听起来很迂腐也很不科学，却的确是中国“旧社会”价值持续的枢纽。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反拙，混淆是非之余还断送了自己的合法性。因此有“史权”的说法，表示中国史家和知识分子秉笔直书，自成一独立系统，可以制衡皇权。以前的皇帝甚至要克制自己，不能查阅更不能更动内史书写保存的“实录”。

可是自从 1958 年的“史学革命”，中国政府发动以无产阶级的立场重新评价历史人物之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就被彻底颠覆了。它不只翻转原有的褒贬原则，孔子变为不学无术满腹祸心的“孔老二”，秦始皇成了只可颂扬不得损抑的明君；而且还

把历史化作完全服务于眼下政治需要的奴才。且看这场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到了文革，梁效等笔杆子甚至说写历史可以“七真三假”！于是华国锋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就说文革集团“抓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捧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见逯耀东《史学危机的呼声》）

我没有兴趣去争论施琅的问题，只是想指出，如果一个号称“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者为历史人物翻案的理由只是想配合眼下的政治需要，那就实在太可悲了。但再转深一层，就知道这不是个别学者的问题，而是整个世代史学地位沦丧的结果，知识分子群体堕落的表现。当历史可以尽管利用，它的利用价值就会破产：当知识份子放弃了自己的批判角色，他们对政权的美言也就不再可信。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政府以全能的姿态强推一套道德观，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明日不成黄花？

原题为“春秋既亡贼子何惧”

刊于《明报·笔阵》

2006年04月19日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冤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

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损国家形象。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的角度。

同样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明报》，2008.05.18）如果更进一步站在那些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刚刚经历丧亲之痛，那种悲愤难道还要让位于政府一时的形象问题吗？何况他们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岂不更添依法治国的光彩？我想恰恰因为有媒体在场，无告的父母们才要更加卖力地嘶喊。这是传统智慧中迫使当局正视事件的理性行为，也是间接替全国无数学子争取安全环境的义举。

在这种时候，仍然要他们忍气吞声，回去默默流泪，无异于在公众面前删除他们的声音，在新闻构成的历史中抹消这一段不好看的记忆。提出这种要求，的确是要含泪的。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

刊于《明报·笔阵》

2008年06月14日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前一阵子北大校园出了件趣事：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和中央电视台合办了一场论坛，兴致勃勃地请来一批经济学家畅谈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在这样的场合底下，没想到有两位经济学家很不给面子地发出了惊人的尖锐言论。首先是茅于軾先生就着近日城管打死人的事件痛批城管制度。接着是吴敬琏先生在压轴座谈会上语带嘲讽地问央视主持人：“我看茅先生刚才那番话，你们肯定是要剪掉，不播了吧？”然后话锋一转，吴先生又说起了央视红极一时的纪录片《大国崛起》。他说自己只看了第一集就看不下去了，原因是里面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吴先生回头再问台下的听众和学生：“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吗？”在大家一时还会不过意来的时候，吴先生又引述刘少奇当年的名言，且更进一步指出那三年的大饥荒几乎完全就是人祸。于是台下掌声一片，主持人尴尬地说要回去检讨，整场座谈会不久就提前结束了。

茅先生与吴先生都是常常惹起争议的人物；但这一回他俩的坦率直言，我以为不管

是自由派还是新左派，不管是庙堂精英还是草根愤青，都应该为他们鼓掌喝彩。因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于是问题就来了，茅先生和吴先生到底说了什么真话？他们的言说面对的又是什么呢？在那一天的论坛里面，最刺激的当属吴敬琏先生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从台下的掌声看来，大家一定都很认同他的意见。可是一个人说了番人人都晓得的事实，又有什么好喝彩的呢？假如我今天煞有介事地向大家宣布太阳果然是从东边升起的，会得到掌声还是笑声呢？换句话说，吴先生一定是说出了大家都明白，但某些人硬是想回避甚至否认的道理或事实。

虽然有许多学者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也曾为中国的现代化立过功劳，认为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大社会工程替今天的荣景奠下了基础；但是已经没有人再坚持随之而来的大饥荒是纯粹的自然灾害了。当年平江一位农民写的那首词：“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已经成为那几年最有名也最真实的写照了。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号召底下，中国出现了亩产万斤的奇迹，大如人的玉米“怪物”……那些欺上瞒下的数字甚至影像掩盖的是过千万人的死去（到底那三年死了多少人，还是个备受争议的谜团，最高的估计甚至达到四千万）。最令人气结的，是种种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在当年不只被掩盖，还要上升为政治路线斗争的论题，而听过老农诉苦，真打算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却被残酷斗倒。

吴先生说得对，现代中国史上真没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有的只是人祸，所以连官方也早把这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命名为“三年困难时期”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大家还要为吴先生那番“太阳必从东方升起”的大实话喝彩？为何这番话果然没出现在央视的转播之中呢？原因我们都知道，因为大饥荒的真相虽然早已不是禁忌，但它始终涉及毛泽东，始终涉及历史的诠释，始终涉及某种似乎不宜言表的问题。

政府若要施行有效的统治，要百姓心悦诚服地遵从法律政令，要纳税人心甘情愿地缴税，靠的不能只是暴力，还要靠对统治者的同意与信服，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必须同意政府的统治，政府才有合法性可言，才能有效地管治。中国现代史之所以还有那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是因为在有些人现有的意识中，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却是历史。为什么共产党是执政党呢？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民（无产阶级）的利益。怎见得它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是因为在历史的实践经验上，我们可以看见它一次又一次地走对了路做对了事……

然而，不客气地说，一个永远正确从不犯错的政权，这是在传统社会里才行得通的神话。如今还有谁会认为一个政权能够只靠传统和神话般的神圣历史就能取得合法性，赢得受统治者的同意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程恰恰说明了，政权的合法性绝对不能

只靠一个不容动摇的神话史观，还要依靠凭债效而来的良治经验。最近两年，领导层不断强调民主的重要，甚至逐渐推进民主选举列入改革的目标之一，用政治社会学的术语来说，这是合法性由人民同意迈向人民依程序授权的转化。由此看来，再去重复神话史观的力量不只不合时宜，简直就是开倒车了。

好玩的是，吴先生那番言论得到一片掌声，仿佛他问的不是“有‘三年自然灾害’这回事吗”，而是“太阳是从西边升起的吗”。也就是说，其实人人都已经晓得太阳是从东方冒头，但偏偏还不能畅快直白地承认这个事实。

原题为“破除忌讳错误的神话史观”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01月30日

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昔年，当高速公路在中国仍是一件新鲜事，当遍布各地的绵密公路网仍然只是抽象的蓝图，我们都曾见过许多好奇的农民站在路旁护栏之外驻足旁观，有时他们甚至冒险横越，来回于车道两端。于是，高速公路延伸之处，农民被车撞死的消息时有所闻。很多人在慨叹之余还不免谴责村夫野妇的无知：你以为那是村里的土路呀？高速公路上的车速有多快呀，你们怎能视若无睹随意穿行！于是有人就强调教育和执法的重要。后来也不知是教育有效，执法很严，还是生命血淋淋的见证已经够惊吓，农民在高速公路上被车撞死的消息渐渐少了。

今天，中国特有的“城管”制度遭到舆论广泛批评，因为那些妾身未明的城管队员总是拿着“执法大棒”一执的不知是什么法，击向他们眼中的“城市毒瘤”，从街头乞丐、流动小贩甚至到过路的看客都无一幸免，受害于他们的人说不定比受害于那些“毒瘤”的人还多。可是又有人说了，原来“城管”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清理城市秩序时也常遭人辱骂，还有过被小贩刺杀的事。所以大家就很关心这套制度的存废问题了，有人说应该彻底让它消失，也有人担心“城管”消失之后城市秩序将荡然无存，比较理性的方法是规范法规，让它更正规更合理也更制度化。

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还没触及更核心的基础问题。假如“城管”是城市秩序的管理者，那么所谓的“城市秩序”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具体地说，在何种城市美学的观点之下，在哪些人的眼中，小贩和乞丐才成为一种不符合秩序的异常事物呢？

且让我们以小贩为例再细致点挖下去。在许多亚洲城市的现代化历程当中，小贩都被市政当局视为必须规管扫除的对象。那些自以为见识超前的官员和规划师相信一座现代城市应该是整洁有序的，最好像那些美丽画册里的设想图一样，人有人路，车有车道，

休憩聚会有公园，消费购物在商场。因此，像小贩这种混淆了功能分区，搞混了街道用途的人群，就像风景油画中的垃圾，必须除之而后快。换句话说，这是漠视历史脉络、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的纯粹美学观点。城市秩序的界定者（往往是官员）把它硬套在一座又一座活生生的都市之上，就像他们喜欢林荫大道和壮阔广场一样，认为好看美观的城市就是现代的城市。从这个角度而言，“城管”扫荡小贩其实也是一种形象工程，罔顾市民生计、削足适履的形象工程。

当然，流动小贩的存在也会实际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例如地产商和铺面商店的经营者。流动小贩不用缴纳租金，甚至不用缴税，所以他们卖的货物注定要比一座大商场里的连锁店便宜。因此在香港这类地产业发达的城市，流动小贩等于是商界公敌，是一定要取缔的。至于小贩交不交税就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课题。

让流动小贩恶名昭彰的另一罪名则是阻碍交通，我们知道，交通在现代城市是何等重要，它就是人流、物流以及资本流动的具体血脉。虽然街头小贩是最古老的市场形式，但这到底是汽车的年代，为了让汽车高速穿梭于市区之间，为了人流和物流及时达到目的地，我们必须把挡在马路边的人群隔开，将吸引人流成群停留的小贩当做打击对象。

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交通畅通，但是我们往往忘记其实这也和权利的分配有关。早年高速公路人车相撞的悲剧屡有发生，不是住在路旁的农民落后无知，而是因为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方。在公路开通之后，他们的自然路径被截断了，现在就一定要走上更远的路程，才能找到安全的天桥或者隧道。换句话说，为了让那些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他们就得牺牲自己的便利；凡是还不能适应这种新生活的人，则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这不是客观的交通问题，而是两种路权的冲突。

中国各大城市如今正一一迈进“汽车社会”，为了让车主和使用汽车的人更方便，道路的使用权一定要搞清楚。行人就该使用人行道，汽车就要走公路，两者间的矛盾常常以前者对后者的“礼让”来解决。坐在汽车上的官员往来各处方便舒适，风驰电掣，最难受的就是遇上堵车；这些人是不会知道市民乘公交或步行要花上多少时间精力才能到达马路的对面，也不会知道有多少残疾人士和老人会望路兴叹，更不可能知道在许多市民步行范围内的小贩是何等地便民利民；他们只知道流动小贩就是使得他们座驾行驶不快的祸首之一。

更进一步言，由于许多流动小贩是外来人口，它难免又涉及到不少城市居民对外人的恐惧。他们先是完整地接受了现代城市美学观念的熏陶，觉得市容比百姓的生活还重要；又未经反省地认同了汽车主导的交通规则（说不定他们就有不少人是车主）；加上对治安不靖的感同身受及时有所闻的流动人口犯罪消息；于是，一股脑地把那些操着外地口音的小贩当成所有罪名的承担者，认为流动小贩就是自己城市的外在威胁的现实象征。

总而言之，“城管”问题的本质既非他们的行为是否文明，是否合法；亦非他们的

存在合不合理，而是他们负责维持的秩序到底是谁的秩序？他们管理的这座城市又是谁的城市？它只是车主的城市吗？它只是地产商和商店经营者的城市吗？它只是不用依靠小贩被迫上街谋生的中产阶级城市吗？它只是一群拥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城市吗？它只是规划设想图中的美好图像吗？它只是官员政绩形象的光辉见证吗？我没有答案，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来不在每一个市民的手中，从没有人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座怎样的城市。

原题为“城管到底维持谁的秩序”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年01月30日

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当几乎所有中国城市都宣传自己要和国际接轨，要建立既文明又现代的新城面貌时，它们大概不知道其实自己又落后了。2006年去世的教母级都市学教授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的经典名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所致力推翻的，乃一种自20世纪初叶以来横行全球的“现代主义城市观”，那正是当前主导中国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理念，早已被欧美各国批判摒弃的一种意识形态。

根据雅各布斯所言，这种意识形态期望一个城市有四通八达的宽大马路、光亮整洁的市容、恰到好处的公园和装饰。整个城市的布局仿佛是为神而设，好让它从上而下把一切看得一目了然。在这个城市里面，该工作的地方有人工作，该生活的地方有人生活，所有商业活动也都局限在划定的区域，彼此之间分得清清楚楚，绝不混淆也因此毫不混乱。

如此完美的城市真是合应天上有，人间只在规划展览馆；一旦变成现实，难免就会衍生无数的意外，进而腐烂破败，成为无法管理的一连串问题。为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它虽是一种规划师和建筑师的梦想，同时也符合为政者那种高高在上控制全局的欲望；却偏偏忽略了民众的根本需要，又不经思考地排除了社会上可能存在可能出现的所有变化。

什么是居民的根本需要？流动无牌小贩就是答案了。他们卖的东西价廉，满足了许多人捡便宜的心理，尤其是那些想省下更多生活开支好把钱花在医疗和教育上的低收入市民。他们总是能敏锐地掌握市场动向，哪一种货物流行就卖什么，这一阵子大家想什么他们就给什么。而且他们够机动，上下班的要点他们存在，人流多的时候他们出现。可以说流动小贩这种行当之所以屡禁不绝，正是因为一种市场的需要，人性的需要。

什么又是社会的变化？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待业人口却不断上升；城乡之别无法弥

平，进城民工则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趋势了。在这样的趋势底下，流动小贩群体的形成不是必然的一件事吗？当小商贩岂不是千百年来无权讨生活的穷苦百姓很自然就会想到的一种职业吗？

小贩本来没有无牌有牌之分，这牌照是政府发放政府管制的。在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里面，例如香港，收紧牌照打击无牌是为了保障那些付出高昂铺租的商户和大型连锁店。但在内地，除了利益分配原则之外，许多城市考虑的还有一些说出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经不起推敲的理由。比方说“保障治安”，又比方说，整顿市容。说到治安，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份无牌小贩和治安关系的严谨研究，所以也不知道小贩增加和治安恶化有没有因果联系。但是凭常理推断，我却晓得你赶绝了基层谋生的活路，就会把人逼上梁山。

至于“整顿市容”，就更纯粹是一个审美的问题了。我们凭什么为了要让城市看起来更有秩序更美观，就断绝部分市民自力求存的机会，就阻碍市场的自然需求，就粗暴地在表面上平抑贫富与城乡之间差别日大的动向呢？

如今中国城市面对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局部的城市管理所能解决的，但是我知道，利用城管队员消灭无牌小贩一定不是解决方法，反而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原题为“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9月04日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1992年，我首次参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园”朝圣。那时的“人民公园”已经和电影、照片里所见大不相同了，一片绿草就与一般的北美公园无异，除了有几个不知是老嬉皮还是流浪汉的男子躺在上头。路灯的柱身上贴满各式各样布告，固然有学生活动的宣传海报，也不乏租房家教一类的小广告。“人民公园”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不见当年风起云涌的盛况。

这块地方是学校拥有，本打算用作停车场的。但到了1969年4月20日，几百个学生和当地市民响应一份地下小报的呼吁，自己带来了草皮、花朵和树苗，要把它变成“人民的公园”。那是全球青年反抗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高潮岁月，对伯克利的学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一个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维持，可以在里面睡觉、闲聊、野餐、唱歌、跳舞、演说和集会的自由交流空间，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车场有趣得多。

正当学校终于筹够资金可以开工之际，“人民公园”已经成了天天有活动的世间小乐园了。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要比温吞的大学校长强硬多了，他认定这是一群占领了公地的暴民，并且指责加大伯克利分校变成了“共产党同路人与性恋态的避风港”。1969年5月15日星期四，后来的美国学运史称作“血腥星期四”的这一天，里根下令军警开入校园，驱赶“暴徒”，结果有100多人受伤，一个并非示威者的学生中枪死亡，一位无辜木匠永久失明。接下来的几天之内，里根更是宣布伯克利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5月30日，只有10万人口的伯克利有3万人不理当局警告，参加了殉难学生的纪念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让一千座公园绽放”。

“人民公园”终于还是保留下来了，和加大伯克利分校一起载入美国自由派的史册，成为火红年代的象征。尽管新一代的学生已经不再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的实际价值（虽然还有零星的演说和集会）；但不论是如今负责管理它的市政当局，还是校方，都不会想到要毁弃它，更不可能搬走后来市民自发摆放的纪念碑。因为“人民公园”不只是个具体的公园，还是学校自由精神与当地社群的象征空间。

我第一次去北大，心里的头号景点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来一般香港人是不会太在意这块小地方的，说不定连听都还没听过呢。但这里正是当年北大学生集会的重地，多少思想界精英，多少学生领袖曾经在此慷慨陈辞；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又有多少激荡思潮的标语和文章在此张贴，多少猛烈的论辩在此发生呢？“三角地”是北京大学迁入燕园后，展开它现代旅程之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它代表了一座大学应该具有的自由、开放和观念交锋的本色。又由于这里是北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是中国的。其意义相当于加大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值得保留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纪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却以它太过杂乱太过商业化为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响学校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先进的电子布告板。

所谓杂乱，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既然是学生与周边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间，表面的无序是必然的。国外大学不知有多少类似的角落，柱子和墙上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海报小广告，但它们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成了大学风格的一部分。至于“商业化”一说，就更是可笑了。大学向商业靠拢，不只是北大独有的问题，是蔓延全球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瘟疫）。如今的北大，最商业化的地方不是“三角地”，而是一幢幢挂上了企业名号的建筑，“校企合作”的计划，在外挂职赚大钱的教授，及无心向学专业打工的学生。到处贴满了商业广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症。校方不只无力阻止商业浪潮的大势，甚至还主动构思种种“创收”方案，如今却指责“三角地”铜臭味太浓，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说网络论坛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旧角色，本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难道就不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标吗？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早就不再是个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论坛了，伦敦市政当局怎么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进去发表演说呢？

拆了“三角地”，换上电子布告板，这个行动最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用了一个由上而下的校方宣传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学生发声平台。也许，这就是北大想要彰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原题为“人民公园还在，但三角地没了”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25日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有些来港活动的女性性工作者总是不忘服用避孕药，不只是为了避孕，更是为了控制月经，使它更有规律，同时还可以减少经期的痛楚。对于性工作者来说，月经是阻碍她们维生的大敌，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我们很难想像，原来某些地方的工厂也常发避孕药给女工，其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月经，减少月事引致的工作效率下滑。但和性工作者自愿服药以提高产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工厂的管理者是怕一个女工的不适会带来自己的损失。他们付了月薪聘人，自然要把工人利用至尽。对他们来说，女工对工资的要求通常不高，又柔顺听话，简直是最理想的劳动力。最大的麻烦就数月经了。

月经从来都是个麻烦事，而且见不得每个女人都自小被教导把它仔细藏好，每个女人都都难免以耻辱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按月流出的污血。正因如此，所有卫生巾的广告都

得强调自己防渗防漏的妙效。这些广告的拍摄方法本身就说明了人对月经的恐惧达到了什么地步，它们的色彩总是一片轻柔的无垢雪白，好完全回避任何与血液有关的联想。就算真要用液体在镜头前示范卫生巾的吸水能力，不知道为什么，那些液体也一定是蓝的。难怪我有个电视看得太多的小侄子到二十岁那年，还以为月经是蓝色的。

去年离世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艾莉斯·杨，在其遗著《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中专开一章来谈月经的问题。她敏锐地指出，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正常的身体、预设好的身体、每个理当如此的身体，都是不会从阴道中流出血来的身体。因此要‘成为’自然，就得被视为自然，来经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还得藏好一切证据”。

这当然是因为所谓“自然的身体”，其标准是以男人的身体来设定的。这种男性的身体标准无处不在，尤以工作场合为最。艾莉斯·杨又说：“月经使得学校和职场等公共体制中的女人有其特别的需求。学校、职场及其他科层式平等的公共体制，预设了一种有着标准需求的标准身体，而这样的身体是没有月经的。”结果自然是一系列的不公平，比方说美国某些工厂限定了工人上厕所的次数与时间，完全不考虑女性的生理需求，没想到经期中的女性使用厕所的方式有别于一般男性。

这位女性主义健将或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在某些地方只会变得更糟。在这些地方，大部分工厂也都严限工人上厕所的时段，它们比起美国的同业幸运的地方是几乎用不着担心给人起诉性别歧视的风险。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发药给女工的厂商，更是毫不掩饰他们视工人为单纯生产工具的用心，直接而粗暴地管训女工的肉体，尽其所能地使之成为没有月经的标准身体。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做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原题为“有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2月13日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

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盾，生产过程不发生污染，产品要达到环保标准，劳工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食品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强奸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这种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于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寻根究柢，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常人想象范围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半十五年里的事。区区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许多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日积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声誉；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及术语，鹦鹉学舌地大谈什么新世代市场推广与现代品牌形象的建立。说穿了，就是搞公关卖广告；舍本而逐末。伊利和蒙牛等出了问题的大型乳品企业为了挽回公司的命运，联手推出一个堂皇的宣言，要消费者重新回到他们的怀抱，其情可悯；但是这份宣言无论怎么看，还是不脱他们过去十多年来用惯的老招，徒有危机管理之形，却不得其神。什么是那个“神”呢？很简单，看看管理人们平常喜欢引用的外国经验吧，那就是最高领导层自行向股东请辞，去一人以存大局。

我常在媒体上看见某些企业老总夸夸其谈，对着访问者说一堆很时髦很诱人的营商哲学、品牌理念，一派高瞻远瞩的架势；后来却又听说他们的公司出事，这些老总们甚至还得为此琅琅入狱。搞了半天，没想到他们居然就坏在最低级的错误上。

这情况就和对着一批在牛奶里添加有害物质的家伙大谈社会责任一样，无异于告诉一帮连汽车都没坐过的人该怎么选择最佳航班座位，是种无聊而虚幻的泡沫。从这个角

度看，“毒奶粉事件”就是过去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某种泡沫爆破了。它揭出的真相是：原来我们连站都还站不稳，居然就想飞了。

原题为“品牌的泡沫”

刊于《am730》

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中國富豪不好當

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开了许多年的宝马。但他最近打算换车了，理由不是宝马的性能欠佳外貌难看，而是因为宝马在内地的形象太糟了。这也难怪，我们总是听说宝马撞人，车主扬长而去。甚至还要下车再痛打一顿贫苦受害者的新闻，似乎但凡开宝马的都没什么良心。那么他该换什么车才好呢？Benz 还是 Lexus？细想下来都不对劲。因为这全是有钱人开的车子，而在今天的中国，一部昂贵的名车除了惹人艳羡之外，还要招人厌恨。我的朋友罪不在车，而在有钱。

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做的一项民意调查，3990个受访者里头有66.75%的人认为中国富人的整体质量“很差”，觉得富人质量“好”或“较好”的则只占3.95%（这3.95%的受访者本身会不会就是富人，或者自以为是富人呢？）。这项调查后来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仇富讨论，战火还涉及一向为人敬重的经济学家茅于軾，因为一向关心贫穷问题的茅老居然要“为富人说话”。

且让我避开富人的形象何以会这么糟这个大问题，把它留给更敏锐的社会学家去解决。我更替富人们担心的是实际的问题。也就是他们该做些什么去补救自己低落的形象呢？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谈到贵族了。

翻开任何一本时尚杂志，我保证你在每一期里都准能发现“贵族”这个词出现一次以上。可见这些杂志的对象，那些有消费能力而且追求品位的读者们，应该都很关心贵族到底怎么过日子。其实这不是资产阶级第一次大规模地对贵族感到好奇了。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当欧洲资产阶级的财势渐渐超出贵族阶级，他们就开始学习贵族般的生活品位了。直到法国大革命，贵族统治正式被推垮，资产阶级的忧虑与自卑仍然无法消除。虽然他们开始掌握政权，虽然他们比贵族有钱。但是他们依然觉得出身与那蓝色的血液很令人敬畏，而一个人的出身与据说是与生俱来的气质，主要就展现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品味之中。

于是我们熟知的法式美食才有了出台的机会。一般资产阶级不容易像贵族般拥有明

星级的家厨，而原来替伯爵亲王打工的名厨又纷纷下海开起了餐馆，所以上馆子吃饭就成了时尚。在资产阶级力求攀比甚至超越贵族的欲望推动下，用餐的程序和方法变得非常仪式化，令人眼花缭乱的刀叉在在考究着食客的礼节和知识。这正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成就之一，使饮食变成可以区分人群等级高下的艺术。

硬資本之外的軟資本

18 世纪的资产阶级明明财雄势大，但硬是心里觉得不踏实。这正好反映出在资本主义开始大获全胜的年代要想彻底取代贵族，靠的不能只是股票现金等硬资本，也不能只是豪宅珠宝等用公钱可以堆砌回来的身外物；还要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软资本。照已故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说法，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源。为了证明自己也很有文化，所有过去由贵族包办的事，新兴的资本家也得跟着做。其中一件最有文化的事莫过于赞助文化艺术了。从前，巴赫要替大公管理乐队谱奏新曲；如今，银行家也不吝啬资助管弦乐团。最起码，也得请个落魄书生或者尚未为人所识的年轻画家来当家庭教师。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近代史三部曲之一的《资本的年代》中曾戏谑地说：“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适合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e Literate)，即不受聘雇但靠自家财产做研究的学者。”穷相毕露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赞助文化学术乃是资产阶级应尽的义务，而培育子女让他们成为学者和艺术家就更是了不起了。说回今天的中国富人，除了学“贵族”打高尔夫球甚至买下酒庄田产之外，他们有没有这种文化资本上的紧张呢？他们有没有大规模地投入文化活动呢？他们有没有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样留下一座繁荣了整个城市艺术景观的艺术馆，或者像摩根图书馆那般足以傲世的珍本收藏呢？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面，新兴企业家很不喜欢“暴发户”这个称号，所以再暴发的地产商也要赶紧学懂欣赏歌剧的门径，因为最后能证实你果然上流的不是你开什么车，而是你有没有文化素养。

当然，很多人会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多现实问题：文化学术此等“长远软实力”实在太软，咱们只争朝夕，有钱还不如捐助医院和基础教育。说得也对，西方历史一直流传着各种乐善好施的好男爵(good baron)的传说，即资产阶级也极力避免给人一种只求私利不顾公益的印象，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绝对是大资本家的天职。

过去十多年来，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两种看似矛盾的趋势就是：一、随着反全球化声浪的提高，有一轮新左翼回潮的现象，无数青年投入了反对大企业的运动，视国际财团

及其 CEO 为人类大敌；二、与此同时，全球富豪的慈善捐款数字却节节上升，大者如“股神”巴菲特更是破纪录地把总数四百三十五亿美金的大部分财产全部捐出。其实今天的大企业都知道自己的样子的不好看，所以“血汗工厂”闻名的球鞋公司成立人权基金，石油公司要投资再生能源的开发。你可以说这是伪善，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伪善，中国商界也不见大规模的企业责任运动，偏偏中国正是一个急需倡导这类企业社会责任的国度。

资本家的美德

近年有一批“创投慈善家”(venture philanthropist)兴起，其代表者为专注第三世界健康问题的盖茨夫妇，与 e-bay 创办人欧米迪耶(Pierre Omidyar)设立的“欧米迪耶网络”。这类新型慈善家的最大特点是以企业家的精神和能力营运自己的基金会和公益活动，他们不愿意只是捐钱。而且还要自己想办法去解决最困扰自己的社会问题，从“第二部门”的大亨一下子变身成为“第三部门”的活跃分子。这种做法当然比“有钱出钱”的境界高了一层，因为他们更能证明自己不光是富有，并且极具良知，有自己特定的关怀对象。就算没有，也不是问题。最近英国有一特殊的组织，专门为富人开设工作坊，带他们参观苏丹的难民营和亚马逊丛林里头几近灭绝的印第安部落。如此实地考察一番，自然对现实世界的悲剧深有体会，不难找到最令自己动心的救助对象(听说有参加者还会在回程的私人喷射机上哭得死去活来)。然后再逐步指导他们成立基金或者加入有关机构的方法，鼓励他们彼此认识形成沟通互助的慈善富豪大联盟。顺带一句，加入这类联谊会，讨论全球暖化与粮食短缺的话题，已经变得比加入私人会所探讨来年波尔多红酒质量问题更“潮”更酷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苛评巴菲特与盖茨此等人类史上最大的慈善家，觉得他们再怎样捐钱也掩盖不了这笔财产取之不义的罪恶。情形就像 19 世纪的头号富翁卡耐基，虽然全副身家丢进了基金会，可是工运领袖还是批判他，与其多盖几座音乐厅还不如把压榨工人的还给工人(大家当记得卡耐基与美国史上最惨烈的镇压工运事件的关系)。这就牵涉到另一个大问题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凭什么拥有财富。正好这也是当前中国仇富心理的思想背景。

最近十多二十年，有些学者把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的形象更正为道德哲学家，反映的就是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紧张从未远去。著名的经济学家麦考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也就是那位因变性而引起争论的经济学家)，去年才推出一部巨构《布尔乔亚美德》(The Bourgeois Virtues)回应这个难题，极力主张市场经济不只不损及道德，反而是美德的温床；而富人不只不可恨，甚至还应该是传统善人的合法子嗣。我不打算在此论辩她的说法站不站得住脚，更不能开展可以上溯至韦伯“新教伦理”等知名观点的复杂学术讨论。我只想借着这堆庞大论述和史料提出一点简单的观察：从资本

主义诞生的一天开始，资产阶级就不能摆脱一种心理困扰，那就是要谨慎对财富(根据麦考洛斯基，“谨慎”乃是布尔乔亚的头号美德)。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级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复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矣，英雄未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原题为“從貴族到資本家=中國富豪不好當+硬資本之外的軟資本+資本家的美德”

刊于《am730》

2008年01月09日、10日、11日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芬兰的义务教育是一个奇迹。从2000年开始，芬兰总是在“国际学生评量计划”里头名列前茅；更令人吃惊、艳羡甚至恐惧的，是他们的学生还在不断进步，评分一年比一年高。且不说其他项目，光看阅读；据统计，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干的休闲活动是阅读。这些孩子的阅读能力又怎能不高呢？为什么芬兰的教育这么厉害？

这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谜题，所以每年都有专家学者络绎不绝地从世界各地涌至芬兰取经。然后他们发现，原来芬兰的秘诀之一在于教师。芬兰教师的社会地位之高，是其他地区难以想象的，据当地媒体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是中小学校的老师，一般普通小学老师受敬重的程度尤胜于国家元首。而且他们的老师都像学者，几乎全部拥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暑假的时候还要上大学继续进修。

如果一个老师干了几年就辞职，他多半是跑去念博士了。由于老师自己就是喜好学习并且擅长学习的人，所以他们才能教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少老师后来进了企业，变身成为高薪人士。芬兰的大公司最喜欢聘请教师，理由是能当老师的年轻人一定是这个国家最顶尖的人才。

如果一个总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总是奋发学习的人，就是未来知识时代最需要的精英，那么中国一定是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因为我们也有一大批好学之士。和注重基础教育的芬兰模式不同，“中国模式”强调“学习型官僚”。你现在去各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点名，会发现登记簿里没有几个中小学教师，倒是有不少在职官员，他们全都很踊跃地攻读着硕士博士，颇有学政合一的古风。

芬兰教育以国际视野闻名，小学开始学英语，中学再加一门第二外语。他们还把全球的信息与知识自然地融入课程，例如在小学的数学课里要孩子计算各国摩天大楼的高度，在初中社会科学的课堂上请孩子模拟演出联合国的工作情况，使他们懂得从不同国家的视角了解世界局势。除此之外，他们的教育部有种特别补助，尽量让年轻人有出国游学的机会。当地一位官员解释，其实“在北欧，你已经找不到没出过国的中学生了”。相对地，在我们的“中国模式”底下，你则很难找到没出过国的官员。1999年，“两会”代表开始关注中国干部公费出国何以花了2000亿元人民币；到了2007年，“两会”代表持续关注干部出国的总开支怎么会渐渐跳到3000亿元。财政部的数字显示，2007年中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大约是6000多亿人民币，占了GDP的2.7%。世界平均水平是7%，一般经济欠发达国家也有4.1%。我手上一时没有2007年中国公务员吃喝、公车 and 出国的开销统计，但我知道在2004年的时候，这笔钱的总数就已经达到了7000亿元人民币。如果把这个账目也看成是种教育开支，那么我们的学习风气就算赢不过芬兰，至少也叫做各擅胜场。

不少地方的教师都在抱怨自己的薪水太低，不只低到一个丧失尊严的地步，甚至连糊口也很困难。本来依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愤怒的教师一个月却只有一千甚至几百元的收入，难道这就是当地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吗？抑或这是学习型社会之“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例证呢？

老师不受重视，一般而言，就意味着孩子的教育不受重视，更意味着我们并不太担心我们的未来。很奇怪，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实行一胎政策，人人都拿孩子当宝，但为什么今年各个事件都显示出了相反的讯息呢？先有一场震垮太多学校的地震，接着是一堆让婴儿患上肾结石的奶粉；莫非我们的希望不在下一代，而在我们自己的长生不老？我突然想起西洋传说中的那条“衔尾蛇”（ouroboros），它太过饥饿，不惜从尾端开始吞吃自己；嘴巴叼着尾巴，形成了一个圆圈，乃西方秘学的著名符号。这个符号有很多层意思，其中一层是：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原题为“一条吞掉自己的大蛇”

发于“牛博网”

2008年11月01日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再次登上了香港报纸的头版。原因是一群学生“大闹”毕业典礼，他们抗议校方颁授荣誉法学博士予前特首董建华的决定，他们要求校政应该更民主（包括颁发荣誉学位时该考虑学生诉求和感受）。结果场面乱得屡次打断了董建华的发言，迫得他要请求学生“给我说话的自由”。除了董建华，最不快的大概就是一些学生的家长了，他们说自己很穷，辛辛苦苦养大孩子等的就是这美好的一刻，居然硬生生叫人给破坏了。然后传媒也说话了，轻则呼吁学生要包容不同意见，尊重他人感受；重则翻起老账，把中大历年的“丑闻”全挖出来（比如说当年学生自办的粗话小报和近年被指“宣扬色情”的学生刊物），证明这真是家早有前科的问题学府。

我真为母校感到骄傲，这是一所充满抗议精神、深具反叛传统的好学校。想当年，我们之所以瞧不起老字号的香港大学，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殖民地精英的摇篮，还因为比起我们这家一开始就高举“中文”盛产反殖豪杰的大学，他们的学生实在太乖，并且越来越乖。虽然大部分中文大学的学生也都不会参与“过激”行动，但总有一些人会不时跳出来吓你一跳。就拿校长得到的待遇来说吧，现任的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只不过是让学生在毕业典礼上喝骂罢了。前任校长李国章甚至差点进不了会场，因为有学生睡在路上阻挡他的座驾前进。再前一任校长“光纤之父”高锟就更惨了，他在毕业典礼上接到的抗议信是用避孕套造成的。中大校方每次有什么动作，学生就一定奉陪“反动”；你要盖新大楼，学生就贴大字报；你要砍树修路，学生就在树上绑黄丝带以示“保树育人”的决心。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抗议港英政府的教育政策，还有过全校学生罢课的光荣纪录呢。所以中文大学校园核心地带的平台广场又叫做“烽火台”，乃同学会集会誓师的圣地。

出了校门，碰到各种社会政治问题，遇上各种示威集会，中大的校友和学生更是无役不与（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很多人更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屡战”的勇敢精神）。那些觉得中大学生负面新闻特多的传媒可不知道，对我们这批天生反骨的校友学生而言，这叫做战绩彪炳。至于那些先是吓傻了眼、后是气愤莫名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他们，这就是贵子弟念的大学了。与其不能改变现实地穷生气，何不换个心情转个角度，欣赏眼前所见。瞧！这就是大学了，真正包容真正多元的一座大学。

大学的毕业典礼不一定总是平静的，尤其在颁发荣誉学位的时候，更尤其是在颁发荣誉学位给政治人物的时候。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回到母校耶鲁大学，预备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时的场面真是热闹，不只一帮学生举着标语高叫口号，还有一些教授愤然离场以示抗议。他绝对不是第一个在毕业典礼上被喝倒彩的政坛领袖，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因为政治人物的一生总是处在争议中，总会有人不满他的政策他的政绩，甚至总是

有人会憎恶地敌视他。对于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和学生来讲，还有比记者云集的毕业典礼更好的示威时机吗？所以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对付政治人物，早已成了各国高教界一种司空见惯的小传统了。

除非，你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般的“圣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正好在波士顿赶上一次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席上的焦点正是快将卸任总统一职的曼德拉。结果也有学生举标语，但那是欢迎他的标语。他一站起来，台下立刻响起如雷掌声，全场起立致敬。然而，世上有多少个曼德拉呢？难道我们应该期盼董建华会得到如曼德拉般的尊敬吗？

就算没有可被针对的人物在场，大学的毕业典礼还是可以变得很“热闹”，也还是可以容许学生趁机表达不同意见的。英国伦敦大学的“亚非学院”（SOAS）向以激进著称，本来是家协助帝国认识第三世界的名校，却变成盛产反殖斗士与左翼政治人的温床。它的毕业典礼堪称一绝，历届学生代表上台致词时总是不忘开火骂人。我有一个老友，前年在“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就曾亲眼目睹学生会主席从大学校政开始骂起，一路说到英国的外交政策，把校方形容为不顾贫苦学生的无良财主，将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批成残忍嗜血的刽子手。结果台下师生一致叫好，纷纷附和。妙就妙在那位被人骂了半天的校长也没什么，致词的时候还不忘赞美那位同学的聪明，趁机歌颂学院光荣的自由传统，人才辈出。

我的母校中文大学绝对没有“亚非学院”这么激进，但是我以为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universal）的，都应该是包容天下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一家大学的毕业典礼要是有人闹事，不只不是一件丑闻，反而是它校风开放的证据。

原题为“大学之大”
刊于《南方周末》
2007年12月20日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备受争议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终于自动请辞，成为该校一百五十年来任期最短的校长。这本该是象牙塔里的风波，但却成了美国以至于其他国家报纸国际版上的热门新闻，原因自然是哈佛。这几年，中国一片留学热，上至高官下至中学生，说到留洋就言必哈佛。到底哈佛的地位是怎么得来的呢？它的声誉又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之上？

除了它庞大的资产、杰出的教授与知名的校友外，我还想到一两件趣事。上个世纪

80年代，因为哈佛违反了和美国联邦政府关于录取美籍华裔学生的约定，被政府告上了法庭。先不说这件事的是是非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哈佛面对政府时那理直气壮寸步不让的态度。还有一回，哈佛的毕业典礼想请时任总统里根任主讲嘉宾，但后来因哈佛不肯颁授荣誉学位予里根，他推拒邀请，这所高傲学校的态度很明确：不来那就算了。

你可以说它对着政府和国家领袖时能摆款，是因为它有本钱；但反过来你也可以说它的本钱就是这么累积下来的，既不刻意疏离政治但也无需献媚。

哈佛换个校长之所以能成新闻，是因为他的校长是个足以和美国总统三军统帅平起平坐而不用自惭的角色。这种象征性的地位来自哈佛在学术界中领袖群伦的地位，而又终极建立在学校本身的独立之上。换句话说，对着一个政坛领袖，他可以说他是政界的头领，但我也是学界的顶峰，互相尊重也互不相涉。

我们时常歌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很少去谈学术界文化界的“界格”。“界格”说白了，就是学术文化相对的独立地位；正因其独立，一个学者的话才有了分量。我们愿意相信他的发言他的研究，信服的是学术本身的逻辑，以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非大量以取悦政治人物的喜好为原点。毕竟政治的逻辑和学术的逻辑是两套不同的逻辑。政治、经济、学术和文化等领域的分化发展是现代性的标志成就，显然它们彼此相关，但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完全吞没另一个领域，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逻辑可以完全取代另一套逻辑，更不可能让一套逻辑的目标成为所有领域活动的目标。大家口中常说的“政治是政治，体育是体育”，就是这种现代意识的体现。

萨默斯个案有趣的地方是他曾经“学而优则仕”（这是传统中国称颂的道路），官拜美国财政部长。但哈佛教员不会因此动摇要拉他下台的决心，正如当年他辞官回到校园出掌哈佛大学的时候，评论的说法是他“更上一层楼”了。不止哈佛，现代世界任何一所大学的校长和教授都不可能在名片上用括号标明自己的身份“相当于正局级”，也许中国是个例外。

想起我们的北大，它最为后人景仰的校长依然是蔡元培。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年代里，今天人们最记得的不是哪个大总统，也不是哪个军阀，而是蔡元培。

原题为“哈佛校长请辞，学术不因政治添荣”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2月28日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15岁以前，我在台湾念书，当时台湾每间中学皆有军方派来的“教官”驻校，表面上教导学生上“军”课练练步操打打枪，实则监视师生言行，是一种另类的训导主任。非常捣蛋的我总是教官办公室的常客，记得有一回，教官狠狠处罚了我一顿，然后郑重地告诫我校规的神圣，他说：“‘国父’孙中山先生说过有四种人是没有自由的，其中一种就是学生。”另外三种是什么我已经忘了，大概不是军人就是罪犯吧。

带着这种学生和罪犯乃同一种人的观念，我回到香港就有点不适应了。尤其当我知道有些大学的校方发公函给学生，抬头竟然是“×先生”或者“×小姐”，我更是惊讶怎么“同学”全成了可敬的先生女士了。再过两年，我才知道，原来不少中学的老师也是如此称呼学生的，他们说这叫“英式传统”。

自从法国史学大师阿里埃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表的震动一时的《儿童概念史》以后，学界就渐渐形成了共识，知道“儿童”、“少年”、“青少年”和“成人”的观念都不仅是生理现象那么简单，它们还是一组社会文化的构成。而现代成人与非成人的重要分野就在学校了，仍然上学不用工作的就是非成人，需要接受特别的看管和教育；不用上学可以工作的则是成人，不应该再受到校园的保护，也用不着事事听从父母。可是在这样的分界标准里头，有一个特别尴尬的群体，那就是大学生了。你应该当他们是小孩，还是大人呢？

最近，著名的南大与浙大都颁布了新禁令，禁止新生自备电脑返校，据说是为了避免他们沉迷网络游戏。这条禁令可笑的地方在于它一方面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把学生的个人电脑全都看成游戏机；另一方面则暗示了学校会紧密监控校内电脑的使用情况，学生全无隐私可言。更严重的，是它假设了大学生都是孩子，毫无自律的能力，他就管不住自己。

回想中国百年大学史，那真是一部学生幼童化的漫长过程，五四时的学生可以上街打军阀，今天的大学生则要校方代行父母之责。大学生这年纪不只可以结婚，更要依法负上完整的刑责了，为什么一个年轻人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大事负责，为作科犯法负上法律的责任，却不能为自己游戏玩得太入迷而负责呢？大学是不是也该替所有学生争刑法豁免权呢？

香港的大学教授不时抱怨，内地来的学生样样都比香港的学生强，就是性格太依赖了，每逢开学介绍选科资讯时，家长提的问题比学生还多。再看内地某些重点大学新生入学时家长在校园里睡满一地的盛况，你就更能理解大学生会退化成小学生的原因了，因为我们都没把他们当作大人看。

古希腊盛行同性恋，男性师生相爱是常见的事。即便如此，当时也还是产生了不少争论，因为许多人担心年轻的学生会在师生的尊卑关系里习惯了被动承受的角色，将来

成不了积极主动的城邦公民。这确实是教育的基本问题，你用什么态度对待学生，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老把学生当成“未来”的主人翁，他们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主人翁。我们如此对待学生，又凭什么抱怨如今的年轻人不成熟，又凭什么指责那些青年“啃老族”呢？

原题为“大学生的幼童化”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10月15日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最近在看一本有关法国哲学家巴丢(Alain Badiou)的文集，编者是英国的霍华德(Peter Hallward)。霍华德不只翻译过巴丢的书。甚至还写过专书向英语世界介绍这位法国大哲的思想，如今又编了这么一本群英汇聚的文集，看来他跟巴丢的交情真不一般。然而就在这本文集的导论里，霍华德却提出了几条非常核心的问题，假如答不好，巴丢的整个理论体系就要从根本动摇了。

这样子为难好友，还算是好友吗？他是不是想彻底摧毁巴丢的学术生涯？这部文集的高潮就在于书末有巴丢的回复，一篇题为《回答一位很有要求的朋友》的短文。在这篇短文的开头，巴丢如此形容霍华德：“这位不可多得的读者、翻译者、同伴和批评者，这位严苛而且温柔的朋友。”

既是同伴又是批评者，不只严苛同时温柔，这是种在当今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很难想象的关系。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是大力推介我的好友，就很难同时是狠批我的批评家；你真的欣赏我，又为什么还是质疑我呢？

在过去几个月里，中国学术界最好玩的八卦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季广茂教授的骂人事件了。事缘四川师范大学的钟华教授在学术期刊上写了一篇书评。季教授觉得那是对他学术生命的根本否定。于是气往上冲。他一连在博客上发了十三篇文章把钟华说成是低级下流、不择手段、狰狞阴恶、无知、横蛮、无耻的“屁眼教授”；这还不止，那些粗话甚至还招呼到钟华教授的家人身上了。于是季教授立刻从象牙塔里一跃成为举国皆知的“粗话教授”，大家看笑话之余也不免要想，这到底是为什么？

坦白讲，钟教授那篇书评看起来确实有点不懂行情，对他要谈的文化研究掌握得不太全面；但起码他懂行规，行文下笔纵然不算客气，可也不逾规矩。为什么季教授要发这么大的火，斯文扫地，满口污言呢？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事要不是发生在现在，迟早也要发生

在不久的将来；要不是发生在季教授身上，迟早也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因为孕育整件事的土壤早已存在，其中的病根早已深植。其病在于整套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讨论规则并没有彻底移民到中国来，而我们原有的那种一看文章就要推断作者“不可告人”

的用心与动机的阅读方法却从来未离开。

霍华德对好友的坦率批评不是他个人的性格无私，巴丢对老友的诚恳响应也不是他的胸襟广阔，其实他俩的这种交往方式根本来自现代学术游戏规则。以前我看“某某教授荣休文集”之类的书，总见其门人友好不住献媚称美。后来读到一些外国大师的同类文选，却发现那些撰文的同行和学生竟毫不客气地炮火全开，颇有欺师灭祖的意思，很是不解。有朋友点醒了我，说这才叫真正的尊重。如今书籍出版的数量多如恒河沙数。随便一块街招掉下来都能砸死三个大学教授。你若不是很重要，又有谁会花功夫刻意批评你呢？批评一个人正正表示他是某种学问发展上的界碑，后人不超越他则再无寸进。难怪那些被人骂了个透的大师，最后还是总要客客气气地在文集结尾来一篇“回复我的批评者”，铭感大家的厚爱了。

原题为“粗口教授”

刊于《am730》

2008年03月10日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十多年前第一次结识内地文化人的时候，我很惊讶地发现他们给我的名片上印有“国家一级评论家”和“国家二级艺术家”之类的衔头。

我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人完全闹不懂为什么艺术家和评论家还要国家评级，当时就问：“这是种荣誉吗？”朋友笑而不答。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荣誉虚衔，而是实实在在的身份，有了这个身份才能享有相应的待遇，是哪一级的身份就配得上哪一级的工资和福利。原来内地文化人都有国家供养，真叫我羡慕不已。但是这几年制度改变，许多文化人艺术家再也无法寄身于“作协”“文联”一类的单位机构，纷纷下海自力谋生。好日子已是老早以前的事了。

曾经与余华苏童等知名作家并称“射雕五虎将”的“北丐”洪峰，近日真成了“北丐”，在沈阳街头行乞，目的是抗议聘用他的沈阳市文化局停发工资。结果惹起全国舆论的注视，有人说他“作秀”，有人取笑他竟然还指望国家供养。我赞成长平在其专栏所言，要是沈阳市文化局真的违反合约，洪峰当然有抗议的权利。但是从有那么多人批评他的举动看来，短短十余年间，内地公众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角色的看法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这又牵涉到了整个文化艺术领域与政府关系的根本变革。

很多论者欢呼，今天的艺术家和作家终于脱离了国家供养的体制，恢复自由，回到一个由市场主导的正常生存环境了。其实这种“正常”状态在欧洲也只不过是近200年之间的事罢了，从前的艺术大师如巴哈和达·芬奇莫不托身于宫廷和教会的庇荫，要

想完全自立于市场根本是天方夜谭，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足够庞大的文化消费市场。

自从现代文化消费市场出现之后，政府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就不再是不证自明的一件事了。相反地，如果政府要出钱资助文化或者供养艺术家，反而得有理据支持。常见的理据有三：一是受资助的项目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对外代表国家形象，对内团结国民认同；例如法国的罗浮宫博物馆和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二是受资助的项目和艺术家有重大的文化意义和艺术成就，但在市场上却又无法生存，于是把资助当成一种社会投资，将受资助者当作“公用物品”。三是把受资助者看成文化产业的一环，于是资助他们就等于是在推动文化创意产业；换句话说，这是将文化资助看做一种工业政策。

回到中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从政府全面供养艺术家，到完全将文化推向市场任其自生自灭的这段转折期间，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主张一刀切割政府与文化的关系，有些单位则抱持“存在即合理”的态度继续昔时做法，缺的就是一套完整合理文化资助政策和相关讨论。

相比单纯指责洪峰身为作家还想吃公粮，或者慨叹今天的政府不再重视文化，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辨明政府支持文化艺术的理据，彻底理顺在文化艺术领域上政府与市场的分际和关系。

原题为“政府供养艺术家要有理据”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11月13日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规则怎么失效的？制度又是怎么腐坏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更基本的地方说起，那就是人们为什么要遵守规则。换一个说法，也就是一套规则的合法性到底是如何确立的呢？

按照社会学创建者之一韦伯(Max Weber)的著名见解，真相实在不脱常识：如果规则显得公平公正，而且大家都认定执法当局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乐意遵守规则了。相反地，假如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有许多规则的执行并不公正，久而久之，就没人再愿意百分之百地跟着这些规则办事，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它们的效力了。

假如有人富可敌国，但只交很少的税甚或不用交税，一般人纳税的动机就会因此减弱了。假如有官员身居高位，可以挪公款为己用而不受处分，那么底下的公务员和普通百姓偷窃的动机也就会因此增加了。假如有学生成绩不好，但凭着关系和贿赂却能考上研究院，那么其他人就不会再发奋读书了。假如有些公家用车能够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视交通规则如无物，但又仗着特权从不受罚，别的驾驶者又何必再死死地跟着种种道路安

全规则开车呢？一条规矩的执行不够公正，大家就不会再心甘情愿地尊重这条规矩；要是有一堆规矩的执行不够公正，那么整个社会遵守规则的文化就要破产了。如果不守规则不仅不用受罚，甚至还能得到好处；大家乖乖地循规蹈矩岂不是太笨了？“窃国者侯”，偷小东西的人或许得死；但到底还是有不只不死甚至发财升官的机会呀！当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心态。他们就不再相信还有谁能清白无辜。原有的规则至此就只是一纸具文罢了。

犯规仍然是有风险的，我们应该假设没有人天生就喜欢犯规。但大家可以研究为什么有人犯了规却不用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再仿效他们的办法，归纳出一套原理，使自己也能避开逾矩的恶果。这些使人犯规之后照样平安无事的办法就是平常所说的“潜规则”。在正常的情形底下，就算表面上的规则已且失效，大家还是会阳奉阴违地在表面上同意它支持它。可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再发展下去，终于会有一场典范转移。危机重重的表面规矩被彻底扬弃，然后堂皇登场的就是原来潜伏在暗角的规则了。

山西黑窑事件之所以是个巨大的警号，就是在于黑窑女主人指责地方官员的那一句“他们就知道收钱，但不给办证”。终于有人觉得交钱解困这套行事手法不再是潜规则，而是可以正大光明宣之于口，并且假设大家都能理解同情的常规了。应该保障劳工权益的公仆变成了人贩，应该维护治安的警察变成了闲事少管的路人，照这逻辑来说，似乎也都是正常的了。经营黑窑的这一家人犯下了如此邪恶的大罪，不是因为他们的良知被蒙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收钱就得办事的公平新规则。所以这名坦白得吓人的女子才能如此无悔无愧地向大家“揭发”那些收了钱的人不按规矩做事。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当局与其填缺补漏地强化原有的规范体系，还不如研究如何与百姓重建新契约。

原题为“当潜规则变成规则”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7年07月06日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王斑在《历史的崇高形象》中文版的前言如是说：“此书是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思考写成的，因而染上了那个时期浓重的躲避崇高、反崇高的情绪……如果我现在有机会重写这部书，我的倾向会跟原来不一样……这时代，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走向了反面。”

我想很多人也会有同感。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

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然后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问题是经过近二十年来反崇高反英雄的潮流之后，我们真的走出了崇高逻辑的桎梏了吗？还是跌入了同类逻辑的反向发展呢？

四川都江堰市光亚学校的老师范美忠在自己的博客里坦承，地震当天，他不顾学生，先跑出教室，于是在网上招来一片唾骂。当大部分人都在谴责他时，也有人为之辩护，说他不只有说话的自由也有自私逃命的权利。有趣的是这场争论再发展下来，竟然又成了一次崇高与反崇高的对决，英雄和真小人的较量。范美忠随后发表的言论更是把它上升到了自由和非自由之争的理论层面，俨然把自己变成了“自由主义”的代表。

以我的粗浅理解，的确没有哪一路自由主义会否认一个人逃命求存的权利，但似乎也没有任何一种理论会认为一个人必须在危难关头抛下学生亲友自求多福。舍己救人是崇高的。几乎在任何文化里面，几乎在任何一种伦理学的立场来看，这都是值得敬佩的行为。

范美忠身为北大历史系毕业生，自愿到地方上的小学校任教，并且常常为文探讨教育体制的缺失，实在也是种教育理念的实践；他的逃跑乃是一时软弱，是人类求生本能的表现。或许不符他以前的高尚言行理想形象，但也不值得大家的峻词辱骂。毕竟英雄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英雄才格外让人尊敬。然而，我们为他凡人的软弱扼腕甚至辩护，却不表示我们佩服他的行为。更不表示这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都该效法的事。范美忠是个真正的凡人，不多不少如此而已，既不邪恶亦不高尚。为何有些人会把他捧成令人尊敬的人物？为何他自己又显示出好像要为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奋战，当个人权斗士的倾向呢？

由此可见，反对崇高反了二十多年，许多人仍然没有逃离崇高的逻辑，不做英雄就做反英雄，总是要和一套宏大的叙事挂钩，总是要让自己变成伟大理论的道成肉身。传统的英雄观鼓吹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可是过去二十年来，对这种虚假宣传的反感却居然使得真小人成了很吸引人的人格典型。

一个人再多妄语、再多劣行都不是问题，只要他够真就行了，仿佛“真”就是最了不起的价值。

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在举国歌颂英勇义士的气氛下，范老师的坦白不应惹起如此愤恨，反而更该让我们瞭悟那些英雄的伟大超凡。反过来说，范老师也完全没必要引用什么自由主义的主张来掩饰一时的本能表现。这要不是为了贯彻自己自由主义的信徒的形象，

就是另一种当英雄的冲动，一种反英雄的冲动。更何况自由主义虽然以人性的缺陷为其前提之一，却断不会把它当成终极的目标。

原题为“为什么真小人也想当英雄”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06月19日

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关于中国运动，有一个很大的误会，我称之为“可口可乐迷思”。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外国大企业都闻到了空气中传来一丝人民币的气味，他们觉得中国是全球市场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处女地。那时流行用可乐做譬喻，他们说：“十亿人呀！只要有十分一爱喝可乐，一天就能卖掉一亿罐了”。

后来他们才发现要把这么庞大的人口变成他们理想中的消费者，要打进这片经济世界中的亚马逊，原来是件多么困难的事。必须斩荆披棘，适应水土，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成熟和条件的具足，中国的人口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数字。

同样地，我们也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既然有十三亿人口，就一定能找出十一个人组成“第一流足球队”这类鬼话。人口数字有多少，和某项运动的表现好不好实在是两码事。牙买加的人口有多少？为甚么它能称霸短跑赛道？立陶宛的面积比北京大很多吗？怎么就能变成欧洲篮球劲旅呢？按照“可口可乐迷思”的逻辑，应该整个欧洲加起来派一支球队也赢不了中国才对呀，为甚么光是一个比利时就能叫中国足球丢脸丢到家呢？

中国男子足球不只是中国体育界的奇耻大辱，还是世界体坛的一道谜题。国足的人均收入可能是所有项目里头最高的，偏偏他们的表现是最烂的。当体操选手一个个为中国夺取荣誉同时还要为生活精打细算的时候，那帮球员却一方面坐享豪宅，另一方面把球踢到了亚洲三流的水平。二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几乎呈现了反向发展的态势。

其实它的问题恰巧也折射出了中国社会面对的困境。中国足球是中国所有体育项目里头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但市场不只救不了它，反而还使它更加证明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如果左派用这个案例说明市场并非万能的话，右派也可以反过来说那是因为中国职业足球的发展根本还不够市场化，没有建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所以才变得贪腐横行、黑幕重重。中国足球或许是中国球迷心上的伤口，但它却是个了解中国现况的好样本。难怪有回听一个外国教授说，任何一个关心中国发展问题的学者，都能透过它找到中国的矛盾与暧昧。

本人忝为佛教徒，近日却在电视节目中因为一时激愤，失却正念，粗言辱骂了足协

主席谢亚龙先生，不只犯了妄语戒，更伤害了谢先生和他的家人，谨此向他致上诚挚的歉意。同时我也希望年轻的读者和观众在我身上看到教训。此等劣行，实不足法。

然而，我依然以为谢先生要求国家女足成员做检讨，批评她们“三无”的做法是非常不恰当的。女足的拼搏精神，我辈球迷有目共睹，真不知道谢先生以何标准说她们没有斗志？相反地，男足在对比利时的那场赛事里明明犯了极不君子的错误，谢先生竟然还称赞他们够拼搏，他的判断为什么会和我们差这么远呢？

平心而论，中国足球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实在不是谢先生一个人的错。可是当年国家请他担当舵手之职，难道不就是为了痛改沉痾，为我国足球树立新风吗？几年下来，谢先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就算当下的成绩不行，起码也要给出一套令人信服令人可以期待的长远方案吧？如果两样都没有，我觉得谢先生就应该背起责任，引咎辞职了。假如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不单要向他道歉，更要为他的勇气和承担而鼓掌喝采。

原题为“中国足球是个好样本”

刊于《am730》

2008年08月21日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熟悉现代中国体育史的人都知道，百年的奥运梦其实也是一个强国梦。透过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中国人对内可以团结民心，把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对外则能获得国际的认同，表示中国已经彻底从“闭关锁国”的状态走了出来。如果得到奖牌甚至冠军，效果就自然更好。所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奥委会以来，政府就很积极地规划各种体育项目的发展，以夺金为目的。

但是在这投入多产出高的浩大工程里，田径始终是一个难言的隐痛。虽然断续有过突出的例子，可是大家不能不承认田径确是中国体坛的弱项。偏偏田径是块很大的领域，而且常被认为是最具奥运传统色彩的经典项目。假如中国运动员在这么重要又这么基础的赛事上表现优异，那才说明中国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大国。

所以同样是金牌，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上得到的那一块却分外耀目；他是现代中国挺进体坛圣域的突破口。问题是中国以前也曾出过田径金牌，刘翔又有什么特别？凭什么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又为什么能造成如今那么多人的创伤呢？

那是因为他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冠军运动员，还是当代新中国的一张脸孔。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面，从前中国运动员的性格总是模糊不清的，败了固然低首饮泣，胜了竟也不见兴奋若狂的举动，表现自我的话更不敢多说。刘翔很不同，那一年当大家看到他打破世界纪录时，不单单看一个冲破红线的运动员，还看见他是何等骄傲地对着镜头说：

“中国有我，亚洲有我。”除了飞扬的一面，他还很稚气地向着电视机的观众说：“妈，你看见了吗？”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言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新一代中国人不再是过去老外常说的“蓝蚂蚁”，而是一个个个性鲜明敢笑敢怒的年轻人。他们不再一张口就是“感谢党和国家的栽培.....”而是声色俱在地高喊“我赢了！”

刘翔更幸运（或者更不幸）的地方是他碰到了中国市场化的新领地。在21世纪以前，体育明星同时是商业宠儿的潮流还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到了2004年，却是东风已在，又欠火把了。姚明和刘翔等人拜此大潮所赐，他们的形象无孔不入地渗进了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因此，一百一十米跨栏运动员刘翔变成了北京奥运的中国大使，几千人里负担最重的一个。他这个人的笑容和个性，就在这巨大的形象投射里渐渐渺小.....

原题为“谁是刘翔”

刊于《am730》

2008年08月22日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很多人以为一个电台或电视的清谈节目要做得好，主持人的口才是最重要的。但就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原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成功的清谈节目靠的是参与者的“耳才”，而非“口才”。也就是说，懂得听有时要比懂得说更要紧。因为谈话不是独白，你说的任何一段话都不可避免地坐落在对话者的言词之中，它构成了你的背景，发展了你的言论。假如你只是抱着满腹的宏论，却完全听不到别人在讲什么，就算你说得再有道理，也难免予人一种格格不入的错乱感。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许有错，也许需要检视自己的信念；除非我们坚持自以为是的正确要比公认的真理还伟大，否则带着耳朵去参与对话就是一次检验自我的好机会了。解释学宗师伽达默尔在他的经典《真理与方法》里如是说：“.....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觉察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解读文本固如是，与他人对话恐怕更当如是。

因为在央视上讲清史而闻名的阎崇年先生前几天被人掴了两巴掌。那是一场作品签售会，一位年轻男子排队走向正在为读者签名的阎先生，然后发难出手。据目击者说，当时还有人在现场大叫“汉奸”，看来是针对阎先生种种为清朝辩护的言论。那位年轻人的朋友后来解释他揍人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和阎崇年平等辩论的机会。

我不想参与评价清廷的史学争论，也暂且不谈这件事情的后续处理对不对（那位青年后来遭到重罚），我甚至很能体会那种由于欠缺交流机会而生起的沮丧与愤恨；可是我很好奇出手打人与言谈对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假如我说了一番驳斥对手的话，而对方不能完满响应甚至不理睬我，于是我动手给他一巴掌；这是否表示我这一巴掌其实是我所有想法的延续和表达？一个耳光又是不是一段话的代替呢？如果打人也是一种辩论的方法，我是否也该预期对方将以拳脚回报？因为对话和辩论总是有来有往的。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是没有时间，还是他的响应被人觉得不够正面？）。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也许我说得没有什么道理，但起码我被人听到了；也许别人没听懂我到底说的是什么，可是说话的语调和姿态要比说出来的内容还重要；因为正是那些语调与姿态让我被人看见。被人看见，所以我存在。于是每个读者其实都是作家。在一篇一万字的文章里看见一句令我不满的话，忘记剩下那部分吧，我要写一篇两万字的回应来批判它。我为什么要耐着性子看完那篇东西呢？我为什么要深入甚至同情地理会它的真正含义呢？它只不过是我想用来表达自己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个性被压抑够了，因此“个性”二字是今天最高尚的品德。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所以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在这样的年代里，清谈节目或许是不必要的，我想。

原题为“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10月15日

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河南陕县支建煤矿事故在全国电视观众眼前成了一场感人的奇迹。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矿难次数最频繁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矿难生还者最少的国家，而这一回，被困井下75小时的69名矿工竟能被全数救出，怎能说不是奇迹？又怎能不叫人感动？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救援部门的人性处理，每一位被救上地面的工人都立刻给黑布蒙上了双眼，以防他们那长时间处于黑暗中的眼睛一时受不了日光的刺激。

然而再看下去，我却看到了一个令人错愕的场面。话说最后一位被救出来的矿工，

在众多高官的簇拥下，竟然在还罩着黑布条的情况下对着镜头直喊：“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政府！感谢全国人民！”

从我这个未经训练的香港人的角度看来，这句话简直完全违反了人性的常理。为什么？因为一个正常人被困在矿井底下三天，不知前路是生还是死，突然被人救出来之后，不是激动无语，就是忙着喊爹喊娘问候妻小吧？他怎么可能第一句话就是先行拜谢党中央呢？而且他这四个感谢不仅不漏一个对象，还从党中央谢到全国人民，次序严整得无懈可击，完全不像一个刚刚逃出生天的灾民。

出现这种情况，大概有两种可能。可能之一是在我们还没看到他的时候，早已有人先在镜头背后指导过他了。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指导员可真是要回去好好接受再教育。要知道今天不只党中央执政为民，就连各级媒体也都努力来贴近平民，中国的受众已经习惯了一套很人性化的认知世界的方法。所以相信不只是我，任何人对于获救矿工的第一表现也都有了既定的预期；假如那名矿工的表现不符大家预料中的“人性”，多半就会被人怀疑中间是否别有不自然的内情。换了是我去当新闻公关或者镜前表现指导，我不仅不准他“四个感谢”，还要逼他先和母亲说声好，叫她老人家别挂心呢。

可能之二是当地所有人员都很真诚地让获救矿工们自说自话，绝不横加干涉，但这名矿工偏偏就是打从心底谢了出来。若是如此，情形就更不妙了。从好的角度看，这还可以说是中国特色，毕竟举目全球，灾民获救第一句话不是挂在心上的家人，也不是谢谢直接救他出来的工作人员，而是很宏观很有深度地感谢政府中枢与全国人民的，恐怕就只有中国人了。

要是从不好的角度看，那就说明我们的救灾新闻已经形成了一套感恩戴德的报道模式，一套很不与国际接轨的模式。全世界的新闻机构处理天灾人祸，都把重点放在灾害之痛灾情之险，以求刺激起受众的关注和同情。虽然也有对救援感谢的时候，例如“9·11”事件就出了不少被媒体视为英雄的消防员，但人家要感激的多半是那些历尽艰辛冒险犯难的前线救援人员，而不是白宫的政府核心。反观中国的灾害新闻，过去常有救灾之功大于灾情之惨的惯性，仿佛一场灾难的重点不是灾难自身，而是救灾行动的胜利。这种违背常理与人性的新闻公关手法怎能叫好呢？

这位工人兄弟要是由衷地喊出了四个感谢，那就说明他新闻看得太多，早就内化了一种符合老套报道模式的反应了。

原题为“获救工人应该感谢谁”

刊于《南方周末》

2007年08月09日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那天我在北京机场一座自动咖啡机前唤来一位侍应，告诉她咖啡卖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回应：“有呀，怎么会没有？当然有。”等到她自己仔细查看过，才发现咖啡果然倒光了，于是她沉默地为这机器装上一袋咖啡豆。

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的第一反应会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她连一眼都没瞧，就能如此确定那座咖啡机的运作很正常呢？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很不寻常的奇事。我们坐计程车，要是发现车子震动得厉害，司机一定会说：“没事。”奶粉吃得孩子生了肾结石，负责官员却在大规模检测开始之前，就信心满满地告诉大家“出问题的只是极少数产品。”这又让我想起央视转播奥运开幕式的解说，据说他们后来做了内部检讨，承认当时的表现的确不够好。我干电视这一行，很明白他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读稿；事先写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诵出来，完全不顾当时现场的实况。于是观众看见的和听见的，仿佛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

在这里，语言文字与真实世界“隔离”何其严重。前人花了一万多年努力去命名世界的每一样事物，例如一头山林中的走兽，一座架设在河道上的工具，一种暧昧的情绪，甚至是某种风暴的形态。到了现在，这一切名字却像粘力失效的小纸片，从它们所在的东西上逐一剥落，逐一飞散。所以我们开始习惯不再相信言词。满街的标语，我们当作装饰。课本上的教训，我们当作考试过关的口令。什么“国家名牌”、“免检产品”，我们当作是产品包装上的图画。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变成了在真空之中戏耍修辞的高手，公司办的一切活动，我们都在内部通讯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访的宾客一律“尊贵”，他们和领导的谈话则必然“亲切”。国营商店的墙上称我们为“亲爱的顾客”，但里头的工作人员却不耐烦地用“喂”来称呼我们。

话到这里，我很难不想起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所说的那个著名故事，一个市场上的蔬果贩在店铺里打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但这句话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关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吗？他真心信仰这句话的力量吗？恐怕不。可是他仍然无可无不可地挂上了。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以及那些用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然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之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

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犬儒时代的信任”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09月25日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 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正确，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测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政府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

地说，商家与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原题为“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

刊于《am730》

2008年09月17日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看到新华社前不久报道四人帮在世的最后一个人——姚文元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了文革。说到文革，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语言，一种那个年代盛行一时的行文方式与说话风格。文革的战斗性，文革的杀伤力，多多少少和这种语言有关。不搞清楚这种语言的性质，就很难让今天的年轻一代理解那10年以至于共和国数十年来经历过的运动；不看透这种语言空洞的力量，就谈不上反思文革，也很难保证后人可以彻底脱离历史的阴影。

且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文革式的语言，比如“极少数”这个形容词。今天重看文革10年的文献，“极少数”三个字出现的频率可说是极不少数。内地以外的华人大概不知道“极少数”在这个脉络底下，并非一种纯粹描绘数量的中性形容词，而是一种饱蕴价值涵义的判断。

如果我们说“今天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染上了禽流感”，这里当然没有任何道德判断的含义，因为这里的“极少数”指的不过是患病的机会罢了。但是当年要做政治批判的时候，“极少数”就是很强烈的指责了。

是什么使得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变成非常负面的价值谴责呢？当然就是近代中国革命里的民粹思潮。按照这种民粹思潮的主张，凡是大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必然就是对的；而凡是大多数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错的了。放在政治上，这可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也就是得“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那一边”。所以“极少数”和“绝大多数”都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

同时它还牵涉一个划界的问题，无论是统战还是批判，从实效上讲都不可能团结“极少数”或者“一小撮”，却跑去打击“大多数”。当时每逢批判活动展开，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没有谁愿意当少数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一边，而不要

被划做一堆白羊里的几只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极少数”。

这种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盛行于文革时期，说来实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数量的多寡来定质量的高下，而且还忽略了民主原则中尊重少数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国的民粹倾向，使得当时很多优秀的学者受到折磨，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与百姓日用无关；也正是这种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艺术家的探索，因为他们的创作太过阳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听不懂。在政治上我们当然强调“多数决”，但艺术和学术乃至其它的意见表达，为什么就非得是多数人欣赏认可的才是对的，而“极少数”就一定是错的，甚至是邪恶的呢？

执政要为大多数老百姓着想，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自动转换成“极少数”就非得斗垮斗臭不可。偏偏在文革10年间，这种转换来得太轻易太绝对，只会有利于不断的斗争，无益于实际的施政和建设。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连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二战之后的德国兴起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看看空洞的语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贫乏和虚无的热情。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式告别过去的阶级斗争，迈向建设和发展之路，我们也需要相应的语言反省和重建。以“极少数”为例的老式术语虽不是文革的产物，却是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斗争语言”代表，小心清理它过多的价值意蕴既合时且有益，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一些笑话。

原题为“‘极少数’的迷思”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1月17日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有几百人出席了官方纪念仪式，他们在“唐山市抗震纪念碑”广场默哀了三十秒，相当肃穆也相当隆重。可是他们并不全是当年死难者的遗属，也不是震灾的幸存者。本该是这一天真正主角的唐山市民，这时候都在广场之外。一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赶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得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曾翻遍当年留下的照片，但无论怎么找都很难找到死尸的相片。的确，今天查书上网，你会发现唐山大地震在影像上呈

现出来的，就是一片颓垣败瓦，倒塌的房屋，断裂的墙壁，可是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急忙奔走的志愿人士，斗志昂扬不畏艰苦的解放军，还有一些正在拯救伤患的医护。至于那些未获救治的伤者，甚至倒卧在瓦砾中的死者，却几乎全部失踪，没有鲜血，没有残肢，只有空洞的街和极度萧条的市区鸟瞰图。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场巨灾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年。

如果采用某些在海外相当流行的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忌讳死亡，乃至要出动到为相片消毒净化这一招。但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把在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例都推到官方头上。且看当年曾经参与救灾的龚铁鹰在博客里发布的一篇老日记：“……当我投入抗震救灾行列，看到了工人同志的冲天干劲，看到了各级党组织坚强领导，我又被震服了。我想到，自然灾害是暂时的，而人们的斗争精神则是永存的！只要还有人生存，就一定能重建家园。而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仍会掌握群众，仍能指引群众克服这一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党。这一革命理论认为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伟大的党，动员起千百万群众来，任何困难也不在话下，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并非什么交心报告，而是一个曾在现场见过灾难，救过伤员的青年的日记。在这篇日记里面，龚铁鹰也记录了放在自行车架上的死尸和嚎啕痛哭的生者，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以其时最流行的方式向自己总结了一切经验。这样的总结，这样激情勃发的文字几乎是当时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样式，不止见诸报端，甚至还渗入到每一个人最贴己的日记之中。即使是灾难的第一手见证亦不例外。

身为人类，有着最普通的感情，有伤会痛，受苦会哭，是什么使得当年拿相机的人拍不到死亡？又是什么使得见过死亡的人依然乐观，意志饱满？曾有许多文献指出当年唐山震后的幸存者表现得有点“漠然”，路上相遇就是简单地问一句“你那里走了几个？”不见悲恸，也没有恐惧。许多人还说唐山人给“震傻了”。

对此，我宁愿相信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一番话。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但是本雅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同理，当时的唐山人不是给“震傻了”，而是实在无话好说无泪可流。

可是在这一刹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变的人到底会崩溃；在此之后，痛失亲人的到底会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这些全被一个更宏大的主题掩盖了。请注意唐山的那座纪念碑不叫“亡者纪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纪念碑”，却叫“抗震纪念碑”。重点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对抗。地震和它带来的所有伤亡一切苦难，全部成了人类崇高意志与斗争精神，以及领导抗震有方的背景。这不止是当年官方定下的主旋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军人的日记自然会颂扬群众的力量，

有摄影机的自然不会拍照太多的尸体。唐山大地震被记忆的方法恰正记忆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其曲折一如“抗震纪念碑”，借着“抵抗”来纪念地震；又像今天纪念唐山大地震的主调，透过歌颂“新唐山”的建设来忘却被毁灭的老城。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死亡，方有解脱。

原题为“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7月31日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天灾，还是人祸？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发生以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总是有人想强调天灾的自然，不可预料与非人力可阻；另一方面，又总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里追查出人为错误因素。似乎一场意外若非天灾，即为人祸，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惟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而不是追问它的属性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天灾抑或完全人为的过错。因为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备。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就以最不可预估的“天灾”地震为例吧，虽然科学家目前为止仍无法确切掌握地震发生的时机与强度，但这是否表示大家就什么事都用不着干，坐着干等呢？当然不。我们可以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对建筑物的防震措施设定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制定一套地震发生时的紧急应变方案，甚至要学校和各工作单位定期举行震灾演习。尽管我们不知地震何时发生，也不知它有多么强大的破坏力，但是我们可以在事前尽力做足一切资源许可范围内的准备。万一灾难发生，而真要追究责任的话，这个责任的归属看的就不是灾情严重的程度，而是管理当局是否已按原定计划做好所有预备工作了。

例如山东华源煤矿的溃水事件，我们要检视的就是有没有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措施。很多人都说这次煤矿矿井的进水事件是一种从前想象不到的矿难类型，料不到下大雨也会酿成矿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矿难”，而把它定位为“暴雨成灾”的

话,情况又会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的是当地有没有一套暴雨警戒制度,按不同规模的降雨量定出不同层次的警告。然后,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些不同层级的警告又有没有附带一些规定,要求某种工作或某种活动必须在暴雨达到一定层级时自动中断。以香港为例,天文台把暴雨警告分成了“黄雨”、“红雨”和“黑雨”三种级数,当“黑雨”警告发出之后,整个城市都要停工停学,而位处低洼地区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泰安市以至于整个山东省有没有类似的机制呢?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它没有被贯彻执行?如果没有,为什么没有?将来又要不要设计一套各型天灾的分级预警系统和相应的应变方式?与其缠着“天灾”和“人祸”的问题不放,还不如切实吸取教训。

说完灾难的定性问题之后,我们再来重新思考受灾范围的定义。遇上灾难,我们通常只把注意力放在直接受到生命威胁的那一群人身上,却忽略了这些直接受害人的周边范围。就以矿难来说吧,大家最关心的当然是还被困在井底的那些工人。但是从更大的范围思考,受害的其实远远不止这些工人;从某个意义上讲,就算煤矿的经营者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遭到了经济上的损失。但是在这一切周边的受害人之中,最值得关注的,无疑是工人的家属。

若是把遇难工人的家属也看成是受害人,而且是受灾情况仅次于工人的这么一种人的话,所谓的救灾工作就一定也要把他们当作对象了。换句话说,有待拯救的不只是矿井下的工人,还包括了他们的家属。他们受的是什么灾呢?那可能是日后丧失了家庭的经济支柱,也可能是整个家庭情感纽带的瓦解。而在这一刻,他们面对的最大打击肯定是心理上的创痛。

我们要永远记住,家属不是救援工作的外来干扰,他们本身就是要被救援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家人生死未卜之际,当局就要开始援助他们了。而援助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随时向他们报告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尽量满足他们的一切疑问和要求。此外,还要在安顿他们之余找人安抚他们的情绪。救援现场挂出“救灾抢险”一类的口号根本就是多余的。都到了什么时候,怎么好意思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虚文矫饰上头!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哪怕是一点点的人力浪费都是失职。而隔离罹难者家属的做法,无异于扩大了灾害的范围和深度,因为他们延伸了第二受害者——那些家属们的痛苦与无助。

透过溃水这类非典型的“矿难”,我们应该学到怎样为所有的风险做好准备,又怎样在灾难发生之后降低灾害的损伤。而这个责任,绝非一句“自然灾害”就能推卸得了的。

原题为“摒弃非天灾即人祸这套二分模式”

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8月29日

哀悼：与亡者和解

有人说这是高等哺乳类动物的本能。例如象群，当它们在东非逐水草而迁徙的漫漫长路中，遇见同类留下来的骨骸，就会沉默地、缓慢地，围成一圈，然后伸出鼻子，温柔地抚触那些未能抵达终点的同类，那些不知年月的残骨。良久，它们才再重组队形，继续前进。在漫天黄沙的旷野上目睹这一幕，动物学家只能说这是哀悼，几乎就和人类一样。

尽管如此，还是有考古学家坚称哀悼亡者是人类独有的异行。最早可能是 13 万年前，最晚则是 3.5 万年前，史前的人类就有了仪式性的埋葬活动。他们不只发明了葬礼，甚至还发明了死亡。万物皆有生灭，但并不是所有生命都“看得见”死亡；唯有人类(或者其它高等生命)为此震惊，困惑，然后他们把死亡从一个平常的自然现象变成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并且思考其中的舍义。因此，人类才会很不自然地埋葬死者，并且创造了一连串的程序和礼仪。

仿佛只有经过这些仪式，我们才能处理好生者与死者的关系，才能让死亡产生意义，不至于一片虚空。然后死者才算真真正正地死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息”。不得安息就是放不下，生者放不下伤痛，于是感到死者也会和自己一样放不下离开的失落。所以要安息的不只是死者，还是生者和死者相互间的关系。

一场大灾，不只带走了几万人，还同时创造了十几亿与此相关的生者。再简单点说吧，四川震灾，我们全都是心理上的灾民。所以就有了三天的全国哀悼，让往生者安息，让幸存的所有灾民得到处理情绪的机会，让往生者和在生者发生神奇的交会。更重要的是死者因而有了声音；透过这类仪式，所有人全神贯注于死难者身上，仿佛想听到些什么讯息。“发明死亡”就是这个意思，走了的人已经走了，但我们听见他们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然后主动为他们构想死亡的价值；掩埋火化了的躯体，却生出了物质以外的另一些东西。

我想起了数十年来无数大劫中的死者，他们是否也透露过什么信息？我听不清楚。我们自己的心安息了吗？我把它忘在意识深处了。未经悼忘，没有仪式，这世上还有很多未死的死者。

原题为“有哀悼，才有真正的死亡”

刊于《am730》

2008 年 05 月 26 日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多难如果真能兴邦，首要前提是在灾难中活下来。面对灾难，力求存活的种种措施与工夫，通常叫做“抗灾”。“抗灾”的“抗”的字隐含了人力可以对抗灾难的意思：可是我们都知道人力根本不足以阻止大地的撼动。就像许多汶川大地震亲历者所说的一样，“大自然的力量太可怕了”。更现实的态度或许是学懂与灾难共存。不管是主流科学界公认的人力所致，还是部分异议学者所说的自然循环，全球正在暖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往大家关注的是怎样通过减排碳元素等各种手段去缓和暖化的趋势，现在有人则开始为即将出现的事实做准备了。例如一向饱经水患威胁的荷兰，他们的建筑师最近开始推广水上浮动房屋的概念了。又如孟加拉国低洼地带的农民，他们适应了一年猛过一年的大潮，在水风信子造成的浮筏上种植稻米。既然海洋水平面上升的倾向暂时无法逆转。何不干脆调整既有的概念，预备水上生活的日子呢？环太平洋的地震带上有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他们都知道下一个巨震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又不愿放弃既有的成就和基业，于是就更要学会活在灾劫的阴影下了。例如美国人口第一大州加州，连许多小孩都知道加州迟早有一天会彻底从大陆上断裂出去，成为一座巨岛。其中将要出现的震灾会大到什么地步。自是不言而喻。于是由日本、台湾地区一直到北美西岸，这些地方的官民无不把地震当作不可避免的事，然后设法在地震的预警、房屋的建设以及灾后逃生救难的规划上做足准备。

日本的灾难意识不仅充分表现在其流行文化里(比方说拍了又拍的《日本沉没》电影系列)，甚至连文具商也推出了求生套装，让人在倾倒的学校、家庭与办公楼里能多活两天。就像每座大楼必备的灭火器一样。回到中国，为什么我们平常不大容易感到这是一个多难的邦国呢？汶川震灾之后，大家都很关心地震预测的问题，就其之可测与否展示了反复的争辩。我更好奇当地居民知不知道自己住在一个巨大的断层上呢？无论哪一方面的专家，大家都同意汶川一带本来就是一个有危险的地方；那么当地官民有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呢？地震发生的准确时刻就算不能预知，房子的避震却是可以设想的。当大家都在追究“豆腐渣”工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不只是建筑质量达标与否的问题，还是灾难意识是否普及是否贯彻的问题；房屋要避震，是因为我们确知灾难之必。

如果真有灾难意识，那么我们的孩子就应该像日本、台湾地区以及加州的学生一样不只知道地震发生时要躲在那里，还要经历定期的演习。如果真有灾难意识，地方政府一定会有应急的定期对策，例如充足的对外通讯设施以及相应的物资储备。容易发生水灾的地方就要懂得水上的生活，容易发生震灾的地方就要懂得在废墟里逃生。中国既然多难，就不该避讳灾难。不该在“抗灾”“救灾”的光荣里忘记与灾难共存的现实与谦卑。

原题为“与灾难共存”，刊于《am730》2008年06月04日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没有一个政府在面对天灾的时候不挨骂，好在我们不一定总是要依赖政府。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是日本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场震灾，死亡人数高达 6500 人，需要搬进临时组合屋的则有 32 万人。当时的首相村山富市在地震发生了一天之后才开始动员全国的力量，被人批评为反应迟缓。而且在“灾害对策本部”成立之后，各级政府部门的行动还是慢了半拍，于是我们才会在电视上看到令人震惊的场面：几千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居然不慌不忙地排着队，静候救援物资的发放！如此迟钝的官僚系统与如此高质的公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政府人员来晚了，但是民间的行动却非常迅速。日清食品立即派车发送即食面，麒麟和朝日运去了大量的食水和罐装茶水，日本电信公司则在避难所附近架设临时公众电话共 450 架。除了自动自发的商业机构，各种慈善团体和民间组织更是空群出动，同时大量接纳临时报名加入的义工，有人从外地赶来帮忙分发物资，有人组织民间纠察队负责灾区的秩序；中小学打开了校门接纳灾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各地架起了帐篷……最是一时佳话的，乃帮派“山口组”也成了慈善组织，文身断指的大哥小弟一下子都变为瓦砾堆中的抢险人员。

1999 年台湾“921 集集大地震”，从灾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慈济”义工，到多年之后的自发社区重建计划，更是处处可见民间力量的身影。事实上，无论是“南亚大海啸”还是美国的“新奥尔良风灾”，反应最及时、工作最有成效的，都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

最近这次“百年一遇”的超级大雪灾，除了让我们看到政府架构条条块块间的不协、机制的缺陷、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基础建设的脆弱之外，最令人遗憾的莫过于民间社会的缺席了。是不是中国人都很凉薄很没有爱心呢？当然不，我们知道有无数企业正在发动救灾捐款，许多平凡的老百姓自己提着沉甸甸的物资走到人满为患的车站，更有一些民工愿意让比自己住得更远的人先行上车。中国社会的人心再坏，价值观再虚无，但天不亡我，漫天飞雪，犹有温情在人间。

问题不在于民间没有救济同胞的决心，而在于欲救无从，不知该从何处着手。评论家笑蜀在流传甚广的《缺的不是物，缺的是柔软的心》一文中谈到了他在广州火车站的见闻：“我在现场看到的捐赠物资很多，好几个地方都顶到了天花板，但都成包成包的没开封，而就在这些没开封的捐赠物资旁边，很多妇女和老人都盖着单薄的床单席地而眠。热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很少发放到他们手上，原因何在？”

这真是个好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钱有了，物资有了，热心的志愿人士也有了，但应该获得帮助的人还是得躺在地上颤抖呢？笑蜀兄认为其中一个原因乃在于有关部门人员的冷漠，把救灾当交差，所以才会不主动征召民间力量，甚至还将志愿人士的

热诚当作碍事的麻烦。但我认为除了他所说的“一颗柔软的心”以外，更重要的其实是“如果平时让 NGO 充分发育，让他们有自由的广阔天地，这时就不难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其实要是健全民间社会，有活跃的非政府组织，见诸近年国际上历次大型灾难，你又何需“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呢？他们根本就会不请自来，遍地开花。虽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是往日那个全能型国家，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和各种私人生活的领域，但部分公务员仍把人民的自愿行为看成干扰，反映出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民间不是没有人，他们只是没有组织。而非政府组织，始终存活在一个灰色发展空间之中。许多规模庞大的老组织老机构一旦遇上什么事，根本没有自主独立的决策能力，只能听任上头的指示动员。至于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和近年新兴的民间慈善团体，虽然比较独立灵活，但也不能不低着头走路，唯恐越雷池半步。

家产上亿的湖北富商王元山最近宣布：“有生之年，我要将过亿的全部家产无偿捐献给政府。”这真是个大笑话，可笑的不是王先生感人的热诚，而是富商不捐钱给民间慈善机构反而要把钱交给全世界外汇储备最高的政府！同样的情况难道不也正发生在眼前的雪灾之中吗？一提到捐助，大家马上想到的对象就是政府。就算民间善款和国家补助没有经过无良地方部门“雁过拔毛”式的层层盘剥，就算前线公务人员没有冷淡地对待人民的热情，这也只不过是把全部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水龙头而已。而在全世界的危急救灾行动之中，最无效的恰恰就是只有一个大水龙头的做法。难道连遇上了“百年一遇”的天灾，也还要让有关部门去垄断救助的一切法门吗？

其实不少部门在最近几年已经渐渐体会到官方的局限与民间组织的潜力了。很多事情需要的不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府，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过去的 2007 年在很多论者眼中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元年”，从“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直到“厦门 PX 事件”，中国公民的意识与尊严都在不断地觉醒。但愿这个步伐不要在今年停下来，让十三亿看似平凡的“老鼠”发挥群体的惊人动力。

原题为“让老鼠成群，让民间自助”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 年 02 月 09 日

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或许，过了 2008 年之后，中国将永远地被改变了。

2008 年 5 月 19 日下午 2 点 28 分，十三亿人同时静默。我们上一次看到这种全国共哀的景象，已经是毛泽东逝世时的事了，不同的地方在于这回大家是为了最普通的百姓，如你如我的一般国民而哀。三分钟之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开始激动起来，没有组织，也不需组织地高喊：“四川挺住！中国加油！”他们挥着拳头，与电视机前的观众同时流泪。

纵然有一些仍待商榷检讨的细节，中国政府在救灾工作中展现的惊人能力得到了证明；虽然后来难免出现了救灾大于灾况的传统叙事手法，但中国媒体在报道灾难上的透明与开放到底是史无前例的。这两者加起来，换回的便是国人的空前团结，而这份团结也许是办十次奥运都得不到的。只要看过第一天全国哀悼日的场面，我们就知道中国政府已经在这时刻赢得了人民的认受，巩固了统治的合法性。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 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兄弟姐妹。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在公民道德的启发上，这场不能以悲剧二字去形容的悲剧，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导的美德运动还要大的作用。探讨公民道德的典籍论著浩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定下的格局。亚氏认

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必须同时是好的统治者与好的被统治者。过往强调的守法守秩序其实只是在教人怎样做一个好的被统治者，这一回的震灾却让人领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统治者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广场上高叫“中国加油”的群众不单单是为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加油，更是为自己构成的中国而加油。

国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员和解放军的将士用命不畏艰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应该忘记无数志愿者的热心。坦白讲，那些没有专业技能未经充分准备就自己开车跑进灾区的人，有点傻也有点乱；不过他们却释放了很巨大的潜能。

可能有人会觉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间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大型的灾害之中，争分夺秒，我们不能把筹码全押在一个巨型机构上。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的反应是很迟缓，但是它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沃尔玛”与“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开入前线。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给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不拥有一大批曾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瞬即开拔），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50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

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

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

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

刊于《明报·笔阵》

2008年05月22日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国难当前，奥运火炬的传送要不要中止呢？很多人都觉得是要的。哀矜勿喜，有那么多人丧命，那么多人失踪，那么多人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当局又何忍一片喜气，继续大办盛事呢？

汶川震灾的前两天，我刚从成都回港。心里还在回味当地友人所说的段子时，噩耗忽然传来，我连夜打了好几十次电话，却没有一个接得通。尤其令我挂心的，是一个住在都江堰的友人，不知她是否无恙？后来我又想起，这么猛打电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会增大线路的负荷，阻碍了其他必要的紧急通讯。直到一位朋友开始更新博客，即时向大家报讯，我才稍稍宽心。

守着电视，我看见一个五年前SARS时期仍然不能想像的政府。除了少数关于震灾预测的小道消息之外，它开放了一切的渠道，几乎没有禁区地任由媒体采访，负责救灾的解放军甚至还特地安排了媒体联络人。如此开放透明的信息处理并没有带来往日担心的社会不稳；相反地，它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救灾热潮。没有媒体想在这种时刻泼冷水；相反地，不须指示，它们自动地汇合成了一道主流。经过这次悲哀但却宝贵的经验，政府一定能够学懂，天灾并不是天谴，毋须羞耻也毋须遮掩。

我又看见几个月前雪灾为祸时还看不见的一个政府，其行动之迅速固然远胜新奥尔良风灾下的美国政府；它学习的速度更是令人咋舌，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举国动员的救灾体制竟然就已发展到了如此灵动的地步。我从来不相信写评论要服膺“在官方做得对的时候称赞它，在它做错的时候批评它”之类的训条，因为政府不是小孩，它不需要掌声呵护；而批判与质疑却是评论者的天职。但是，在这一刻，我实在不能不佩服中国政府在抗灾中的表现。

然后，我看见了我爱成都，以百万计的市民露宿街头，令人神伤。可是我要说，这次灾劫中最叫人感动的还不是虽然负伤流血却仍赶赴灾区的士兵武警，甚至也不是亲临前线的温家宝总理，而是这些可爱的成都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不只没有发生灾后常见的趁火打劫，更没有商铺乘机抬价，几百万人就这样秩序井然地守在街头，照样过自己的日子。有人谴责部分市民在这当头仍不忘露天打麻将是幸灾乐祸。我却想起伊朗导演基阿鲁斯达米在《春风吹又生》中那最动人的一幕：强烈的地震摧了无数人的家园，但那些灾民在野地上架搭帐篷时仍不忘竖好天线，因为世界杯就快开锣了，逃难固然要紧，但并不表示世界杯就不重要了！这不只是苦中作乐，这更是人在浩劫中夺回自己尊严的努力。天灾可以带走我们的财产、亲人以及生命，但不一定带得走人之为人的起码生趣。

我还看见更多的成都人走到血站，卷起袖子。当地的著名作家冉云飞在联络恢复之后告诉我，他们一家连续3天去排队捐血，竟然都还轮不上！何只成都，四川好几个灾区的居民这一刻才从鬼门关前拾回性命，下一刻就已自发地组成救援队伍，要往山里进发……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吗？天不亡我，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这又不只是一种爱国爱同胞的情怀，它还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在“反华”的CNN网站上面，我看见它们连上了救灾捐助的链接，还有许多美国人的留言，有的在呼吁大家捐款，有的在为中国祈祷，还有人谴责美国政府出手太小器没有良心。著名博客罗永浩则刻意摘译了部分美日新闻网站上的留言：一些美国网民不太清楚四川的位置，还特地搜寻材料，当发现四川原来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后，其他人立刻开始忧虑，一位留言者如此回应：“多谢（你提供的信息）。很快就有地区救援……我今晚要停下所有的事情，祈祷上帝立刻去帮那些受灾的人。”日本网站公布震灾消息之后，很多人也即时送上祝祷，其中一个网民说：“阪神大地震，新潟大地震的经验，日本的救助技术，应该可以在这类灾害中发挥作用。不管政治局势怎样，中国又是我们的邻国，时间紧迫，不要再说他们反日什么的了。日本政府应该尽早派遣救援队伍。”

是什么在瞬间消弭了那曾经不可越过的偏见与敌意？当然是慈悲的力量，那种使得解放军不眠不休，消防员奋不顾身，以及平民百姓忘己救人的同一种力量。

我不能不想起亚当·史密斯在《道德情感论》中的那个著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或许会感到伤恻，并且沉思当中的

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史密斯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像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的处境。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 18 世纪的苏格兰了，拜媒体所赐，我们现在更有资源去培育自己远程的道德想像力。除了感情人更易被陌生人的痛苦触动，我们甚至还可以透过跨政府的连系和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去实际践行自己的道德良知。换句话说，比起 200 年前，人类现在更有本钱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做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我们都不忍再看到迎送奥运火炬的欢庆场面，因为我们有难以言喻的哀伤需要宣泄。所以在倾全力救灾之余，政府也不能不顾虑 13 亿人的心理需要，它应该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它应该在稍后的日子里于各地举办集体的纪念集会，让日日夜夜沉浸在悲剧消息中的国民有一个治疗自己的机会。至于那一把火炬，我们却不一定要按既有的模式去传送它。何谓奥运精神？难道不就是一种对于跨越藩篱的和平的梦想，对于人性中种种美善的肯定吗？所以当局不一定要中断火炬的传送，而是要让这把奥运精神的象征重回正轨，于浩劫中发掘出它的真正意义；换一种方法，换一种仪式，为了一切在生者，更为了一切往生者，将整个过程转化成一种祭悼，甚至升华。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该放弃对理想的坚持，对人性的肯定。即便是死去的同胞，我相信，他们也希望我们好好活下去，把他们留在我们身上好好活下去。

原题为“浩劫中见希望伤痛里有慈悲”

刊于《明报·笔阵》

2008 年 05 月 17 日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四川震灾发生之后，我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入睡，只能日夜守在电视和电脑旁边，一边等着最新的消息，一边忧心如焚地思忖着自己到底可以做什么。除了捐款与诵经，我们这些身在远方而且没有专门技能的人，到底还能帮上些什么忙呢？

然后我看到有人开始质疑震灾前的预警工作。据说早在 5 月 3 日晚上就有群众致电四川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查询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息；可是当局视为谣传，于是开始了“辟谣工作”，并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网页上发布在有关当局的“主动解释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绪”的消息。再来则有人批评灾区的学校建筑有问题，其中极可能发生了偷工减料的情况，否则倒塌的怎么多是学校呢？

这种种反思言论发出之后，自然会引来一些网民的不满。他们会想，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大家应该一心救灾，而不是坐在一边批评这个讥讽那个，与其空谈，不如行动。

钱钢先生也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至于有的传媒，震中信息尚且朦胧难辨，就已经主题先行，搞策划，玩深沉，就更不合时宜。”

我完全同意钱先生所言，在基础事实都还没办法弄清楚之前就开始大搞策划，确实有违媒体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场化时代的机制冷酷，那些媒体的编辑与记者何尝不伤怀急切如你我，说不定他们私下还捐赠了许多现金与物资。只不过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之下脱颖而出，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于是想方设法地构思和别人不同的主题，试图在一片震灾的报道中独树一帜。

至于那些现在就把焦点放在反思和问责的论者，我就实在不敢苟责了。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实在不是源自凉薄的心态，而是另一种关怀的表现。受到这么大的震动，除了默哀、祈祷与捐助，他们一定还想找到更多的表达途径。思量下来，你很自然地就要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悲剧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你也很自然地会想这一切又该如何防止，是不是还有更多更好的预备工作呢？

没有人只想“空谈”，问题是除了为救灾抢险的工作打气，除了以言语表达哀思之外，绝大部分的人还可以说些什么呢？人的思维广阔，及至无限；而言论的表述则是此无限思维的直接产物。要他们不在这时候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某程度上就是要求大家只能用一种思维方式去体现万众一心的崇高。

我们常常强调“万众一心”，不一定是否认差异存在的事实，只是总想界定差异存在与不存在的最佳时机。所以在奥运火炬惹起对立的时刻，有人就要再三强调“一致对外”，停止批评自己人。在西藏发生暴乱的时候，就应团结起来谴责暴徒，不要来什么反省。然而，谁去界定万众一心暂停差异的合理时刻呢？基于什么标准？所谓的“万众一心”又该怎么个“一心”法呢？

同样地，对于那些即使批评防震救灾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朋友，你也不能用“万众一心”的布条去暂时塞住他们的嘴。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那顶多是不顾大家的感受，不懂方便善巧的法门，所以说出来的话不只令人听不进去还徒惹反感。不过，差异毕竟是不容易抹煞的，连另类意见与言论出现的时机也是不能确定的。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和权力。更何况大家或确实享有同一种心情，只是思考的路向不同罢了。

原题为“万众一心，表达不同”

刊于《am730》

2008年05月15日、05月16日

第三空间：“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间的空白

假如你有去酒吧欢乐时光或者泡茶馆的习惯，你也许会认识一堆聊天的朋友，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真要你记起他们的名字，却又有些困难。仔细想想，这些交浅言深的酒友真是你的朋友吗？再假设某一天的欢乐时光，人群中传来一本相册，里头有不可示人的照片，一问才知这是某人在路边捡到的，你会不会觉得不大好意思看，甚至觉得偷看人家的隐私是不道德的呢？

我们总爱形容互联网的出现是一场革命，它不只增进了沟通的方式，加快了知识累积的速度，而且还会彻底改变我们熟知的人际关系、社会结构与价值标准。可是它到底有多“革命”呢？却又好像不大说得清楚，直到一个又一个的案例涌现。

香港艺人陈冠希的“淫照门”事件在雪灾稍缓、新闻寡淡的新春假期里连续霸占了香港报纸头版好几天，仿佛是全城惟一仍在发展中的大事件。看起来这事好像没什么可以再说的了，法律、自由、道德和色情，几乎任何你想象得到的观点都有人谈过了。然而大家好像忽略了，在连续剧般的演变中，却牵扯出了互联网革命里某些令人一时还难以理解的变化。

例如“网友”。究竟什么叫做“网友”呢？由于有个“友”字，顾名思义，“网友”应该就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但“网友”和“网民”常常又可以互换使用，彼此指代——中国网民则有过亿之数，难道这一亿人都是朋友吗？

香港警方发言人警告大家，在互联网论坛上发布和转贴那批很刺激的照片是犯法的，因为这时你的对象是一批你不认识的“网友”，按法律来讲也就是一群无名的“公众人士”。生怕大家不懂，这位警官还补充：“你自己想想，对于那些你天天在网上交谈的人，你有多少的了解呢？”

接下来的情况就好玩了，大伙不在香港论坛上发帖，但要不是转攻内地网站，就是以电邮或其他手段转送照片，还不忘加上一两句深具讽刺意味的按语，例如“你是不是我的朋友？是的话请进入以下链接”，又如“由于我是你的朋友，我送你几张照片”。

结果一时间法律界众说纷纭，不知该不该修订法例；当事人没申请禁制令的情况下，警方对着这批照片的崭新蔓延方式也只能束手无策。

那位自以为道理明晰的警官可能不晓得，无意中他踩进互联网世界的灰色地带了。按传统定义，“公众人士”与朋友还是分得开的，好比酒吧里天天碰面的人应该能算朋友，而那些坐得稍远、从不往来的人大概就是“公众人士”。且让我们以酒吧比喻网上论坛，假如我日日在同一个论坛泡上几小时，那些在网上听我倾诉，偶尔也回我一下的人，和酒吧里的酒友有分别吗？更要注意，论坛与博客就像一个任何人的发言都能让所有人听见的酒吧，不如酒吧那样有坐位远近、空间大小和容纳人数的问题。所以我完全可以每日登入一个浏览量过万的博客，不留片语，只是在人群中倾听博主的心声，了解

他甚于朝夕相处的同事、家人。我，算是他的朋友吗？

在传统的概念上，我们可以把人的活动领域区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然后依此架构出一连串基于公私之别的制度、法律与规则。

可是互联网却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既非公亦非私的第三空间，它介乎二者之间，混淆了公私的区别，捉摸不定、边界不明。再以香港警方所说的“公众人士”与“朋友”的分别为例。为了让大家更明白“朋友”的定义，警方发言人很强调“你有多认识你的网友”这一点，似乎只有非虚拟空间的实体接触才是惟一真确的友谊基础。但他可能忘了，对许多网民而言，网友才是他最好的朋友，尽管他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职业和身份，但谁说友谊一定要依赖这些条件呢？

我们区分公众人士与朋友的准则之一是有没有个体间的互动往来，一般人和抽象的公众是没有这层关系的；但网络就不同了，网友好像也是一堆无名的抽象的公众，可他们却完全有能力有机会与你进行单对单的交流互动。我们时常把论坛想象为报刊传媒般的公共空间，但它其实不是，因为它提供了大众传媒做不到的互动条件。而一个原则上开放的论坛，甚至会在频繁的互动中形成亲密的团体感，对内凝聚，对外排他，恍如一个庞大的朋友圈子。其吊诡一如传统的日志型博客，明明是个人日记，却又公开示人容人留言。

根据一项调查，在这次“淫照门”事件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网民认为转发有关照片的行为没什么不对，反指始作俑者陈冠希才该负上最大的责任。但也有很多人觉得这批网民是非不分，道德观极有问题，明明自己偷窥了他人私隐，却反过来指责人家后门里的私事有错。

我们应该仔细地先把陈冠希和众女伴拍照、有人把照片偷取上网及网民们接力传播照片这三个环节分开来看。首先，陈冠希的行为虽然有争议，但在法律上站得住（只要被摄者在神智清醒的情况下自愿被摄），而道德上也只有保守派才会彻底否定它。其次，在陈冠希电脑中偷取相片，以及将该批相片上载网络的人（且假设是两批不同的人），则在法律和道德上都犯了错。于是我们就要面对第三个环节，也就是网民再散布那些相片的做法。

理论上讲，这就像翻阅人家偷来或拾到的家庭相簿，都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觉得如此？难道他们不觉得这和偷看人家的日记和钱包一样吗？我无意为这批网民掩护，但我认为就此推论出网民道德水平低下的判断是不公平的。我相信这么多人不可能都一有机会就要偷瞄人家的皮包里装了些什么，真正的关键在于他们可能根本不以为那些相片是隐私。

打开任何一个博客，我们都不难发现许多转贴的文章、图片和音像，它们可能来自其他博客和网站，甚至来自版权所有的报刊杂志。

当博客和网民乐此不疲地转载、再转载这些材料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这些里头有

什么问题，因为网络世界的基本价值倾向（ethos）就是共享，任何信息上了网就是公众的了，自由、公开而且免费。所有在网络上出现的文字、声音和图像都已经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又哪还有隐私可言？偷了人家的相片放上网肯定不对，但任何赃物只要一放到网上，网民就会感到那是大家的了。

因此，一个人在实体世界里或许从不偷窥他人隐私，但同时却在网上时刻等待最新的“淫照”浮出水面，因为他看不出这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

一个博客能够毫无愧色地把自己喜爱的一首歌放在网上播出，因为他觉得博客是他自己的私人空间，和自己家没多大分别。其他人要是喜欢这首歌，可以下载回去不断转发，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块公众空间，里头的声音就和鸟鸣一样自然并且免费。

原题为“‘淫照’照出了公私间的暧昧”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02月20日

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互联网刚刚开始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幻想它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公共领域”了：没有限制出入的门槛，没有权威的中央管理，没有身份背景的差异，所有资讯自由交换，所有人理性对话。于是差异容许存在，共识也会渐渐形成，一个摆脱任何权力扭曲的开放平台将会带领人类迈进空前的民主时代。

可是正如铸造这个概念的哈贝马斯被人认为太过粗疏，他的欧洲沙龙和早期报纸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公共”一样；互联网上的“公共领域”原来也只是个过分乐观的期望。

先举一个好几年前我就说过的例子。我是美国NBA湖人队的球迷，从前要在中文媒体上寻找湖人的消息，我必须很有耐心地看完整节新闻才偶尔听到一两则它的赛况，又或者买一份报纸翻过国际版财经版才找得到它球员的动向。但是现在，我可以直接进入湖人的官方网页或者它的球迷园地，甚至完全略过其他NBA球队的讯息。假如我是个心系篮球不理世事的球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也许不会知道谁是奥巴马，也不知道楼市暴涨的影响，说不定还不晓得原来我家附近昨晚发生了杀人案；但是我却十分清楚一名湖人球员的状态，乃至他所穿内裤的牌子。

互联网是无尽的资讯宝藏，让我们各自发掘自己的需要，发展自己的兴趣；它却不一定会使大家更加了解彼此。相反地，有时它会阻断我们彼此沟通的可能，因为再也没有什么所有人都一定要知道的常识，也没有什么保证能够打开陌生人话匣子的话题了。要是互联网取代了由一点发放讯息至多点的大众传媒，我们或许会很自由，也会变成某

个领域的专家；可是我们也很有可能丧失掉所谓的“公共”。

再看“网友”这种群体，它和“网民”最大的不同就在这个“友”字。一个本质上开放的网络论坛是很理想的，任何人只要上网登入，或许浏览或许发言，他们就变成了网民，表达不同的关注，展示不同的思路。可是和任何团体一样，一个论坛也有它的“团体动力”，不必然仰赖领导，却会依循一定的组织社会学法则，渐渐自发形成一群“网友”的俱乐部。

在这个俱乐部的各次讨论里面，理论上的异质和多元将透过相互影响与寻求认同的过程，慢慢形成自己的主流。一开始，大家只是不赞成某个观点，然后有人开始宣称“鄙视”持有某种观点的个人，再来就有人用上了粗话，最后则出现了追杀通缉令。匿名的条件一方面保障了大家，同时也加剧了这种话越说越极端，你激进我比你还激进的倾向。多年以来，我们目睹无数这样的历程，看见一个论坛怎样从国事讨论变成了征服世界的幻想乐园，另一个论坛又怎样从标榜理性变成了要把所有愤青都丢到海里喂鱼的小圈子。和任何封闭的团体一样，所有极端的声音都会牵制整体的走向，逐渐把温和变成必须排除的异端。

终于，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一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什么两样。

原题为“网友——新部落时代的身份”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06月12日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向来都是令人头疼的问题，最近横扫全球的电影《波拉特》(Borat: Cultural Learnings of America for Make Benefit Glorious Nation of Kazakhstan) 更是一颗超级的炸弹，一方面破尽美国所有的言论禁忌，惹来数十宗诽谤官司；另一方面则对哈萨克斯坦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美国那边的官司打成什么样没有下文，倒是原来气得撞墙誓死追究的哈萨克斯坦政府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态度大转化。

他们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表示“我们最好有一些幽默感，而且尊重他人创造的自由”。又说：“以法律诉讼为借口对艺人进行威胁是毫无用处的，这只会进一步损害国家的声誉，并且让波拉特更受欢迎”。他们甚至发出公开邀请，希望波拉特有空的话不妨

到哈萨克斯坦玩玩，亲身体会一下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据说哈萨克斯坦政府很有可能发行这部电影，让国民与全世界的观众一起见识一下这部笑得大家人仰马翻的电影。

看到这个聪明的决定，我想有不少人都会对这个中型国家顿生好感，就算不一定真的会去“玩玩”，也想多认识它一点。近年人人争说“软实力”，都认为在国富兵强之外还要注重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政府才在海外遍开“孔子学院”，希望传达出一个美好的大国形象，让别人想起中国的时候不只是在脑海中浮现出各式各样的“made in china”的商品，那么我们就得学学波拉特和哈萨克斯坦合演的这出峰回路转扣人心弦的喜剧了，它可说是讨论国家形象的最佳教材。

如果有人搞一个调查，衡量世界各国的幽默指数，我想中国就算不用排到百名开外，肯定也不会轮上前十名。没错，中国人很会“恶搞”，中国老百姓更懂得在手机和网络上传播道之不尽的“段子”，但要说整个国家的对外形象，我想没有多少人会以为这是张笑眯眯的脸孔。因为这张脸孔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政府密切相关的，而我们的政府则向来不以幽默著称。

当然中国也有一张笑脸，然而那是什么样子的笑呢？自从1949年以来，外间在媒体上看到的中国式笑容是这样的：一群农民在田地里看着饱满的麦子露出心满意足的笑；一帮工人对着冉冉东升的璀璨旭日龇牙咧嘴地欢笑；领导到地方巡视时则多半有一群干部加百姓围着他鼓掌微笑；无论是当年的雅典奥运会，还是中央电视台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有一堆小妞或者小鬼摇头晃脑，不知所以地鼓着红扑扑的脸蛋傻笑。这些笑容多半是僵硬的，多半是种表演；更严重的是这总让人联想起宣传里的标准四字词“欢声笑语”，似乎有一个老师在看着一班学生上笑容指导课，不准不笑。

这几年来，美国穷兵黩武妄自尊大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每年年尾，白宫记者派对还是会全球报纸国际花絮版上抢到一点位置，为它得回哪怕只有那么丁点的好感，因为大家都喜欢“第一家庭”自己拍的DV短片，喜欢看见他们不得不厚着脸皮接受记者们的挖苦调侃。

至于美国的难兄难弟英国，也还有它独特的英式幽默。例如时常出入唐宁街十号的著名流浪猫汉弗莱(Humphrey)，自从首相夫人不喜欢它的传言散布开去之后，首相府就是谋对策修补形象。其中一个办法是让唐宁街十号的管家板起脸发言：“很多人说汉弗莱是大英帝国首相的猫，我个人觉得这是过高的升职。事实上它顶多只是一头‘内阁猫’，因为它通常在内阁大臣开会的时候出现。”

或许我们还不能期望高层领导在记者面前展示他开自己玩笑的短片，毕竟是国情不同。可是我们应该让这个正在痴迷于大国想像的国家变得有幽默感一点，不只让外国人松一口气，觉得这个来势汹汹的新兴强国其实也挺可爱；更能叫人民感到“亲民”二字原来不只是一种说法。

要怎么做才能产生幽默的形象呢？这又不只是包装工程的表面功夫，还是整个政府

基本思路的问题。因为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而宽容则意味着要接受不同的言论，不同的出版物和不同的电视剧。宽容是官员不能因为有人散发嘲笑自己的手机短信就将其入罪，宽容是官员不能对着一群出版商凶神恶煞地说要“因人废书”，宽容是官员不能对着记者说要好好整顿电视剧以正社会风气。这是什么年代啦？

每一个政府干部对内的讲话都会外传成为中国表情的一部分，这表情是严峻还是和蔼，就全看政府对待言论与文化表现是否宽容。下一回要是官员们再想干预，他们真该想起哈萨克斯坦的范例，看看自己打算为中国换上一副什么表情。

原题为“何等单调的中国式笑容”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2月11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大家都以为笑是种颠覆的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应该早在1989年之前，就垮在如海啸般翻涌的政治笑话之下了。但是我们都知道，铁幕并不是给笑倒的。

最近中国政府和社会上许多保守势力纷纷出面，指摘“恶搞”的风气败坏了社会道德，甚至威胁到国家大本。究竟何谓“恶搞”？它又怎么破坏了社会的善良风俗，甚至国家存续的根本呢？

请容我抄录一段8月27日《中国青年报》的特稿〈我国将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恶搞信息〉：“从一些媒体爆炒影星怀孕生子到一个老妻少夫的无聊“新闻”炒得满天飞；从贬损民族英雄岳飞，到把污泥浊水泼洒到鲁迅、董存瑞、潘冬子和雷锋等身上的“恶搞”；从披露各种耸人听闻的碎尸、绑架、强奸“秘闻”，到公然大炒耸人听闻的“性闹剧”、“性丑剧”，一些媒体节目、版面网页的轻浮化、低俗化、血腥化倾向日趋严重，有些媒体甚至不惜制造虚假新闻、泡沫新闻、黑色新闻等以吸引眼球，而且此风正蔓延到彩铃、短信和人们的各种日常交谈口语中，甚至标榜为“新的文艺形式”和“灰色文化”，流毒甚广”。

所谓“恶搞”，就是这种“不正之风”的代表，以戏谑调侃的形式摘取主流文化的题材片段，变奏变形。例如把官方支持的巨制《无极》变成谐趣的短片，将宣传机器认可的价值观和相应口号扭曲为逗人的笑话。又和以往私底下口耳相传的“段子”不同，现在有了无远弗届的通讯网络和廉价方便的电脑技术，“恶搞”作品可以用视频和手机短讯的方式在公众领域流布。因此有关部门就格外紧张，觉得有必要管制一下。

首先是广电总局在9月份开始规管互联网视频，一方面要求所有包含戏剧内容的

视频，也要和电视电影一样接受审查监督（请想像所有 Youtube 的短片都要送审的话，会是什么状态）；第二，把传播视频的资格限定在新浪和网易等几家大型门户网站手中，以方便管理。这对方兴未艾的网络视频热潮当然是个严重的打击，所以激起了许多网民的争议。

其次，则有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刚刚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重点放在“净化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这项法案为此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和赌博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娱乐、动漫产品以及网络信息等，对此类侵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制售传播行为依法从重处罚”。

这些动作一般被解读为是要打击“恶搞”，压抑不良的社会风气。且莫论它们实际上是否可以操作，也先别管它们会发生什么效果；我们只专注一点，去看看打压“恶搞”的理由。回到《中青报》那篇文章，有这样的说法：“不以为丑，反以为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既暴露出当前某些引导舆论的媒体和从业人员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也透射出在追逐市场利益中值得警惕的道德滑坡现象。如何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新的舆论道德观、价值观、伦理观和文化观，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绿色舆论环境，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共同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从这番话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丑美耻荣”等字眼是在呼应胡锦涛提出的共产党员道德观“八荣八耻”；而“和谐社会”这个最流行的术语则是胡温新政的一大目标。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恶搞”不只是和新时期的共产党员道德观对着干，甚至还有破坏和谐社会的可能。

所以“恶搞”也就成了国家的大敌了。

由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现代国家通常不愿太过介入道德领域，进而把国民道德上的完善剔出国家存在的目标之外。也就是说，百姓是不是君子，人民是否皆为尧舜，并非国家关心的问题。尽管政治未必可以和道德切割得一刀两断，但现代政府一般都不会承认甚至不敢宣布自己有一个道德的目标和相应的政策。中国的情形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是十分特殊的，一直以来，道德学习就是政治动员的一环；而政治动员又是回应形势变化，巩固自身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所以胡锦涛才要提倡“八荣八耻”，一方面在制度建设门径以外强调个人操守的学习进化，以回应国家机器腐败恶化的趋势；另一面则藉此树立自己的主张，承接历任中共领导人用“哲学”和“思想”宣示地位的传统。

有些论者以美国白宫记者的周年派对为例，指出连美国总统也不顾身分，拍短片来恶搞自己，与民同乐；中国人又何必如此小器。其实这根本不是大方或小器的问题，而是政权合法性来源不同的区别。一套正面的道德观和相呼应的领导人形象，至今仍是中国政府建立合法性的重要法宝，因此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恶搞”，实在无异于颠

覆。

可是“恶搞”真有那么可怕吗？表面上混乱了主流价值和社会等级秩序的笑话就真能动摇国家大本吗？有些文化研究学者喜欢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的论着，指出传统欧洲城镇的狂欢节是对社会秩序周期性的破坏。在这类一年一度的大型派对里面，小丑可以临时扮演国王，乞丐可以做一天主教，所有平时法相庄严的神圣象征此时都成了嬉闹的对象。同样情形在中国历史上也绝不罕见，即使规矩严明如清初，很多城市庙会也是男着女服，女扮男装，民演官，官做民，一片喧腾得没了。中央纵有不满偶有禁令，也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原因不难理解，这些玩笑不只无伤大雅，反而还宣泄了过度的压力，有助于日常状态底下固有秩序的继续。所以这种颠覆只不过像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上翻筋斗，根本无伤大雅。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在其《无权者的权力》一文里曾经举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一个蔬果小贩在其店铺的墙上贴了一张书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横幅，但买卖蔬果其实和这张标语固然没有一点联系，那个小贩也不可能真心相信这句话的意涵。但是在共产党治下的捷克，张贴展示这类没有人会认真对待的道德口号与政治标语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种非常犬儒的道德态度，政府大可以宣扬任何主张，但人民不只不会认真对待，反而怀疑它们的真实。久而久之，所有的学习，所有响应号召的行动都成了虚应故事。然后笑话和“恶搞”就来了，他们表面上心悦诚服，私底下则把种种的训条变成笑料。

当代大哲齐泽克（Slavoj Žižek）形容这种状态下的政权是个“道德沦丧的政权”。因为它期许于人民的，不是他们严肃领会它所颁下的教条；而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犬儒心态。他说：“对于官方意识形态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政权真正希望的——对于该政权来说，是它的臣民要把它的意识形态太过当真，而且付诸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大祸临头。”所以广电总局和各方保守力量不只不该对付“恶搞”，反而得欢迎它们。因为最可怕的不是人民调戏官方认可的价值观，而是他们高举“八荣八耻”的标准，据之严肃地检验所有国家干部的言行。

原题为“人民一发笑，政府就思考”

刊于《明报》

2006年09月06日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位特别好

所有政府都有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保姆，将人民看做孩子的倾向。它们害怕只要不留神，人民就会犯错甚至犯罪。为了防患于未然，它们会忍不住想从“根处”下手，消灭人民走上歪路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那个可以深深影响老百姓的“根处”呢？通常被指出来的就是媒体了。根据一种流传已久但在学术上仍然无法确证的常识，媒体是能够教化受众的。如果一个人老是看描写黑社会的电影，他很有可能会变成黑社会；假如一个人老是看《超级女声》之类的选秀节目，他的品位会变得很坏。为了防止有人加入黑社会，为了防止整个社会的品位低俗浮浅，政府有必要出手介入。所以广电总局最近下令，各地电视台“选秀节目”的播出时段不准超过两个半月。原因就是这些节目太媚俗了，人民看多了没好处。

先不管传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学理争论，也别碰“超女”之类的节目是否低俗的审美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反而是这种“保姆政府”的假设。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只要进了广电总局之类的部门，就会变得比较聪明，比较有品位，比较有能力去辨识美丑善恶？是不是这些部门都有一些严格的甄选机制，少点智力少点艺术上的天分都进不去呢？还是它们都有精深的培训课程，使得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经过训练之后能够摇身一变，成了看电视的专家？答案我们是知道的，在媒体管理部门工作的也只不过是普通人。

可见，“保姆政府”不只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备受争议；就算我们真想要一个把人民裹在襁褓里的政府，也很难去找到有足够资格当保姆的官员。那么政府是否就彻底放手，让媒体放任自流呢？当然也不，即使是全球媒体自由度最高的丹麦等北欧诸国也不可能毫无底线，问题只是底线何在。这条底线该怎么划，决定于国家的形态，有的注重提政治，有的注重提道德。以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在这里先不讨论政治问题，而专注道德品位的问题。

最近《锵锵三人行》成了媒体焦点，原因是嘉宾王朔在我有份参与的那几集节目里说了许多粗言秽语，逾越了一般电视可接受的尺度。

有意思的是，经过事后一番查考，我才发现所谓的“尺度”原来是不存在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法律去定出这样的尺度，更没有明确的法律去管理电视传媒的用语范围！因此，目前绝大部分的尺度几乎都是来自传媒自己的约束，或者政府部门的意志。

这种情况当然极不理想，也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大势，所以许多学者都曾提出要为传媒管理立下可行法规。我完全赞成立法，问题是立法的原则是什么？具体操作的办法又是什么？

先谈立法管理传媒品位与道德的原则问题，且以语言问题为例。同样是粗话与不文明的内容，你可以因为它会造成坏影响而规管它，也可以因为它会伤害受众而限制它。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准某个字出现在电视上，但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关于影响这种说法，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还存在着许多争议，因此有些发达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根据它去管理媒体。相反，你若对电视上某人的粗言秽语感到恶心，或者觉得某种言论是在歧视你的性别、冒犯你的族群，这种感觉则是实在可感的，它造成的心理伤害和尊严受损也是可以具体说明的。因此，若要立法管理传媒的言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是否会伤害人，而不是它们的影响好不好，更不是它们的品位高不高。

至于操作上的程序，不少国家都采用字库的方法罗列不宜出现在电视传媒上的词语，让传媒依靠自律，触犯者自当以法论处。然而，语言造成的伤害就和品位问题一样，可以是件非常主观的事，没有人有能力去为它做个最终的客观评断。故此又该有某种评审委员会的机制，在专业人士与学者之外，还要集合各种阶层与界别的代表，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样本，代表主流共识，去为我们定出一份字库，告诉媒体有哪些字眼是当前社会主流所不能接受的。可是语言流变不拘，很多曾经污秽不堪的字词经过岁月的变迁早成了大众日用的语言，例如“吊儿郎当”和“王八”。所以这份字库又要定时重检，这个评审团又得定期重审，与时俱进剔出过时的东西再加入新生的说法。

以上所言虽然局限在语言尺度方面，但其原则也适用于整个传媒的法律管理之上。它不外乎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制传媒，比如说“造成坏影响”和“品位低俗”，而该以尊重主流国民的感受和尊严为大前提。在具体操作上，它不该信任少数官方精英的能力和品位，而要用一种机制去尽量体现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如果大家能够把最近有关媒体的新闻转化为开拓未来的理性讨论，坏事说不定就能变成好事了。

原题为“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制传媒”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3月18日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我不是记者，也从未在任何新闻媒体担任过正式的编采工作，我只是一个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人；但是每逢9月1日（香港和台湾的记者节）和11月8日（内地的记者节），我都觉得这也是属于我的节日。因为我很希望把自己也列入记者的行列，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行列；它应该是的，它本来是的。

2007年10月15日到22日，香港浸会大学办了一个“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工作坊”，请来几位普利策奖得主与学生交流。其中一位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记者方凤美，她刚凭在《华尔街日报》上一系列谈北京奥运的报道得到了本年度的“国际报道奖”。她那些文章谈到了不少“负面”问题，例如环境的污染与赶建场馆却收不到工资的民工。于是

有些内地学生就提出疑问了：身具华人血统，你会不会尴尬？更直接点就干脆问她如此在外揭露中国的阴暗面，怕不怕破坏中国形象。

假如方凤美不是华人，大概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还好方凤美只是马亚西亚华人，如果她生在中国，而且仍然持有中国护照，说不定这些问题还会变得更尖锐更锋利。因为我们通常假设记者心中不可没有祖国，她的调查她的报道都不应该损及国家的利益。可是什么叫做国家的利益？谁又有权去界定一篇报道何时才算有损国家的利益呢？

当代最伟大的记者之一，阿米拉·哈丝（Amira Hass），是以色列《国土报》的专栏作家，长年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巴勒斯坦地区，报道当地人的生活面貌。她是个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但她却和加沙的计程车司机与伊斯兰教领袖交朋友。她是以色列人，平常身处约旦河西岸等地简直是深入龙潭，不只要小心游击队“误伤”自己，更要躲避以军无区别的枪弹攻击。她是以色列国民，但当今世上没有几个比她对以色列更不客气。她喜欢拿以色列和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期的南非相比，指控以色列政府压迫甚至屠杀巴勒斯坦人。很多以色列人因此视她为叛徒，称她做“卡波”（Kapo，集中营里协助纳粹的“犹奸”）。以国法庭更曾判她罚款六万美金，罪名是“诋毁以色列殖民”。最最糟糕的，是她竟然还用英文写书，把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以色列带给他们的伤害公之于世。

正是阿米拉·哈丝这种人使我感到记者的尊严与光荣。她是一位真正的“无国界记者”，在普世的人道价值和政府与同胞的欢迎之间，她选择了前者。然而，她又是一位最爱国的记者，因为她不能忍受自己的国家犯错，不能忍受自己的祖国在军事和经济上是巨人但在道德上却是个侏儒。看着自己的政府和国民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于是奋起孤笔一士谔谔，欲挽狂澜于既倒，这岂不就是新闻人的良知吗？

一个记者报道或许一时无法见容于当权者，但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就一定更聪明更了解什么是国民应该知道的事、什么是对国民最有利的东西吗？任何政府都想叫人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任何记者都应该怀疑。

约翰·皮尔格是我最敬佩的调查记者，数十年来，他走遍世界各个阴暗角落，用同情的眼光注视被遗忘的人群，专门揭出令大国权贵尴尬的事实，英语世界那些右倾的媒体无不视之为拒绝往来户，跨国财团的首脑与白宫里的鹰派则把他当作必须消声的噪音。同为澳洲媒体人，他的老乡默多克坐拥亿万财富，把买回来的报刊电视全部变成喉舌工具，异口同声地为美军入侵伊拉克鸣锣开道，说萨达姆藏有大杀伤力武器。皮尔格孤身一人手无恒产，却办起了独立新闻和评论网站“Znet”，连结世界各地的进步人士，成为伊战期间最受注目的反战言论基地，拆穿无数谎言。

外国的月亮未必特别圆，我们中国也曾出过一代又一代不畏权贵执著真相的好记者，政府还鼓励舆论监督，以收广开言路之效。但是经过长期的环境扭曲，有些新闻人已经忘记了令他们骄傲的根本价值了。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不得舒展心愿，大家可以同

情可以理解；但是自己心态不正，在没有太大的压力下主动迎合奉承，那就实在对不起记者和新闻人的名分了。

我曾目睹一些人号称是做调查报道，却在受访地处处接受该地方官方单位和企业的招待指引，不但不因此焦躁，反而为自己的贵宾级待遇感到庆幸。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原题为“新闻人的良知”

《南方周末》

2007年11月23日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德籍犹太裔维克多·克伦贝勒（Victor Klemperer）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提出了一个相当经典的问题：“什么是希特勒最有力的宣传工具？是他和戈培尔的个别演讲吗？”与当时大部分人的想法不同，早在该书出版的1947年之前，克伦贝勒就极度清醒地发现了纳粹的秘密：“不，最有力的影响不是来自个别的讲辞或文章、宣传单张、海报与旗帜；这种影响力不是透过那些必得清醒地、有意识地吸收的东西而达致。”“相反地，纳粹主义之所以能渗进人民的血肉，靠的是一些单词、词组和语句的结构，靠着广泛、机械而又不自觉地重复使用它们达到百万次以上。”其实克伦贝勒的发现不只适用于纳粹德国，而且还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一切社会的通性。

政治语言的力量何其强大；当它不再只是官方成套使用的术语，还是每一个人虽然都觉得它是陈腔滥调，却又毫不在意地以之沟通的时候，它的效果就能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了。

克伦贝勒增补了席勒美学的名言“被教化的语言能为你写作和思考”，他进一步指出：“语言不只是简单地为我写作和思考，它还逐渐宰制了我的感觉，我整个人的精神存在，使我毫无疑问毫不自觉地把自已放弃给它。”

例如“宣传”，它本来是中性的，只不过在我们的语用习惯里，“宣传”多半和好事拉上了关系。虽然也有“负面宣传”的说法，但究竟比较罕见；平常一说“宣传”，就总是意味着有些很正确很伟大的东西，不能不让大伙知道。

“宣传”的反面大概就是“炒作”了。一个人要是肆无忌惮地公开胡言，引人注目，我们会怀疑他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成名。想出名不是坏事，但太想出名就有点不正常了，

所以我们不齿地说他的举动是“炒作”。“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海外媒体人捉着中国丁点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不放，还惹得其他同行纷纷跟进，这就更是“炒作”了。因为我们可以断定那很“不可告人”的用心其实就是“反华”。

技术上讲，“宣传”和“炒作”几乎没有分别，都是有企图有计划地把一个讯息从一个小圈子扩大开去，四散传播。但由于炒作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从来不会说总是正确的政府在“炒作”什么；相反地，“炒作”二字一出，那些被指控的炒作者必定就是心怀不轨的可疑分子。

“宣传”与“炒作”之分别存乎一心，端看那条要被推广的信息正面与否。但在长久的使用传统之下，于稳固的意义联系之中，我们再也不用先去判断某段讯息本身是否正面，只要搬出“宣传”，那被宣传的东西就是正面的了；相反地，如果看到“炒作”二字，那被炒作的东西也自然就是负面，毋庸再说。

举个浅近的例子。三鹿集团曾经在发现产品含有三聚氰胺之后，向政府提出报告，“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炒作此事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段话翻译成：“请政府好好管一管媒体，别让我们的问题曝光，别让我们挨骂；最好能让我们静悄悄地把产品弄回来。万一媒体广泛报道了问题产品的事，社会大众以后就不再相信我们公司，那可就惨了。”为什么一家企业如此可鄙的意图，竟能用上这么义正词严的修辞去包装呢？也许他们以为只要使出了“协调”、“良好环境”、“炒作”和“负面影响”等一系列官方熟悉的术语，他们和政府就有了彼此沟通甚至相互认同的基础。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在媒体环境中耳濡目染，应该都能自如地说出这类冠冕堂皇的大话，而且都以为这些言辞能够把自己和政府的正面立场绑在一起。因为这一连串词语都有价值定向的明确效果，特别是“炒作”。

一般而言，媒体是很喜欢“炒作”的。它们有如亚马孙河里的食人鱼，一闻血腥，立即空群而出。问题是用“炒作”去形容大众传媒的这种特性并不恰当，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别有居心的刻意图谋，而是市场倾向主导的结果。为什么大家一窝蜂地报道问题食品？那是因为读者关心。反过来说，假如某个不太重要的官员在某个不太重要的场合做了“重要讲话”，就算媒体很善意地去配合炒作，恐怕也炒不起来，因为打呵欠的受众对此不感兴趣。也就是说，真正在推动炸作的不是什么媒体，而是整个社会的民情。

有些人总是用“宣传”的模型来理解“炒作”，似乎一切备受关注的议题都是少部分人努力推广积极散播的结果，仿佛除了政府之外，媒界背后还有一个地下宣传部，老是想弄些坏消息出来，搞乱“大局”。可是包括相关部门在内的所有人其实都明白，从北到南，自西往东，全中国这么多这么杂的传媒，根本就不可能有一个威力庞大的小组织可以策动大家一起讨论某件事。

虽然用“炒作”去形容传媒的集体关注并不准确，因为它完全建立在“宣传”概念

的反面，以传统官方的模式去理解现代的大众传播。但它仍然有用，理由是它带有负面的价值联想，能够很笼统很含糊地定性不利于自己的情势。就像三鹿集团那段报告一样，把所有自己不愿看到的新闻都说成是“炒作”，好让政府和他们站在一起去对抗那些看不见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分子。虽然，那“一小撮人”其实是全部的消费者。

原题为“什么叫做‘炒作’”

发于“牛博网”

2008年10月13日

诽谤：为什么政府控告传媒不是一个好主意

现代法学里面有一门有趣的学科，叫做“微观法学”，专门研究那些在任何成文法例之外，最微细最日常的人类互动行为。例如排队，一般而言是没有什么法律专规管大家一定要排队上车排队买票的；但是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头，仿佛人人都晓得排队的规则，甚至还知道例外情况下最恰当的应对之道（比方说中途来了一个行动不便的人，队伍会自动让他插入）。法律以外，尚有一个广大的世界，看似无法可依，却有无数不需明言的隐形法规支撑，此乃社会运作的基石，文明之所以为文明的本质。

辽宁省西丰县公安局最近派人到北京《法人》杂志社捉拿记者朱文娜的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愤怒。只因为这位记者写了一篇谈及西丰县县委书记“负面消息”的报道，西丰县居然就按“诽谤罪”的名义拘传她。大家首先注意到的是《法人》乃中央政法委所属的《法制日报》旗下刊物，区区一个“地方官”竟敢派员入京捉人，岂非“以下犯上”？更有法治精神的论者则依照国家法律，指出诽谤罪乃自诉案件，而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一方面承认自己没有亲自提诉，另一方面其下属公安局却出动公权力拿人，分明就是非法行动，知法犯法。

我想在这个基础上提一个假想的问题：如果张志国依法提出起诉，按正常程序去检控朱文娜的话，那又如何呢？假如西丰县公安的拘捕行动完全合法，大家的不平与愤怒是否又会因此消减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想法，起码我自己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一位掌握政治资源和权力的官员受到媒体的监督是应有之义。如果他不满意媒体的报道，觉得舆论对他不够公正，他最该有的反应不是诉讼法律，而是像其他人一样依循公共空间的游戏规则，或者写信去报刊，或者召开记者会，在媒体上平等地回应质疑批评。这种做法不是法律规定的，却是现代人都明白的隐形法规，每一位政治人物都该尊重公共空间的往来方式，尊重传媒的相对独立与自主。

其实这也是最聪明的做法，因为读者并不愚蠢，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资讯，给他们多方

面的观点,他们自己会下判断明是非。张志国书记和西丰县的相关官员先是拒绝朱文娜的采访,平白丧失在媒体上替自己辩护的机会。等到报道出来了,又不在《法人》和其他媒体上回应澄清,反而直接动用法律和公权的武器,这岂不是在公共空间不战而败?在广大受众面前默默认错?放弃了还自己清白的良机(假如他是清白的话)?

所以在香港,台湾乃至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政治人物都不会轻易对传媒兴讼,因为他们晓得这不只不合现代社会的规则常识而且非常不智。假如所有的政客官员都动辄告人诽谤,恐怕全世界的记者和媒体早就给人告个遍了。当然,例外也是有的,比方新加坡,当局每逢大选就告对手诽谤,于是反对派选都不用选就先输在法庭上了。所以没有多少人会拿新加坡的“民主”当真。问题是我们想学新加坡吗?

依法治国固然好,文明地依法治国更好。

原题为“依法治国之外”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年01月16日

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

只要逛一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任何人都能发现如今的中国出版界和二十年前真是大不相同了。从前的翻译书籍不只在种类和数量上无法和今天相比,而且yhbq还常在序言里煞有介事地声明一番,说“本书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人的观点,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地检讨”云云。而现在的翻译书多半已经可以直接跳过这层八股虚文,直接以素颜和读者见面了。对着琳琅满目的译书,你真的很容易生起一种感觉:“中国真的和世界接轨了。”但,这是真的吗?

今年年初,英国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非常轰动的书,作者是个土生土长的英籍印裔穆斯林。他就是那种近年震撼欧美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典型,明明在英国长大,与同龄的孩子一样唱英国的流行歌曲,受英国的正规教育;偏偏在青年时期突然转向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满脑子仇恨西方的思想,甚至还做好了执行自杀袭击的准备。这位作者特别的地方是他后来突然痛悟,脱离同伴,回到校园攻读博士,这本书就是他前半生的自传了。此书一出,书评界莫不称善,因为以前还没有人试过从第一身的角度去谈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路历程。

令我惊讶的是,不少内地出版界的资深编辑和大佬似乎都没听过这本书,而当我问他们会不会代理它的中文版权时,答案则是“这要看中国读者的反应了。这种题材,大家多半不感兴趣”。事实上,自从“9·11”发生之后,与伊斯兰题材有关的书籍一直就是全球各地畅销书榜上的常客,其中不乏立论中肯观点独到的好书,但被译成中文的却

是凤毛麟角。理由真的就是中国读者不感兴趣吗？还是怕这些书太过敏感，出现了之后会影响“社会的和谐”，“民族间的关系”呢？

我并不认为别的地方流行什么书，中国也就一定要赶着把它们译出来。但是，畅销书的确有指标的作用，它可以反映其他地区的人正在关心什么，正在渴望什么，看到这些书，就意味着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情趋向；理解其他人，我们懂得怎么和他们打交道，形成一个更完备的世界观。

如果这个例子太不平常，我们还可以看看“维基百科”和“Youtube”这两个热门网站在中国的处境，大家都知道，要在中国境内顺利登录这两个网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外国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自由自在地从“维基百科”里找材料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却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性的平台，这里头的资讯差距岂不是大得太离谱了吗？

没错，人家有“维基”，我们有“百度”；人家有“Youtube”，我们还有无数的视频网络。凡是外国有什么，我们就能炮制出一个针对中国市场很有中国特色的模本和翻版。可是，在中国独家提供的资讯选择之外，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去直接接触别人的声音、别人的世界吗？

这种中国特色的资讯不对称不只使得我们很难和全世界做“同一个梦”，而且还会损及我们在知识经济上和其他人竞争的本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人家要知道我们很容易，我们对人家的认识却总是慢了半拍，缺了一角。

原题为“中国式的信息不对称”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7年09月03日

下编：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我很难不想起小时候在台湾生活的经验。当年国民党实施报禁，不只没有几份报纸，而且每份张数极其有限。仅管如此，那些报章却极有国际视野，常见论者畅谈天下大事，说得头头是道，煞是好看；相反地，自己家里的东西，大家却写得吞吞吐吐，四平八稳。后来我才明白，那实在是因为岛内的事情不太好说，于是才被迫出了一堆国际问题专家。

政治激进派的豪赌

如果说爱好和平是人类的天性,那么为什么又总是激进派主导了局势的发展呢?每当鹰派遇上鸽派,被吃掉的往往都是鸽派。一个国家的强硬派碰上另一个国家的强硬派,结局就是不断循环和繁殖的暴戾与悲伤。

温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进路线

来自 50 个国家和组织的代表专程奔赴美国马里兰州的安纳波里斯市开会,但他们这一趟注定是要白跑了,因为这场会议的目标是中东和平(一种几乎不可能达成的目标),主角是宣称自己很有决心要缔造和平的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每一任以色列总理都说过这种话),以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一个实际上只能控制半块巴勒斯坦的领袖)。

为什么这个备受瞩目的会议注定要失败呢?因为主办国美国没有邀请哈马斯参加,而哈马斯领导人哈尼耶已经表明:“这场和会达成的任何协议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来说没有任何约束力。”不幸的是,哈马斯控制了整个加沙地带。

为什么这个会议要把哈马斯排除在外呢?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都认为哈马斯是个极端的恐怖主义组织,就像过去的法塔赫一样。所以当哈马斯在 06 年赢得巴勒斯坦议会大选,并且组成政府之后,美英这些“民主国家”都拒绝接受这个巴勒斯坦人民民主选择的结果。他们不只和以色列联手实施更严酷的经济制裁与禁运措施,甚至还提供武器给阿巴斯所属的法塔赫,协助他们去和哈马斯打一场两败俱伤的内战。

为什么巴勒斯坦人民要支持态度强硬,不承认以色列有权立国,“专搞恐怖袭击”的哈马斯呢?难道他们不喜欢和平的来临吗?除了因为过去的法塔赫政府贪腐无能,而哈马斯则广设医院与学校惠及百姓之外,最重要的是因为法塔赫已经被许多人看成是叛徒了。自从被誉为是划时代的“奥斯陆协定”签署之后,十多年来,每一张以巴和平路线图都成了巴勒斯坦真正独立建国的路障,每一次和平的停火协议都是新一轮暴力冲突的预告。在把巴勒斯坦切割成以色列境内互不相连的小岛的“奥斯陆协定”里面,法塔赫是丧权辱国的签署者;在以色列每一次暴力攻击之后呼吁巴勒斯坦人不要报复的,都是日趋软弱(有人说是“务实”)的法塔赫。

2001 年 7 月,以色列暗杀了两名哈马斯领袖,终结了短短两个月的停火协定。2002 年 7 月,以色列在法塔赫正要与它签下新一轮停火声明之前的几个小时,空袭一座加沙地带的公寓大楼,杀死了 11 名儿童。几乎所有哈马斯策划的自杀式恐怖袭击都是为了报复以色列主动挑起的战端,而法塔赫则负责去维持那些沦为一纸具文的和平协议。巴勒斯坦人如何能不支持哈马斯?又如何能不更加鄙视投降的法塔赫?

如今,甚至连哈马斯也有投降的嫌疑了,因为它放弃了坚持作战的立场,跑去参加

美国和法塔赫主推的选举，走一条温和妥协的道路。

孰料美国输打赢要，竟然拒绝承认愿意放下身段的哈马斯。在哈马斯协助以色列殖民离开加沙地带之后，换来的是以色列对这个地区更严密的封锁。于是，一些更激进的小股力量出现了，他们认为哈马斯正在步法塔赫的后尘，以妥协换来更大的伤害和侮辱。

在哈马斯仍然可以影响激进力量，仍然控制半个巴勒斯坦，仍然得到大部分人民支持的今天，安纳波里斯会谈却对它关上大门，它怎么会是一次有前途的和平会议呢？

原题为“更多和平还是更多侮辱”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12月02日

激进政治的自我繁殖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过去的100年：在这100年里，战争不得针对平民首度成为全球各国的共识；但它同时却也是人类史上平民死伤最多的100年。

20世纪以来，战祸接连不断，使得研究战争是否合情合理的各种“正义战争”理论也空前发达。然而不论何家何派，无一赞成可以把平民当做攻击目标，其实这只是重申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滥杀无辜是有罪的。且以伦理学大师罗尔斯晚年力作《万民法》里的一段话为例：“既然法外国家并非良好国家，社会当中的非军事成员就不可能是组织和发动战争的人。那是领导者、官员以及其他操控国家或是受国家雇用的精英们一起干下的好事。他们是罪魁祸首，是他们执意发动战争，他们才是罪犯。老百姓通常只是被蒙在鼓里或是被国家的宣传所蛊惑，是不必负责的。即使有些民众没有那么无知，也非常好战，但老百姓还是无须负责。不管战争爆发的原因为何。”

离开理论，我们再来看现实。为什么以色列军队可以公然违反国际惯例，肆无忌惮地杀害平民？除了误炸，他们还有更好的理由吗？

又为什么美国仍然可以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坐视惨剧持续发生，而且阻止任何立即停火的要求？

其实以色列一直都奉行“集体处罚”的策略，也就是说在其眼中，敌人并无平民与武装人员之分，要打击就得一起打击。因为那些平民不只主动协助甚至窝藏武装分子，甚至还会随时变身为后者的生力军。所以无差别的轰炸或许可以使他们乖一点，知道和恐怖分子搞在一块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集体处罚”其实是种连坐法，逼迫所谓的“平民”必须和恐怖分子划清界限。

这种目中没有平民的心态不只表现在许多以色列和美国主流传媒的报道之中（例如

当以色列受到袭击时，他们很强调那是“平民”；但遇上加沙地带有人伤亡，那就是很笼统的一句“有巴勒斯坦人遇难”了)；即使是很进步的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平常在计算以巴冲突为双方带来的死亡人数时，也是把以色列军人与平民分开点算，再将巴勒斯坦人不予分类地并陈罗列。

反过来看，在真主党和哈马斯的眼中，以色列人同样没有军民之分。他们的理论是以色列的青年不论男女一律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退伍之后还要担任后备军人，随时应召上阵。既然如此，以色列自然是全民皆兵，又哪有强分军民的必要呢？因此明明针对的是以色列鹰派，还是可以向他的全体国民无区别地施以打击。

中东战争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双方都公然奉行一种违背了现代战争观念的策略和理论，只有滥杀，没有无辜。然而这又是何等诡异的逻辑呢？我们当然知道军人与平民的区分往往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大家承认，但真能做到的却寥寥无几。可是大家仍在表面上维持这个虚假的共识是有理由的。再引罗尔斯的话：“任何让敌方人民心怀恐惧或胡思乱想，以为将来会遭到仇恨和报复的做法，都必须禁止。尽管不容易做到，但当前的敌人还是必须被看成是将来在共享且正义的和平中一同合作的伙伴。”也就是说，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的目的依然是长远的和平。如果不加区分地滥杀平民，对方的平民将来又如何可能与你维持和平的局面呢？

以色列声称自己的目标只是铲除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势力，而美国国务卿赖斯提出的“可持续的停火”也意在彻底消灭真主党这个国中有国、自有武力的黎巴嫩党派。但是经过“雪松革命”之后，真主党已成黎巴嫩政坛不可分割的一股力量，且享有四成国民的支持。

经过近日的战争，无数平民家破人亡的苦难，黎巴嫩甚至开始出现不分党派不分宗教的团结情绪。以色列如何可能永久保障一个平静的边界？美国所谓的“可持续的停火”又怎么实现？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不不断扩展的仇恨，永远轮回的暴力，一场不以和平为目的之战争。

或许这才是以色列长久以来在中东军事行动的本质，也是当代所谓“反恐战争”的最大特点。首先指认对手并非国家，而是恐怖组织(例如真主党、哈马斯和阿尔盖达)，然后和他们打的也就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了。因此这场仗既没有战俘的概念，抓回来的人可以让美国送到“法外之地”关塔那摩湾基地；也没有“非武装国民”和军人的区分，因为他们根本不成国家，不受任何国内法对身份的规定和国际法的保障。所以杀害真主党隐性的支持者就不算杀害无辜平民了，像夏图那一家人，他们只是脱离了正常国法的赤裸生命罢了。我们或许可以把法学家卡尔·施密特的名言“政治就是划分敌我”改写成“战争就是划分敌我”。在这场战争里面，双方并不是先决定好敌人，再予以攻击消灭；而是不断地透过战争去持续地制造敌人，将对方的平民动员为自己的新仇。最终得到的，就是一组永恒运作的战争机器。就像平常以军对付巴勒斯坦的方法一样，先

是炸掉对方的基础设施，再将前来抵抗自卫的武装人员定性为“恐怖分子袭击”，于是仗就可以永远打下去了。

原题为“只有滥杀，没有无辜”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8月08日

战争不能取代建设

加拿大政府一个高层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Staff of the Privy Council Office)在上个月针对阿富汗情势提出警告：“阿富汗已经变成两个国家了”。它指的是阿富汗政府实际控制的范围只剩下以首都喀布尔为主的北方领土，而南面则已渐次陷入塔利班之手了。最近的韩国人质事件等于向全球证明了这个说法，而且还顺便知会大家，这个南方的阿富汗还在不断扩大，慢慢逼近喀布尔。

在伊拉克恐怖袭击新闻都已经叫人厌倦的今天，听到阿富汗塔利班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消息，很难不令人怀疑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是否已全盘失败？何以美国当年的头号大敌今天可以变得这么嚣张？这几年来的阿富汗重建工程究竟又出了什么问题？

仔细分析今天的塔利班，我们就会发现它相当年轻化，成员中不乏十多岁的小伙子，他们绝对不是当年被联军击溃的那帮人，而是2001年美军入侵之后才被招募进组织里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意识形态极端保守，禁绝娱乐的塔利班呢？除了阿富汗当年赖以击退入侵苏军的强悍战士传统，美军自己的策略要负上绝大部分的责任。

首先，我们知道美军的地面部队在长期征战中已经陷入了神经紧张的敏感状态，不时传出敌友不分的滥杀消息。更可怕的是他们的频密空袭，这些轰炸造成的平民死伤甚至到了一个连欧洲盟国都深感不满的地步。无论是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是北约组织发言人，近日都曾公开批评美军既不节制又不精确的空袭为联军工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果。原来标榜极端伊斯兰思想的塔利班这时反而可以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动员受害的无辜平民。

更现实的问题或许出在鸦片身上。我们知道，目前全球九成的鸦片都来自阿富汗；而塔利班在正式执政的时期就很依赖鸦片贸易的收入。鼓励农民种植鸦片，使得鸦片的种植、生产和运输成了塔利班组织的重要命脉。无论是为了切断塔利班和其他军阀的财源，还是为了打击美国深恶痛绝的毒品问题，美国都要好好对付鸦片。于是美国政府把当年用在中南美洲“反毒战争”身上的那套手法照搬到阿富汗，不只逼迫农民停种鸦片，还用空袭轰炸的方式毁灭连山遍野的罂粟。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策略的根本失误，那就是以打击塔利班的微观战术思考取代了重建阿富汗的宏观战略考量。当你焚毁了无数农民赖以维生的罂粟，却又不能提供其他更佳生计的时候，你叫那些农民该往何处去呢？有那么多阿富汗百姓靠种植鸦片过日子，你不但不把资源重点地投放在经济转型之上，反而急速摧毁他们的生活来源，这不是变相地在帮助塔利班召唤支持者吗？

其实早有很多研究机构指出，阿富汗的问题不在表面的反恐，而在深层的重建；就算一时提供不了鸦片种植的替代方案，也应该想办法从农民手中收购鸦片，使之从毒品转向药物的用途。可惜被战争冲昏头脑的美国鹰派政府对此置若罔闻。阿富汗沦落到今天这个局面，责任属谁，岂不是一目了然？

原题为“阿富汗的沦陷或许在于鸦片”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7月29日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其实科索沃不是第一次独立了。早在1989年，当时的塞尔维亚领袖米洛舍维奇宣布取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以只占人口总数10%的塞族人去统治这片土地上绝大部分的阿尔巴尼亚人时；科索沃的反对力量就曾自行宣布独立，成立了平行政府，甚至还建立了包括学校在内的一整套平衡社会体制。请注意，这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的杯葛运动，他们只是不愿和充满民族压迫情绪的米洛舍维奇合作。有人甚至形容，这是甘地以来规模最浩大的一场和平抵抗运动。

如今凛然大义地支持科索沃独立的几个国家在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坐视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看着他大肆捕捉异见分子，看着他镇压示威、虐囚甚至未经审讯地处决犯人。他们吝啬到了连外交手段都不大愿意给出的地步。其实这次“独立”和平运动的本来目的不是独立，它的领袖只想回到原来自治状态。不过，它到底是失败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激进的“科索沃解放军”（KLA），以恐怖袭击和极端的口号为手段，争取货真价实的彻底独立。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很清楚了，双方最激进的头脑碰在一起，终于演变成两个民族彼此仇杀战争。直到这一刻，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才开始介入，而且不顾“科索沃解放军”自己的残暴行动，单方面地挑了塞尔维亚做对手，打垮了米洛舍维奇，扶起了“科索沃解放军”。

而手沾鲜血的“科索沃解放军”领袖正是最近一轮独立运动的主导人物。那么十年前的温和派在哪里？他们早已不成气候，其中有不少人死在身为同族的“科索沃解放军”

枪下。

至于塞尔维亚，可别忘了它后来的政府正是北约诸国眼中的温和派，当年以群众民主运动赶了米洛舍维奇下台。对于科索沃，他们的要求不多，只想它以高度自治的形式保留在联邦之内。可惜回头路已断，这时的科索沃不只要独立，甚至还以各种方法骚扰沦为少数的塞尔维亚裔居民，迫走其中近半人口。

接下来，右翼民族主义的“塞尔维亚激进党”果然在大选中赢得较多议席。可以预见，北约和美国越是支持科索沃，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就会越得势，为未来埋下了定时炸弹。这是政治上典型的激进派主导大局的悲剧，你硬我更硬，最后使得一切呼吁和平的理性力量都变成了微弱少数(如不是叛徒的话)，渐渐蒸发。

所有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会同意，“民族”这个东西的最大谜题，就是在于每一个民族都宣称自己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偏偏从历史上仔细去看的话，每一个民族实际出现的历史却又是成不成比例地短。

就以科索沃问题涉及到的两个民族来看吧，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宣称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很独特，足以区分彼此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仿佛自古以来他们就是两种人，只不过在过去的时间里出了些错误，所以他们才很无奈地被迫混居同一块地方。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之一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所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同一个民族应该统一，而一个较大区域里的某个少数民族就该独立建国。这些民族早在统一或者独立这些政治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过去一直被压迫被蒙蔽，当他们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后，他们就要建立国家，实现自己的天命。

可是，这种几近常识的说法其实只是个神话。在所谓的“民族意识”觉醒之前，根本就没有什么民族的存在。例如在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巴尔干半岛的时候，如今所知的各族原本就混居得相当好，对大部分农民来讲，什么“塞尔维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果不是完全陌生的名词，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概念。当年唯一足以区分帝国臣民的概念是宗教，人们只知基督徒与穆斯林的不同。

这么说不是否定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存在，而是说它们不构成政治上有意义的区别。建立在文化与语言差异上的族群概念不是自然天生的，或者用英国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说法，它们不是“先在”(primordial)的。既然如此，今天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这些前南斯拉夫国民，为什么突然会如此热切地拥抱民族概念，为了本来不太重要的语言及文化的差异拼个你死我活呢？捷克历史学家赫洛奇(Miroslav Hroch)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他说上个世纪90年代后的巴尔干民族主义复兴运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很像。这个著名的“欧洲火药库”原来分属奥匈、俄罗斯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辖下，当时各个老帝国的原有体制分崩离析，很多城市精英感到自己熟悉的政治与生活环境完全变了样，前路茫茫。正好民族主义思潮从外涌入，于是他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语言文化是个可以拥抱的东西，所以就生起了民族意识，

纷纷争取建立自己的国家。

二次大战之后的南斯拉夫是个共产党政权，建立在各民族“共和”统治的基础之上，它不只巩固了几十年前突然出现的民族身份，甚至为了方便统治而“发明”了几个新民族。但是等到柏林围墙倒下，南斯拉夫等政权——垮台，老局面又复活了。对许多适应不了剧变的人来讲，比起民主、自由这些外来的抽象观念，语言和文化乃至血统要来得扎实多了。所以一度被压抑了民族身份的各个族群再度奋起，要不是想在自己的土地上当各族的老大，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外族居住的纯净国家。

顿然迷失于礼崩乐坏之世的人民不顾一切追求稳定的认同，加上激进派政客夺取权力的野心推波助澜，就酿成了我们现在在科索沃看见的乱象，多么吊诡又多么可悲。更令人忧心的是，政治激进派与虚妄的族群意识造成的悲剧好像不独是巴尔干的专利。

原题为“巴尔干悲剧的教训”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年03月03日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为什么萨达姆·侯赛因在世的时候，潜伏在伊拉克的宗派冲突搞不起来呢？那当然是他强力压制的结果，但这个压制绝不能从其表面观察，就遽下定论说是他以少数逊尼派分子打压了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

虽然萨达姆·侯赛因是逊尼派人，而他的执政社会复兴党也以逊尼派为主；但他的政府从来都不像沙地阿拉伯那样，用一套逊尼派的宗教意识形态治国。侯赛因极力追求的其实是一种现代民族主义。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面，型塑中东政治局势的除了传统宗教冲突断层线之外，就是受到西方影响的民族主义潮流了。从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再到萨达姆·侯赛因，相信的都是一种与宗教派系无关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不论信仰，只要是同一个民族，就应该不分彼此地统一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一个伊拉克人可以是逊尼派，也可以是什叶派，但他在政治上效忠的对象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伊拉克民族建立的这个国家。

所以萨达姆·侯赛因一方面残酷镇压想要分离独立的库尔德人，同时又紧紧控制和伊朗关系密切的什叶派，为的不是让逊尼派独大，而是要达成他民族统一的梦想。在其任内，他大力重建巴比伦王国时期的遗址，宣扬古巴比伦的荣光，这些动作完全没有宗教色彩，就和意大利政府推崇古罗马帝国国威一样，是大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都会干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个时期的伊拉克反而是比较“现代”的，是一个西方国家比较

懂得应付的角色，起码大家的立足点接近。但是当美军收拾了萨达姆·侯赛因，他的政府和整套伊拉克民族主义也就彻底崩溃了，随之冒起的则是缠扰千年，西方世界看不懂也不知如何处理的古老宗派冲突了。

这就是美国如今陷入的泥沼的真相了，想要令什叶派和逊尼派放下成见，和平共处于一个民主政制之下，是一个千年来未曾实现过的大计。如果美国办得到，她才真正是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强权。

原题为“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崩溃”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7年01月10日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朝鲜核试，全球震惊。

虽然缺乏足够数据证明，但一般相信朝鲜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要挨饿过日子。即使如此，朝鲜政府还要发展核武和维持庞大的军力，看来真是不可理喻。其实我们当能理解：对一个内外交困的政府而言，核武器乃是振奋弱者民情，长威风壮志气的尊严工具。

自从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核武器一直就是种象征的和心理上的武器，因为没有人会真正使用它，几乎连想都不敢想。为冷战时代核武恐怖平衡奠下理论基础的谢林(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在《广岛的遗产》一文中析述这个禁忌的生成过程。他指出，美军在韩战陷入危境和法军在奠边府遇困的时候，都分别有人很认真地建议使用核武，可是这些建议都不被采纳。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时代，核武的“非常规武器”地位就更是不可动摇了。东西两大阵营制造出足以毁灭地球数十次的核武，全是为了保存第二次打击对手的威吓力，也没想过要真正应用在战场上。即使是苏军在阿富汗陷进了泥沼，西方的分析家和媒体也没有提过苏联使用核武的可能，因为大家都相信对方明白核武是种只能拥有不得投放的绝对禁忌。因此谢林提出了一个“怪论”：当年美苏双方在欧洲部署了大量的常规兵力，又各自投入巨资扩充军备的举动，其实也是种“限核”行为。发展常规武装，正是为了表明限制非常规核武的决心。万一有一天真的要打仗，我们大家也不能用原子弹，所以最好弄些精良的飞机和战车出来。

在冷战的年代，或者某些地区性的敌对情形下，核武的作用就是要发挥这种威胁的力量，然后在国家对国家的基础上冷静考量彼此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就会达至一个恐怖但是平衡的稳定状态。冷战之所以没有变成热战，就是因为大家都有默契，知道核武是个不可开启的潘多拉盒子，甚至连使用它去炸开运河深挖地道都不行，怕门槛一过，

就再也没有限制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愿意相信对手是正常的理性的，和己方一样，不会随便牺牲自己国民的利益与福祉。

朝鲜的问题在于很多人都不相信它是正常的，不觉得它会遵守国际上的游戏规则，当然包括关于核武的这套规则。围绕核武的禁忌与默契，是过去 60 年来“正常国家”互动的结果；而朝鲜却是一个长期孤立的化外之民，它的政府怎么可能和我们一样理性？由于它的反复，由于它的不合常理，国际社会对它也就束手无策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到底它要的是什么？

朝鲜到底要什么？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却很奇怪地也是最少人去谈的问题。大家更关心如何可以使它让步，如何回到六方会谈中来；是应该彻底中断它的外汇来源，完全经济制裁？还是全部做齐再加上军事恐吓？我们不去探讨朝鲜一直以来的真正意图，却把它当成一个完全无法沟通，不能按常理认知的国家，又会不会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呢？

假设朝鲜是个打不了交道的国家，为求自保，日本可能会加速“国家正常化”的步伐，不只把自卫队升格为军队，甚至发展核武器(其外相麻生太郎早就公开表明有这种可能)。然后就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乃告展开。另一条路就是加强施压的力道，用更广泛的制裁和封锁去对付朝鲜。但这又会不会逼得朝鲜采取极端措施呢？

可见，基于朝鲜不是一个正常国家的假设，无论采取哪一种行动去响应当前的局面，都是有风险而且不可知的。这时候与其盲目地反应，不如回到最基本的课题，把朝鲜当成一个有理性的国家，找出它连串行动的逻辑，找出它的真正目的。

原题为“要把朝鲜视作正常国家”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 年 10 月 17 日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从文化角度去分析时事，不只是简单的，有时候甚至还是危险的。以近日发生的法国暴乱为例，由于它在媒体上常被定位作“种族暴动”或“移民骚乱”，所以大家就会追索下去，看看那些种族是什么种族，那些移民是哪里来的移民。一见是北非移民，有些评论家就想当然地把它变成“伊斯兰极端主义阴影的另一次扩张”。其实只要多看几份报纸多听几个播客，就算身在香港，我们也不难发现骚乱主角之一的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北非阿拉伯人。虽然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北非，但他们是黑人，不只对伊斯兰教没有多少认识，在法国出生的他们往往也只能说法语。

可怕的不只是一些半吊子专家习用了最方便最就手的宗教文化冲突语言，来理解这

场骚动，把它上升到一个玄之又玄的文化层面，很有“深度”地分析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法兰西文化，如何与蔓延全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水火不容；而且竟连法国政府的部分官员也戴着这种眼镜，用对付恐怖主义的心态来面对“敌人”。早前法国治安部门声称这场骚乱“不排除有组织在幕后操控”，就是在暗示这点，他们的证据是“暴徒”们很会利用手机短讯通讯联络。这个判断和今年夏天中国政府某些官员对反日风潮的看法如出一辙，他们都不懂得在这个流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年代，搞一场集体运动并不需要多了不起的地下组织去串连煽动。正如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我们收到的电邮和短讯，难道也是一个幕后黑手在全盘操控的吗？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之流的学者厉害的地方，是有把解释变成预言的本事。当他们用文化冲突论去分析国际形势，而且还受到信任欢迎的时候，结果就会变成真有这么一回事。同理，如果法国真把它的市郊暴动看成“移民暴动”，甚至“有黑手策划的宗教文化冲突”，然后顺着这条思路去解决它的话，它就可能真的被逼成一场移民文化之战了。

回顾这场发起了十多天的骚动，其源头是两个非裔青年在逃避警察追捕时意外死亡。这两个年轻人是第二代北非移民，可说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但他们还是惧怕警察，因为据说警察常常针对“他们这种人”，犹如我们的警员会截查一些口音衣装不像“本地人”的家伙一样。

所以他们在一宗爆窃案现场附近看到警察时转身就跑，不慎碰到电站触电身亡。问题是警察为什么要针对这些年轻人呢？这就得从他们聚居的社区说起了。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法国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又严重欠缺成年男性工人，于是开始从它的北非殖民地输入移民。这些移民工人对工厂老板来说别具好处，因为他们毕竟是外来的新人，人生地不熟，不像传统法国工人阶级那样有加入工会和搞罢工的传统，听话得多。

为了安置这些突然增加的移民人口，法国政府在市郊工厂附近兴建了大量的cites(也就是“公共房屋计划”)，因此形成人工规划的移民社区，这也就是今天法国市郊暴乱的主战场了。直至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巴黎近郊的雷诺车厂还有八成的工人是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

法国主要城市的郊区都有这些移民住宅地带，除了连结市中心的运输系统，它们没有太多的公共设施，就连医院和学校的经费也不足够。数十年下来，这些社区的房子日久失修，更呈一片破败景象，所以它们早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已故法国社会学大师布迪尔(Pierre Bourdieu)曾率领一群研究人员做了一个大规模的质性研究，探讨法国的“社会苦难”(Social Suffering)问题，其中不少受难的案例就是来自这些cites。

经济发展兴旺的时候，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不过当法国经济表现迟缓，右倾政策抬头，原来的移民就会突然面临身分降级，变成了二等公民。布迪尔采访过的一对葡萄牙

移民夫妇，尤其能够说明问题。这对夫妇在 1970 年代来到法国，男的当建筑工人，女的做家务助理(葡萄牙移民亦是法国移民大宗，家庭佣工则是葡裔妇女在法国的热门工种)，二人克勤克俭，每日工作 14 小时。多年之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过着不错的日子。由于丈夫是个很好的足球员，所以公余还在地方上教孩子踢球；而太太因为工作的关系，也结识了一些对他们友善的法国中产家庭。至此为止，一切十分美好。丈夫甚至说：“我听不进半句诋毁法国的话，这是一个团结友爱而且同情穷人的国家。”但是到了 1985 年，太太突然中风，丈夫则因工作断肢，整个经济的表现则日益差劲。更惨的是他们发现新推出的社会政策对他们十分不利，而太太根本不在社会保险的覆盖网下。过去对他们不错的本地人——疏远，没有伸出任何援手。要靠援助度日的这对夫妇开始发现“自己原来还不算法国人”，到处受到白眼。20 年后突然打回原形，成了外来的寄生虫。

这对夫妇的遭遇说明的不是法国文化的虚伪，而是身分问题和阶级问题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很多情况底下，移民的身分本身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当它结合了经济和阶级的变化之后，就会突然成为一个以移民身分标识的问题了。所以法国的市郊暴乱绝不只是“移民骚动”，它还是个错误社会政策和经济转变的结果。当然，文化不是不重要，身分也不是毫无关系，但它们不是单独决定一切的因素。正如今天还有很多香港华人嫌弃南亚裔居民，说他们“身上有阵味”，但有多少会说夏利里拉家族大宅旁“有阵味”呢？

我们看法国的市郊暴乱不能只是带着一种隔岸观火的心态，还要学着回过头来反思自己。香港所谓的“新移民”问题到底有多少成是“移民”的问题呢？内地大城市的外来民工和流动人口愈来愈多，“都是外地人搞砸了北京(或者广州、深圳)”之类的言论也日益猖獗，法国的现况难道不也是中国的警号吗？

原题为“法国的骚乱我们的警号”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7 年 07 月 06 日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前一阵子缅甸的僧侣上街游行，抗议军政府的独裁恶政，有不少人看了之后觉得很疑惑，不明白出家人怎能这么关心世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出家为僧就是要远离俗世，静心修行，政治这等肮脏的事情更是连碰都不该碰。和尚要是扯进政治，那就不够清静了。

这种说法反映了大家对佛教的误会，以为佛教是彻底出世的一种宗教，和尚尼姑最好全部躲在山里，就算在世间弘法也只能教人自救解脱，追寻心灵上的宁和。如果真是

这样，佛教为何还要搞慈善事业，又为何还要办学做教育呢？

再说政治，今天有些僧人当上了政协委员，这算不算是搞政治？中国的佛教在国家宗教局的管理之下，这又是不是和政治沾上了边呢？为什么做政协委员，或者善颂善祷地与高官同场敲钟念佛不是搞政治，而缅甸僧人为了受苦百姓冒雨示威就叫做搞政治呢？

如今我们都爱说佛教是个讲和谐的宗教，最近香港还有一群高僧大德办了一场以“和谐”为主题的大会，与胡锦涛主席主张的“和谐社会”十分配合。而这“和谐”二字在很多人看来也的确就是佛教与政治之关系的恰当描述，比起老是喜欢谈政治甚至发动游行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佛教与政权的关系要好得多了。所以我们总是看到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人拜访佛寺，甚至参加佛像的开光大典，但却从未见过他们去教堂参观。其实佛教和政府的关系也不是自古就和气友好的。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护教者慧远就曾经和东晋的独裁者桓玄展开过一场著名的辩论。慧远主张“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僧侣乃彻底的方外之人，有自己的理想和行为模式，因此不只不该和世俗的权威沾上边，甚至见了皇帝也不用行俗人之大礼。他甚至认为反而是王者要多加尊敬僧人，好好把他们供养起来，因为比起他们带给俗世的好处，王者的区区供养根本算不了什么，正所谓“濡沫之惠复，焉足语哉”。

不过这段维持了数十年的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因为对向来尊重天子权威的中国人来讲，一批不守世俗礼法，不结婚生子因此不孝，不纳税服役因此不忠的家伙实在是不能忍受的。现在你竟然还想见了皇帝不下拜，这岂不是目无王法？所以在世俗王权的淫威底下，佛教要想在中国好好地生存下去，实在不能不屈服。

除了汉传佛教不得不“敬王者”，其实自从推广佛法最力的印度阿育王开始，各地的佛教就都已经逐步找到了自己和政权间潜在的紧张关系的调解办法了。例如武侠小说里头常见的“法王”，它指的绝非什么武功高强的番邦国师，而是以护教传法为己任的国王本人。原始佛教本来没有这种概念，它纯粹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后，为了适应政治现实才发展出来的说法。直到今日中南半岛一带的南传佛教在政治上还是享有很高的地位，泰国和缅甸固然以佛教为国教，尤其前者更有备受礼遇尊贵非常的所谓“僧王”。可是就在这块佛教传统最稳固、政府对佛教最友善的地方，却发展出了一种关怀弱势社群，参与社会运动，甚至不惜抗衡当权者的“左翼佛教”。“左翼佛教”乃“Engaged Buddhism”的汉译，“Engaged Buddhism”一般又被译作“人间佛教”，以强调佛教入世人间的性格。可是在中国佛学界里，“人间佛教”通常指的是由太虚大师开启，当今的星云法师所推动的那种佛教传统。这种“人间佛教”或许会教导生意人修心为善，甚至透过静坐修持来增进自己的工作效率，但通常不会参与太过对抗性的激进活动。所以复旦大学的刘宇光教授主张把南传佛教与欧美流行的那种“Engaged Buddhism”译成“左翼佛教”，好和政治倾向截然不同的“人间佛教”做个区别。

早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从对抗殖民政府开始，南传的“左翼佛教”就已经发展得很兴盛了。著名的越南高僧一行禅师曾经领导过反战和平运动，泰国的素拉·司瓦拉差是坐过牢的反军政府运动领袖，印度的安培德卡尔则是印度贱民解放运动的旗手，这些著名的佛教徒全都走上了一条不与当权者轻易为善，反而站在受压迫者那一方的激进道路。就和我们最近看到的缅甸僧侣一样，他们的表达方式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而且他们采用的方法也和一般社会政治运动不同，他们强调人心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一样重要，要改变社会的不公就不能忘记深藏在人类意识之中的偏见与执著。所以他们虽然也是一种反抗运动，但却是很有特色的反抗运动。

根据刘宇光教授的研究，“左翼佛教”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我们不能再按传统观点，把贪、嗔、痴等三毒单纯地放在个体层面，因此也不能以为个体的解脱就必然能导致集体的解脱。相反地，在现代世界里面，“无明” (delusion) 已经制度化了，成了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举凡市场经济带来的阶级剥削，种族偏见导致的社会隔离甚至屠杀，专制政府的压迫，甚至工业化引起的环境破坏，这都不再是个人修行所能解决的问题，真诚的佛教徒更不能轻忽它们对世间解脱的束缚。故此，好些致力于“左翼佛教”的学者如肯·琼斯(Ken Cones)甚至提出了佛教的社会理论。

缅甸的和尚不一定都拥有一套十分完整的“左翼佛教”的社会理论，而且他们修持的多半是近代南传佛教大师马哈希禅师的内观禅修。

在中国佛教徒眼中，这是典型的小乘佛学；根据由来已久但却很粗糙的简化偏见，只有大乘佛教才会教人普度众生，小乘佛教求的则是个人的涅槃；为什么一群天天静坐寻求智慧的和尚却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众生的名义走上街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理解南传小乘开出了“左翼佛教”的根本原因，绝对不是一两篇小文章可以解答的；但是我们可以例举一点来说明。

所谓“内观”，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对现世涅槃的强调。修习内观，静坐冥想，为的不是“积累功德”，然后摆脱下一辈子的轮回苦业，它的根本目的在于觉悟，并且是此世的觉悟，因此参与政治行动的僧侣都很关注此时此刻的日常生活。他们的禅修不是脱离俗世，而是在世的修行，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们内观的材料和对象。

贪念、愤怒与愚昧都是他们应该在日常修行中去除的障碍。假如这些障碍正是来自政府的作为、政治的结构和社会的体制，那么他们是应该好好地继续清修，还是设法改变现实呢？很明显，“激进”的僧侣走上了后面那条道路。在他们看来，参与社会行动就是一种布施，因为这得耗去个人的精力、时间甚至生命；参与社会行动更是一种修行，因为它是从现实世界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从静态的内观禅法到非暴力的政治游行之间，实在有一以贯之的逻辑。

介绍这些南传“左翼佛教”的故事，目的不是宣扬他们的理念，我只是想指出佛教

的广大多样，绝非一般媒体呈现出来的片面形象所能概括。佛教自然是和平的宗教，但它和政权和不和平，却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我们觉得缅甸僧侣的行径奇怪，是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

原题为“沙门可以不敬王者吗”

刊于《am730》

2007年10月24日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看到如今声势浩大的禁烟热潮，看见政坛诸公为人民健康着想的慈眉善目，我实在不能不想到纳粹德国，也实在不能不想起希特勒。

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最痛恨吸烟的政治领袖是希特勒。所以最急于推行反吸烟运动的也正是纳粹德国。在1930年代末期，纳粹政府先是禁止国民在公众场合与交通工具上吸烟(以当时的标准来说，这算是很严苛的了)，跟着则不许空军成员与孕妇抽烟。到了最后，他们不只征收惩罚性的烟税，还下令严禁柏林市民在户外抽烟。最后这个动作尤其大胆，因为它令人容易联想到1848年的往事，那时柏林曾经发生过一场大革命，推翻了当朝政权，而革命的理由之一竟然是霸道的政府剥夺了市民公开抽烟的自由！

可是希特勒魅力十足，又掌控了全国的传媒和通讯渠道，不单不怕烟民革命，更可以反过来大打禁烟宣传战。纳粹政权最擅长制作海报。其中一款把一根香烟画成食人怪，底下写一行字：“不是你吃它。而是它吃你”；另一款干脆让一只党军铁靴踏碎一个烟民的脑袋。

为什么纳粹党这么反对抽烟呢？主要的原因是希特勒本人痛恨抽烟。希特勒年轻的时候曾在维也纳学艺术，其时文艺圈一片烟雾缭绕，不管是颓废的维也纳画派还是崇尚简约理性的新派设计潮流，莫不人手一烟，可惜我们的阿道夫太过贫穷，抽不起烟。有一回，他好不容易弄到了烟，于是不理学校禁令在校内抽烟，结果给人捉个正着，受了处罚。自此之后，他就彻底弃绝香烟，而且反对人家抽烟。看来，这又是一个自尊心受创的悲惨少年故事。玩不起想要的潮流玩意，偶尔玩一回还要出事，于是因爱成恨，翻脸无情。

不过这种故事当然不能拿出来作为公开禁烟的理由，所以纳粹党必须发动机器，叫智囊和学者研究一些堂皇的说法出来。1939年，弗朗兹·穆勒(Franz Muller)采用日益精致的流行病学首次证明了吸烟和肺癌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肺癌发生几率的增加与吸烟数量的成长有正面的相应联系。这个发现的意义极其重大，不仅是人类史上第一回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吸烟危害健康，更是希特勒要创造优秀雅利安人种的重要助力。现在，第

三帝国的元首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臣民吸烟了，那就是为了整个民族更加完美。

有一种古怪的历史解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结局基本上是帮不健康的人打赢了一个很健康的人。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个人都抽烟；而希特勒不只不吸烟，甚至还吃素。可是如果你说丘吉尔不健康，他肯定不同意。在非洲战场上打赢了“沙漠之狐”隆美尔的蒙哥马利元帅一向和丘吉尔不大对劲，有一次他对丘吉尔说：“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每天睡很多觉，所以我的身体百分百健康。”然后丘吉尔如此回答：“我抽很多烟，喝很多酒，但是睡得极少，所以我的身体百分之二百健康。”

且不要理会这种烟民发明来自慰的高层理论，下到战场，吸烟与否还倒真有影响。当时美军把香烟列为战时必需物品，一般盟军每周可以获取五到七包的香烟，美军拿到的要比这个标准更多。另一方面，德军每天就只能取得可怜兮兮的六根烟了。虽然他们获准每月可以自掏腰包额外购买五十支香烟，但必须同时付出比一般零售价高出90%的特别税。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战争末期物资缺乏，而是因为希特勒主张军人更不应该抽烟，万不得已，也是抽得愈少愈妙。

这种香烟的配给状况对战事有影响吗？有的。想象一下在炮火连天的岁月，士兵们朝不保夕，今天活生生的弟兄们说不定明天就只剩下一堆尸首和兵牌了；这时候告诉他们小心肺癌爱惜健康，岂不是笑话？再说战场上子弹横飞，战壕里血迹与泥污混成一片，战火一起昼夜不分；对许多士兵来讲，唯一可以舒缓神经，让人暂时忘却现实惨况的，恐怕就是手上的一根烟了。此外还不能忽略这根烟是什么牌子的烟，比方说美军获取的就全是“好彩”、“骆驼”等常见的大厂名烟，这让他们在这非常状况底下依然保有与故乡和平岁月的最后联系，恍如家书，提醒他们战后回家的美好生活正在前方等待。

俱往矣，坚决拒烟的希特勒最后死在自己的手枪之下。他一生中最后闻到大概就是枪管喷出的火药味了。至于那些策划反吸烟运动的大将们，也没一个好死。例如纳粹的健康部长，他在狱中自杀；党部书记弗里茨·索克则因为犯下了反人类罪行，于1946年被处死刑。

刊于《快周刊》
2006年12月

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

对很多中国人来讲，美国不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国家，而是一个用来对照和界定我们自己的镜像与坐标。要不是以其仍未完全实现的理念遮蔽了它的阴暗面；就是无限放大它的这一面，然后把它的理想看作纯粹的谎言。于是批评美国就等于批评民主，毫无保留地称美它才算真正拥护普世价值，搞了半天，我们其实是在谈我们自己的事。

右翼版本的美国人

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米雪·巴赫曼在10月17日的一个电视节目中把奥巴马形容成“非美国人”。使得“非美”这个说法声名大噪的，当然是麦卡锡。五十年前他在美国国会设立“非美调查委员会”，以揭发共产党同路人为己任，不只无辜牵连了许多思想左倾同情基层的各方人物，还成功地将“社会主义”和“非美国”划上了等号。虽然麦卡锡版的白色恐怖业已破产，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美国人的头号大敌，可是那种社会主义绝非美国本性的印象却已深深种在他们的意识深层了。因此，麦凯恩最近也才会在逆境中想出了把奥巴马称做“社会主义者”的办法。

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美国选战中，共和党右派一直喜欢拿“真正美国人”的定义来说事，将对手打成“非美国人”或“假美国人”，使选战的主题从实质的政策辩论变成一次捍卫美国甚至定义美国的抉择。早在上世纪60年代，里根就在加州州长选举的拉票活动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抉择的时刻》，试图引导选民把注意力放在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之上，令他们相信对手其实是红色阴影的先头部队。

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邪恶帝国”已是旧日的废墟。

他们现在最怕的是恐怖主义。所以在两个星期之前，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公开指控奥巴马和恐怖分子有关。她说：“这个男人看待美国，不像你我看美国一样，我们的对手认为美国非常不完美，不完美到他要和攻击自己国家的恐怖分子厮混。”他们不只将奥巴马和恐怖分子扯在一起，并且积极操作那种恐怖主义总和伊斯兰有关的偏见，利用他曾在印度尼西亚居住的经历，硬把这位虔诚的基督徒说成是个隐性的穆斯林。这是恐惧政治的老路，他们想努力唤起美国人心中那种虚幻不实但又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种恐惧政治的基础就是美国人的身份问题。麦凯恩选择佩林当副手，除了她的女性身份之外，就是看中她的形象和主张简直就是保守派眼中完美的“美国人”。这种美国人应该是个非常忠诚的新教福音派，相信“创造论”多于演化论。他们很注重家庭价值，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道德错误不是社会的不公正，甚至不是用人唯亲以权谋私，而是堕胎和同性恋。他们赞成个人有拥枪自卫的自由，不屑于任何环保的主张(佩林最有

名的行动之一就是在电视镜头前，乘坐直升机追杀不小心走到阿拉斯加保育区外的麋鹿，而那块麋鹿保育区一向是石油公司的眼中钉。他们很爱国，从不怀疑战争的理由，甚至愿意把亲生儿子送上战场。最后，他们还要视政府为必要之恶，把一切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行为都当成迈向社会主义的踏脚石，至于大公司高层领取的巨额花红与劳工阶层日益萎缩的福利则是经济的自然规律。

在这样的策略布局底下，总统选举选的其实不是什么政策上的分歧，而是你是不是美国人的问题。针对奥巴马提出的种种措施，麦凯恩不去正面响应在富人身上加税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也不去讨论医疗保健政策的改变到底能不能造福一般大众；而是把这些建议全都放进“大政府”的帽子里，再依据右翼的一贯逻辑，从加税和扩大公营业务的规模推导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于是提出这一连串建议的奥巴马就很自然地成了“社会主义者”，一个“非美”的美国人。

虽然这套政治操作手法荒谬得令人发笑；虽然美国在布什政府治下已经走到了内忧外患的地步，这种曾经有用的招数多半不能再奏奇效；可是我们不能忽略它的社会基础其实是多么深广，它激起的恐惧又有多么真实。回头想想，尽管美国大部分传媒都觉得麦凯恩找佩林当伙伴是愚蠢的错误，但若不是她很能代表某些选民心目中的美国人的话，又何必在那么仓促的时间里挑出如此一位政坛新丁呢？纵然像鲍威尔这样的老将也都是为了佩林才终于离弃共和党，但每次她一现身，仍然有那么多人激情地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共和党举办的选举集会里面，甚至已经先后有23次在人们听到奥巴马的名字时喊出“杀了他”的事件。

对这些人来说，“非美”的奥巴马如果真的当上美国总统，那就是美国的末日了。所以，“真正美国人”的争议不单单是右翼的一个竞选手段，还是一个让人看清某种“真正美国人”的机会。

原题为“真正美国人”
发于“香港独立媒体网”
2008年10月29日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自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它就一直高举“气候变化是全球责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拉下水，认为它们也该和发达国家作出相同的减排承诺。于是这就成了刚结束的岩里岛气候变化峰会的主战场了，结果双方僵持不下（“双方”其实就是美国与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最后弄出了一个白马非马，只有时间表但不设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共识”。到底是美国

的讲法有道理，要减排就大伙一起来，还是中印等国家的主张说得通，你们发达国家应该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这是一个“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也就是先假设大气层吸收废气的的能力乃一种有限的资源，然后再去判断怎样分配这项资源才最公平。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大幅减排，着眼的是种分配正义的“历史性原则”。意思是谁过去排放废气最多，消耗大气层的吸收能力这项稀有资源最多，谁就应该先降低自己日后排放的废气。

举个实例，根据一项调查，在 1950 到 1986 年的全世界含碳废气排放总量里面，常时占全球人口 5% 的美国居然就贡献了 30% 的废气。

反观占全球人口 17% 的印度则排放了 2% 的积累废气。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就如同某一村落的 20 个居民全都共用一间浴室，其中一个人所掉落的毛发占了阻塞排水口毛发总数的 30%，而有三个人在使用浴室时几乎完全没掉过任何毛发”。如果要请工人清理这条淤塞的排水管，这费用该如何摊分呢？依据“历史性原则”，那个毛发掉得最多的人就应该按比例交出整笔费用的 30% 了。

虽然《京都议定书》大体上依循了历史性原则，但它对发达国家相当宽容，并没有按照大家过去的排放总量严格要求它们的废气减排量。即使如此，美国还是不愿意，还是退出了温和妥协的《京都议定书》。

美国之所以反对“历史性原则”，不愿意被它过去的废气排放量绑住，其中一个说词是“不知者不罪”。它承认自己的确是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得最多的国家，也不讳言因此得到了莫大的经济利益；可是它认为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暖化的原理只是很近期的发现，在工业化的早年阶段，根本没有人知道石油的燃烧会带来这么多问题。

回到毛发阻塞排水管的例子，这等于是说当初大家在使用洗手间的时候不知道身上掉下来的毛发会塞住下水口，甚至不晓得洗澡原来会洗掉毛发，所以就算有一个人的毛发脱落得特别多，也不能因此要他分担更多的水管修理费。换句话讲，美国主张大家一起向前看，忘记过去那段无知的岁月。因此美国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它一起承担责任，要减排废气就大家都减排，而且目标和数量也得平均摊分。

好吧，就让我们不要追究这种“不知者不罪”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一起着眼现在。既然要“着眼现在”，我们就要引入“分配正义”的“共时性原则”了。办法是把废气排放量按人头平均地分配给全球 60 亿人，每一个人可以排出的温室气体都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不多不少。这应该是最公平的计算方式了吧？不，美国依然反对。

根据《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下的目标，分配给每人每年的排放量正好是 1 吨，理论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该享有比其它国家人民更高的排放量。然而事实却是美国人均年度排放量高达 24 吨！美国有任何理由要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得到更多的大

气层使用权吗？

当然没有。美国官方和部分传媒不断渲染中国空气污染的情况，强调中国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废气排放国，而且很快就要超越美国。可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有 13 亿人口，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1/4（中国人均排放量只有 3.7 吨）。你怎好意思拿 3 亿人去和 13 亿人比较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里面，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都要比美国积极，他都愿意接受一些减排指标。而美国除了要求它们作出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承诺之外，还要事后反悔，质疑得来不易的大会共识，声称减排目标要按各国“国内具体情况”弹性调整。

什么叫做“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昂贵，全地球环境付出重大代价，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轻易改变。具体情况就是美国现政府想要保障其能源产业的重大利益，不想牺牲他们的生财之道。

在上述最明显的道理上说不通，白宫和其支持者就不断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古怪理论来自圆其说，但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事实击倒。

例如其中一套曾经流行的理论就认为我们根本什么都有用不着做，因为建立在电脑和高科技上的“新经济”会渐渐取代以重工业为主的“旧经济”，所以随着经济进步，废气问题会自动消失。但是在“新经济”崛兴的过去 10 年里面，温室气体不只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因为那些常开视频会议的人并没有少搭飞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这个举世第一强国自私的真面目，这个自诩为世界领袖的超级大国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还强词夺理，拖着大家的后腿。它的表现，我们只能用令人作呕去形容。

原题为“不负责任的第一强国”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 年 01 月 02 日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世界上在位最长的国家元首卡斯特罗终于捱不住岁月的催逼，入院让权。这位古巴强人一生勇悍，以意志坚定耐力超凡著称。最能说明他耐力的，大概就是他超长的演讲时间，动辄两小时以上，而且还全程站立，手舞足蹈，丝毫不见疲态。

有一回他甚至对着群众接连演讲了八小时，应该是个世界纪录，只可怜台下的听众未必有他这等本事。

五十多年来，卡斯特的北方大敌美国已经换过九位总统，而这位独裁者/民族英

雄依然屹立不倒。根据古巴官方的说法，美国特工曾策划过六百多次暗杀计划，试图取他性命，其中最搞笑的一次是把炸弹放进他心爱的雪茄里面，好等他点烟时炸粉碎。当然这些计划全都失败了。

为什么美国连越南都可以握手言和，却独独不肯让步于古巴？当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和这个“共产主义的最后岛屿”建立正常经贸关系的今天，何以美国仍然坚持制裁古巴，不待卡斯特罗倒台誓不罢休呢？

注意一下卡斯特罗病倒消息传出之后，美国迈阿密街上那些欢喜若狂的古巴移民。这帮人的人数不算太多，但却是共和民主两党极力争取的“基本盘”，在美国政坛向来享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对卡斯特罗的痛恨和美国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可谓一拍即合。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古巴？又为什么如此仇视卡斯特罗？除去政治理由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

要知道现代古巴曾经历过两场革命，第一场是19世纪末脱离西班牙的独立战争；第二场才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第一场战争与其说是争取独立，倒不如是美国和西班牙争霸战的延伸。当年的美国不只有官员出来公开呼吁古巴加入美国联邦，更以驻军和外贸的形式直接掌控古巴局势。

在整整半个世纪里面，美国驻哈瓦那的大使馆一直是古巴的真正权力中枢，还养出了一批裙带资本主义的掮客买办。所以第二场革命首要针对的固然是当时无能的政府，同时也是要清算那些垄断市场的美商和古巴的既得利益阶层。

卡斯特罗上台，充公不少私有产业，自然就走了一大批从前获利甚丰的“资产阶级”，而且他们走得不远，就在稍北一点的迈阿密。

原题为“谁最痛恨卡斯特罗”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6年08月09日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敌人

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异见分子，让数以万计的人民失踪，让智利全国百姓都要遵守宵禁，在晚上9点前回家的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终于死了。

这位曾经和美国中情局联手推翻南美第一位民选社会主义领袖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大独裁者，虽然一生之中犯下了无数侵犯人权的罪行，虽然镇压过无数的示威集会，虽然强力管制过无数的传媒和社团活动；但是依然被许多人深深怀念，例如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感谢将军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福克兰战役爆发的时候站在英国

那边。

那是冷战时期，对英美等“自由世界”政权而言，凡是左倾必为敌人，他们代表着专制独裁，是人类自由的天敌。由于皮诺切特反对社会主义，所以他一定是自由的朋友。这位自由的朋友却用上了最极端的手段去推广自由。他一方面师承佛利民的主张，力促智利的贸易自由化，让汇率浮动，让国营机构私有化，造成了智利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则采取强行压制的方法，去消除国内一切反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的声音。

尽管这位军人一如拉丁美洲历史上一切继承“高地主义”（Caudillismo，源自19世纪的拉美军人强权传统）的将军，认为代议制民主只是一种腐败的，没有效率的政党游戏，但还是被撒切尔夫人称许为“把真正的民主带给了智利”，只因为他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思维与自己如出一辙。

当时协助皮诺切特处理经济的是一帮芝加哥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佛利民的追随者，人们称之为“芝加哥兄弟”（Chicagoboy）。他们在智利实行的一连串包括大幅度减税在内的经济改革，是拉美最早的新自由主义试验，的确成就了十年左右的盛世，号称“智利奇迹”。

最喜欢拿这个奇迹当例子说明新自由主义成功之道的，就是同样喜爱香港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了。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上世纪90年代拉美金融风暴之后，智利十余年经济实验的恶果也——浮现，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拉大。

当年的“智利奇迹”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蛋头型经济学家坏事的经典案例。很奇怪，在前一阵子弗里德曼逝世时的一片哀悼热潮里，倒是没有几人提起这桩往事。

拉丁美洲90年代初的经济崩溃，直接导致了近年急速左转的局面，同时也开启了许多国家回归民主宪政的道路，例如智利。回首一望，原来过去数十年来，拉丁美洲的军人独裁政权竟然没有几个是真正左翼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自由的朋友”。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但愿皮诺切特是拉丁美洲最后一个“自由的朋友”。

原题为“自由的朋友，皮诺切特死了”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12月16日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奥尔良风灾

我第一次“看见”新奥尔良，是在加州的迪士尼乐园。那里头有条小街，仿造了新奥尔良最有名的法国区街景，充满浓厚的拉丁风味，小酒馆里一首接一首播放路易岩士唐的歌。这就是新奥尔良，这就是大家想像中的新奥尔良；爵士乐的源头，《欲望号街

车》里那人欲横流的烟花地，安·赖斯(Ann Rice) 吸血僵尸系列小说中巫术横行的魔幻世界。为了要保住这股浓厚的异样文化色彩好吸引游客，近 10 年来，新奥尔良正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主题公园，好让它更接近迪士尼乐园版本的法国区。方法之一是把市中心传统的黑人聚居区一一拆除，变成更干净宜人的高尚住宅，原来那些低下阶层居民则被搬到游客看不见的地方。

那些游客看不见的新奥尔良原居民，就是过去一个礼拜以来站在屋顶睡在体育馆地板上，曝光于全世界眼前的灾民。一场五级飓风，这个卡特里娜把本来不该让大家看到的美国彻底揭露了出来。突然间所有人都吓呆了，这就是世界第一强权吗？怎么像个第三世界国家似的。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就习惯把世界各国按其发展程度区分成第一、第二和第三等 3 种等级，另外一种类似的区分方式则是所谓的南北两个世界。在这种习惯底下，我们会觉得美国遇到灾害的表现与其身分极不相称，一个第一世界国家，一个北方世界的代表不该对早就预知的天灾毫无防范，更不该任由身患重病的百姓在飢饿惶恐之中枯等数日之后失救死亡。我们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容器，在一个国家之内，其社会的财富和实力应该均匀散布。而全世界的社会生活水平就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来排序的。所以第一世界的贫民无论如何都该比第三世界的百姓活得好活得强。

但是这等假设早就饱经怀疑，特别是在这个全球化的年代，我们发现有一些人不论国籍为何，可以搭飞机四处自由来去，其资金则流窜全球；还有一些人则不论国籍为何，却只能够负上满身债务，守在自己的出生地一辈子。国家依然可分南北，世界依然可分 3 等，只是在更常见的情况底下，同一个国家就已经包括了三个世界。一个被划作第三世界的非洲国家有人活得就像第一世界国民一样，参与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游戏；一个住在北方国家美国的老百姓，却可以无异于非洲居民，不知加拿大就在美国北方，完全脱离了地球村里那变动不居的主流。

卡特里娜是第一场把这种理论学说活生生地展现出来的天灾，它让大家看到南方原来不一定在赤道以南，南方可以就是美国的南方。说新奥尔良的灾情恍若南方国家第三世界，不只是其政府危机管理的水平，还是它在灾难中体现出来的社会发展程度和政府政策的系统性错误。

在美国这个汽车社会里面，没有私家车是许多新奥尔良灾民无法及时逃生，要困在体育馆里等待救援的主因。新奥尔良起码有 13.4 万人没有汽车，他们全是这个城市最贫困的居民。“联邦紧急事件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早就为美国南方遭遇风灾事故做过沙盘推演，知道疏散交通是新奥尔良最大的问题之一，但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协调措施（例如临时抽调数以百计的校巴），原因是有关预算被削减了。

美国人要问的不只是这笔预算何以会被削减，他们还应该问那 13.4 万人平时过的

是什么生活。在新奥尔良这个世界知名的旅游城市里面，一年有 300 宗谋杀案，五成黑人学生没办法在 4 年内完成初中学业。更令人惊讶的是，它竟然有四成黑人市民是文盲！根据知名的都市社会学家麦克·戴维斯 (Mike Davis)，新奥尔良的情况惊人，但不是孤例。另一个聚居了许多黑人的城市洛杉矶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它最近才因为预算问题关闭了市中心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医院的急诊室，去那儿求诊的主要就是黑人。

种族歧视在美国并不是过时的题目，只供学者挖掘研究。布殊政府虽然在竞选连任时竭力拉拢少数族裔，甚至有了赖斯这么一位黑人女性国务卿，但他反对“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立场还是一如既往，而平权法案正是一种透过保障少数族裔就读高等学府的名额，来促进种族平等的措施。美国的新保守派一方面攻击平权法案，认为它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歧视了成绩与黑人一样但因为预留学位问题而入不了学的白人)；另一方面却不反对军校实行平权入学政策，更不反对军方专为招募少数族裔入伍而推动的特别优惠手段。

种族问题不只是个“身分认同”(Recognition)的问题，它还是“资源再分配”(Redistribution)的问题；歧视黑人与忽略低下阶层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路易斯安那州和新奥尔良非裔居民现在受到的待遇，是整个新自由主义政策系统地缩减政府职能的结果。新奥尔良有那么严重的教育难题，是因为它的教育开支自列根时期开始就不断缩减；政府预算不断减少，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大力提倡“大市场、小政府”和积极减税的原则。所以这几年来，美国基层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开支愈来愈有限，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短了，公立医院排队的人龙却长了。

在白宫备受攻击的这段时期，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犹在推动有益于 2% 美国人的物业税改革方案。

如果说新奥尔良的灾民简直就是活在第三世界，那是因为造成他们过去生活得贫困现在生活得绝望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套系统的资源再分配原理。这套叫做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主导了世贸组织等全球化运动的主要推力，让更多的国家要严控政府开支，撤除社会保障网和各种公共服务。尼日尔之所以饿殍遍野，其中一个原因正是政府要把所有的食物供应市场化，可以运送救灾物资的道路建造则因为政府开支问题半途而废，那也是为了回应世贸的要求，也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结果。尼日尔的饥荒是全球化时代的第三世界灾难，新奥尔良的风灾在这个意义底下也是第三世界式的灾难。

依据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个人要负起最大的责任。教育是个人的责任，居住是个人的责任，健康也是个人的责任。难怪在去年一张新奥尔良市政府发放的防止风灾光碟里面，会有官员劝诫市民：“每一个人要为自身和家庭的安全负上最大责任。”那 13.4 万个没有私家车的灾民不该指望政府安排公共交通，疏散是他们自己的责任。

原题为“南方世界就在美国南方”，刊于《明报·笔阵》2005 年 09 月 07 日

爱国怎么毁了传媒

伊拉克战争结束已久，英美主流传媒自我反省的声音才渐渐浮现，越来越多。有些较资深的记者还写书回顾自己当年的愚蠢，忏悔自己的盲目。回想开战初期，民间示威人士那种“为了石油流血”（blood for oil）的口号，美国各主流大报都报以忽视的态度，许多论者批评这种说法浮浅无据，不值一晒。但是事后看来，他们自己支持过的种种开战理据难道不也一一落空了吗？到底是什么遮蔽了他们的眼睛呢？

美国政府不能直接指挥传媒要宣传什么重点，也不能为它们随便设下宣传禁区。它可以做的，就是利用“政治化妆术”（Spinning）的技巧，散发对己有利的消息，甚至不惜捏造一些“内幕故事”引诱渴求独家新闻的报刊。除此之外，也有人认为复杂的政治商业网络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媒体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得罪支持政府的大企业，失去了命根般的广告。

不过政府的公关手段也好，政商勾结的压力也好，这全是惯见风浪的传媒应对惯的，并不至于让《华盛顿邮报》等老牌大报全军尽墨，几乎发不出一点异见声音。

其实，真正杀得了他们的，正是“爱国”的氛围。“9.11”之后，布什政府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妥善利用人民不安和恐慌的气氛，奠定了反恐的基调。由于“反恐”，政府的权力得以扩张到了威胁三权分立的地步；由于“反恐”，政府能够视个人私隐如无物，铺下监视的天罗地网；由于“反恐”，政府得以公然虐囚，将关塔那摩基地变成法律进不去的法外之地。利用“反恐”的名义，共和党政府把自己打造成最坚定的爱国者，好像他们比人民自身更明白人民的利益是什么。政府主动散播大量杯弓蛇影般的信息，使民意弥漫一片疑惧的情绪，在这种情绪之下，谁的态度越强硬，人民就越相信谁，越觉得他够坚定有办法。那么，还有比发动战争更强硬的主张吗？于是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就变得不可置疑了，主战者不用罗列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对伊拉克的指控，也不用尽责研究战争的成本及后果，他们只要在战争的前面冠上“反恐”的名义，就足以把人民的不安无助转化成有目标的愤怒，让战争变成一场复仇的爱国战争。政绩拙劣的共和党之所以赢得连任，基本上靠的就是这个。甚至直到今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还在利用“爱国”去挑对手的毛病，其幕僚更在访问中坦承：要是今年美国再遇恐袭，选情将对麦凯恩有利。国家的灾难，竟然成了政府扩大认可度的资本，共和党是个发国难财的政党。

标榜独立客观的美国主流传媒就这么倒了，不支持战争就是不爱国，挑剔政府的作为就是不爱国。他们不是害怕直接来自白宫的压力，他们怕的是被当局挑动得异常亢奋的人民，也就是花钱买报纸的读者。当然，这里还是假设了他们有自己清醒的看法，才谈得上受压与否。

更常见的情况，其实是那些传媒工作者也都傻了，他们也都变得很“爱国”（官方

定义下的“爱国”)，他们也都相信萨达姆·侯赛因是必须铲除的美国敌人。因此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他们质疑政府的地方主要是作战的方式，而不是动武的原因。

回顾这一段经历，它绝对是美国新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没有政府直接管控的情况下，奉“爱国”之名，主流传媒竟然自动靠拢做其喉舌，牺牲了异议，更牺牲了真相。结果整个美国付出的代价就是士兵的生命，数以千亿计的金钱，以及得之不易的国家声誉。

刊于《am730》
2008年06月27日

奥巴马的修辞学

奥巴马开始广为人知，是在2004年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着全国观众发表主题演说。奥巴马没有采用一般美籍非洲裔政治人物喜好的传道士腔(最佳示范是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而是以一种相当亲和但同样有力的方式来表达。结果一夜成名，从那时起就有人说“看到了民主党的未来”，并且预言他必将成为下届总统大热门。请注意，这时他连国会议员都还不是，更说不上有何政绩，单凭一场演出，居然就得到了这等赞誉。

在那次演讲里面，奥巴马就奠定了以后他的竞选基调。那就是摒弃几十年来的左右对抗，把那些好斗的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定位为老一代；而他自己则能够团结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的新生代。请看以下的名句：“这里没有一个自由派的美国，也没有一个保守派的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请注意United的双关意义)。这里没有一个黑色美国和一个白色美国、拉丁裔美国、亚裔美国，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已故的当代修辞学大师柏克(Kenneth Burke)曾断言，修辞学的核心不是前人所说的“说服”，而是“认同”。这篇演说的重点就是要吸引大家对奥巴马的认同，认同自己和他是同一种人，新美国人。

但这还不够，依循美国政治的惯例，奥巴马还要让大家知道这种新美国人的根源，其实就是最原始的美国梦，一种已经被现今主流政坛遗忘了的古老承诺。于是他又把他说了半天的“希望”归结到这段话“它是坐在柴火旁唱着自由之歌的奴隶的希望，它是即将启程往遥远海岸的移民的希望，它是勇敢地巡逻湄公河三角洲的一个年轻海军中尉的希望，它是一个磨坊工人那敢于挑战不平的儿子的希望，它是个有着奇怪名字而又相信美国也会留给他一个位子的瘦小男孩的希望(按：这小孩指的就是他自己)”。透过接上这等最动人又最有神话色彩的美国梦，奥巴马再扩大了他的认同范围。凡是认同他所说的“希望”的，就是认同他；而又由于没有美国人会不认同这等“希望”，所以其实

人人都该和他站在一起。

这真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演讲，即便他在后来的竞选中就只是不断重复“改变”、“希望”和“相信”这几个关键词，他还是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肯尼迪的接班人、新美国的象征。当然他靠的不只是讲稿出色，还有中国人喜欢说的“人格魅力”。如果没有这一点，没有他的自信、诚恳而亲和的神态，再好的讲稿也只不过是一纸具文罢了。

可是“人格魅力”这回事虽有天赋差异，却还是不脱后天人工的造作。西方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论著——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第一卷第二节就把“演说者的品格”列为“由言辞而来的说服论证”之首要形式。亚氏很明确地指出大家要是相信一个人的品格，也就更容易被他说服，“但是这种相信当由演说本身引起，而不能依靠听众对演说者的品性的预先风闻”。换句话说，我们并不认识奥巴马，所以只能从他的演说中去感受他的为人与风范；而这一切全都可以是种表演，全都是可以透过学习得来的技巧。换句话说，人格魅力也是修辞经营的重点。

表面上看，“奥巴马魅力”与同类型的政治人物只盛产于职位要公开竞逐的政体当中，和一向擅长用语言对外耍弄政治套话、对内勾心密谈的中国无关。然而随着媒体的日渐开放，电视观众的主观喜恶渐渐替代了真正的程序认受，谁晓得我们未来会不会看见一批专长修辞学的中国式奥巴马呢？

原题为“修辞就是一切”

刊于《am730》

2008年02月19日

奥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

这真是奇妙的一天。看见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我也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尤其在麦凯恩发表那段大方而优雅的败选感言之后，更是让人不禁感慨：美国始终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然而，我又知道，这一切可能只是幻影。毕竟，对于奥巴马那惊人的魅力，我始终都有几分保留。

从小我就听过，美国是不一样的。他们说，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凭理念建立起来的国家；“人人生而平等……”。只要你认同，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有什么肤色，也不管你的出身与阶级；你都可以在这片新天地找到属于你的位置与机会。

今天一谈起美国就满腔怒火的中国青年大概不知道，六十多年前的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情是很不一样的。当年的美国派出过大量和他们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到遥远的战场上去为其它国家而牺牲，为什么这个国家要去打一场本来和它无关的战争呢？虽然后来的学者给出了许多更现实也更合理的解释，但是当我在读“飞虎队”的往事时，我知道那

些黑白照片里的年轻脸孔背后的确有一种天真的信仰。不管美国政府的高层当时在打什么算盘,虽然有美国军方的支持,那些正当盛年的孩子们却是自愿来到中国。彼时仍未发生“珍珠港事变”,他们就开着飞机穿行在险峻的深谷之中;其中有许多人就此留落异乡,再也回不去了。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替他们所不认识的中国人而送命呢?

年纪渐长,见识多了,我逐渐了解到美国的阴暗。在它理想的背面,是一个不断扩张的帝国。为了完成这个计划,它可以违背自己对民主的誓言去推翻一个民选政府,也可以假借这个理念去侵入另一个国家。在外国移民不断涌入去寻找谋生机会的这两百年里,它没有停止过对外战争;例如“美西战争”,它不只夺取了广阔的土地,还抢走了重要的水源,不知断送掉多少代墨西哥农民的生计。

我还知道,这个号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并不真的完美。例如奥巴马,人人都说他是“第一个黑人总统”。可是为什么他会是个黑人呢?明明他是个混血儿,对自己的黑人父亲所知不多,从小被白人母亲与外祖母抚养长大,为什么我们不说他其实是个“白人”?难道有一半的血液来自父亲,就注定他是黑人吗?想想看,在美国有不少白人和亚裔所生的后代,他们并不会因此被认做是亚洲人吧?一直以来,不管是在政府保障黑人入学权益的矫正政策(affirmative action)里头,还是在白人至上主义者选择攻击目标的时候,都有这么一条似乎不证自明的规则去辨别谁是黑人,那就是恶名昭彰的“一滴法则”(one-drop rule)。它来自黑奴时代的美国南方;它的定义是只要你身上有一滴黑人的血液,你就是黑人了,哪怕那滴血来自你从未见过的曾祖父。这条规则隐含的文化假设是白人的血液无比纯洁,不容染污。一盆白水,只要不小心滴了一点黑血进去,它就不再干净了。如此国度,配得上“人人生而平等”的庄严誓言吗?

且先撇开肤色不谈,奥巴马只用了惊人的短短四年,就从一个初登全国政治舞台的新人,变成了美国总统。到底他凭什么呢?起初,我以为他凭借的只是极为出色的表达能力和仿佛天生的风范,以及一套纯熟自足的修辞体系与形象操作。但是在后来的竞选运动里头,我看到他的政纲日益充实;在与对手不断交锋的过程之中,他的各项政策提案变得越来越具体可信。然而,能够让华盛顿陷入彻夜狂欢,令芝加哥街头的车辆鸣声长响的,还是他的竞选主题:“变革”。

仔细阅读奥巴马的讲稿,我们会发现他所讲的“变革”,就和美国历史上每一位伟大领袖所提出的改革一样,其实都是种返根溯源的“复古”。例如马丁·路德·金,当他向着几十万人宣布他的梦想时,他不是再说一番以前没人听过的白日梦,而是一个建国者们未能完成的理想蓝图。换句话说,他的改革根本就是一种美国梦的再诠释;唯有诉诸每一个美国人自小听到大并且引以为傲的那套理念,一场改革运动才能真正发挥出庞大的能量。

美国左翼哲学家克里特齐利(Simon Critchley)在他最近一篇发表于《哈泼》(Harper's Bazaar)杂志的讲稿里指出,除了变革,奥巴马还很喜欢“共同体”的观

念，时常提醒美国人不要再纠缠在“蓝州”与“红州”、“保守派”与“自由派”、“异性恋”与“同性恋”以及“白”与“黑”的种种分歧之中；却要记住“这里只有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可是足以团结这个共同体的信念到底是什么呢？克里特齐利认为奥巴马对信念的态度是疏离的；在哲学角度上说，他的答案只是“空洞的能指”，并没有多少真正能够撑起一个共同体的骨干价值。

我本来也许会同意克里特齐利的说法，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奥巴马其实早已非常巧妙地把“变革”与“共同体”联结起来了。

他所谓的同一个美国，其实是相对于共和党右翼版本的另一种“真正美国人”，这种美国人不执着于性取向的问题，不在意肤色的分别，不强调个别宗教价值的优位；这种美国人是“建国之父”所许诺的梦想追随者，是《独立宣言》与宪法等“圣书”所建构出来的公民。

他口中的“改革”不是突破性的创新，而是矫正过去八年来的扭曲，回到经典美国梦的正轨，让美国人变回他心目中的“真正的美国人”。

在奥巴马反复强调的“改革”与克里特齐利解析出来的“共和体”之间，那个连结的关键其实就是奥巴马自己：一个在外岛出生的黑白混血儿（所以他是美国梦的具体化身），一个《哈佛法学评论》的前主编（所以他是精英，懂得上层社会的语言），一个芝加哥的激进小区工作者（所以他心念基层，明白他们的需要），一个四年前才进入国会的新人（所以他说的“改革”要比老面孔希拉里更有感官上的说服力，缺乏经验等于没有历史包袱），一个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国会异见分子（所以他能受到国际欢迎，在柏林引来数十万的粉丝，可以满足美国人要做“世界领袖”的欲望），一个主张公平税制和全民健保的温和左派（所以他能令选民想起对抗大萧条的罗斯福，期盼另一场“新政”的到来），一个用人唯才的跨党派领袖（他找前联储局主席沃尔策当顾问，所以又能让右翼稍稍放心）。换句话说，他的形象本身就是以改革迈向共同体的那道桥梁，他的存在就是美国理念的象征。

尽管我仍然不能忘记美国那可怕的背面，但是我又不能不佩服这个国家自我修复的能力与速度。

不久之前，欧洲人还在取笑它的顽固保守，觉得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人相信“我们的祖先曾与恐龙和平共处”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可是在11月4日之后，几乎欧洲各地的主要报章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拥有一个奥巴马？是呀，我们何时才会见到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当法国总统，一个土耳其人当德国总理呢。至于亚洲，一向以歧视华人政策知名于世的马来西亚，他们的首相在第二天也要被迫响应这道令人难堪的问题，他尴尬地解释，“任何人都能当首相，这要看人民的选择”。一夜之间，美国竟然又成了那个领先全球的先行者，激励世界各国无数弱势群体的“机会之地”。

奥巴马胜出的第二天，我收到一个美国朋友发来的电邮：“从前我总是为自己身为

美国人而惭愧，仿佛去到哪里都会听到美国的坏话，美国护照甚至成了最不安全的旅行文件。但是今天我要骄傲地告诉你：我是美国人！”另一个非裔美籍朋友则把我喜欢的黑人歌手 Jay-Z 的那句名言抄在电邮里：“罗莎·帕克（Rosa Parks，上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的导火线，她在公交车上违法坐进专属白人的位子）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然后他在信的结尾说：“We made history！God bless America！（我们创造了历史！上帝保佑美国！）”。打开电视，我看到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说：“美国是一个持续使人惊喜，持续更新自身的国家……身为非裔美国人，我格外骄傲。”听说那一晚，还有一些支持麦凯恩的共和党员也被奥巴马的胜选演讲感动得默默流泪，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有些投票的老人真的见证了一场奇迹。六十年前，还有不少三 K 党徒把黑人吊在树上处死；四十年前，还有黑人为了在密西西比州争取投票权利而被捕；二十多年前，民主党还不敢提名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当副总统候选人。

今天，我们却听见一个黑人总统质问还有谁会怀疑美国梦的承诺，他用自己去说明美国之所以强大的真正理由。很多有几十年资历的记者都说，那一夜是他们见过最令人激动的大选之夜。我想我明白了，使奥巴马赢得胜利的真正原因，使那么多美国人欢呼落泪的真正动力，是他们可以再一次地肯定自己。起码在这一晚，他们终于发现小学教科书上所说的美国故事，是真的。

原题为“奥巴马把梦想带回了美国”

发于“香港独立媒体网”

2008 年 11 月 23 日

建立在一本书上的国家

英国评论杂志《展望》（Prospect）七月份的封面专辑是《戈登·布朗：知识分子》。很夸张的标题，所以连这个专辑里的好几个特约作者都怀疑这位爱丁堡大学的政治学博士究竟算不算英国几十年来第一个知识分子首相。为了说明此言不虚，他的一个前助手出来见证，表示当年亲眼见过布朗与名满天下的哈佛商学院教授波特（Michael Porter）会面，聊他那著名的《国家比较优势》理论。一场长谈下来，波特教授赫然发现这个英国财相对这套理论的细节掌握得竟比自己还好。而这类会面，正是布朗最喜欢的活动之一，他总是定期约见各个领域的大牌学者，向他们当面讨教自己的读书心得。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虽然布朗深受亚当·斯密及大卫·休谟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但他对美国的保守主义却情有独钟，甚至还想召集手下合写一本大书，“一本可以描述整个英国的书”，因为他很羡慕“美国是个能够用一本书去代表它所有价值观和所

有理念的国家”。

我说这个想法古怪,是因为它很不英国,英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需要奠基文件的国家,也不可能有哪一本书总结得了它那纷杂、自由和散漫的思维习惯与社会传统。

而美国的独特,就在于它身为一个民主国家,却活像一支“圣书的子民”(People of the Book),已经两百多年了,它的大人物还动不动就要回到建国初期,引述先贤圣言来支持自己的言行,就和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老把先知挂在嘴上一样。布朗钦羡的,大概就是这种把整个国家建立在一个由书与文献构成的磐石上的传统吧。

竞逐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奥巴马(Barack Obama),他学问或许不如布朗大,但好歹做过芝加哥大学的法律教授,所以写起书来一点也不含糊。其近著《希望的无畏》(The Audacity of Hope)在一票职业政客的业余写作中真可说是出类拔萃,备受好评。看他这本书,你就能感到《独立宣言》、《联邦论》和美国宪法等奠基性文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了。奥巴马谈任何话题,都不忘向这些“圣书”频频致意,似乎离了它们,美国人民的希望就不知该要着落何处了。对奥巴马而言,这个圣书传统是迷人的。“我们坚持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所有人生而平等,创造者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尤其是生命、自由与对幸福的追求”,他说:“《独立宣言》里这简单的几句话是我们美国人的原点;它们不只描述了我们政府的基础,更是我们共同信念的实质”。更迷人的是落实和追寻这个信念的方法:他曾为了选举穿州过省,去过乡村教堂,去过平凡人家的厨房,去过某个小镇十字路口旁的商店;听一个母亲对战场上儿子的思念,听一个墨西哥移民工人想进大学的愿望,听一个快要退休的白领对未来日子的担忧;而奥巴马似乎真心相信,在美国“圣书”的引领之下,这一切都将找到答案。

用一本书去代表整个国家,这是所有政治家的终极诱惑,因为它看起来如此优美而简单,就像早年的科学家想用一条公式去说明整个宇宙的诞生和演化。差别在于你用什么方法去验证这本书的真理,又用什么手段去说服别人支持它。与利比亚等国家比较起来,要不是美国政客比较蠢,就是美国宪法还不够说服力。你看奥巴马还要跑遍全国,从底层由下而上,才能总结出美国宪法的永恒与伟大;其他人则根本只要好好地站在那里说话就行了,全国上下自然会以欢呼声证明“绿皮书”之类的真理。

至于中国,历史长远,当也不乏在一本书里构想一个国家的努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英雄领袖想把王朝建立在最正确的圣典之上,又有多少文人想要把治乱兴衰的原理总结在一本可作帝王宝鉴的名山巨业里。可惜我最想看的,却是一个亡国之君的不传之书:“徽宗在金,尝得春秋,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涉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改岁钥而成书”(俞樾《九九消夏录》卷六)。

原题为“一个国家的圣书”

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8月08日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

萨科齐顺利当选法国总统，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说这是“法国人选择了改革”。他们看到的是萨科齐要向右转，把法国从左翼当道的深渊里解救出来；他们看到的是萨氏要向传统的大政府开刀（每五个法国人之中就有一个是公务员），打散庞大而广泛的福利体系；他们看到的是萨氏接上了世界主流，高举工作的价值，让劳动市场更有弹性，减低税负，使企业有创新和投资的动力，挽救法国沉沦的经济。

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新法国，一个对美国更友善的盟友，一个“重新回到欧洲的法国”（这是萨氏在发表获胜感言时的第一句话，他的意思是不再将欧盟宪法交给全民公投，以防法国公民再次否决）。

然后大家都提到了一点：萨科齐很强硬。接着就不再多说了，似乎“强硬”这两个字指的就是他要对抗老法国痼疾的决心，于是萨氏就有了一个坚定改革派的救星形象了。到底他的“强硬”指的是什么呢？他又说过什么强硬的话，做过什么强硬的事呢？

2005年11月15日，就在法国郊区大型骚乱暴发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巴丢（Alain Badiou）是最重要的在世法国哲学家，任教于法国最高学府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日常侮辱》，讲的是他16岁非裔养子的故事。据巴丢讲，这个年轻人在街上经历过无数的警员检查，更曾在十八个月内被捕六次。每一次都是无缘无故被扣上手铐，带回警署，遭到辱骂和恐吓（例如“白痴”和“你想试试狗咬的滋味吗”），受到无理的攻击（路过的警员会顺便踢一下被压在地上的小伙子）。每一次巴丢都会被叫去警署，带回孩子，接受警方诚挚的道歉。到了第六回，巴丢再也忍受不了了，于是投书报纸，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儿子的罪名是有所学校的校长认出他是前一阵子群斗事件的一员，“因为他们全是黑人”。巴丢又说，他儿子就读的高中“曾被警方要求提供所有黑人学生的档案和照片。是的，你没看错——黑人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巴丢不是郊区里贫苦的移民，他是备受尊重广为人知的学者，他住在巴黎一栋不错的房子里，他唯一的问题是有个非裔养子。当时，主管全法警政和治安的不是别人，正是内政部长萨科齐，他顺理成章成了法国青年骚乱针对的对象。当年引起不满的是总理德维尔潘的青年就业政策，他提出雇主可以不用提出任何理由就在两年内解雇青年员工。当时外间都认为这个做法很正常，批评法国新一代好吃懒做。可是大家忽略了萨科齐的火上加油，忽略了他怎么清理郊区的“人渣”和他批评青少年的言论。他的竞选纲领之一就是要加强警察执法的权力，对付罪犯。

要怎么做才能维护治安呢？2007年3月20日，法国宪法法院通过了《萨科齐法案》，禁止记者以外的任何人拍摄和散布暴力行为的影像。推动这条法案的萨氏认为，年轻人“快乐打耳光”（happy slapping）等网络欺凌行为很不恰当，所以要立法禁止。

问题是这条法案同时也禁止了所有人拍下暴力场面的权利，萨氏相信 2005 年骚乱扩大的原因就是有人刻意散布警员追打移民青年的短片。自此之后，所有个人和网站要是拍下或上传了暴力行为的影像，就要面对五年的有期徒刑或将近十万美元的罚款。

这就是萨氏的竞选对手罗雅尔声称他的当选会引发骚动的原因，也是法国左翼媒体一直妖魔化萨氏的原因了。他们想把萨氏描绘成一个希特勒般的人物。可是，为什么萨氏又能赢得这么多法国公民的支持呢？难道法国不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现代人权观念的老祖宗吗？

除了他的种种改革措施之外，萨科齐还有别的板斧。

2002 年的法国总统大选，极右分子勒庞（Jean - Marie Le Pen）意外地淘汰了社会党对手，挺进第二轮选举，震惊全世界。五年之后的今天，这位反移民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连第一轮选举都过不了关。这是否说明了法国人厌弃了极右，不再仇视非法移民，也不再厌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与其他地方的“外国人”呢？恐怕不是，根据法国媒体的票站调查，三分之二的勒庞支持者转向了萨科齐。就连勒庞本人都愤愤不平地指摘萨氏“偷了我的理念”。什么理念？首先他改造了勒庞上届大选的口号“法兰西，要不是爱它就是离开它”，不断强调移民的可怕。然后他甚至宣布要在缩减政府规模的同时成立一个新部门——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好教导大家怎样做个纯正的法国人，同时收束移民的拥入。而这正好对上了勒庞支持者的胃口，他们一向认为说话带口音的外来人口要为法国的高失业率负责，而聪明的政客总是懂得如何将内部的问题转移到对外人和其他者的恐惧之上。

萨科齐是个聪明而复杂的人物，他具有反移民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同时又主张和美国交好，鼓励国民学英语。但基本上他是个想要维护法兰西国家身份的民族主义者，例如他曾提出政府应该资助穆斯林兴建清真寺，培训本土的教长。虽然在竞选期间，他害怕赶走右倾的选民，对此避而不谈，但这个举措其实是为了切断法籍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一方面避免“恐怖主义”的散布，另一方面把伊斯兰教国家化，纳入政府可以管控的范围。

单方面强调萨科齐的经济政策和劳工政策，却忽略了他对治安和民族身份的看法，我们就不能掌握其右翼本色的完整面目。萨氏真如许多媒体所说的，是个新自由主义教条的追随者吗？即使是《经济学人》也指出了在工业政策上面，萨科齐是个国家干预的忠实信徒。其实他向来也是个“经济民族主义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反对印度富商拥有的 Mittal 钢铁公司去年提出的 Arcelor 收购案。正如大部分政坛里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一方面强调开放竞争以促进发展；但是在面对外国农产品的“倾销”和国家标志性企业被收购的时候，却又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卫士。

萨科齐在竞选期间大力攻击所谓的“六八遗产”。很多人认为 1968 年的左翼革命是今天法国经济停滞不前、社会生机停顿的祸因，所以觉得萨氏的说法有理。但是，我

们也知道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有着血脉关系的“六八遗产”，乃是现代法国的宝贵遗产，它批判殖民主义的遗毒，重振自由、平等和开放的共和国精神，拒绝歧视、尊重人权。不过，这一切或许真的已成过去。正如萨科齐那名称古怪的“移民与国族认同部”，“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对不少经历过“六八事件”的人来讲曾经是个贬义词，他们当年相信的是“共和国认同”。

原题为“萨科齐会否远离共和国”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5月13日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才不过几个月之前，就在泰国前总理他信和反对派闹得最不可开交之际，出面协调并逼使双方让步的泰王普密蓬被许多国际传媒歌颂为“民主的保卫者”。有些评论还因此回想起梁启超当年的建议，如果有个甚孚民望的皇帝，君主立宪制会不会要比共和体制更稳定也更适合亚洲人呢？

然后，2006年9月19号，泰国军方发动不流血政变，迅即掌握局势，他信成了个流亡政客。大家看得目瞪口呆，这一场兵变怎么会获得那么多曼谷市民的支持呢？而且政变军头们组成的“军营团”小动作还越来越多，他们甚至打算在未来的宪法内赋予军方罢免民选总理的权力。这还算是民主吗？

除了他信本身不受城市中产阶级欢迎之外，很多人都注意到这场政变获得了“合法性”，是因为有泰王普密蓬的祝福。还有些消息指出泰王的角色绝不简单，他不只是事后默许军头的行动，更可能是整件事的隐密策划人。如此一来，泰王还算是“民主的保卫者”吗？一个民主的保卫者可以赞成推翻民选领袖的军人政变吗？数个月前把泰王捧得至高无上的那些传媒和评论人现在又躲到哪里去了？

所谓立宪君主可以担任民主保卫者这个说法，本身就是反民主的。因为它并不真心相信民主体制本身的权力制衡原则，不相信元首渎权的时候有恰当的机制可以应变处理，却幻想平衡权力的大任可以托付在一个别具威信的个人身上。

假如一个民主政体的领袖出了问题，比如说英国首相贝理雅面对大部分国民的反对，依然决意出兵伊拉克，我们应该寻找修复的方法，逐步完善体制自我健全的能力。它可以是增加民选领导的问责程度，也可以是削弱元首的权力，我们甚至可以反思民主体制自身的局限；但是我们万万不能把希望寄在一个世袭君主身上。因为那到底是一个人，如果大家运气好的话，他可以是个圣君明主；但假如他不是呢？

我们怎么可以容让一个凭血统而握有权位的人去监督人民普选产生的领袖呢？

以泰王普密蓬为例，他勤劳爱民，生活作风、文化品味俱有足以为天下法的崇高声誉，他甚至曾以个人威望逼走了政变军头，但这是否表示他永远正确？他的继位人也是永远正确呢？在这一次的军事政变里，他容许军方逼走几个月后就要下台的总理，难道是维护了民主的正常发展吗？他信纵有百般不对，到底不是当年杀害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的军头，难道就不能多等几个月让国民决定他的命运吗？

所以泰国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到了几近拥握实权的君主，不只不是民主体制之福，还是它的风险所在。

原题为“支持政变的民主卫士”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6年10月04日

国王与我

泰国王室何以有那么崇高的声望和权力，一直是政治社会学界的议题。许多人把原因归在普密蓬个人身上，说他爱民如子，引进多项改革，促进了泰国的现代化。其实这种讲法既没有看到曼谷王朝百多年来的历史作用，也忽略了泰王在开放西化之外的保守与传统。

和所有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泰国人也很喜欢强调自己有种与别不同的“泰国性”(Thainess)，并且认为这是从传统那里自然而然地承传下来的，值得自豪，需要捍卫。但是也和所有民族国家的民族性传说一样，所谓的“泰国性”其实也是种历史很短的现代产物，是它从传统王朝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时一并构造出来的。

著名的东南亚史学家、前泰国学运领袖彤才·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在他的经典著作《绘图暹罗》(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里说的就是这个“泰国性”的生产过程。其中有几个地方提及泰国王室，相当有趣。

原来泰国王室虽然一直是暹罗地区的最高强权，但它并非唯一的王室，至少在泰北就有驻都清迈的兰那王朝。虽然后者也得向曼谷称臣。但是彼此各有权限，边界模糊。在欧洲列强侵入东南亚之后，各方势力逼迫暹罗成为一个疆界清楚确定的现代国家，曼谷王室才成为泰国不可争议的唯一统治者。因此在泰国人的心目中，从自有“泰国”这个称号始。王室就和佛教并列，成为界定“泰国性”的传统支柱。

泰国在政治上真正特别的地方，是她乃整个东南亚唯一未曾沦为正式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在官方的历史教育里，这个值得骄傲的奇迹是泰国历代国王的成就，他们审时度势，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做最精明的决定；在与英法和随后的日本等列强周旋，进退有据。

因此泰国的独立，本身就离不开泰国王室的存在。

看过《国王与我》的，想必也知道片子里那位非常开放，接受英国女教师教育长大的太子就是后来曼谷王朝最有名的朱拉隆功大帝(Chulalongkom, 1853-1910)。他和他的继承人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观念新技术，就和今天的普密蓬一样，因此有不少外国人以为泰国王室在紧守传统价值之余，也是泰国西式的“现代化”的推手。

诚然，王室是外国文化进入泰国的阀门之一，只是他们同时也过滤和障蔽了不少事物。例如朱拉隆功，就曾宣布政党和议会政治并不适合泰国。他的儿子瓦栖拉兀(Vajiravudh, 1881-1925)更认为现代经济学也是违背传统的，因此禁止第一本泰文经济书的出版。可见王室在协助建立“泰国性”的时候是很小心的，他们自有一套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东西不适合泰国的标准。

泰王的地位，因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历史，其作用已深深植入泰国社会的基础。时至今日，泰国的“国家身份委员会”依然把王室列作国民身份的要素之一。

原题为“泰王的地位”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6年10月06日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一点说明：奥运期间，原来连普京都要去哀悼的索尔仁尼琴也是我们的禁忌。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先后在三份媒体间流过，从广州去到上海，每回都是在最后一刻被撤了下来。谢谢《财经》的杨大明兄，让它最终能以缩略版的面目在纸媒上和大家见面（缩略的原因纯粹是版面字数所限）。也要谢谢中间经手过的各位编辑；你们的理想我尊敬，你们的局限我同情：真的。拙作本已错过最佳面世时机，但有鉴于大部份人都单向地为索氏叫好，故再以完整原貌贴在此处求正方家。

我们都很敬佩索尔仁尼琴，我们都很仰慕索尔仁尼琴，所以我们都说他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至“人类的良心”。当然拥有一颗非常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它不只熬过了劳改营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乐，还挺过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直到他的敌人苏维埃垮了，他怒视的叶利钦也走了，才终于停止跳动，永远沉默。问题是他这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

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

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 Rev）所说的，许多发生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纪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仿佛真的终结了，20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尽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么地少。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沙特所说的，“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它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

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相信马克思）。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他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钱伯伦（Lesley C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成了一具过时的大钟，发出没人注意的鸣号。对文学界来讲，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就连曾经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也只剩下历史价值，还不如同时代的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那么浩瀚全面，文笔精美。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电视台高层却居然不耐烦到了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可是颗良心呀。

好在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

美国前总统列根喜欢他。因为彼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大有一士谔谔的气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恶帝国”。更妙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列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国前总统普京也喜欢他。因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罗斯神话的传人；对外，他力拒北约东扩和美国的独大；对内，他还原了圣彼得堡的旧名，重振东正教教会的权威。这一切作为，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梦想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先后拒绝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发奖章的他不只欢迎普京送上的荣誉，甚至不认为普京先当总统再做总理是弄权专断。他曾经斥责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却不觉得普京把媒体——收归国有的做法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列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蹩脚的配

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起到的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们相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头至尾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话，就不能不为他感到难过了。他晚年的种种言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可是两位总统却感到很受用（特别是普京），能够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普京真心相信索尔仁尼琴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话吗？未必；但它的确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动的意识形态。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的幻影。

刊于《明报·笔阵》
2008年08月09日

世界到底有多平

地球始终是椭圆的，所以任何一种地图都是不可能完美。换一种投影方法，就会得出一张不一样的世界全图；无聊哪一张，都有它不平的地方。

政治游戏的规则

足球也许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但他们确实创造了现代足球的形式与规则，例如把一场球赛分成上下半场。十九世纪初叶，从哈罗公学到伊顿公学，从牛津到剑桥，几乎没有一家学校的学生不玩足球。问题是他们不只没有共通的玩法，甚至连足球和橄榄球的区别也还没开始区分清楚。于是一遇到校际比赛，你用脚踢，我用手接，大家闹得不可开交，混乱非常。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将球赛划成上下两截，上半场依你的规矩，下半场就按我的来。

在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里头，除了奥巴马那动人的胜选演说之外，我觉得麦凯恩的认输演讲也绝对不容忽视，那可能是近年同类讲辞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麦凯恩告诉他的支持者，这次失败“是我的错，而非你们的”；还压制倒采，极度宽宏地呼吁大家要支持奥巴马，说“他是美国总统，我的总统”。他没有否认双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对手胜出的意义与民主的真谛，认为这一次选举证明了每一个公民都不该忽视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响力。最令人动容的，是麦凯恩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忘慰问刚刚失去外祖母的奥巴马。为他的演讲加上了一个格外有人味的注脚。

这篇演讲极为特出，但它的基调却不罕见。在所有以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国度里，大选落败的那一方总是要致电对手道贺，总是要发表一次落落大方的退场感言。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举措已经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惯例。麦凯恩的演讲固然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格调（“格调”，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这是多么陌生的字眼呀！），但这种个人风格的美善其实来自于背后一个客观的习惯存在，那就是要尊重游戏规则。既然大家都下场参与了民主普选，就该明白“愿赌服输”的道理；只要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规则本身提出异议，而且跟着它一路玩下来，便要接受这场竞技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输打赢要。

为什么出来的结果明明不合己意，却还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反悔覆盘呢？原因绝不止于风度尊严等人格因素，还包括了更深层也更真实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足球规则制定和普及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假如当年那些学生只想关起校门自己跟自己踢球，他们用得着发明上下半场这种点子吗？假如那些不同的学校只想办一次校际比赛，

以后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话；他们还用得着约束自己去服从规则接受结果吗？

民主选举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游戏规则：参与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明白自己必须和其它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还得一起生活下去。于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觉得还算公平的规矩，然后按规矩办事。在这意义上讲，选举乃至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游戏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人我共存的问题，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

今天有不少自由主义者喜欢宣扬民主选举的价值，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公民自由的政制设计；也有一些保守派从道德立场怀疑自由主义可能会令个体无限膨胀，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它这么热衷于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么喜欢为各种运动设计规划，或许不只是巧合。

刊于《南方周末》

2008年11月19日

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自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它就一直高举“气候变化是全球责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拉下水，认为它们也该和发达国家作出相同的减排承诺。于是这就成了刚结束的岩里岛气候变化峰会的主战场了，结果双方僵持不下（“双方”其实就是美国与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最后弄出了一个白马非马，只有时间表但不设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共识”。到底是美国的讲法有道理，要减排就大伙一起来，还是中印等国家的主张说得通，你们发达国家应该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这是一个“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也就是先假设大气层吸收废气的的能力乃一种有限的资源，然后再去判断怎样分配这项资源才最公平。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大幅减排，着眼的是种分配正义的“历史性原则”。意思是谁过去排放废气最多，消耗大气层的吸收能力这项稀有资源最多，谁就应该先降低自己日后排放的废气。

举个实例，根据一项调查，在1950到1986年的全世界含碳废气排放总量里面，常时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居然就贡献了30%的废气。

反观占全球人口17%的印度则排放了2%的积累废气。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就如同某一村落

的 20 个居民全都共用一间浴室，其中一个人所掉落的毛发占了阻塞排水口毛发总数的 30%，而有三个人在使用浴室时几乎完全没掉过任何毛发”。如果要请工人清理这条淤塞的排水管，这费用该如何摊分呢？依据“历史性原则”，那个毛发掉得最多的人就应该按比例交出整笔费用的 30%了。

虽然《京都议定书》大体上依循了历史性原则，但它对发达国家相当宽容，并没有按照大家过去的排放总量严格要求它们的废气减排量。即使如此，美国还是不愿意，还是退出了温和妥协的《京都议定书》。

美国之所以反对“历史性原则”，不愿意被它过去的废气排放量绑住，其中一个说词是“不知者不罪”。它承认自己的确是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得最多的国家，也不讳言因此得到了莫大的经济利益；可是它认为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暖化的原理只是很近期的发现，在工业化的早年阶段，根本没有人知道石油的燃烧会带来这么多问题。

回到毛发阻塞排水管的例子，这等于是说当初大家在使用洗手间的时候不知道身上掉下来的毛发会塞住下水口，甚至不晓得洗澡原来会洗掉毛发，所以就算有一个人的毛发脱落得特别多，也不能因此要他分担更多的水管修理费。

换句话讲，美国主张大家一起向前看，忘记过去那段无知的岁月。因此美国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它一起承担责任，要减排废气就大家都减排，而且目标和数量也得平均摊分。

好吧，就让我们不要追究这种“不知者不罪”的说法是否站得住脚，一起着眼现在。既然要“着眼现在”，我们就要引入“分配正义”的“共时性原则”了。办法是把废气排放量按人头平均地分配给全球 60 亿人，每一个人可以排出的温室气体都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不多不少。这应该是最公平的计算方式了吧？不，美国依然反对。根据《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下的目标，分配给每人每年的排放量正好是 1 吨，理论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该享有比其它国家人民更高的排放量。然而事实却是美国人均年度排放量高达 24 吨！美国有任何理由要比世界上其它国家得到更多的大气层使用权吗？

当然没有。美国官方和部分传媒不断渲染中国空气污染的情况，强调中国已经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废气排放国，而且很快就要超越美国。可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那就是中国有 13 亿人口，相当于全球人口的 1/4（中国人均排放量只有 3.7 吨）。你怎好意思拿 3 亿人去和 13 亿人比较呢？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里面，发展中国家的态度都要比美国积极，他都愿意接受一些减排指标。而美国除了要求它们作出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减排承诺之外，还要事后反悔，质疑得来不易的大会共识，声称减排目标要按各国“国内具体情况”弹性调整。

什么叫做“具体情况”？具体情况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十分昂贵，全地球环境付

出重大代价，而且他们还不愿意轻易改变。具体情况就是美国现政府想要保障其能源产业的重大利益，不想牺牲他们的生财之道。

在上述最明显的道理上说不通，白宫和其支持者就不断生产出各式各样的古怪理论来自圆其说，但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事实击倒。

例如其中一套曾经流行的理论就认为我们根本什么都有用不着做，因为建立在电脑和高科技上的“新经济”会渐渐取代以重工业为主的“旧经济”，所以随着经济进步，废气问题会自动消失。但是在“新经济”崛兴的过去 10 年里面，温室气体不只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因为那些常开视频会议的人并没有少搭飞机。

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这个举世第一强国自私的真面目，这个自诩为世界领袖的超级大国不但不主动承担责任，反而还强词夺理，拖着大家的后腿。它的表现，我们只能用令人作呕去形容。

原题为“不负责任的第一强国”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8 年 01 月 02 日

美国的“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总裁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丑闻发展到今天还没有结局。他到底是被迫下台，还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好自为之，暂时也还看不出端倪。但是我们倒是能从这个事件看出世界银行的根本缺陷。

沃尔福威茨的女友丽莎一直任职于世界银行，不过自从沃尔福威茨走马上任之后，根据世行的内部伦理指引，他俩的亲密关系使得她必须暂时借调到其他地方，以避嫌疑。结果本身是阿拉伯裔的丽莎给调去美国国务院，负责中东地区的事务。虽然她现在是为美国政府打工，但领的薪水却还是来自世行。现在的问题就出在沃尔福威茨亲自写了条子，要求世行人事主管为丽莎大幅加薪，使得丽莎的工资比美国国务卿赖斯还高。所以大家就纷纷指责福威茨以权谋私，不再堪担如此位高权重的职务。然而在这桩关系到腐败问题的事件上，大家却忽略了另一个重点，那就是身为国际机构的世行为什么可以把自己的员工借调给美国政府使用呢？

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都是 1944 年布列顿森林会议的产物，它的原意是集合先进国家的资金，协助落后国家的发展。

近几年来，世行一直把消除贫穷当成它的首要目标，提供贷款给各项发展方案，例如修建水库和铺设铁路。依照惯例，世行总裁一向由美国总统提名，因为美国是世行的最大股东；而其他股份持有国组成的董事会则多半会认同老大哥提名的人选。

所以丽莎才会这么轻易地被“借调”去美国国务院，福威茨基本上把世行和美国政府看成是一家人了。但世行到底还有其他股东，凭什么要国际社会拿钱去为美国办事呢？更重要的是丽莎的新工作包括：要替美国改善它在伊斯兰世界的恶劣形象。换句话说，福威茨现在是借着给自己的女友加薪，大慷国际社会之慨，去帮美国为它自己这几年反恐反出来的烂摊子抹屁股，而沃氏本人正是这场反恐战争的主要建筑师(他在担任美国副国防部长时的最大功勋，就是提出伊拉克拥有大杀伤力武器)。

讽刺的是，沃氏自就任世行总裁以来，大力提倡要严格执行反腐标准，任何想要获得世行贷款的穷国都须遵照世行的指引，改革自己的政治体制，清除贪腐发生的机会。这套做法本来是很有道理的，许多贫困国家之所以沉痾不起，援助贷款恍如泥牛入海，正是因为它们的政府太过腐败，给多少就用多少。但是也有一些记者指出，福威茨提出的管治及反腐策略随意性太强，可能与美国的外交利益并轨，结果得到贷款的不是清廉的国家，而是积极改造自己以配合美国意图的国家。包括曾在世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批评世行的权力倾斜。虽说改善不发达国家的境况是它的目标，但这些受援助国家却完全没有发声的机会，做股东的富国自己闭门造车替它们决定了一切。而在这群股东里，可以只手遮天的当然就是美国了。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4月21日

买军火好比买玩具

不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商业财经杂志都很少谈军火贸易。看足半年的BusinessWeek，几乎没有一篇报道分析某家军火公司的业绩；每天盯着彭博财经频道，你也很少见到某个武器展的消息。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军火武器不是一种买卖，不是一种生意吗？

其实军火何止是一种商品呢？它简直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生意之一。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估计，光是美国今年就可能会在国防上花掉7000亿美元，排第二的是中国（请注意这只是该机构单方的预测而已，不一定准确），再下来则是法国、英国及俄罗斯。这些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除去人员开支之外，你猜有多少会掉进军火商的钱包里呢？

就以阿联酋的阿布达比主办的“国际防卫展”(International Defence Exhibition, 简称IDEX)来说吧，主办者在今年的展览开始前预测将会达成总值20亿美元的买卖。这很多吗？当然不，因为大部分的军火交易都不会在这类武器展中现场交易，否则阿联酋又怎会在展览开头的第一天就宣布今年它已签下两亿多美元的武器买卖合同呢？

武器展大概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商贸展了。虽然它是做买卖的，一来它高度敏感，并非来者不拒(比方说朝鲜就不会受邀参加 IDEX)；二来它的现场不是用来供人订货，主要是用来吸引潜在买家的。如今的军火展是办得越来越像样了，例如盛大的 IDEX，你在里头看不到杀气腾腾的制服人员，来往的几乎都像西装革履的生意人。每个摊位除了军事迷最喜欢的战车与飞机之外，就是设计得新颖亮丽的多媒体展示装置。一不小心，你大概会以为这是高科技玩具展，里头每一件可爱的玩具都在引诱着你，对你说：“想要我吗？快回家搞定你的政府和议会吧，我可是很好玩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有一部轰动一时的名著《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里头有一章分析现代语言的设计，看来至今仍未过时，尤其适用于 IDEX 这类展览。马尔库塞说，20 世纪的建制越来越喜欢使用缩略语，一个看起来很吓人的东西掩饰得十分专业非常有技术性。例如“国际防卫展”简称为 IDEX，又例如本届 IDEX 中很引人注目的 UAVS，它的全称其实是“无人飞行载具”。马尔库塞又进一步指出，权威体制还喜欢转化语词的意义，使杀人的东西变成带有善意的无害专业工具。例如明明是展示最新杀人武器的展览，名字却叫做“防卫展”。又如另一项展品“协商者策略性监视机器人”，其实是一种可以在各种地形上来往然后将情报传回指挥中心的间谍机器人，但它偏偏叫做“协商者”。

今年 IDEX 的其中一名参展商公关人员对记者说：“这真的不是军火展，它是防卫展……它和任何其他生意没什么不同。”但是很奇怪，会关注这些商展的全是“詹氏防卫年鉴”一类的媒体，而非那些专门介绍营商之道的财经刊物。他们到底是良心发现不屑双手沾血的买卖，还是不当它是门生意呢？

原题为“军火买卖也是干净生意”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 年 04 月 11 日

有钱不一定有权

每年的《福布斯》全球富豪榜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好话题，对我等平民百姓而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羡慕一下也好。但有另一个榜的实际意义可能更大，却常常被人轻轻略过，视而不见，那就是《福布斯》对国家元首、独裁者以及国王财富的统计排行榜了。

或许是因为这个榜的历史太短，形式及内容常变，更未发展出一套稳定可靠的标准，所以也就无法形式常轨，可以让人前后追溯，比较议论了。

今年在“国王与独裁者亿万富豪榜”上名列榜首的是坐拥 210 亿美元的沙特阿拉

伯国王阿卜杜拉，其次是文莱苏丹，再次则是阿联酋总统哈利法。这个结果可说一点也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是名副其实的王国，君主既有实权还享受到天然资源的原始占有权，国家土地里出油，国王自然也富得流油了。反观一度被传为欧洲最富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实际上只有 5 亿美金的身家，屈居第八，活该她的王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

在我们的常识里面，说一个人有权有势总会联想到一个富人的形象，似乎人只要有钱就能买回巨大的权力，反过来一个人有权就自然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财富。简单地说，钱权是可以彼此交换的。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想把这个必然的连接斩断，使得它们的转换变得不那么容易。因为我们预设了政治和市场是两块不同的领域，各自依循不同的逻辑来运作；又预设了公平是这两个领域都得遵守的价值，尽管它在不同领域体现的方式有异。

在市场活动里面，我们希望见到一个发展商得到土地的原因是他会在拍卖会中出价最高，而非后台够硬。在政治场域里面，我们期盼一个政治家能够领导群雄，是靠公民的信任，而不是因为他有够多的钱可以收买人心。

为了达到这样的理想，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普遍发给占有政治职位的专业政治家一笔不错的收入，就算不能使他致富，起码也能保证退休后体面的生活，因为大家不想看到他以权力投入市场来赚取金钱。同时大家又相信对于政客而言，权力已经是最好的奖赏了。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6 年 05 月 10 日

富豪治国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参与政治的机会都应该是平等的。一个人不能只是因为比我有钱，交的税比我多，就可以拥有多过我的政治权利，进而得到更多的权力。西方民主国家在过去两百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个原则的渐次展现。起初，只有拥占某个数量资产的人才拥有投票权，后来扩大到了所有纳税人；最后，则全部成年公民不论贫富，都有一张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选票了。

然而到了今天，可悲的是许多民主国家国民剩下的，也就是这么一张选票了。《福布斯》杂志近日公布了 2006 年“国王与专政者亿万富豪榜”证明的是个古老的道理，一个国家的政制越是集权，它的财富和政治权力也就越集中，所以沙特阿拉伯国王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当然是他们国家中最有钱的人。可是今天的世界却出现另一股奇特的逆流，那就是有些民主国家元首竟然同时是他们国家的首富。比如刚刚给扳倒的泰国总

理他信和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

就算不谈这么极端的例子，看看前两年《福布斯》杂志拟出的另一份“世界各国元首财富排行榜”，我们也会注意到许多国家领导人原来也都是富豪，例如美国总统布什和副总统切尼。这是什么道理，难道老百姓都喜欢富翁，觉得他们光是有钱还不够，还要让他们统治自己？

当然不是。这是因为现代的民主政治已经变成一种十分昂贵的游戏，要竞选要打宣传战，口袋里没有充裕的经费就根本玩不起。筹款是条出路，但筹款很容易变成明正言顺的官商勾结，以收取财团巨额献金闻名的日本式民主就是最佳范例。要不就干脆靠自己，像他信和贝卢斯科尼那样，先掷下大把的银两，当选之后总有机会连本带利地捞回来。

这种现象的出现，格外令人神伤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全球退潮，因为强调社会财富分配，立场左倾的社会民主主义本来要解决的，就是财富与民主的根本问题。社会民主主义把民主和财富的平等看成彼此相关密不可分的两大价值，相信没有较为平均的财富分配，就谈不上真正的平等。举个例子，一个人若是贫无立锥之地，谋生尚且困难，他又怎么去买报纸关心时事？又怎会有空去参加公民集会讨论政治？

更何况参政？就算他肯放下一天的工作去投票，多半也只能是受到排山倒海的竞选工程蛊惑，不知就里迷迷糊糊地投下了选票。

主张紧缩福利开支的新自由主义如今大行其道，或者真能提升社会主整体的收入水平，但却不只压不住，还助长了全球各地贫富之间的距离。照这个趋势看来，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看见《福布斯》全球元首财富榜和全球国王财富榜一较高下了。

原题为“总统为什么和国王一样有钱”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5月14日

贝卢斯科尼——富豪政客启示录

如果一人自称“只有拿破仑比我伟大，但是我长得比他高”，甚至宣布自己是“政坛上的耶稣”，你会选他当自己家的领袖吗？这个人就是刚刚宣布辞职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意大利人两度把他送上总理的宝座，还让他的政府成为意大利数十年来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

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他以些微票数输了最近一轮的大选，再也没办法代表意大利人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他最擅长的搞笑角色。但是身为外人，我们还是搞不懂过去几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还有一半意大利国民舍不得他。

在所谓的“文明世界”里面，我们很难找到第二个像贝卢斯科尼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了。在最近意大利大选前的口水战中，他把反对派的支持者叫做“一批蠢蛋，一批龟头”。换做广东话，相当于把人称为“×样”。如果是在香港一个政治人物说了这样的话，就算勉强可以播出，那个关键词也一定会给特别声效“嘟”掉。

但是意大利不同，因为贝卢斯科尼控制了大部分的私人电视台，而电视台也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他的发言就算再不驯，也总是可以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放送到每一个家庭里面。除了电视台，他还拥有电台、报纸和杂志，是个绝对的媒体大亨。饶是如此，总是笑口常开。喜欢唱歌又演技高超的贝卢斯科尼还要在一次聚会上苦着脸说：“我们国家九成以上的媒体都给共产党控制了，所以他们老是攻击我。”

前两年，在一次欧盟高层会议结束后的大合照里，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在西班牙外长的头后面做了一个古怪手势。更要命的是，那个手势的意思是“这个人戴了绿帽子”。还有一回，芬兰总统访问意大利，双方要谈判一些经贸往来的问题。贝卢斯科尼叫媒体“放心，她到底是个女人。我会用自己的男性魅力征服她”。

如果贝卢斯科尼只是个说话不经大脑的人，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身上还有数不清的案子。早在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的情治部门就怀疑他涉嫌勾结黑手党走私毒品；他从政之后更是公然地以权谋私，一方面贿赂法官和议员，另一方面则推出一些法案方便他的企业成长(例如把全国教科书的网上售卖权交给他的公司，将意大利足球联赛的电视转播权从国营电视台转到他拥有的电视台手中)。美英攻打伊拉克，意大利也加入了，而他自己的企业则在重建合约里分到了一杯羹。用一句话来讲，自从贝氏当政，其家族财产增加了三倍，现在是意大利首富。

与此同时，在过去五年里，意大利是欧盟诸国之中经济增长得最缓慢的一个，各项经济数据中攀升的是外债数字。它在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的地位，则刚刚被中国取代。贝卢斯科尼曾于2001年在电视上对着国民签下契约，承诺要减税，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要增加补贴和福利，还要降低犯罪率。这些承诺今天——落空，税没有减成，公共医疗系统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教育开支还要加三倍才能达到欧盟标准。至于大型基建，大部分因为太过异想天开而停摆，例如一道比巴黎艾菲尔铁塔高一倍半、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还有一条穿越阿尔卑斯山、全长52公里的隧道。

最近一期的德国《明镜》周刊把贝卢斯科尼叫做“意大利的怪癖”，“很多外国人和意大利人聊天谈到他的时候，脸上的奇怪笑容就像说到拉丁大情人或黑手党教父一样”。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在政府变换之快犹胜走马灯的意大利，贝氏独受国民拥戴长达五年之久？而到了今时今日，他竟然还受到一半意大利人的支持？

这当然牵涉到意大利本身独特的国情。例如它严重的南北差距，众多保守的小型企业主，中间倾右的政治势力中没有太多竞争对手。

此外还有意大利那宽广无比色彩斑斓的政治光谱：意大利共产党是芸芸左翼政党中

的第二大党，再往左靠还有更激进的小党派；现任外长费尼率领的“全国联盟”则是右翼中的第二大党，这个政党直到今天还公然展示墨索里尼时期的法西斯标志。可见意大利人政治取向的差异大到什么地步。而政治力量越是分裂，政坛斗争越是陷入泥沼，人民百姓就越是厌倦传统政客，期盼新鲜的面孔和有性格的强人。

当今民主政治的一大危机，就是这种厌恶政治的情绪，人民对严肃的政治议题丧失兴趣，见到正经的政治脸孔就感到沉闷。于是，一批善于鼓动人民情绪、擅长表演多于从政的“明星”就有了可趁之机。日本从小泉首相以降的一系右翼政客，就是这种新世代角色的标本示范。他们往往把自己包装成无惧传统、敢言敢当的反叛英雄，以经过精心设计的形象装作清流新风。

如果这些人恰巧还是富商，那就更有说服力也更危险了。泰国的他信就是一个例子，他不只可以调动庞大的竞选资源，使对手无力反制，还可以用自己营商的成功例子说服国民：我既然搞企业搞得这么出色。治理政府当然也有一手；我既然自己赚个盆满钵满，当然也能叫大家发财。

贝卢斯科尼是这类人里的极端。他不只有钱，而且拥有两项最足以左右意大利国民的资产：足球和传媒。他是意甲强队 AC 米兰的班主，20 世纪 80 年代叱咤一时的 AC 米兰“荷兰三剑客”就是他收购回来的宝贝。而他亲手创立的政党“意大利力量”(Forza Italia)，这个名字原本就是来自意大利球迷为国家队呐喊加油时的口号，相当于中国球迷在场上吼叫的“雄起”。当他在 1994 年第一次出来竞选总理的时候，AC 米兰球迷会简直成了他的竞选后援总部，全国的 AC 米兰球迷也都自动过户变成他的选民。

最能巩固贝卢斯科尼权势的，当然是他独步意大利的传媒帝国。他不只利用电视和电台的时事节目设定了有利于自己的政治议题，在报纸上降低甚至消除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讯息(例如他在法庭受审的报道)，在杂志中追击抹黑对手的私生活。还利用旗下广告公司的户外展板与大屏幕电视，把自己的样子散布到意大利全境。如果一个外国游客这阵子到意大利旅游，他大概会以为贝卢斯科尼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而意大利则是他的私人庄园，因为他的笑容无处不在。这就是贝卢斯科尼给大家的最大启示：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面写的“老大哥”是在掌握政权之后，才使得自己成为国民最熟悉的形象；现在一个富豪政客却可以先让自己的笑脸投射到每一个家庭之中，再掌握政权。

原题为“意大利是富豪干政的坏榜样”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 年 05 月 03 日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第一个总结市场经济规律的思想家，现代资本主义信念的祖师爷亚当·斯密，其实也是批评资本主义最猛烈的人。

在《国富论》第一卷结尾，他痛斥商人“欺骗和压迫公众”，不止说他们“下贱”和擅使“卑劣的阴谋”，还说“商人工匠只知道为一己的利益。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有钱可赚的地方”，甚至把他们形容为没有良心的冷漠公民，造成社会的“庸俗”。

相反的，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里指出，真正使人称得上美善的是“多同情他人而少些只顾自己的感受，抑制吾人的自私欲望，尽情发挥我们仁善的爱心——人性的完美由此组成”。

即便如此，他还是为资本主义鼓与呼，称颂“看不见的手”之美妙，说富人们的自利行为无形地促进社会的利益，并让其种类滋生的繁衍，即使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也不知有此后果。表面看来，亚当·斯密是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他明知市场经济无益于人性之完善，明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一个道德的社会，但依然把他十分珍视的“四大美德”之一的恩惠，排除在他所设想的政治生活与社会体制之外。

因为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他首要的战斗目标是政治和信仰的自由，而非古代学者如亚里士多德等所提倡的道德美善。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一种可以把人民从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体系，还人以自由、买卖、投资和定居的自由。

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道德乃个人之事，政府不应该为所有人设定生活的目的和方式，它不能规定我们的信仰和人生规划，也不能限制我们要过怎样的日子。市场经济不需要恩惠和同情心做它的基础，它根本就和这些道德无关。

公司为牟利而存在，这是一种社会体制；至于个人要不要行善，则是他自己的事。所谓有良心的资本家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两者之间的偶然碰撞，而非必然的因果结合。盖茨和巴菲特的仁慈并非市场规律的基础，纯属个人的取向。

比尔·盖茨最近发现要改善第三世界的卫生状况，不能不从减贫下手。但他立刻了解到要帮助贫民搞小买卖谋生脱贫，没有银行愿意贷款是个难题，于是投资开设不以牟利为目的的“微型金融机构”。这就是巴菲特那句“市场经济解决不了贫富差距”的真义了，不以赚钱为目标的银行和药厂是不存在的。

这两位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善举，吊诡地彰显了一个根本问题：市场经济帮不了最苦的人，我们只能期盼个人偶发的善心。然而，这世上还有多少个盖茨和巴菲特呢？

原题为“看不见手，更看不见良心”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6年07月14日

传媒帝国的阴影

给人骂了几个月之后，默多克终于在8月9号开腔响应：“在收购《华尔街日报》的这三个月里，其中一件最辛苦的事就是面对批评了，那些刻薄的语言只适用在搞种族灭绝的独裁者身上。”他也没说错，在《华尔街日报》将被他收购的消息传出之后，不只网上的另类媒体大肆攻击这位“邪恶大亨”，连许多备受尊重的主流传媒也不放过这个“澳洲来的骗徒”。其实早在这桩震动全球媒体界的大事发生之前，默多克的“邪恶”形象就已经家喻户晓深入民心了，甚至连007系列电影其中一集的反派角色也是用来影射他的。

默多克到底做错了什么？根据一些反对者的说法，他的罪行简直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所以还真有好几本书即要用上数百页的篇幅来罗列他的恶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指他降低了新闻的水平，例如他旗下的《纽约邮报》和《太阳报》都是擅长贩卖腥膻色甚至不实的驰名小报，而他的旗舰电视频道“福克斯”（Fox）则不只立场偏颇，还常常把新闻弄得像是娱乐表演一样，乃当今“信息娱乐”（Infotainment）潮流的代表者。

自从“九一一”之后，他的“新闻集团”更全力替美国新保守派护航，一方面歌颂出兵伊拉克的决策英明正确；另一方面则攻击反战分子，把他们形容为“自由的敌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外，他也紧紧跟随鹰派的脚步，例如2006年中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开启的战事，就被他拥有的一份澳洲报章说成是，“以色列慷慨地送了一个大礼给黎巴嫩”。

对所有“反恐战争”和英美保守派的反对者而言，默多克固然是个大敌。但有趣的是，《华尔街日报》的言论也一向以保守派著称，在经济上他们主张政府尽量放宽市场监管，与默多克的新自由主义立场非常接近；在政治上，他们让像John Yoo这样的鹰派学者发表了许多支持布什扩张总统权力的文章，在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幕僚利比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之际，还坚持为他辩护，这也应该很合默多克的胃口。既然如此，默多克收购臭味相投的《华尔街日报》难道不是一次天作之合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担心《华尔街日报》会被玷污，而自由派则痛骂默多克的野心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原来拥有《华尔街日报》的班氏家族一直被认为是美式报业家族的代表之一，比起其他的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他们对编辑自主的原则守得更紧，尽量不去干涉编辑的言论立场和运作方式。此外，《华尔街日报》还是一份出了名的性格分裂的报纸，它的社论和其他言论版上的内容固然非常右倾，可是新闻却相当独立，甚至有和评论版对着干的势头。据说新闻部的记者们私底下还会把评论部称作“纳粹党”。反观默多克，在他的牢牢控制之下，“新闻集团”一百七十多份报纸在“反恐战争”期间发出的几乎是同一种声音。当年他收购英国的《泰晤士报》时也曾像现在买《华尔街日报》一样，答应公众绝不改变编采独立的传统，最后还是食言收场。

更重要的是，是《华尔街日报》的保守乃一种价值上的保守，他们自有一套“自由市场与自由人民”的社会哲学。而默多克的保守似乎只不过是种现实利益的需要，当撒切尔夫人主政英国的时候，他就站在保守党那边；当工党在大选稳操胜券，他就离弃了保守党的候选人。近日的新闻，则是在他私下赞助的美国右翼的眼中钉希拉里，一个和他保守“理念”截然不同的“自由派”政客。此外，《华尔街日报》出于自己的价值观，时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今年使它夺得普立策奖的一篇报道就是一份大谈中国经济副作用的调查报告。

原题为“邪恶的梅铎”
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
2006年08月13日

超级财团垄断传媒的年代

这个世界上喜欢把原来很严肃的刊物变成媚众取宠的小报的老板，绝对不止是默多克一个人；和他一样事必躬亲总是要传媒紧跟自己政治路线的，更是数不胜数；可是兼备这两项条件，同时还要很有钱也很有野心地去建立一个传媒帝国的，恐怕就只有默多克了。所以，默多克是令人畏惧，甚至叫人厌恶的。

默多克收购《华尔街日报》，最叫全球传媒中人担心的还不是这份大报日后的走向和质素，而是整个媒体世界的命运。

言论自由是很脆弱的，它需要很多具体的条件来保证它的健康存在，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媒体所有权的分散。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一个地方的传媒机构大多被政府或单一财团垄断，那么，任何不利于这个政府或财团的言论就不大可能出现了。再假如那个财团还有很明确的政治取向，而且强硬要求下属媒体跟随，那么，不只所有不同于这个取向的意见会被消音，甚至连有碍于传播这个取向的一切讯息也极有被排除障蔽的机会。

就算这个财团没有既定的政治立场，也不表示各种言论可以在它拥有的媒体上任意流布，因为它的生意太大太杂，所以它要顾虑的东西也就比别人多了。就以默多克当年下令取消曾经是“千古罪人”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忆录合约一事为例，彭定康那本书的出版社 Harper Collins 其时还没有开拓中国市场的打算，为什么默多克要担心中国方面的反应呢？那是由于默多克还有别的生意要在中国做，他不想为了区区一本书就失去了巨大的电影电视市场。如果 Harper Collins 还是一家独立的出版社，或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难道除了默多克就找不到别的出版社了吗？当然不是。除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全

世界还有时代华纳等五六家大集团，它们合共拥占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出版市场。而且要注意，它们都是跨媒体经营的，在出版以外，它们更庞大的生意是电影、电视、电台和网络这些最赚钱的产业。这是个超级财团的战国时代，谁想活下去，谁就要选择依附靠拢的对象。所以，《华尔街日报》的主要对手，英国的《金融时报》最近也开始紧张了，急着要找可以栖身的大树。

这些财团大多来自美国，而美国的建国父辈都很了解言论自由与分散传媒所有权的重要，因此依循他们的精神，美国曾经有各种限制传媒垄断的法例和规定，例如不准一家公司在同一个城市同时拥有电视和主要的日报，也不准一间公司在—个地区市场拥有多于两家的电视台和多于六家的电台。这些规定是为了保证地方性的小媒体和媒体市场的多样性，以免被—把声音吞没了整个资讯环境。

但是，以新闻集团为首的这些大财团却出了一大笔钱在华盛顿搞游说，试图说服当局放松管制。他们的理由是传媒生意到底也是生意，既然做生意要依循市场规律，政府就不应该去限制他们做生意的自由和破坏价高者得的买卖本质。这些道理不只完全符合近二十年来称霸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也是默多克等人天天利用旗下媒体鼓吹的“常识”，所以，那些原来挡着他们发财的关口终于被—攻破，几家财团开展了瓜分天下的黄金之旅。值得一提的是，默多克聘用的许多说客本来就是负责管传媒的退休高官，他给出的高薪对仍然在位仍然掌权的官员当然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私下为美英政治领袖提供捐款，公开利用媒体为他们做宣传的功绩就更不用说了。

《洛杉矶时报》透露，默多克的下一个目标将是《纽约时报》。看来，全世界唱同一首歌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7年08月19日

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泛谈足球如政治的关系很容易，但如果要说清楚两者到底是怎么联系起来的话，就有点难度了。政客总是想利用足球，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到佛朗哥，都曾经试图让足球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而球迷也未曾停止过把自己的国仇家恨投射在足球之上，例如所谓“英阿大战”，就一直被解读为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福克兰群岛战役的延续。但是，足球为何能够担起这样的重任？围绕它的巨大情绪动力又是怎么来的呢？

伊朗大师级导演基阿鲁斯达米拍过—部片子，叫做《春风吹又生》，描述—个电影导演在伊朗山区的强烈地震之后，前往灾区寻找曾在他—部片子里担任主角的小孩。结果令人失望，直到片末，在—片颓垣败瓦之中，在流离的灾民堆里，我们就是看不见

小男孩的踪影。

然后，动人的一幕出现了：就算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正在努力收拾破山河的伊朗人连帐篷都还没搭好，竟然先七手八脚地赶着架上天线，装好电视，赶着收看 1998 年世界杯。电视打开那一刹那，远方球场上的喧哗立刻为这山谷带来了久违的生气。

在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为了那一点点的甜美，生活还是值得继续过下去的。就像独立之后就陷入内战的安哥拉，三十年来的战火葬送了无数百姓的性命，遍地皆是的地雷炸断了数十万计的大腿。但是敌对阵营的士兵偶尔碰上了却会踢场友谊赛，为了他日战场再见时能够念在踢过球的因缘手下留情；而难民营里则不乏拄拐杖还在追逐用破皮包卷成的足球的儿童。如今安哥拉首度打入世界杯决赛周，虽在首仗败给前殖民宗主国葡萄牙，可是虽败犹荣，斗志昂然，振奋了安哥拉全国上下的民心士气。战争可以摧毁一切，但是战争摧毁不了足球。

放在国际舞台，足球还可以织起最不可能出现的网路。例如这一届的世界杯，其中一个焦点，就是伊朗能否打进 16 强，因为曾经宣称“纳粹大屠杀并不存在”及“以色列应该在地图上消失”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届时可能亲赴德国观赛。欧洲政界及犹太人团体早就强烈抗议，要求德国政府禁止他入境。在伊朗首战墨西哥的比赛中，也有许多人示威，谴责在场的伊朗副总统。可是最怪异的情况发生了，一批极右德国新纳粹分子居然聚众游行，声援来自中东世界的伊朗队。这些平常在欧陆不会特别宽容的种族主义者，现在竟以内贾德为同道。

伊朗总统内贾德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固然站稳宗教上的保守路线，受到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支援；但他同时也是个打民粹牌起家的政客，精于迎合民意。而宗教上的保守主义和迎合大众的民粹倾向并非总是走在同一条轨道上的。

美国《新共和国》杂志主编 Franklin Foer 在《足球如何解释世界》一书中曾经报道过伊朗的“足球革命”，让我们了解到足球与政治的复杂纠葛。在伊斯兰革命之前，足球就被巴勒维王朝奉为国家世俗化与现代化的一面旗帜，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及至什叶派教长掌握政权，虽然讨厌这种袒露大腿的运动，但已无法将它从伊朗人的生活之中抹除。妙的是上任总统卡塔米和现在的内贾德都标榜自己是球迷，在竞选的时候纷纷找来明星级球员助选。可见即使在伊斯兰神权政治里面，外来的足球还是一种统一民心的手段。

问题是在于世界杯是以国家而非宗教为单位的，这个世上只有伊朗队，没有“什叶队”。于是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和宗教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潜在矛盾就被足球给射穿了，触发这火头的是另一组社会矛盾——根据伊朗当局的规定，女性只宜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转播，不可到现场观赏那些男性的躯体，更不能在球队获胜的时候拥到街上庆祝。

1997 年，当伊朗队在墨尔本打赢了澳大利亚队，首次取得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门票，凯旋班师德黑兰，在世上最大的球场阿札迪搞庆功大会的时候，数以千计的女球迷

不理禁令，脱下长袍，拥到球场闸门前，意图冲进场内。她们喊的口号就是“阿札迪是我们的权利”（阿札迪是自由的意思）和“我们也是伊朗人”。吓傻了的警卫居然就让一部分女球迷进了球场。这就是有名的“足球革命”了。这些女性用民族主义当武器，要求和男性同享足球带来的光荣与乐趣。自此之后，足球就成了一种解放的象征，不只是女人的议题，还是一些被压抑的诉求释放的途径。因为在球场里面，亢奋的大众可以喊出粗俗无比的言语，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口号。好些球迷俱乐部实际上成了女性主义和公民社会意识的温床。

为了贯彻他的民粹路线，为了掌握最新的形势，内贾德不只在本届世界杯前向伊朗国脚致意，说他们的成就媲美那些正在开发核技术的科学家。他甚至还在4月宣布解除女性进入球场的限制，让伊朗女球迷欢喜若狂。虽然伊朗最高精神领袖最后又否决了这道命令，使一切打回原形，但这到底是这位总统和老教长们的第一次公开矛盾，令人瞩目。

足球绝对可以成为政治权力的武器，但是它又能反过来滚动出当权者意想不到的力量，掀开社会被压抑的另一面。看来那句老话果然有理：足球的确是圆的。

原题为“政治之手永远抓不牢足球”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年06月16日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

据说1994年当拉丹还住在伦敦的时候，是阿森纳的球迷，偶尔甚至会进海布里球场看球。一个许多人眼中杀人不眨眼的狂魔居然也是球迷，而且还是一支英国传统球会的支持者，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知道他今天还看不看足球？要是看的话，他还是看英超特别是阿森纳的球赛吗？假如他躲在巴基斯坦的山区里，收不收得到卫星电视的讯号呢？他会不会和我们一样，为了世界杯而废寝忘食？与我们同时握紧拳头，同时挥臂高呼？

一颗小小的足球就是这样提醒了我们，原来大家全都住在同一个地球上。我族人类，不论肤色、语言、文化、性别、宗教与政治的区别，全都有爱有恨，会欢呼大叫，也会悲情落泪。尽管我痛哭的理由可能就是你狂喜的原因，比如说我支持的巴西队败给了你硬挺的德国队，但是无疑我们都是有情绪，而且情绪会起伏的人类。足球证明了这点——往往在我们骂人“不是人”的时候忽略掉的基本事实；即使拉丹，原来也是一个人。

说到今天的足球，很难不联想到全球化。在芸芸论足球与全球化关系的文章中，最

有力也最不失精简的人，大概就是科尔·比威特(Dirk Kurbjuweit) 在德国《明镜》周刊世界杯特辑上的《全球游戏》了。

他指出：“美国是政治上的全球强权。其他的强权则是以美国为家的大型企业：麦当劳、可口可乐、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微软与谷歌。不是反美，只是我们应该庆幸至少有一种力量使得全球化不会沦为美国的势力范围。”

的确，又有世界杯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全球贫富强弱悬殊的年代，看到一丁点公平的希望。原来饱遭内战困扰的非洲国家科特迪瓦，是可以和欧洲豪门并驾齐驱的。只有在世界杯的球场上，伊朗可以暂时抛开被排挤的阴影，与其他国家同台往来。也只有世界杯，能够让南美人挺起胸膛地站在美国面前，昂首宣布：“我是王者。”

四年只有这一个月，我们可以稍微记起巴别塔(Tower of Babel) 崩塌前的人类本是同一种动物；四年只有这一个月，我们可以暂时忘记世界本是何等的不公。为此，我们都应该恳切地祈求上苍，不要在这个月里降下灾难，恐怖分子不要发动袭击，美军不要再滥杀平民，种族主义者不要把仇恨化为暴力。毕竟我们只有这美丽却又可怜的一个月。

原题为 “ 美丽又可怜的世界杯月 ”
刊于《南方都市报》
2006 年 06 月 14 日

鸣 谢

我要特别感谢业师石元康教授，他是华文学术界第一代的罗尔斯（John Rawls）专家。我愚钝懒散，没能学到他研治政治哲学的半成功力；可是我在他身上见识到了客观分析与清晰逻辑的魅力。

多谢《明报》的刘进图先生和陈锦强先生，《am730》的冯振超先生，《南方都市报》的李文凯先生、邓志新先生、何雪峰先生、李海华先生和评论部诸位同仁，《南方周末》的鄢烈山老师及蔡军剑先生，以及“牛博网”的罗永浩先生。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鞭策，这本书里的文章是出不来的。

多谢邓小桦小姐及陈景辉先生，他俩花了好大工夫才把我散落各处稿件收集齐全。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公司的刘瑞琳老师，她很勇敢，居然愿意出版这本不只容易过时而且使人过敏的集子；蒙她不弃，拙著方得面世。陈凌云先生、吴晓斌先生及李丹婕小姐勤奋精细、博学敏锐，是每一个作者都会梦寐以求的专业编辑。而陆智昌兄在极有限的时间里面不眠不休地设计拙著封面，这份人情义气，我怕我还不起。